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七月的人民



（桂）新登字 03 号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七月的人民
〔南非〕纳丁·戈迪默
（1991 年获奖）
莫雅平等 译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插页 6　字数 356000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800册（内精装1250册）
ISBN 7—5407—0860—3/I·603

定价：平　　装 10.50 元
彩盒精装 17.00 元

目　录

七 月 的 人 民

（1981）

臧清、臧洁　译



旧的正在死亡而新的还未能诞生；在这个空位期，产生了大量病态的征兆。

——安东尼奥·格拉姆齐：

《狱中笔记》

你们要来杯茶吗？——

七月弯着腰站在门口，像他们黑人过去一直为他们的白主人做的那样，替他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敲门声。七点钟。在总督官邸，在旅馆的房间，在倒班老板的公司平房，在带主卧室的高级套房①——散发着救生圈牌肥皂味的黑手上的茶盘。

敲门声。

没有门，只有厚厚的泥墙上的一个窟窿，在短暂的夜里，吊在上面当门帘的麻袋片有时候被风吹得打起卷来。巴姆，我要憋死了，她的声音把他从精疲力竭的死人一般的昏睡里拽出来，他摇摇晃晃地坐了起来。

没有敲门声，只有七月，他们的仆人，他们的房主，拿着两只粉红色的玻璃茶杯，还有一小听炼乳，专门给他们的，撬开的口子参差不齐，里面放着一把勺子。

——我不要牛奶。——

——我也不要，谢谢。——

这黑人往那边看了看，三个孩子躺在从车里搬来的车座上睡得正熟。他微微一笑，放心了：——他们都很好。——

——是的，很好。——这时他正从门口弯下身子退出去：——谢谢你，七月，非常感谢。——

① 本书加点的字原文为斜体。

她以前也曾在这种顶上覆着茅草的圆形小土屋里睡过觉。在克鲁格公园，倒班老板的一个孩子和他全家在度假，桌上摆着橙汁啦，饼干啦，等等，还有一只搪瓷脸盆和水罐。而今天早晨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这一切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了。那儿的朗达屋就是巴姆的布尔人① 祖先根据黑人的土屋改建的。这种房子是非洲大陆地道的乡村风格；在有空调以前，人人都称赞茅草屋顶天然隔热的优点。朗达屋铺着红油漆又浓又亮的、印着蚂蚁爬痕的水泥地板；在博茨瓦纳，她和巴姆带着他的猎枪以及猎人喝的红酒一起也在土屋住过。现在他们住的这一间是所有其它小屋的原型和再现：在她身下，在这张铁床底下，是留着泥巴和粪便印记的地板，就在这张床生锈的弹簧上面他们铺开了汽车的防风油布；在她上方，枝条粗粗编成的尖顶支撑着破损的灰色茅草顶，粘满灰尘的蜘蛛网晃晃荡荡地垂下来。几道光柱射进来。泥墙和屋檐没被砌合的地方泛着一道黯淡的光影；黄蜂或者蝙蝠用浅色泥巴筑的巢牢牢地粘在那儿。门口环着一圈的亮光；一只秃毛母鸡带着一群小鸡进来了，叽叽喳喳叫着，发出世界上最柔弱的声音。它的温和和普通展现出了突如其来的、整个的不信仰。莫琳和巴姆·斯迈尔斯。巴姆福德·斯迈尔斯，斯迈尔斯和凯普兰诺及其合伙人建筑设计公司。来自西部金矿区的莫琳·海德林顿。约翰内斯堡茵斯坦福剧院十岁以下儿童的古典戏剧及哑剧银杯赛。她又闭上了眼睛，汽车东倒西歪的颠簸在她脑袋里旋转，就像乘船的人刚刚踏上岸：海里的滚滚浪涛仍然使脚下的陆地翻腾不已一样。她沉沉入睡了，三天三夜以来不时地藏到汽车底板上这么睡着，起先还感觉到关节都被车身的猛烈晃荡震得脱了位，后来

① 布尔人，非洲南部的荷兰人后裔。

全身散了架，反而能合着颠簸单调的节奏起落了。

人们在极度兴奋中上升，下沉，上升，下沉，会时而清醒时而迷糊。这一番摇晃、震颤、摔撞、颠簸停下来之后，生活才降落到实地上。那辆汽车像患了热病。在孩子们晕车呕吐的难闻气味中，金属片和松了的插销叮当跳着，乱响了一路。渐渐地，她越来越长时间地从汽车带来的昏头胀脑中上升。起先随她一起落到实地的是那已经消失了的一切，是过去。在昏暗中，在一间部落小屋不断移动的光亮中，她使心境重新归于平静，那是从前有一次她的姐姐到寄宿学校去了，她在属于矿山地产的那栋倒班老板的房子里，独自一人对一个房间曾有过的心情。她挨个儿回想起书架上她的那些收藏品，微型的黄铜咖啡壶和托盘，其中一头断了牙的四头骨雕的小象，背上画着英国国旗的土黄色的陶制叭喇狗。一个薰衣草香袋装饰着天鹅绒勿忘我花，从梳妆台可移动的镜子上端吊下来，把窗户分成两块，窗外透进来的光线被金属纱窗上的细小方格滤成了一张网，纱窗眼里塞满了矿尘和死蚊子。一个刻花的玻璃香水瓶，它凹陷进去的银塞子被多年干在上面的一层层丝尔佛擦光油粘在了瓶颈上。她上学穿的鞋，我们的吉姆(倒班老板的名字也是吉姆，所以她母亲提到丈夫的时候说“我的吉姆”，提到家里的仆人则说“我们的吉姆”)给刷得干干净净，放在门外。一只眼睛和耳朵之间有一块胎记似的褐斑的兔子，正在花园的笼子里等着人来喂……开车远行本来可以让他们忘却已经失去主人的那套房子，可是这次旅程却似乎远远超出了这种设想，颠簸使他们失去了正常的时间感觉，如同失去了她每次恢复回来的意识习惯于归属的房间，那个她四天以前才离开的房间。

几头猪的影子移过门口，同时传来她完全不懂的一种语言

的召唤声。有一回，她知道——她一直知道——她丈夫即便像个醉汉似地打着呼噜也是醒着的。她听见自己在说话。

——车在哪里？——她看到也感觉到了她自己的思绪还缠在汽车上。

——他说藏在灌木丛里了。——

又有一回，她听到什么东西在沙沙响或者在啃着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

他没有回答。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开车，三天三夜了。即使没再睡着，也被睡魔攫住了。

她开始慢慢地在她周围安顿起来，小屋除了铁床，仍是空荡荡的，孩子们在汽车座上沉睡着——这里的其它东西属于另外一种范围：一张卷起来的硬牛皮，挂在钉子上的一把锄头，一小堆破布和一只靠墙放着的、残缺不全的燃汽炉。母鸡和小鸡在那儿活动；但她所听见的那些轻微的声音不是发自它们。也许是小老鼠和大耗子的声音。苍蝇在空中游荡，发现并叮上了孩子们的眼睛和嘴巴，孩子们或许仍然散发着呕吐味，脏兮兮的，睡在那里，倒还安然无恙。

这是一辆多功能的小型卡车，备有三升的发动机，十四英寸的车轮装着很厚的载重轮胎和一个坚固的标准底盘，买主还在顶上配了带窗户的玻璃纤维防风篷盖，车厢后部两边排着有海绵垫的长凳。它是为白人家庭，一般来说是生在南非的欧洲人，制造的一种便宜的汽车兼带篷车，他们的混血兄弟们也用这种车。对于多数富有的南非白人来说，这种车是城里汽车不宜用时的二等的运动车。

车是黄颜色的。巴姆·斯迈尔斯在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送了这辆车，用作狩猎马车。他一年到头不管什么时候都喜欢飞靶射猎，冬天到来的时候他就在灌木林里度周末，在离城里的办公室和家两百公里的范围里，打珍珠鸡、红腿石鸡、野鸭和刺儿翅鹅。孩子出生以前，他曾经带着妻子去更远的地方狩猎旅行——去博茨瓦纳，还有一次，是在葡萄牙政府被推翻以前，去了莫桑比克。他宁可开枪打一头公羊也不愿向一个人射击；他也从不在枕头下面放一把左轮手枪以保护他的妻子、孩子或他们在郊外房子里的财产。

这辆车是为了快乐而买的，就像有些女人据说是为了快乐而生的一样。当他把车买回家的时候，他的妻子把脸拉成品尝齿尖什么东西的样子。而他保护了这个染了金发的活泼人儿；黄颜色是快乐的，它抵得住酷热。

他们——妻子和全家溺爱地站在汽车四周，孩子们很兴奋，好像没有别的事情能比这一新财产更让他们兴奋了。买东

西是他们最高兴不过的事；他们对养兔子根本不感兴趣。她对他微笑着，像他平日里突然活力迸发，冲在她前头做了他想做的事时那样；结婚以后她还从未这么看过他。——有些东西能让人在一英里外就认出你来，即使你在丛林里。——

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某些东西和人会变得至关重要。事物能不能存在下去，是由它自身的特性决定的，事先并不能知晓。单个人能知道什么呢？国内紧急状态规划服务局也提供不了什么情况。(1976年，索维托暴乱之后，制药商行开始生产政府认可的急救箱)各种情况出现的方式是不可预测的，即使有基督的启示和政治的预见，起关键作用的人和物都总是因为他们角色的卑微和琐屑而隐于情境之中，被你视而不见。

事情发生得自然而又离奇。1980年的罢工，由于工人团结而此伏彼起，一直发展到罢工停产被视为持续不断的家常便饭的程度，而不仅仅是工业秩序的混乱。政府表面上在向黑人工会让步，实际上是在以精巧的措词掩饰伴随让步而生的限制，与此息息相关的黑人工人却在挨饿、愤懑和失业，车间的地板常常是被焚毁的工厂所留下的全部东西。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真正了解在他能亲眼目睹的地区之外还发生了什么事情。暴乱，纵火，对国际公司总部的占领，公共建筑物里的炸弹——对报纸、电台和电视的审查制度使得谣言和口头消息变成了了解全国动乱状况的唯一信息渠道。在国内，索维托几个星期的异常骚乱之后，一次一万五千名(据估计)黑人向约翰内斯堡进发的游行在商业中心的边缘地带被拦住了，代价是一些(有各种传言)黑人和白人的生命。那位曾请巴姆给他设计过一栋房子的银行会计师透露说，如果城里的局势没有将被控制住(他的话)的迹象，银行将不得不宣布欠款的缓期兑付。巴姆虽然对自己的做法抱着一种超然的怀疑态度，还是拿着原先曾装过日本高

保真音响的压模泡沫塑料箱子，去提取了五千兰特的钞票，莫琳也拿着她的存折发出了二十四小时内必须结清的提款通知，并且清了帐，一千七百五十六兰特的钞票，用橡皮筋扎得牢牢的，她把它们装在一个草编的购物袋里，顶上故意显眼地叠放着从干洗工那儿取来的巴姆的衣服，平安无事地带回了家。

不过后来银行并没有关门。市民武装阻止住了黑人(他们当时缺少弹药而且很久以来早就放弃了用棍棒和石头迎向子弹的英雄主义)，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一些前塞勒斯侦察兵，适应这种类型的战斗，他们充实了市民武装的力量，而且从塞舌、扎伊尔、乌干达来的白人雇佣兵也空运到了——不管在哪儿，他们都是阿明，博卡萨和穆布图斯[1] 的政权支柱。孩子们呆在家里不上学，在和平的庭园里疯玩起巷战的游戏来。酒店忽然送来了几个星期前订购的葡萄酒和啤酒，两个黑人穿着绣有一种甘蔗酒标志的工装裤，把酒箱子搬到厨房里，还跟佣人闲扯开玩笑。二十次了，一百次了，自从五十年代的焚烧通行证，自从夏普威尔事件，自从1976年的索维托之乱，自从1980年的爱尔西河事件，看来一切都会平息下去的。

起先斯迈尔斯夫妇准备留在这里十年，后来又多呆了五年，再后来有了孩子，计划又得推迟。他们完全不想再呆下去了，却一直没动。一想到他们可能会像过去那样度过一生，只是替这黑色大陆生养了几个白色杂种狗，这念头就让他们恶心，受不了。他们曾经想加入旨在取消特权的政治党派和“联络”团体，因为这些特权久而久之会成为白狗子的天性，和幻影飞机、坦克一起来防范黑人，但人们不相信他们。那时他们就想到过离开，他们正当年轻，完全能够把黑人的拒绝连同白

---

① 阿明、博卡萨、穆布图斯：均为非洲国家有名的独裁者。

人的特权都抛开，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但他们还是留下来了；两人对自己对别人都说除了这里哪儿都不是家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知道钱拿不出来变成了他们不走的原因——包括巴姆不断增长的存款和投资、莫琳的外祖父作为一小笔遗产留给她的啤酒买卖分红以及由于城市骚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越来越难卖掉的房子。这第一百零一次骚乱，结果又是老样子，上千名黑人被逮捕，碎玻璃被扫走，割断的电话线被重新接上，电台和电视保证说局势又被重新控制住了。夫妻两个觉得把钱藏在家里很愚蠢，打算把钱再存回银行去……

所有这些过程和细节，都成了神话故事或宗教寓言的变体。银行会计师就像非洲民间传说里的报警犀鸟，它预示危险的一鸣即逝的叫声常常被忽略了。那辆本来为快乐买的黄色小卡车变成了交通工具：载着他们逃离了枪炮声中的商业区林荫道和火光熊熊的、在不景气的市场上没能卖掉的房子，逃离了把他们全身淋了个遍的炸破了的自来水管道，他们身上正穿着星期六早晨的猎装外套，逃离了打下过波音飞机的热导火箭，飞机上满载着试图从珍斯穆茨机场逃命的人们。厨娘诺拉先跑掉了。那拿着主人慷慨的工资心满意足的男仆没跑，他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就一直住在他们的院子里，他们给了他两套制服，土黄色的裤子干粗笨的家务活时穿，白色斜纹布的伺候餐桌时穿，每星期三和隔周的星期天还给他放假，允许他的朋友来看他，并允许他镇上的女人来他的房间跟他睡在一起——他最后成了被挑中来决定他们的生活的人；他是青蛙王子，救星，七月。

他拿来了一个足够孩子们一个一个坐进去的镀锌的大澡盆，头上还顶了一煤油桶在做饭的火上热好的水。她给孩子们

洗了澡，然后用他们的脏水给自己洗；她平生第一次发现她两腿之间有股难闻的味儿，并且——把孩子们打发出去，用麻袋把门口挡好以后——满心厌恶地在肥皂水和泡沫里搓洗她光滑的阴道内里和肛门上看不见的疖疤。她丈夫找了个机会到河里洗澡去了——所有这些向东流的河都有血吸虫感染的危险。

七月跑前跑后地拿来了粥，煮熟的野菠菜，居然还有一个又硬又青的木瓜——不管什么情况，这个家庭每顿饭必以水果来结束的规矩，还被这么长时间熟知他们的他仪式般地遵守着。这儿没有制服（他穿了一件颜色褪得模模糊糊的T恤衫，一条落满灰土的裤子，外套是他留在家里两年一次的休假时才穿的），但他进出这小屋，仍保持着十五年来在他们家一直具有的耐心，服务式的而非奴性的态度，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喜好，在各个方面适应他们的要求标准，甚至对孩子们的管束和娇惯方面也是这样。

——我们要自己做饭，七月。我们要自己生火。——客人声明添了麻烦，他和她注意着她屋子里的参观者的每一点反应，他们离开的时候都轻轻地碰了碰他。

他给巴姆拿来了木柴，黄昏时他又来了。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他不放心。——你们要我现在生个小火吗？——他带来了满满一糖浆罐的奶。还有个小男孩跟他一块儿来了，白天早些时候他曾把那些好奇的黑孩子们撵走的。——这是我的三儿子，和维克多差不多大。维克多是一月二十一号，是不？这孩子是圣诞节那天.——

以前在家里，孩子们见过仆人的孩子的照片，那跟银行存折一起放在他的钱夹里。他们看着这个黑孩子就像在看一个冒名顶替的家伙。

——是从母羊身上挤的，这种奶我们喝，不知道吉娜喜欢

喝不。吉娜总爱挑点刺儿。太太，你可以把奶煮一下——他眯起一只眼，嘴唇翻到胡髭那边，表示一种劝告，极其体贴地指出卫生方面的欠缺，假如拿这羊奶，这糖浆罐，跟以前在那儿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消毒牛奶瓶相比的话。

夜里，汽车从灌木林开到了一片在七月一家人视野之内的废弃小屋之间，后来又挪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了。像旅程中的一些路段那样，巴姆没开汽车前灯，而是靠七月黑暗中的导引向前移动。这样他们可以避开巡逻兵和流动哨。七月的经验或本能告诉他，乡下小村子里的黑人加油工通常住在修车铺兼百货店的混合铺子后面的棚子里——凭着这点了解，他们能保持往前开，继续往前，尽管他们剩下的燃料只够他们走不到一半的路了。七月要了些泡沫塑料箱子里的钞票，每次都能换些汽油、水、食物回来。这真是一个奇迹，完完全全的奇迹。而且一个人应当清楚，根据圣徒们的苦难，奇迹都是恐怖的。车上只带着他们紧张匆忙中胡乱抓到的东西(那袋桔子是莫琳跑回厨房取来的，收音机是巴姆记得拿的，好听听他们出逃的时候身后正发生什么事儿)，怎么能指望到达安身的目的地呢——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希望越来越渺茫。——咱们可以去我家。——七月说，站在他从来没有坐过的起居室里，就像过去地板上有一点污渍要清除时他说“咱们可以买点儿煤油”一样。他应当决定他们该干什么，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的无助使得他不得不这么做——这颠倒了他们逻辑上应处的位置，但除了这不可做的事以外，其它更不能做了，他们已经耽搁得够久了。他们把孩子们送上汽车，用一块油布把他们一盖，莫琳也爬到下面，就开车了，现在他们已经不知道汽车怎么没有垮掉，居然狂奔着越过了草原和玉米地、花生地，驰进了峡谷，还穿

行在河沟里，里面满是夏天涨水时会被淹没的石砾；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找到路的，不敢走大路，用了三天三夜才走了正常情况下辛苦点开车一天就能走完的路程——亏了有七月，七月知道这六百公里全程的情况，他第一次到城里找工作的时候曾经步行走过，当他沿路穿过克鲁格公园的时候，夜里还得点起火来吓跑狮子。

汽车开进了一个正好能围住它的没顶棚的小屋。小屋像一座大蚁冢那么红，厚厚的泥墙上好多地方被冲掉又和泥地融成一片了，矮树伸进墙里，像被扔在拆了一半的建筑里的测绘仪支架。汽车轧平了地上高大的杂草，碰断了遮成天顶的树叶，蒺藜和爬藤密密地覆盖住了汽车的黄漆颜色。

从分派给他们的小屋的门口，她可以看见那辆汽车。或者说她以为她可以看见车在那里；她知道车在那里。从路上最后一个村子弄来的一塑料坛子自来水，还留在车里。在远处窃窃私语的黑孩子们的注视下，她悄悄地走过去取了水给她的孩子们喝。她一脚踏进去，全身的重量把发热的金属板压得轰隆隆闷响，犹如又踏进了一座废弃的房屋。挨过扑打的苍蝇仰翻在地上，嗡嗡叫着一会儿就蹬腿了。这汽车真的就像她以前进过的一幢破房子。

——你从空中看不见汽车。——他们曾经看见两架飞机飞过，尽管是在很高的高度。巴姆感到很满意，这辆车不会招来炸弹，莫桑比克黑人军队的飞机有时会侦察灌木丛林，在这样一个一辆破车也算件稀罕物的地区，这辆车很可能被看作令人起疑的白人军事设施的标记。

七月的家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个被他的家族占据的土屋聚居地。那儿也像他早就想到的那样存在着危险，就是说，他虽然能说服他们同意这些陌生白人呆在他们中间，并且闭上嘴

巴不传出去，却不能阻止其他那些分散住在四周的人，这些人熟悉每一片荆棘灌木林，一旦发现有片荆棘林里藏着一辆白人的汽车，就会把消息报告给任何一支黑人军队巡逻兵的。即使他们不这么做，也会动手干点别的。

由于她对一种她不理解的权威——他的权威的忽视，七月陷入了让人好笑的窘困；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告诉了他们——每一个人——关于汽车的事。

——跟他们说了什么？——她一向信任他点子多、感觉好；他已给她干了多年了。巴姆常常搞不懂他不成句的英语，可是他和她却能很好地理解对方。

——我告诉他们你把车给我了。——

巴姆噗地笑出声来。——谁会信这个。——

——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现在出事了，城里出了乱子。白人被赶出屋去了，我们拿了车。每个人都会那样做的，不对吗①？——

——可是你不会开车。——她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虽然他们相信他。

——他们怎么知道我不开？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在城里呆了十五年了，我懂的多啦。——

几天以后，这辆车已不成为他们在这里的标记了。剩余的罐头食品还在车里；他们还发现了维克多的电动轨道赛车的盒子，一定是他趁大人忙乱没注意时放进来的。小屋里什么东西也放不下：——再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也用不着。——可

① 本篇中七月等黑人的英语水平都很低，句子中大量的语态、时态、主宾格错误，句子也多为简单句，因为前面有“巴姆常常搞不懂他不成句的英语”等语。只是汉语缺少时态、语态、单复数，主宾格变化。因此译文传达不出七月英语的全貌。

维克多却老嚷嚷着要轨道赛车。——而给他他也只能拆拆装装地玩。

他提要求时，很爱在他面前一直站着，她只好绕着他走。

他又堵到她前面了。——我们怎么走啊？——

——维克[1]，哪有地方放它？再说这里也没电，你没法开。

——我想给人看看。——

——给谁？——

那些从远处瞅着小屋的黑孩子们一副随时准备拔腿跑掉的样子。她一瞥就像向他们扔了块石头，他们后退了几步。

——不过得告诉他们不得碰这赛车。我不想让我的东西乱七八糟地被弄坏了。你一定得跟他们说——

她笑了，像成人不愿做他们凭权威完全能做的事时那样笑了。——我跟他们说？他们不懂我们话呀。——

维克多不再说什么了，只是不停地踢那个他们洗澡用的坑坑凹凹的锈澡盆。

——别那样。没听见我的话吗？那是七月的盆子。——

盛水的坛子空了。罗伊斯，最小的孩子，一直不停地要可口可乐；——那就去买点呗。去商店里买点。——她把盛着河水的煤油罐子坐到了火上。她还要把头天晚上煮开的水冷却；——让他们喝直接从河里打上来的生水简直是发疯。他们会得病的。——

巴姆让火苗窜了起来。——我可以向你肯定，他们会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喝水的，而且已经……阻止他们怎么可能呢。——

——他们要是病了，怎么办好呢？——

他没回答，她也不指望他能回答。摆在他们和所有这类问

[1] 维克多的昵称。

题之间的是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他们能活下来就够幸运的了。

从汽车里拿出来的车座不再属于车子了，它们已经成了小屋的家具。一天下午，明亮的灰云遮出了一块飘动着的荫凉。她和其他人一样坐在地上。她知道，在山谷那头，在用蓟草和干蒺藜编的圈山羊的栅栏的那一边，就是放汽车的所在。一艘停泊在遥远国度的轮船。抛锚在黄草丛里，它会生锈并剥落成废船的，除非短时间内它再返旅程。

一个在农家厨房里可以看到的黄杨木碗柜，搁板的边沿装饰的像是插图花哨的报纸，里面放着那套粉红色玻璃杯碟中剩下的几件。

七月带她去见妻子。她妻子有一张纯黑人血统的、表情漠然的小脸和坐在地上就像坐在垫子中间的硕大的臀部，当时她正从地面的火灰上拎起锡壶，悄无声息地转来转去，给一个老妇手里的茶杯倒了茶，又调整了一下孩子手里的奶瓶，这孩子已经过了断奶的年龄，正闭着眼睡在她的膝上。在七月的催逼声中，她恳求地皱着眉，摇晃着咕哝出了几句问候声。

——她说，她非常高兴你们到家里来。她很高兴见到你，早就想了，七月的人嘛——

她刚才实际上什么也没说。莫琳握了握她的手，然后是那老妇人的手，大概是谁的母亲——七月的或者他妻子的。老太太戴着镀金耳环，用一个饰有红色玻璃的别针别住她蜗牛壳似的黑包巾。她半蹲半坐着，一双瘦薄的脚，光脚板上沾满了灰，从一层层的裙子下面伸出来。她向七月要什么东西，每次说话和看人之前都先大声呼噜着清清嗓子，面向着这位微笑着俯身不停地重复问候话的白人妇女，她高高地昂着头。屋里还有几个年轻的女人和半大的姑娘。他的妹妹，他妻子的妯娌和他的一个女儿；他没介绍她们的名字，而只是介绍了她们和他的亲属关系。那个小孩子是他最小的孩子，跟他其他的孩子一样，也是他回家休假时怀上，他不在家时生下来的。每听到一

个孩子出生的消息，莫琳就拿出些礼物让他以她的名义寄回家。她给这个女人，这个从来没见过面、从来没想象过的七月的妻子，寄过供孩子们玩的玩具娃娃，还有看起来不管一个女人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方式生活都可用的物品：一件睡袍，一个手提包。七月休完假回城时，也以他那谁也没见过的妻子的名义，给她家带过手编的篮子，作为回赠——她曾用其中的一个篮子从银行往家带过钱。七月城里的女人是一个假日穿着打褶的两件套礼服的很有礼貌的办公室清洁工。她用莫琳的熨斗给他熨衣服，在院子里碰上莫琳还跟她聊几句天。话题多是她那在索维托的儿子，她用自己挣的钱供他在那里上大学预科；七月要对他自己很远的家负责任这一点她们都很理解。这个城里女人没有跟她的情夫生过孩子；有一次她把一只手放到了乳房下面，一副女人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架式；——全部做了——我在医疗所做了绝育手术。——看来的确如此，她能用黑人城市英语把与那种内容有关的词用得这么恰当、熟练、也为她的话作了证明。

天刚亮了一会，女人们还像白天已结束那样在她们的小屋里做着梦。一道金雀花般鲜亮的阳光从墙上一格窗那么大的缝隙中射进来，照出了年轻姑娘、老妇抽搐的身体和隆起的关节、吃得饱饱的孩子伸开的胖腿的轮廓。一张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床上铺着带穗的方格毛毯，半大女孩子中的一个正给低下头的另一个梳辫子。大概天一亮她们就出去拾过柴或下地干过活了——在这间小屋里，在她们中间，莫琳突然有了不知身在何处、何时的感觉，过去一向清清楚楚的时间顺序现在已被搞乱了。

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

当他那夜坐着白人的汽车回来，还带来五张黑暗中不时浮现的白人面孔时，他妻子已接受了他的意见。她们让出了第二张床，帮他们借了一个汽化油炉子；她们在早晨还看着他拿走了一次他从他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地方带给她的漂亮茶杯，他的妈妈也已经腾出了她的小屋——搭墙的树干和顶柱都倒了，七月又把它们撑了起来，泥墙是他妈妈和她妻子和泥砌成的。两个女人在他的催促下没有争吵就搬出去了。但事情没有完结。他知道事情不会到此为止的。

——你们不懂。没有其它地方可去。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他的妻子使劲地点着下巴颏，故意夸张地模仿同意动作；然后头一垂，肩一耸，像她做姑娘时做的一样。——白人在这儿！你不是跟我们多次讲过在那儿他们是怎么过的吗？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吃饭，一个房间坐着，一个房间搁书（她有一本《圣经》），我不知道你跟我讲过多少遍，一个房间搁多少书……几百本，我想。还有热水弄得像我们在涅斯路斯道波大街上看见的灯似的。所有这些东西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孩子们也从来没见过——洗澡的房子——甚至你，在那儿的院子里也有一个你自己的洗澡房间，而且你甚至从来不在里面洗衣服，另有一台机器在别的一个房间来洗——现在你跟我说没有地方。——

她有她的听众。那些总呆在她家跟她在一起的年轻姑娘嘲

嗤地笑了。

——他们得出去，他们得走。人们正在烧那些房子，那些大房子！你想象不出的房子。白人在他们的房子里被杀死了。我看见过——全部的东西都坍塌了，墙壁、屋顶。——

他妻子用一个食指在耳后揉搓着。——他有一把枪。孩子看到过一把枪，他藏在房顶上了。

——他们[①]来的时候，一枝枪不顶用。今天赶跑了，明天会再来。出了乱子！除非你去过那儿，要不你不懂是怎么回事。——

他母亲的两手永远也静不下来。她不停地用另外四指的指尖敲着拇指肚——像衰老了、暴露在外面的不断跳动的心脏，更像解剖已经死去的动物，切开后的胸膛里依然跳动着的心脏。——白人到处都有他们自己人，不是到处都在住着吗？肯明斯顿，开普敦——你去过很多地方，我的儿子。他们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吗？他们有的是钱。——

——到处都一样。他们都在赶白人出去，白人正在跟他们打仗。所有这些城市全一样。他能带着他全家跑哪儿去？他的朋友们也都在跑。如果他到另一个城市他朋友那儿的话，这个朋友肯定不在那儿。他能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这是真的。但他到了那儿的话，他很可能会被杀掉。——

她们听着。对于她们，没人能搞清楚她们是否被说服了。

——你过去常写信讲你一个人是怎么看管那栋房子的——喂他们的狗、他们的猫。那次你在屋子里睡觉，小偷溜进来砸破了你睡的地方的窗户——我不知道，那些房间的一个他们是否已经……当时他出门去了，到海外去了，是不是。——

① 他们，指参加骚乱攻击白人的黑人。

这个英语词破坏了她们语言的节奏。海外。这个概念他妻子不熟悉，就像这个词的舌形叫她感到陌生一样。可他曾经搬运过旅行包、收到过印有摩天大楼和冰雪覆盖的群山的明信片，接过同一天内时间就有差别的国家打来的长途电话。

——你们知道飞机从那里可以飞到海外的那个飞机场吗？现在机场没用了。在那儿他们打下了一架坐着想跑掉的白人的飞机。——

——谁打的？黑人吗？咱们的人？他们怎么能做到。——老妇人不耐烦了。——我见过飞机，它们在天上飞得高着呢，你甚至看见它们在云彩上边飞。你都看不着了，还打得着吗——

——在莫桑比克那边，咱们的人有一种特殊的炮或是炸弹。它们能跑得老远老高。他们现在甚至在戴维顿、奎特玛、索维托都弄到这些东西了——离城很近。他们打飞机，飞机就在天上爆炸。个个都炸死了。——

他的母亲发出风格像火鸡咯咯叫的呼叫声，以驱邪避灾并把灾难归咎于命运。——现在白人要对咱们做什么了，上帝一定得救救咱们。——

七月——她的儿子，曾经看见了莫琳和三个孩子在汽车底板上发抖，白面孔巴姆驾车跟着他的脚印——荒野中唯一的路径向前开，他这时才突然明白了一些他从前未曾明白过的事情。——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啦。再也不能对咱们怎么样了。——

——白人。他们可厉害啦，我的孩子。他们可聪明啦。他们做的事你怎么也赶不上的。——

他在女人堆里，很像在酋长的法庭上，在那儿，坐在裁决席上的老人们闲荡着，出出进进，有关证词的讨论在继续着，他们却轮换着到外面去透气，或者到他们拴在树上的马和停在树边的自行车中间去放松一下，呆一会儿再回到法庭，也不管

程序进行到了哪一步。他的母亲走出去给一只他刚扭断了脖子的鸡拔毛。他的妻子问那些年轻的姑娘她们是不是以为她一整天不喝水也行？她们到底打算东拉西扯嚼舌头多长时间？其中一个大胆但又恭敬有礼貌的女孩子问道：——塔塔尼，我想问一下，你也有一个跟他们一样的洗澡屋子，真的吗？——

——噢，对，洗澡，白瓷的洗脸盆，什么都有。——

她们再就只能陪笑了，她们怎么能想象得出他的住处呢，他的房子没有邻近的车库两个那么大，但屋里有一块挺不错的从主人卧室里磨破的地毯上截下来的地毯哩。

——肚子里还有蛋哩——它还能给我们下蛋哩！你该逮那只断腿的白鸡，我跟你说过的。——老太太在外面嚷嚷了起来。

——她要什么？——

——你杀错了鸡……我不明白你干的事。——

他回头喊着。——一点没错。妈妮，那只脚不好的是只小鸡。它明年会下得更多的——

那白种女人的手，当她站在那儿伸过来——她还是第一次碰白皮肤哩。她有时跟她婆婆一起到村子里印度人开的商店前面叫卖青玉米或老太太扎的扫帚，有一次，碰巧有一个白人从警察岗出来买了她袋里的青玉米，一只白色的手把分币丢到了她手里。但她并没真正地碰到过白皮肤。

她又恢复了把脑袋歪到一边的老姿势，那曾是她让他着迷的羞怯样子，那时她还是个年轻姑娘，她用这来逗他，又用这来躲开他。现在，他到城里去了这么多年以后，这样子开始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了，拒绝、退缩、逃避，一个人出神。——那张脸——我不知道……不算好看，不俊。我还一直以为她们会有很多漂亮衣服哩。还有头发，那么滑稽难看。她们干嘛把头发弄成这样，深一绺浅一绺的。跟脏绵羊的尾巴似的。真没想

到她会是这个样子，一个有钱的白女人会是这个样子。——

——他们在那儿看上去不一样——你要是见过他们柜橱里的衣服就好了。还有那些玻璃杯——给客人喝酒用的。在这儿他们当然什么都没有——跟我们一样了。

她尖声呵斥着婴孩，那孩子正两腿撑开保持着平衡，摇摇晃晃地四下里走，他捡了一块鸡粪，并且成功地把这脏东西送到了嘴里。她想都没想就用食指在小孩软膜一样的小嘴里掏起来，好像这小躯体还没从她身上分出来似的。这一刻她男人被排除到一边。她把白垩似的糊糊从手指上弹掉。——以后每月不会再有钱寄来了。——

没有了他以前在那儿的白人，没有了他给他们干活的那所大房子，她再也收不到信了(是的，她上过学，他不会娶一个读不懂他们自己的文字的人的)，那些信来自他的另一种生活，他的另一个自我，而且是写给不能跟随他的家人的。现在她已经看到了他那些白人，以后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如此刻的现实中，她都不可能再收到信了。

·

巴姆能帮七月修理干农活的家什——很难称之为农具——他和他村子里其他人都拥有的家什。套着轭和缰绳的耕牛是公用的，各家轮流耕地，平常就养在不住人的专用的小屋里。屋里，链子沉甸甸地拖在地板上。锄头从屋顶吊下来。篮子里贮藏的食料散发出霉味和坚果味。刚才有人在这呆过，用一块草垫子当桌碗，碎豆子摆在好豆子旁边，刚出去的那个人选的——这些在莫琳眼里简直是自然历史博物馆设计的原始文明的西洋景。

巴姆在草草赶做一个储水箱，用的是一个圆的波纹铁皮罐，不知它被谁拖进灌木丛老远，却从没被装上使用过。七月还笑着给了它一脚(像维克多踢澡盆那样)。

——不，我指的就是它。如果能搞到一袋水泥，我们就可以安个底座。我还见过几根旧管子，在哪里来着……？这样整个雨季你就要有一个相当体面的雨水供应装置了。现在是多余，到时候女人可就不用去河里了。喝这个比喝河水卫生多了。——

没有水泥，他们也还是干了，这多多少少有些像以前巴姆让七月帮他偶尔盖点什么或修点什么，家里的七间屋子和游泳池，不时需要他们干点维修活的。巴姆用石头作底座也还行。他把收音机放在旁边，到整点播送新闻的时间，莫琳就出现了，不管刚才在哪儿。他们站着一起听。这个村落还有几台收音机，吼着，聒噪着，放带着鼻音唱的流行歌曲，或放用一种黑人语

音念的活泼轻快的广告顺口溜；新闻播音员那园艺讲座似的故作亲切的英语播音，只有他们夫妇俩在听，好像是专为他俩播放的。他们彼此注意着对方的表情，不加评论地听着。无论是他们希望从广播上发现的，比如突然作出的一个新决定，还是害怕发现的，比如引起恐惧的新情况，都没有出现。在珍斯穆茨机场周围发生了一场激战；处于戒严令管制之下的市中心，昨夜很平静，虽然还能听到迫击炮的轰响。他们还收听到了众说不一的关于东部和北部郊区多次交火的报道。红十字会呼吁献血。煤气厂遭到了袭击，爆炸引起了一场一直蔓延到郊区房屋的大火；巴姆眉毛挑了上去，瞪大了眼睛——只要穿过山谷、快车道，就到了他们过去选好建在安静的郊区的房子了。美国议会正在辩论由美国政府为美国侨民增加航班的事。不知道措施先从哪儿开始实行；开普敦，德班和伊丽莎白港的机场都关闭了；它们的港口也被炸毁和封锁了。莫琳向远处看去，那儿正有一个小男孩在按七月的指点倒一只装石头的盒子，她原来一直试图到海岸去的。

很幸运还活着。没有人指望别人来告诉他下一步会有什么降临；下一步该做什么，现在也不知道。他另外花了一些气力搬了石头来，已修好那已成了废墟的东西。这里的人们反复使用着周围的自然供给他们的贫乏的资源，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等到墙上的泥剥落成土后，他们就再迁到林中另一片空地上，在一片适宜的山岩间，用泥土再砌新墙。没有一个人记得那水箱是怎么来的。七月说过他要问问老太太的却从没问过。尽管她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她们小屋外边的泥地上，用她们专门割采来的草扎扫帚。水箱是从后边来的，就像斯麦尔斯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样是突然出现的，现在这白人要给它弄个果的地方。

向更远处走，过了这片空旷地——小屋村落，牲畜圈，以及砍伐、火烧、开垦过的土地——到了树林中如人臀部般起伏的地带就到了那条河，那是他们通常活动的最远距离。这热带大草原上的灌木林在不同的光线照射下，像云一样千变万化，变幻出不同的姿态和色彩，仿佛旅行者走马观花时眼里掠过的无数景观；沉默的蒙尘的绿色像大地一样伸展着，一直伸展着，天空下无边无际的景色一无阻碍地扑入她的眼中。大地上自古代移民(从来没有断过，她家是最近的一批)起就穿行的数百条路看不见了，人们来回迁移时用蓟草和灌木枝篱笆标出来的聚居圈，很像草地上的蘑菇圈——也看不见了。还有劈里啪啦穿过小矮树丛的牲口，和静静不动的野兽——所有这些都看不见了。空间，如此无限又如此有限，她的孩子就不理解这个地方。罗伊斯率了一个代表团来：——我们今天能去看电影吗？要不明天也行。——把时间往后延是一个迹象，表明他们开始适应这个地区的新生活节奏了。吉娜和维克多已经长大了，知道电影院已被留在了后面，他们不阻止他来请求，过后便在小屋里当床的汽车座上生气，吵架，抓挠跳蚤咬的地方。莫琳从不走到聚居圈外的无垠之地去。走得还不如带狗遛街或到邮筒那儿发封信那么远呢。她可以走到河边，不能再远了，但河边她也很少去。每次去了，她也认为不去的好，省得冒被人看见的险。

七月来取他们家人的衣服让那些婆娘们洗。

——我自己可以洗。——没有几件，他们穿得那么少，孩子们把鞋都扔了，每天也就换一条短裤和袜子，自己洗没问题。

但他一副不达目的不走的态度。——那我一定得给你们送水，烧热，什么都弄好。——

她明白她不能指望在这儿还有人惯她，在他不理解的地

方，她不能由着性子干。

——是你妻子洗吗？我一定要付钱的。——

在他的家里，这是女人份内的活儿。当他的手指碰到她递过来的松松一叠东西的一端时，他短促的笑声戛然止住了。——我不知道谁洗。不过你可以付钱。——

——还有肥皂？——她很珍惜她这一大块香皂的，每次用过都小心翼翼地把它弄干，放在小屋的墙顶上，不让孩子们够着。

——我带了肥皂。——

肥皂，是他记着从她储藏柜里拿的？他干净的衣服散出一股她给他们——仆人们买的救生圈牌肥皂味儿。他没说过，大概是不想吹嘘自己的远见。她想问——很明显又不能问。

——我会付钱的。——在这儿，成捆的钞票不过是纸片罢了；对此刻的她来说，钱代表不了塞满冻肉和冰块的电冰箱、报纸、床头灯，就没什么意义，这儿什么都买不到。但钱的意义，对于七月的村民们来说并没有消失。她看到了她和巴姆是如何、从什么时候依赖着这群人的，除了这些纸片也没有什么可给他们的了，甚至连多余的衣服——这很受穷人欢迎的——也没有。他们用破布条把这些纸扎好，再用奇特的皱巴巴的袋子装好，秘密地藏在身上。他们能够在抽象和具体之间建立联系。七月——还有其他跟他一样的男人，所有能干的男人都跑出去干活——过去那么长时间寄回来的就是这样一堆纸片，十五年里（这意味着七次休假回家）他带回的东西也是用这种纸片换来的，从巴姆替他搞来的自行车到超级市场的粉红色玻璃茶杯都是它换来的。

七月妻子的小屋，他自己的小屋，家族成员其他三四个人一间的小屋，他们的山羊圈，用弯曲的干枝条交叉插进地里围

成的鸡笼，用参差不齐的带刺的芦荟杂乱围成的猪栏，从破汽车上卸下来的磨损了的轮毂盖，破了的锡盘子，泥砖；存放农活家什的小屋——这些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目标和轨迹。她在这些东西中间既不可能像一些人那样干活，也不可能像另一些人那样什么也不干。她倒是有一本书——一本她逃跑时匆匆装起的平装书，几年前买的，但却一直没看过，好像它就是为逃跑提前准备的：马佐尼[1]的I Promessi Sposi，翻译过来就是《订婚者》。她不想翻开读它，读了以后又能怎样呢？可又没什么可干的。于是她破坏了自己的心愿（她曾这么想过，假如她不读，也许他们不久可以找到一个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如果她读了，读完它之前他们还将在这里）。她把七月拿来"给孩子们"用的瘸腿凳子拖到外面，坐在外面可以看到丛林景色，她开始看书。但过去那种因读小说而置身于另一种时代、地方和生活的幻觉，也就是阅读的乐趣，现在不可能再得到了。因为她现在就正在另一种时代、另一种地方、另一种感觉之中；这一切在她身体里挤压她、充满她，像人在吹胀一只气球。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了。有什么小说能跟现在比呢，她现在知道了多少过去她不知道的，也不可能通过虚构作品想象出来或找到的东西啊。

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的屋子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而且你得在黑暗中呆上好一会儿才能认出墙上的东西。七月妻子的小屋里的墙上有一条很宽的赭白两色的波浪状带子。其他人屋里——她们整天像燕子一样在黑暗与光亮间飞进掠出，她不知道她是不是受欢迎，——她很快地扫了一眼，只看见了一个上了色的圆环，

[1] 马佐尼：意大利小说家，《订婚者》是他的代表作。

眼睛或靶子。另一个邀请她进去的住处，倒有一只动物的尾巴和一个啮齿动物的头盖骨，晒干的内脏，从屋顶上悬垂下来。通常还有很小的小镜子倏然映出零星的光束，很像浮游着的饿鱼。它们照不出什么来。她眼前这些东西给她以平庸、造作、俗套交缠在一起的印象——感觉，她立即转回身，好像有人在后面听她。这是放耕牛的轭和缰绳的小屋里给她的感觉。她第二次进去，发现了勋章，像是战功勋章，钉在黑乎乎的门左手。其中一枚珐琅徽章上的红十字由于潮湿变色，不平了，粘上了脏东西，泥巴和粪土久而久之掺和到了一起附着在上面。另一枚铜臂章上刻的字也长满了锈。大的一枚是颁发给那些通过了如何应付地下可能发生的紧急伤亡的急救考试的人的，小的一枚是黑人矿工的级别标志，是黑人可以升到的最高级别的标志牌。这些纪念品是从矿上来的人、或者是去过金矿的人带回家来的。或者是他们寄回家的。它们的主人在哪儿呢？这小屋现在没人住。可以前有人住过，并把他的财富、他的珍宝在这儿展览过。走了，还是死了——被忘了还是被记着，小屋里的这些东西，是扔在这儿的还是摆好放在这儿的。这地方很久以来一直出矿工，几乎采矿业一存在就有人干矿工。她念了一下铜臂章上的字：领班助理？

倒班老板及其属下赢得了认可、取得了成绩。他对他的领班助理感到满意；历任这职位的人有一些是从村庄、从小土屋招募来的。“我的吉姆”在其整个工作生涯中总是在和这些人签订九个月或十八个月的雇佣合同；而他那正在西部地区长大成人的女儿却在想往做一名芭蕾舞蹈家哩。

一个嚼着口香糖的白人女学生在穿越旁边就是商店的十字路口，边走边伴着夏日午后的节奏哼着歌曲。跟她步调一致地

走在旁边的是一个黑女人，年龄在乳房坚挺诱人和屁股像铅一样重这两个年龄段之间，她的漂亮结实的双腿正慢慢迈向人生的下一站——老年。这个黑人妇女也在嚼着口香糖；她的羊毛帽子扣在一只耳朵上面，头上顶着一个上学用的提箱，上面很不熟练地印着蓝色的“莫琳·海德林顿”字样。

红色交通灯突然亮了。黑人妇女还对着灯往前走。白人女孩一把拉住了她，在等着变灯的时候她们继续拉着手，松松地、自然地拉着。然后一起蹦蹦跳跳地穿过了马路。莉迪亚几乎不需要抬手来扶稳头上沉甸甸的箱子；她顶箱子和随随便便戴着顶帽子没什么两样。

可以看到这两个人一直在这样走着，到了十字路口那头的本地店铺旁边，短头发的那位穿过开阔的草地（后来那儿建了一个工业区，有金属箱厂和油炸土豆片厂）进了矿山家属区。倒班经理们的房子在那个开设芭蕾舞课的娱乐中心后面。莉迪亚有这栋房子后门的钥匙——倒班经理“我的吉姆”的妻子在一家房地代理商的办公室工作，全天不在家的。“我的吉姆”正在院子里刷鞋、打扫住处。莉迪亚有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她干的家务活不一定，到这家那家商店逛荡一圈，取一只面包啦，浆一下洗过的衣服啦，或者干脆去传话给做着同类差事的其他黑人。莫琳经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在那儿撞见她。莉迪亚在等她；也许她有心安排她知道的莫琳下校车的时间去商店。一遇上，她们就不再匆匆忙忙了，白天的这会儿正热。莉迪亚就坐在莫琳的提箱上，长时间不停地讲她认识莫琳以前的事情，莫琳则到希腊人开的商店买一瓶可口可乐，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共享，莫琳还买——如果她有现钞——几块口香糖或巧克力。莉迪亚常把提箱——里面装了一大包书本和一件运动上衣，一双体操鞋——放在头顶晃悠着。有时候她们咯咯笑着，密谋似

的商量些什么——别把你看见的说出去，嗨，莉迪亚——（当她不是从学校安全地坐校车回来而是坐在一个男孩的自行车后面的时候）。——亲爱的，我怎么会说呢？你是我真正的朋友，不是吗？——另外一些时候莉迪亚则在埋怨、挑剔别人。这首先是“那些人”引起的：那为互助金或者她们参加的“互助协会”的复杂规矩跟她吵架的人。协会的每个成员每个月须拿出自己工资的一部分加入基金，这样轮到可以拿钱的月份，她就可以收到所有其他成员交纳的总额了。——那个女人！格拉迪斯的嫂子，她手里有钱，我跟她说，你有钱为什么不跟大家一样交钱呢？为什么这个月份你非得拿钱，还短着我的呢——接着这股情绪再转向莫琳，翻起陈年老帐来。——莫琳，如果你跟上回似的再把东西弄丢，你可小心，你爸爸会发脾气的——（那装电池的提灯是从他放在车库工作间的一套野营工具里拿出来的；她答应拿它做校庆演出用的聚光灯。）——莫琳，你怎么把枕头从床上拿到草地上去了，被你的朋友弄得脏兮兮的？你妈妈从要洗的东西里看见那些印子会冲我嚷嚷的，狗、狗爪子印和其他的东西。

——亲爱的，别着急。我会告诉妈妈是狗跑进来跳到了我床上。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去的，我答应你——莫琳哄着吊在她的脖子上，那儿比她身上其余的地方颜色浅一些（不知她全身赤裸会是什么样子；她对身体和身体的魅力非常拘谨，从不给人看她不穿衣服的样子，下身最少也要穿着尼龙灯笼裤，上身则最多露出暗黑得有点发紫光的、拔了毛的腋下）。从她的脖子能闻出干净的熨烫过的味儿、炸鱼的味儿，还有一缕缕她走路时拖鞋塑料底和脚之间的汗散发出来的味儿。她丰满的脖子上有三道“珍珠纹”，属于年轻女人的漂亮的线条；她只有二十八九，最多三十出头。

一天下午一个摄影师给莫琳和莉迪亚拍了一张相。她们看到他屈着腿跳来跳去地好把她们对进镜头里，就在她们过的马路的那些商店旁边拍的。他拍完后走过来，问她们介不介意。莉迪亚说了算的；她两手放在髋部，也不影响头顶上重物的平衡。——不过你得给我们寄一张。我们想要这张照片。——他答应了，并且当她们走开的时候又把镜头对准了她们。他没有记下西区这个地址，金矿家属院20号，她们怎么可能拿到照片呢？多年以后有人把它指给了莫琳·斯迈尔斯看，照片被登在了一本供咖啡桌上摆设用的、关于这个国家及其政策的书《生活》上。白人女学生和头顶着她的书箱的黑人妇女在一起，真是一张反映白人统治者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的绝妙照片。

为什么莉迪亚拿着她的书箱？

当她们那样走马路时，那摄影师了解他所看到的情景所包含的内容吗？把他俩收进去的书的上下文分析了她和莉迪亚因她们的感情和蒙昧而不了解的彼此间的关系了吗？

至少，对于巴姆来说，这些日子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劳动和休息两部分。第三部分，即消闲部分，那有条理的市郊生活的产物，并不存在，除非算上从每个星期六上午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后半夜的聊天，喝啤酒，死睡过去再醒来。一些浑身啤酒味儿的人唱起了赞美诗，另一些犹太复国主义教派的狂热者们则拿着绿白两色的旗子到城镇的空地围上一个圈儿做礼拜——也许是星期天的教堂集会，再加上人们自发地喝了酒，每个男人和女人都随着落满灰尘的唱机转盘慢慢地跳起舞来。莫琳在这些乡下人中间也占住了一块地方，她能分辨出七月那急促的话音和男中音的笑声。他们到这儿的第二个星期六，巴姆也接受了敬他的啤酒而跟他们一块儿喝；七月插进来给了他一个大茶杯，其他人则就着一个陶罐咕咚咕咚地喝，转圈儿传着喝。巴姆呆到不失礼貌那么长时间——男人们灌他酒，一边夸他，一边善意地斜眼瞟他取笑他，当他看似津津有味地品着他们的酒的时候，他们还装出钦佩的样子。七月迈着大步在周围走来走去，用一种舍我其谁的炫耀的口气大声地宣讲一件轶事，明显地提到这个曾经是他的雇主的人，这位客人和陌生人。

巴姆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性情温良而略微有点儿傻气的表情回到了小屋；他一句话也没听懂。玉米酒催眠，但他和她之间总潜在着一种拂不去的焦虑需要讨论一下，谈谈。怎样走出这个地方？走到哪儿去？而他目前却要么修储水箱，要么管教孩子——孩子一般情况下就在周围，就像黑孩子总在大人身

边一样。但此刻他困了，尽管孩子们正离开路，玩两只上了油的牛皮鼓玩得着迷，得到礼物的小伙子们把鼓敲得砰砰响，总也不累，只是偶尔歇一会儿，一个睡着的人的呼吸节奏随着他感受到的情况变化——一只独鼓敲出来的柔和的、懒洋洋的砰砰声，节奏不停，直到它被加快并且重新变得和谐起来。

——今天早上，我突然发现罗伊斯在用一石子擦屁股——

巴姆摊平手脚躺在铁床上，夜里两人睡，谁也没有地方翻身。他没有睁眼，不过他在兴奋地用力呼吸，弄得床吱吱嘎嘎地响。——啊，好事，他学会了这门技术。你想你的卫生纸还能用多长时间？——

的确很难让孩子们记住把粪块和手纸埋起来，发现擦过屎的纸片吹得到处都是，很恶心——猪还津津有味地吃着，她看见过的。她那时就应该想到手纸是应该带的少数几种必需品之一。那么多东西都装进来，打捆带来了（不用提维克多抓起来的轨道赛车）！她突然想到那种用来从衣服上取下干洗店的标签而不弄坏指甲的小玩意儿。还有，在这片住地到处在用着的其它一些小玩意儿，她认出来原来是属于她的东西。她面前的一个原先在矿区住宅厨房用的小磨刀器，一把鹳形的剪子，她真真切切地看见，他斥责老妇人用剃刀给他的婴孩剪脚指甲的时候，手里拿的就是那一把。这些东西从前是她的，他肯定很早以前就拿来了。别的还有什么，这些年里？但他确是诚实的。他打扫地板，发现一个滚到那儿的硬币，他也会把它放到巴姆的床头柜上。他们从没锁过任何东西，包括酒柜。如果她不是碰巧地——一百万次中才这么一次机会，——来到这里，她永远也不会想起这些东西：看来诚实是指你对于一个人知道的那些情况而盲的，的确如此。

因旅途紧张形成的说话简明扼要的习惯，这对夫妇现在继

续保持着。他们交谈的主要是那些谁也不愿一个人负责的事情。巴姆打开她装蓝色卫生纸的包裹时，没想到她居然没忘带疟疾预防药。——我们该给孩子们留着。——

她给他一片，她也拿了她的一片，干干地，一下一下地吞咽着，让这融了的苦东西下到肚里去。——要是我们害疟疾死了，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沉默了许久，等对方说出想说的话。

他既疲倦又烦躁地说着托孤的话。——他们会照顾孩子们。他将来也会照顾他们。直到某些人来这儿。——

——谁？——

——"古巴人。"——

他们开始逗趣并笑了起来。他们一直远远地钦佩着卡斯特罗，这位成功地转变为革命者的白人布尔乔亚。

——俄国人……——

——我们还剩几包？——

——六包，我想。——

——上帝呀。这么多药丸！——他的话音低下去，省略地喃喃着。这是他们两人亲热地说情话时惯带的音调。——嗯？……你觉得要呆上很长时间吗？——

——嗯，你说呢？——

他们信任的那家电台已经有二十四小时不播音了，肯定有一场争夺这家电台的战斗正在进行着。其他广播电台不加评论地概述了这次战斗。如果黑人胜利了，将会出现军乐的轰响，胜利的宣言，一个新的国名。但是只听到了RPG 7型火箭筒推动的榴弹袭击卡尔顿饭店的报道，紧接着是这家五星级饭店被黑人军队占领的消息。

她走过去蹲下，把后背靠在一个汽车座上。没有指甲锉，

她常常坐着检查她碰坏的指甲，像她现在这样，用一根细金属丝，一根刺，用随便露在她周围尘土里的什么从指甲下面抠出泥垢。——我过去常想，有一天我会来看看他的地方，跟他一块儿回家。我还以为这绝不可能实现呢。——

——不会出现的……那些听起来好笑的事情……那时是绝对想不到的。——

——那时候不会。——在她停顿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你知道的。把它跟你的打猎旅行连起来想想。且得在孩子们的假期。带所有的野营用品。便携冰箱。我还会怎么想呢？——

他扭动了一下身子，他想睡一会儿。

——来到这里，带着给他们的礼物，他们则站成一排，拍着手欢迎我们。告诉孩子们，这是他的家，他就是这样生活的，看看七月给他自己盖的房子，多么灵巧。告诉家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的确确一路开车送他到他的老家，像探访一个朋友那样拜访了他。

巴姆刚要睡着，猛然想起他们是在仓皇和混乱中跑出来的。想起那些疟疾药片：——你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我们洗澡间的柜橱里肯定不会有这些吧？——

——我抢的。从那家药店抢的。在他们攻打了那些店铺之后。

他睡着之前看见的最后一件东西是她的脸，朦胧之中离他很近，她不自觉地皱了一下眉，一副母系氏族女族长对许多事不用想就得操心的表情；同样七月的妻子在女人们的小屋里也对她这样皱过眉——假如他那时在那儿也会看到。他醒过来听见了汽车发动机加快转速的声音。——莫琳，你瞧你在干些什么吧！——他震惊地摇晃着，从床上坐起来。

她就在小屋里和他在一起。他冲她嚷着。——谁在那儿玩？该死的小维克多！你给他钥匙了——？

——我？我什么钥匙也没有。——在不稳定的生存的悬崖上；没有余地互相进攻。像这张床。他们颤抖着、蹒跚着，小屋的昏暗紧贴着他们前后，在他们中间被打破了。她跑了出去。

她向她放汽车的地方跑去，一直地跑，甚至没有注意脚下。汽车正被开走，颠簸着却渐渐加大了信心和速度，它穿过荒芜和废墟，摇摆着开上一条牲口走的路。她看到了两颗黑脑袋的背影，司机和乘客。当她回到小屋子的时候，他想起来了，告诉她，告诉他自己：——是七月拿了钥匙。他想把什么东西锁到汽车里。对，是他的自行车零件。他妻子要让别人偷走他们。——

——是另外一个在开车。——

——但那是他。——

——我看不清楚。只见两个脑袋。——

巴姆起了床，在超我获得对他身体的控制之前，他已把男人具有的雄性威力的一面从沉睡中唤醒了。他的阴茎在他皱巴巴的裤子下面膨胀起来。他围着那些小屋转，从一间到另一间。几个男人在睡着，正在为再回去喝啤酒做准备。他碰上的女人没有一个会说他的话。鼓声在他的脑袋里执拗地响着。他的儿子们看厌了不知疲倦的鼓手，正在玩骨头做的小车，这是黑孩子们用弯曲的金属丝在家做的，他们用这些换到了维克多的轨道赛车中的汽车模型。小汽车已经散架了，那些碎片他们也当东西保存着，对于什么也没有的孩子来说，这些无用的财产本身就是宝贝。他的女儿正用手抓玉米饭吃，跟另外两、三个小女孩一起从一个罐里吃。她在她们面前炫耀地叫他。——嗨，爸爸！——在喝酒的那群人里，他让他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

们问着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争论着，其中一个人能说几个不是英语而是南非公用语的单词，说七月“已经走了”。去了某个地方。和某个人。另一个用英语补充说——他没有跟我说。我们不知道。——

尽管他让他们懂了他的意思，但不能问他们他想知道的事，他真正需要知道的被他们拒绝了，因为这已够不平凡了，这个地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就像巴姆、莫琳·斯迈尔斯和他们的三个白孩子到来的事难再出现了一样。一个人仅仅从这些年来他所听到的事就能够引出假定和恐惧。战争期间，据说罗得西亚的游击队甚至用严刑拷打逼迫人们跟他们合作，白人塞劳斯兵也干过同样的事。他别想从任何人那儿获得答案，七月是被路过的巡逻队抓住了，还是挨告发后被带去接受盘问了，是不是被架在耳朵边的枪逼着放弃白人的汽车呢？

与此相抵触的事实不足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如果情况的确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搜查村子呢？为什么人们还在继续喝啤酒并说着笑话呢？——看来所有的叫喊都和这件事有关，都是欢笑微醉的人们的谈资。

没有地方可以逃避。没有车子载着他离去。他能跟莫琳说的一切是，那是七月干的。七月。

——他不在附近。——

——他什么时候拿钥匙的？——

——噢，前几天。——

这件事，他俩没有什么可评论和埋怨的。路上他是主管，在这儿他们在他的地界上。他知道怎么最好。——它不只是他的东西。他说我们得锁车，因为还有工具。——七月显然很了解他那些亲戚，当汽车上的工具被用来修耙的时候，就有人在等着借用，不过七月不相信他们会还回来。

她踏在坚实的地面上脚跟摇摇晃晃的，她只知道脚仍在那儿。她好容易站稳了，刚才差点儿失去平衡。她坐到一个汽车座上，给一个孩子的针织上衣摘掉刺果。她把它们仔细地堆成一小堆，这样就不会让光着的脚碰巧踩着被弄受伤了。

这个时候七月不在附近——只有他们两个。面对莫琳，他觉得威信全无了，但她好像没这种感觉——难道她在生闷气？

但她站起身来把刺果收集到一块儿，扔进了外面做饭的火烬里，千真万确地看着它们都燃了起来。她是那种对待自己内心就像操纵一个电力器械，一旦按错了按纽就会出事的人。但她对这种一脚踩空的感觉，对内心的暴怒并不害怕，她很清楚，这暴怒只会在她内心翻腾，也只有她自己能避免它出现。

他想把孩子们都叫回小屋来，但不知如何解释他这么做的必要，也不知她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如果她说“为什么？”，他该说什么呢？他有一把枪，就像她记着带手纸一样他带了他的十二毫米口径的猎枪。它插在茅屋顶里藏着，他们在小屋里的时候就在他们头顶上面，小屋里再没有能掩藏起任何东西的地方了。在带他们来而且不问理由就想当然地给他们住、吃和掩护的人们中间，什么地方可以藏一个白人的枪呢？

如果他把枪拿出来杀了人，而且是在七月的保护范围之外，那算不算是抵御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自卫？我只是个拿玩具枪的小男孩，他真想把这话大声地说出来。

真正的小男孩们不约而同地自己溜达回了小屋。他们饿了。她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去在巴姆身上翻他衣袋里放着的带罐头起子的刀。他注意到她把最后那点像湿乎乎的粉红色软塞的猪肉香肠从罐头听里拿出来给了他们。他们抓着，为分多少吵着。她喊了吉娜，但没人答应；最后她像其他背着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弟弟妹妹的黑孩子一样，用那老妇人撅着屁股的姿态

走了进来。她的小脊背上驮了个婴儿，脸上露出一副庄重的表情。她盘腿坐下，拉了拉把婴孩系在她身上的脏毛巾在她没有乳房的肋骨骨架上打的结。他们给了她一根香肠；她摇了摇头，带着模糊的责任感沉默着，或者在假装着做这一切。毫无疑问他的女儿至少是吃饱了半流质的食物。他和莫琳两人都被她弄傻了。她的眼睛天生是蓝色的，嵌在她肮脏的脸上。在她的小手爪和脚趾头上，红色的泥巴刻出了关节的道道儿，她白皙的腿上那看不见的白绒毛也积满了灰垢。黑孩子们身上也没有脏得这么厉害的。

——现在，小娃娃该回到他妈妈那儿去了。——

她用她自己的一些理由驳回她妈妈小心翼翼的通情达理。——为什么？——

——因为娃娃不喜欢离开妈妈太长时间。——

——他喜欢。——

——他是哪儿的？哪间屋的？——

——吉娜，哪间屋？——

——我不知道。——

男孩子们舔着他们沾着香肠油的脏手指头，带着超然的兴趣看着这场冲突。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像在自己家做的那样在紧逼：他们的爸爸带着不许抗拒的表情向他们的姐姐走过去。——来，让我们带他回家。——她扭来扭去，他想拉她起来，她摆着胳膊肘挣脱开了。

这时传来了尖叫声，是大人提高了的嗓门，婴孩睁开了一只眼——另一只还粘着眼皮睡哩——并没有被颠来颠去惊醒。这时一个细长条的人影跳到门口，死死地停在那儿，拿不准是不是进来。吉娜吃惊地叫道：——妮柯来了！妮柯来了！——

那个黑女孩溜进屋里，两个女孩立刻用手捂着嘴咯咯笑起

来。那个女孩解下毛巾，搭到自己背上，抱下小孩，像一只骆驼跪下来那样翘起她自己硬实的屁股，然后把小男孩驮到了自己身上。

男孩子们看见他们的妈妈宽宏大量地做出平和的样子，正准备黑女孩离开的时候给她一根香肠。

莫琳用铅笔刀尖把香肠挑出来。在接受食物之前，那女孩先把双手合拢，好像是在祈祷似的，然后张开双手用一种领受恩惠的表情把手掌捧成了杯状。

莫琳没有擦刀就把它交还给了她的丈夫。——要是我们的孩子在学会用手绢擤鼻子的同时，也学会这样的好教养，那就好了。——

他把这评论跟小刀一起装进了口袋，作为敌意已经消失的信号。

三个孩子很快又陷入了互相骚扰的无休止的游戏。因为吉娜躺到了他们共用的车座床上，男孩子们扔下他们在风中飘鸡毛的竞赛，把她挤到了地板上。他俩——他和她无心理会这场吵闹，不管孩子们两方谁来告状都充耳不闻。即使眼前混乱拥挤的贫民窟生活也不能使他们分心，占据他们脑海的只有丢车那件事。烦恼在苦痛中滋生，长大。他躺在床上。她坐在门口的凳子上，但不时地走到床边来，彼此对视着。

——想躺下？——

这是一个没设想现实前提的推理，就像黑人们借给他们汽化油炉后，她一边给炉子打了气，一边想用他们宝贵的储藏物做出茶来一样。

没有理由无确定限期地等着七月。她走到外面向远处那些奇特的没有顶棚的小屋凝望，小屋掩映在侵进来的树木之中，像某种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洞穴。那个地方看起来跟汽车还在那

里时完全一样。她男人在床上不停地看着手表，但她不看，她知道在这儿表是一件没什么用的东西；暴风雨前黑墨一般的天空下，一轮落日射出浓重的青灰色的霞光，在丛林上面抹过，这一切都无助于她平息她痛苦的戒心。一天正在结束。她还注视着丛林；在那巨大无限的空间前，她那么小那么可怜，像一只徒然等在老鼠洞前的猫。

巴姆闭上眼睛的时候，觉得小屋开着的门很像一盏白热了的喷灯。他本来是该在加拿大的雪地上睁开眼睛的，他本来应该看到雪地、保暖性能良好的亮色衣服以安全而臃肿地穿戴的人形的。从那时到现在已五年了，五年时间，他们若在那里，肯定已经发起来了。而在这儿，他硕大的身体和四肢被一块肌肉一块肌肉地束缚起来，动弹不得，还不都是为了她；他记不住他真正感觉到的想做的事了，留下还是走，她的意愿缠绕在他身上，被它撕裂同时又被它合拢，犹如外面那丛野生的无花果树劈开又拢住岩石一样。他抓起收音机，把旋纽拨过来拨过去，只有可憎的噼噼啪啪暴怒似的声音，吼叫着乱成一片，还有海洋深处的怪兽嗞嗞作响的高声痛哭。——看在上帝份上！——她正站在他背后。

他降低了音量，继续把波长调上调下。

——什么也没有。你是在浪费电池。——

他正要把那玩意儿放到一边，不知是出于错误还是有心突然旋到了一个渐强的声音，她扬起了头。

——为什么操着他们的语言的白人不像我们一样呢？他们为什么从不怀疑地认为白人是上等人？如果我们能够说——她怨愤的时候就像吉娜一样慢慢地，一连串地嘟囔着。

——那没什么价值，别找台了，暂时别找了——。求你，我现在真的受不了它了。在证件办公室和劳动局，白人过去一

直隔着柜台跟黑人打交道的，——会说一种非洲话，只不过是为了工作资格，就是这么回事。它是你找这种工作不得不具有的东西，他们只需懂和他们工作有关的话。

——你在演讲什么呢？——他没有注意到他提到那里的事时用了过去时态。

——我根本不想夸夸其谈，我们是不是自己骗了自己……如果它是谎话，它就是谎话。——

——我要谈的是实用而不是“价值”。Fanaglo[1]会比芭蕾更有现实意义。——

倒班老板吉姆说矿上的黑人讲的是洋泾滨[2]。它的词汇只限于白人发出的命令和黑人的答应。一件旧事曾让她觉得丢脸——那时她刚嫁给她开明的年轻丈夫——是一位父亲[3]曾用土话对他的“助理们”说，受过教育的黑人如果一辈子没下过矿井，就应该被看作是对他们自己文化的侮辱；现在他，她丈夫，又提起了她曾以为耻的那桩羞辱。——假如我们五年前走了的话，你会告诉我我们是逃掉的。但我们已经留下了而且过了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日子。我们坚持到底了——他在脖颈上慢慢地转动着脑袋，似乎上面有一根僵硬的套索；上帝知道，看看我们现在……

——不——你错了。——她不让他转；绳子好像在她手里。——这正像你在讲一件事来显示你的重要或者博学，被抓住了尾巴。嗯？大家听着：“我代表全体评委”——那次国际建筑师大奖，你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提到那些包括你在内的著名的名字——就是为了不用费很多话就能抬出你的身

① Fanaglo是非洲的一种舞蹈。

② 原文lingua franca是一些南非矿上用的一种黑白人都能懂的混杂语。

③ 指莫琳的爸爸吉姆，即倒班老板。

份。“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说西班牙语，所以讨论是用法语进行的。”——显然你肯定会说法语，好像这对你来说没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提名我们自己的候选人，然后我们为我们的选择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每次我都听着你讲，我听懂了你的话。但当别人问你候选人是哪些人，你却回答不上来。记不得了！不得不出错了。因为实际情况是你在那只起了一名评委在那里能起的作用，你只能赞成其他人选择的候选人。而你把这些也泄漏出来了。你被抓住错了。接着说吧。我明白这个，大家都这样，接着说吧……——

——我从没信过这个。不过你在嫉妒，这倒是真的。我的上帝。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我跟玛莎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她父母那套房间正吃着晚饭，趁她妈妈起身去厨房取面包的当儿，她跟我说，我得告诉你我现在已爱上杰（我记不清他另外的名字了，波尔什么的）；我今天下午跟他睡过觉，就在餐桌上。她父亲就坐在那儿，不过他是个聋子。——巴姆朝吵吵闹闹满不在乎的孩子们瞥了一眼。她很不高明地傻笑了一阵儿，突然她的嘴角缩回来了，她看到他在控制着自己严厉而狂怒的声音。——你们女人是种该死的胆小鬼——噢，对，保命有勇气，能在汽车底板上坚持到底，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们得选择时候。看在上帝份上你们得选时候。得“坦率”的时候。

——看起来都可笑得很。就这么回事。——她双手抱着膝盖，坐在门口的泥地上，一边背对着他说话，一边望着远处黑暗中模糊的森林，而森林趁她的注意力每分散一次的空档就迈进一步。

——你究竟想要干嘛？念咒召来个超人吗？（他向着在家看过有关超人的电视连续剧的孩子们张开手猛摇着）把他们都带

走？我知道我给了他他妈的钥匙。——

——你为什么不承认我们跑出来是疯了。你为什么不能。——他感觉到她的唾沫喷到了他脸上。看架势一会儿她的指甲也要跟着上来了；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吓人地在一起厮打过的，两人都快摔到地上了。她拚命地哭叫着：——“当时是你要走的。”你为什么做我想做的事，这样你就可以开脱掉了吗？——

——你在说什么？是你要到海岸去的。——

——那只是在他这么建议之后。我受不了你他妈的重新编排事实。——

——别装腔作势了，莫琳。你不必虚构一个你自己。那正是你指责我的地方。你不必把自己搬到某种“情境”里，在事情过去以后再大作文章。自从我们进了那辆黄车，都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过的。所以看在上帝的面上，别争它了，别吵了，就这么着吧。——

孩子们已经在他们躺下的地方睡着了。他炫耀似地极其轻柔地把他们分开。他们已经解决了冲突——吉娜狠心的小手松开了，放在她一直拧着的罗伊斯发红的耳朵边，维克多满是泥巴和眼泪道道的腮帮子压在一个护身符上面，那是一个串有珠子和碎皮子的大别针，他从吉娜那儿抢过来的。父亲的慈爱代替了母亲对孩子们的爱搭不理，母亲太紧张了。煤油灯光落在她的干草堆上。她离开他们走到外面去了。燠热就是黑暗，黑暗就是燠热，月亮和星星都被熄灭了。那能遮蔽一切的丛林自己也被遮蔽了。不过昆虫的鸣叫，却显示了这单一的、长久不变的吵嚷声正在慢慢地弱下去。（从欢宴处传来的歌声、砰砰的响声以及熙熙攘攘的人声一直没有停息，现在也没有停息。）这里最奇特的事物之一是黑暗，每天晚上只要夜一降临，就结束了人所有的活动。只有这个夜晚——星期六——才有人在他们

睡着的伙伴，他们的牲畜中间一直醒着未睡；在这黑暗之中（在头脑里，拉开距离，浮在它上面，像一只鹰在它的爪子和地面之间留有距离那样）他们晚会的火光不过是掖在宇宙这大毯子下面的袖珍手电筒。

燠热和黑暗开始消散了，她不得不走进来，没有水沟；柔和的雨无声地落到了茅屋顶上。巴姆在铁床边支稳了瘸腿凳子，把煤油灯放在了上面。他在读她的《订婚者》。这是他们到这儿以来的第一场雨；破败的茅草已变得黑魆魆的，雨顺着它光滑的草秆流下来。屋顶嘀嘀嗒嗒地滴着水。昆虫爬着，飞着进来。小虫子由于潮湿活跃了起来，从藏身于墙壁、屋顶干燥地方的蝶蛹中破壳而出。她知道油灯招引了它们，不过他仍然点着。撞到她脸上来的飞着的蟑螂是她熟悉的虫子。还有其它一些像特大的蝗虫，但又闪着光，肥胖的身子是像环一样一圈一圈地连接起来的，虽然用鞋或黄泥浆猛砸过去，击中它们好几次，它们还是不死。这些虫子在地板上的水坑中间落得到处都是，它们锯齿一样的腿不断地抽搐着。

他和她把孩子们抱到床上，以防他们挨到湿地板。

他俩则坐在汽车座上，坐在刺鼻的煤油味中，油灯嘶嘶地烧着，时间也一点点地过去了。他不看书了，但没有熄灯，像子夜时分在医院候诊室里的人似的，谁也不看谁。最后，死一样的疲倦把他所有的恐惧都挤干了，一个男人在被行刑队叫醒前半个小时，或许就是这么睡着的。他想办法在车座上躺了下来，脚悬空垂着。他不知道她已经熄了灯，止了嘶嘶声，也不知道雨下得紧了，后来又小了。她走了出去。暗夜扑到她的脸上。什么也看不见。雨水只管从黑茫茫的筛网中漏下来。她记住了门口在哪儿，好能回来。她脱下了衬衫，把短裤和牛仔裤也一齐脱了下来，身子倚在淌着水的泥墙上。她拿着衣服怕弄

上泥，雨水轻轻地打着她的脸、乳房和脊背，汇成小溪流遍了她全身。她转动着，像在淋浴喷头下面。一会儿她的身体就跟雨水一样温度了。她突然注意到能看见东西了；她看见的像是远远地从淌着雨水的窗玻璃后面映出的烛光。光影晃动着，或者玻璃上湍急的细流晃动着。然而它存在着——在她和雨夜的黑暗之间有空间感就可以证明。它所在的地方，雨一定已经变得稀稀拉拉的了。现在她看见了两道微弱的、针一般的细光束，行进着。它们缓慢地向前挪动着，而且因为在她和它们之间分辨不出其它什么东西，两束光看起来像是在半空中。这时，她突然从那发光的踪迹上获得了一种方向感：没有地图，她在脑海按了一枚图钉，作了标记——那儿，黑暗中雨中的那儿，是那些废弃了的小屋。汽车正悄无声息地爬回来。按在她脑海里的那一点又隐没到黑暗中去了。汽车前灯灭了，发动机关了，停在了没有屋顶的小屋里。

假如不是下雨，七月的噪音会穿过山谷传到她这儿来，他是个说话罗嗦的人，喜欢把小事情从头到尾地细讲一遍，烧积存的草叶垃圾，重新摆摆厨房食品柜储藏的东西，他都爱一边念叨着，一边欣赏自己正干的活儿。没有手提灯在动；他在黑暗中也认得路，尽管炊火的余烬都被雨浇灭了。

她走进来——先穿上了她透湿的帆布鞋，怕踩着死虫子——摸到了巴姆给孩子们脱下的脏衣服。她用脏衣服把自己擦干，套上了一件摸到的羊毛衫，到她的汽车座上睡去了，如同溺水者裹着救助者的毛毯，沉入到粗糙的温暖中去了。

她的丈夫正在给汽化油炉打气。光着脚，穿着湿雨衣，刚才一定出去小便了。早晨的声响是低沉的。孩子们睡到最后一小时左右开始在睡梦中咳嗽起来。——从黑孩子那儿总能听到同样的咳嗽。麻袋掀起来了，她看见了银色的雨幕。他在昨天下午的茶渣上倒上滚开的水，一边等着喝过的饮料变浓，一边拿起收音机，带着(她暗中观察他)一个悲哀的、聪明的灵长动物受挫后的固执，用手指在拨弄收音机旋纽……传来了平淡而清晰的声音，她即刻坐直了脊背。

她的脑袋弯到那黑匣子上，他的眼光捕捉到了她的，并且盯住她，作为一种无言的温和的责备"……在星期五后半夜发生的一场火箭袭击战中，几枚萨姆导弹落在了城区……咨询保险公司大楼受到了最严重的破坏，东西向高速公路上的一座跨线桥也被严重地破坏了，切断了道路交通……工程兵正在连夜抢修……一场企图接管设在奥克兰公园的南非广播电视台的进攻被麦克·霍尔上校指挥的一支最强的突击队打退了，霍尔上校是在扎伊尔以及其它非洲国家同市区游击队作过战的平暴老手……无线电广播也中断了，但南非广播电台台长至今未发布任何声明……"

她又滑进她的毛毯里去了。她躺在那儿，没有提再一次涌进她脑海里的汽车。她的胳膊伸在外面，他用一只粉红色的玻璃茶杯给她端来了并不新鲜的热饮。分解出来的鞣酸让她歪了歪嘴，她下意识地做了个鬼脸，装出咽下第一口好威士忌似的

陶醉表情。

——最近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你想听到什么事？——

他两手捧着小茶杯喝着茶，耸了耸肩；湿茅草的强烈湿味和屋里潮湿、阴冷的浊闷空气不太保暖。

——“这里是阿扎尼亚广播电台”。——她柔声地说。

——你想的是这个吗？——

——我不知道。——她双手并成一个尖塔捂在嘴上，中指顶住不通气的，睡出了油的鼻子，这使她的嗓音含含糊糊的。——不过都是一样的，难道它会有什么特别的……确实可听的……——

他在等着她说：我们要回去吗？他们逃离了街道上的战斗、他们的孩子们面临的危险以及以理想的名义捍卫他们的生命的必要性，在一个他们信不过的被损毁的白人社会，他们不想为那些他们不信奉的理想豁出性命。回去，马上回去？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一切都将平息下来——以一种新的方式。这些是肯定要做的。在刚果，比利时人回来了；一些史密斯的罗德西亚人也继续留在穆加比的津巴布韦；当劳伦索·马奎斯死了以后，一些葡萄牙朋友们返回了马普托，他们也都准备以一种新的方式生活。不过她不想问这个问题，因为除了其它事情以外，必须得假设汽车还没有丢这个前提。不知怎么的，汽车总是占据她的头脑，不过她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个念头说出来。每个人都为他自己。没有立刻使他从昨天下午早些时候以来就一直缠扰着他们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她并不感到有什么惭愧的，那会让他而不是她回到收音机前，收听收音机里的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坏消息更是令人心烦意乱。会有一个时刻到来，她会选择那时告诉他。而且她不会让他问她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知道的——

她要悄悄地瞒下她像心理剧表演那样半夜里在雨里脱掉衣服的事。在她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向她投来了“看在上帝面上？”这样探询的一瞥，他注意到了她单薄的白白的肚子和棕色的阴毛裸露在羊毛衫外面，就像对色情杂志上的一幅挑逗性照片的笨拙模仿，噢——对，更像——他们在欧洲一起看过的图卢斯·洛泰克画的妓院画上的一个女人。还没等她等到告诉他的那个时刻(她穿上了另一条牛仔裤，昨夜的还是湿的，扣好胸前羊毛衫的扣子，穿好衣服)——七月的声音在门口响了起来。巴姆的目光像空中一双向两边挥动的手；她自己的眼睛没有迎上去，也许他看出了，在那一瞬间，她已经知道七月回来了……这回，她被抓住把柄了。

——你们说我可以进来吗？——他过去常有敲门请示的习惯，他说主人我可以进来吗？而他们曾试图训练他改掉“主人”而用普遍的尊称“先生”。他用一只撕破了的肥料袋装了一抱木柴；当然(而且他是对的)雨开始下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要把一些木柴拿到避雨的地方。——你们今天屋里生这么小的火，会有点儿冷的。——罗伊斯咳嗽着醒了。——对吧，你们看——这孩子清醒了，宁静而信任地注视着他。他扔下了他那件城里人的塑料雨衣。又成了那个弯腰干着活的熟悉身影，穿着土黄色裤子的臀部高过头发粘结在一起的黑脑袋——他立刻开始生炉火了。

巴姆没有问候他。莫琳不能相信竟在这个白种男人脸上看到了以主人自居的那种讥诮、压着火气的质问神情。——昨天你在什么地方？怎么一回事？——

七月继续干着他非常熟练的活儿。折断树枝的劈啪响，揉皱纸团的哗啦声(这儿没有装满旧报纸的食橱，每一样一文不值的东西都得省着用)，一两句让罗伊斯呆在床上的话——一小会

儿，火就好了，温和了，你一烤火就好了。——

——我们昨天非常担心。——她暗含着讨好的意思，“为你”。

——你到哪儿去了？——巴姆在给这仆人各种机会，好让他替自己做一个令人满意的辩解。

——到商店去了。——

他直起腰来，在裤子上擦着巴掌。

商店！就好像家里贮备短缺了派他上街角买了一品脱牛奶似的。商店。到最近的百货商店的距离也得有四十公里。那儿有一个警察派出所；当然那家印度人的商店会有汽油泵。

巴姆穿越了一片词语的雷区才选出了要说的话。——谁开车呢？——

——我找了个人给我开。他在巴塞尔干过一段时间活儿，给牛奶场，他是开卡车的。他给我开车很在行。我带来了煤油、盐、茶、果酱、火柴、所有的东西——雨停了你们跟我来，咱们上那儿取。——他还拍了拍衣袋里的汽车钥匙。

——你有钱吗？——她知道他不可能已经随便动用了那依然厚厚的一叠叠钞票，它们就像打湿又晾干了的书页那样鼓鼓囊囊地躺在手提箱里，吉娜正坐在上面，她一大清早总是从上面跨过来跨过去，一点儿也不知道。

——是十五兰特三十五分。——以前在那栋房子，有时女主人不在家，碰到邮递员来收一封信的欠资罚款，他会掏自己的腰包垫上，当他声明欠他的钱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巴姆，我们得付给七月钱。——她把吉娜从手提箱上赶下来。

——我们付。我们付。有人看见你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了？问什么了？那儿情况怎么样？——

他微笑了，习惯性地清一下嗓子，高声发出美滋滋的喉音。每当问到对他来说很明显的事情，他就这样。——相当多的人认识我。我一生下来就在这儿，对不对？大家都问候我。——

——那儿安静吗？没在打仗？——

他笑了。——不过他们跟我说在矿上可有不少乱子。人们都从那儿回家了，他们不想留下来，他们说着火了，房子，所有的东西。跟城里一样。还有那印度人的铺子也卖得太贵了。缺这个，少那个。糖……甚至盒装的火柴，你也得打着架去买。——

——矿上？——

巴姆回答了她。——有一个石棉矿，估计六十公里远，往另一个方向——西边。我估计有好多人签了合同去那儿干活。——

——几个当兵的从这家商店过时。人家跟我说的，是上星期。印度人一看见他们就跑了。——

——那么谁开着商店？——

——啊——（他给逗乐了）——当兵的他们一走，印度人就回来了。他在那儿，那儿，商店里头。——

小家伙罗伊斯从床上猛地一扑，抓住了七月的大腿当柱子。他抱着，倚着，稀里糊涂地好像退化到婴孩时代，把大拇指含在嘴里不动，用久已不见的挑衅的眼光从下面盯着他的父母。黑人把孩子拎起来抱回床上。这两位做父母的听到了给他们的和蔼亲切的命令。——呆会儿雨不紧了，我叫你们。我打发个人来，你们就来。——他穿上雨衣，在衣袋里掏着。——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了——他在手掌里抛起来又接住，然后把两节小收音机电池送到她面前。

——噢，太妙了。脑子真灵，还记着。——以前当朋友们

带给她鲜花或者巧克力的时候他就听她这么说。

他咧了咧嘴，还稍微歪了歪，像他们那样。——现在你又能听好了。——电池是他退场的一个小小的花絮。

她凝神看着手里的电池；对着这徒劳无益的好心肠微微笑了——如果广播电台被击中的话，不是一节新电池能把声音召回来的。

——把它们放在干地方。——

只有手提箱是干的，而且因为放在地板上，潮气跑上来把它也弄脏了。——要是我们找到一两块砖头把它垫高就好了。——不过砖头是一种受珍惜的物资；在这种小屋里，每家都习惯把床垫起来。巴姆哪儿给她找砖头去？她找到了她自己的解决办法。问七月。——

她这会儿煮粥是绰绰有余了。粥是这个小部落的饭食，玉米是他们自己种的，他们的女人在大木坛子里舂的。它不像机器磨的精制糖那么细，而更像黄色的粗瓷碎片。尽管粗糙，但也比那种袋装的货色味道好。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它在保健食品店有卖的，注重养生的白人美食家就着蜂蜜和黄油吃……盐！他起码给她带来了盐。这是一度曾经失去的，而今她可以把盐放进她煮饭的水里了。

人们——黑人们——当然已经在商店旁边看见了他拥有那辆黄色的小卡车。

——所以他就到那儿露面，好像太平盛世已然来临了似的。——

她搅着炉子上渐渐变稠的饭。手里的汤勺滴滴沥沥，她看看巴姆，正琢磨能为他做些什么，不仅仅是他说过的那些。——不过果酱会不错——一点果酱就着这个……——她搅动着好像要转化它们的能量似的。——他确实搞了东西来。——

向他要钥匙的时机是有的。但是让它过去了。

他们站在正午的太阳下张望，在那边那片废弃的居住区，那辆小黄车正在倒车，颠簸着往前开，突然向后又是一跳，晃晃荡荡地停住了。七月在开车。他的朋友正在教他。

雨天一过，热浪蒸腾起来，从每一样东西上，草木，茅屋顶，还有各种图案、五颜六色的受潮的毯子，毯子搭在能晒东西的每一处灌木丛和柱子上。被风雨压倒是以前在那儿早已忘记了的事。你哆嗦着，你没有可换的干衣服，使小屋弥漫着烟的炉火是一切生命的中心；孩子、鸡、狗、小猫依照他(它)们生存的等级尽量地凑近炉火。食物带来的温暖——血液奔涌变成生命——是它产生的，炉子里透亮的木头渣烧得很热，粥煮得滚开，冒着热气。巴姆和莫琳渴望抽一口香烟，喝一口葡萄酒或者烈性酒，他们的孩子拚命想要甜食吃；就在下雨的几天里，那堆他们从没熄灭的小火满足了所有这些欲望。

炉火的闪光像一群疾飞的鸟，频频地在开过来开过去的汽车上掠过。他正在掌握开车的诀窍。

开车训练终于完了以后，他和他的朋友一屁股蹲下来——太远了，看不出来他们在干什么；只是在聊天，毫无疑问，七月激动而热切地要交流什么，就像一个人在学一门新技术的时候，正处在将通未通的阶段。穿过山谷走回来，在能看清这边也能被这边看清的时候，七月乐呵呵地在挥着手。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做。他总是那么恰到好

处——巴姆顿了一下，确认她同意这个“恰到好处”，这个字眼儿的准确性。——从来不饶人，也从不被人饶，一种平衡。除了所有那些不平等。我们不能纠正的事情。噢，还有那些我们能纠正的。我觉得——

感激使她几乎哽咽了。——我们欠他太多了。——

他的丈夫微笑了，对他们来说，感谢的分量抵不上汽车钥匙。

噢，她可不这么想，她正在估量她面前的实际情况，货币的价值已经被修改了。它不仅仅是在这儿买不到丢失的东西的钱钞纸片。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给他钥匙。我可以教他开，我自己教——他还没求过我。好吧——得有人给我们买日用品。……——

——只要钱还有。——

——钱！我们会带着大笔钱离开这儿。——他又习惯性地担起了积极主动和安慰别人的男性角色——有些东西他一直带在身上，信用卡或存折。她不会朝他看，钱已经从他身上溜走了，而且也不会提醒他他已经失掉往日的财富了。

七月孩子气地挥了挥手。他给他们带来了木柴——都还是那么潮的，每一家门外又重新生起了炊火，全村都朦胧地笼罩在发蓝的烟雾里。巴姆带着不靠外援的愉快大声说着。——你别麻烦了。我跟你说过的。我自己会砍柴。你千万别这么着了。——

——柴禾是娘儿们送来的。你看见了，娘儿们一直在干这个。——这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他对他开车的本领很是得意。——你知道我已经会拐弯了吗？我还知道怎么往回开，什么都会了。我的朋友他教得好极了。——

——我看到了。你没说过你打算学开车。你从没说过你想学。——

——在城里？——他很和蔼可亲，或是对他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或是提醒他们他很明白他的地位的限制。

——这儿。这儿。——

他用双手充满信心地往前靠了靠。——那不好，别的什么人开这车不好，对不？我自己来开好得多。——

——没有驾驶证……要是他们抓住你——

他大笑起来。——谁会抓我？那时候，黑人大兵一来，那个白人警察就跑了。什么时候他们逮住他，我不知道……。那儿没人会问我，没谁问我的驾驶证在哪里。就连我的通行证，也从来没人问过。那玩意儿全玩完了。——

——我还是有点担心，有人可能会因为汽车来搜查我们。——

——汽车？你知道我跟他们说了。我在城里从你那儿得来的。小卡车。小卡车它是我的了。那，他们还会说什么？——

巴姆只有几绺像羊背上梳下来的落毛那样的白头发从左耳朵到右耳朵跨过头顶——他二十来岁就开始变秃了。高高的脑门在透明的短茸毛下发红了。他的眼睛像吉娜那在灰垢之间闪亮的眼睛一样蓝。——它是你的，七月？——

三个人都有点不自然地笑了。

——他们听我的。要是我跟他们说是我从你们那儿得的，他们准信。——

危险的感觉像一道血红的波浪——血似乎是从巴姆头发稀疏的头顶一下涌到了她身上——促使她想提出警告。她又一次找到了问题的落脚点，从这儿开始说。——玛莎给了我点儿东西治孩子们的咳嗽。她用草药做的——至少是她在煮的那儿种草，她给我看了——

七月立刻眯起了眼。——什么？她给了你什么？那玩意儿

不好。不好——

——可是她给娃娃吃了。你的娃娃。我就是用那个法子让她明白我想要点儿东西给吉娜和罗伊斯——罗伊斯咳个没完，整日整夜的，尽管他没醒。——

他的脸上有一种被克制着的东西忽隐忽现；对他妻子的恼怒，被激起的责任感——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们不理解他。他们经历过这种情形，在他们那儿，十五年了；不过随即他们就把这归结为依赖他人——依赖他们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扭曲性格。——那种药对罗伊斯不好。你不要给罗伊斯吃。你已经给他了吗？——

——没呢，我打算今晚给他。我想可能是一种让你瞌睡的东西——

——它是——你知道……它不是给白人用的。——

她微笑着好像他知道得更多。——七月……你的娃娃已经吃了。别跟我说它会有什么害处。——

——她们懂什么，这些乡下娘儿们？她们什么都信。我病了，在城里你送我上医院。什么时候你见我吃过这种非洲药？——

——好了，没错。不过就是在城里咳嗽药也是用草来做的。它可能会有用的。我没什么可给他吃的。——

——瞧我吧，我下回去印度人铺子里找找看。

巴姆结束了这一场学术争论。——不会有什么药的。“爷爷头痛粉”，有可能。——

——不，他是对的，他们很有可能有点儿咳嗽糖浆之类的，想想住这儿的农村人爱得各种各样的肺病。是有可能的。——

——罗伊斯他夜里暖和不暖和？我想去我家拿床毯子来。——

她搔搔头，微笑着表示感谢。她接过话头很敏捷地提了——

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假设——我想把汽车里的橡皮地板垫垫到他睡觉的地方。——她的手伸到了外边。

——我今天早上想去取，不过钥匙在你那儿。——巴姆没有提高他的嗓门；在那儿，从没冲他嚷嚷过。这位白人（巴姆看他自己就像他们看他那样）要是想在他房间门口斥责仆人，而房里正高朋满座，都穿着那么漂亮的假日衣服在聊着天，他就会通情达理地走到院子里去。

——谁能替你们上铺子买东西？谁能替你们弄来火柴，煤油。谁能替你们的孩子弄到吃的？说呀？——

她一向负有听他谈话的责任；只有她能听懂他的话，适应他的表达方式。

——当然。我会把钥匙给你送回来。——

——是对我说吗？——

——当然，是的当然。——

他看看她，看看远处。——明天我要去给罗伊斯弄药。那孩子病着。——

他在小屋里转了一会儿，就像一个人忘了他在那儿干嘛一样。仿佛是突然置身于一个陌生环境一样，他开始在那狭小、拥挤、黑暗的空间，前后左右忙起来，把东西拖来拉去，摆成一种个人喜好的秩序。

当他摆脱不开的情绪也缠绕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站在那儿。他们没有朝他看也没有互相朝对方看；至少他们不能让他们自己也跟鸡一起被赶出去，那些讨厌东西的粪便已被共享这小屋的昆虫们变废为宝了，成了对它们的殷勤奉献。

在他昏暗的侧影里，他的眼白蓦地转过来又闪开去，宽宽的髭须下面那张大嘴饱含着痛苦的神情，还凝聚着来自他血液里的屈辱和羞耻。他们和七月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他们惊奇而

又别扭的原初情结，犹如针管硬往体内推进让血逆流的东西而血管肿起来抵抗那样的感觉；这种情感是必须由双方身不由己地分担的，缺少一方，单独一方不会体验到它，也不会受到它的折磨。这种情结在彼扎罗欺骗了阿特华帕之后才产生，它也存在于丁根和彼特·雷迪夫之间。

一阵突如其来的蹦跳和打架的声音打破了外面寂静的气氛。

维克多和他那帮男孩子在门口争着嚷嚷个没完。

——大家都在拿水！他们发现水龙头出水了！大家都在拿！我跟他们说他们要下地狱的，不过他们听不懂。快来呀，爸爸！——

他的伙伴们黑色的脸孔都发亮了，贪婪地等着那即将来临的兴奋，等着看那最后落在别人头上的惩罚的刺激。

——可是那是他们的水，维克多。那是给大家的。我修水箱就是为这个。——

孩子挠挠脑袋，把他的泥巴光脚丫往外一撇，摆成小丑的鸭子步，用脚跟着地摇摇摆摆地转圈。——噢，爸爸，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他的朋友们都被他的表演吸引住了，纷纷学他，不过走了样。

——雨是谁的呢？——他的母亲用有说服力的道理引导他。

——水是我们的，水是我们的。——

七月对这孩子马上换了一种慈爱、逗趣、轻松和夸耀的态度。——你多运气，你要知道你爸爸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下了那么多雨，有那个水箱大家现在都高兴，好容易啊，对不？你看，你爸爸他让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开心了。——

一向是一个喜怒无常的讨厌鬼。

在她自己对自己评论别人的话里头，这并不是很激烈的字眼；有几次她评论她的小女儿对待维克多和罗伊斯的行为时也说，“真像只小母狗。”

过去在那儿，她很娇惯他。她曾害怕——害怕失去他和他带来的舒适；害怕对他不够体贴周到，因为他可能有一些秘密的悲哀，而她却可能一无所知，只能从他所不适应的环境的情形上去推测。他爱那城里女人吗？她在这里才想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他情愿把那城里女人带到这儿和她永远生活在一起吗？

人道主义信念(莫琳，跟其他人一样，认为她自己的是正宗的)依赖于这样的前提，即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具有不可更改的绝对相同性。否则，既然人们对感情满足和感情饥渴以不同的方式来体验，怎么能说他们的需求相同呢？把这种感情上的绝对性以任何方式看作非绝对的都是可怕的、危险的；那些称量人脑来判断智力的人，那些声称上帝赋予自己权力，可以凭着头发鬈曲的程度来辨别人的道德判断力，凭着嘴唇的厚薄来确定人的理性能力的人——这些人警醒着随时准备去攫取可以歪曲成他们的证据的任何事情。然而另一方面，那亲密关系的绝对相同性又是怎么来的呢？谁决定的呢？“我们”(莫琳有时候又回过头来 想)明白，在主人卧室做爱和在用假名登记的汽车旅馆做爱相比，男女双方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自然是不同的。在这里，在妻子的土屋做爱和在城里的后院房间做爱也

意味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性欲和责任之间的平衡是——不得不是——很不相同地维持的，由于情人经济地位的不同而不同。这些会改变人们对待感情体验的方式，甚至改变感情体验本身。她和她的同道们所谓的“绝对性”只在这一细节上是对的，即把每个人都设想得不过是钱，为主人卧室和地下旅馆出的价钱。

她手里把玩着一头泥牛，这是吉娜学着做的泥牛之一，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了。抽象进入具体就变得坚实起来，甚至死亡也是一种购买物。巴姆的一位年长的同事能够买得起他的死亡，他用了一架私人飞机的价钱——他坐在里面坠毁了。七月的老母(也许她是他的祖母？)会是慢吞吞地爬进坟墓的。就像莫琳现在看到的那样爬着，头上顶着木柴和扎扫帚的草回家来，腰弯下去，弯下去，向着地面，一直到最后她沉陷进去——这是她买得起的唯一的一种死亡。

莫琳有车钥匙，她从车里取了橡皮垫以后就把钥匙留在身上一夜了。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他精力充沛的笑声，也看见了他从小房到山羊圈又走回来。被看到并不一定被注意，在这样的地方每一家每一天的活动都围绕着同一圆心打转。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目睹者，于是也就滋生出了这特有的小心。只有孩子们缠在一起，像蜂群彗星似的尾巴一样活动着。这种蜂群她前几天曾经见过，它们从天空中滚滚而来，盘旋着一棵树一棵树地压下去，最后缠绕在一棵树上。她从来没进过他的小屋；巴姆进去过。——里面有一些从家里拿来的东西。小屋收拾得漂亮利落。他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生活。——巴姆说家是指他和她提供给他的，而他指的是他妻子和女眷们。

她预演着她走到他的领地门前的情景。不过一百来英尺远。过去在那儿他的住处就在院子对过，她曾向川流不息地来

访他的朋友们、他的兄弟们挥手致意，夏天从敞开的门里能看见他们，冬天则能听见他们呆在里面围着她给的电取暖器——每次她去那双车汽车房开车的时候她都正好路过他的住处。可她从来没有进去过，除非——难得有的时候——他病了。于是她敲门，在场的朋友们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原来都这样那样地挤在底朝上的箱子和一张旧桌子上——她给过他一张还像样的椅子，好让她的仆人坐着舒服，不过没料到他会用它招待半打的朋友），而她将在干净的床上放下托盘，上面盛着她亲自为他准备的清淡吃食。而在这里，他的小屋很显然地是他跟女人们分开来的为自己保留的某种东西。但她是一个白人妇女，是曾经雇佣过他的人，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很显然，这是她的说法。

她在那间小屋的数十步之遥处住了两个多星期，而且可以永远地住下去而并不走进去。她一点儿也不想在这里看到她扔掉的那些装饰玩意儿了，在这里它们把他跟住在他周围的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分隔开了，她以前在家时它们倒没有这种不忍目睹之感，在那里它们把他跟她生活的方式分隔开。那旧的绿色床罩，上面有一张摹仿世界早期地图的图案，绕圈印着海豚，美人鱼和半人半兽的海神，那装框的马拉加[1]招贴画——这些东西本身（在那儿他的房间）可能没有被摆出来，不过摆了同类的玩意儿。他肯定知道，每回她过手给他一些新东西，是因为这些东西对她来说是劣质的或者难看的，有点儿旧的东西，则是因为她已不再喜欢了。罗伊斯（他最喜欢的），正一直跑过去跟别的孩子们一起拿花生吃，那是维克多帮着挖地得到的报酬。她叫住他：——看看你能不能找着七月。——

① 西班牙南部一省，该省首府亦同名。

她的孩子跟他那一群回来了。他们肚皮朝下，用胳膊肘支着趴在潮湿的地面上，结实的小脑袋快活地挤成一堆儿，碰得噼啪响。——你找着七月了吗？——

——嗯。在那儿他屋里呢。——

——他过来了吗？——

——他说没事儿，他在那儿，你可以来。——

她坐在太阳底下，皮肤都被烤脆了，就跟一个滚熨斗在湿布上熨过似的。她身上正来月经——昨天开始的，尽管按日历来计算它在一个星期前就该来了——那日历留在家里了，在电话上方。又有另外一样必需品她忘了带。她在牛仔裤下面两腿之间垫了些布条，这儿的所有女人在她们的经期都这么办。她带着在每一个团体中都适当地表现出来的那种谦逊和隐忍的态度，悄悄地下到河边去洗过一叠布条了。她在石头上搓洗布条的时候，没有想到血吸虫病的危险，她凝神看着她的时间流逝，又有一个月逐渐远去了，在水中打着漩儿，像一缕红色的烟雾被匆匆的河水裹挟而去。

——来点儿吗？——她最小的孩子还需要跟她一起分享他的快乐。

红色的泥土和成串成串的生花生紧缠在花生根上。

——要是你不把花生都吃掉，我就把剩下的焙一下。搁盐。那样就会有一种新味道。——

——就跟袋儿里的一样？店里那种？——

——对。——

——我原来不知道那是种的！——

这小男孩的脚趾像小鼓一样敲着地，一边吃一边哼哼着，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会再哼哼了，长大了不能再从双唇之间寻找满足，就像不能再从她的乳头上寻找满足一样。他看来懂得了

黑孩子们说的话，起码明白了他们做游戏时仪式上的或者规则上的土话，他肯定喊着相当于“你输了！”“该我”！“犯规！”一类的话。

——去说我要去见他。——

孩子们整队出动了。她伸出手来，一颗刚洗过的摸上去像绵羊皮似的小黑脑袋在她手底下刷来刷去。有时候她也有耐心哄小孩子，在孩子迈着新生的小腿走过来的时候，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看她觉得太眼生，不以信任。

孩子们没有回来。她觉得她听到他在唱，从颅腔里发出声来，低低地哼着赞美诗，每当他干起那些动作重复的有节奏的活儿，如打亮或者擦洗什么的，他就会一边干一边这么哼起来。但是这次他露面的时候，仅仅是不慌不忙地向她走来，在这阳光灿烂的一天。没有任何愠怒和怨恨的意思流露在他周身上下；她终于召他来的小小的胜利，随着心在里面砰地一跳就翻了个个儿，也显示出藏在一块石头下边的某种卑鄙的东西。她内心的这些瞬息变迁经常把她从一个迫害者变为一个受害者，对于她丈夫、孩子、任何人。

她开口说话了，和在那里的某种时候一个腔调，就是当家庭琐事跟她生活本质发生了矛盾，而这他又理解不了的时候。不过她起身站起来了。——这是你的钥匙。——

有一刹那，他的双手略微做了一个捧接的手势，紧接着就自己撤回去了，而只用右手的手指头从莫琳手上钩住这一串玩意儿，弄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他抬起下巴颏，想要感觉而不是看巴姆在不在小屋后面。她的沉默就是回答：没回来；他们两人都知道那第三个人早早地已经出发了，去打点儿肉——一窝子疣猪卤莽地撞到村子可以看见的一个老沼泽地来了。他站在那儿，他的呆头呆脑就是

对他不能逃避她的一种认可，因为她是单独一个人，他们是一对一；她的态度则是暗示她并不拒绝到他那儿去，不过是想让他们在没有别人裁判的地方见面。其中的微妙并不新奇。曾经有某种关系的人们常常不得不互相解释他们之间从没说过的话。

——你并不乐意非得我拿着钥匙。对不对。我一直都看得出来，你不乐意这样。——

她开始摇头，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差点儿笑起来，她撒了个谎，抗议说得给她时间让她解释——

——不，我看得出来。不过我给你干活。我，我是你的奴仆，一向都有你们房子的钥匙。你们出去度假的时候，我把每一样东西都锁起来，每天夜里把钥匙带到我房间……只有我拿着你们所有东西的钥匙，对不对——

——七月，我想跟你说——

他的十个手指攥起来，挡住了她所想的，她想说的。——在你们的房子，要是什么东西丢了，就得是我一定知道。对不对？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在那儿，只有我有钥匙，从来只有我——

——七月，你不问我——

——给你干活的奴仆。那儿，在城里你信任你的奴仆都十五年了。——他的鼻孔硬硬地张成两个黑洞。“奴仆”这个荒唐的字眼一记一记地敲打在她身上，既不是地方，又无法躲开。他从哪儿捡到这个武器的？那倒班老板曾经用过它；这个词在她的家从来没用过；当她的面说这个词的人，她还曾很是自负地羞他们，揭他们的短。白人店掌柜甚至警察嘴里吐出这个词，她也曾上去质问。——信任你！当然我们信任你——

他们已经同时挪近了。她把拳头放到他胳膊上，表示强硬的要求。

——不。不。你并不乐意我拿着这些钥匙。——

——七月你不问我——你只是一个人说。你干嘛不让我说话？你怎么不问我？——

他把脑袋缩回到他结实的脖子上，好朝她看。——你想说什么？嘿？你能说什么？你跟大家都说你信任你的好奴仆。你是位好太太，你有个好奴仆。——

——别再这么说了。——

——她一直说得好听，我被逮住她替我付罚款，有一回我病了她给叫大夫。——他像哭一样笑了一声。——你担心你的钥匙。你出去的时候我留下来给你看狗，看猫，看留在车房里的汽车。我还不能忘了给你的花草浇水。你一直跟我交待，甚至到最后一分钟我给你搬手提箱的时候，对不对？照看好每一样东西，七月。你回来的时候还带来很不错的礼物。你每个地方看看，看看是不是每一样东西还都好好的。我自个儿，我没说你不是位好太太——不过你也没说你信 任 我。——那 是 命令。——你走在后头。你在看。你跟我说你出去的时候该把所有的书搬出去弄干净。你怕我给你干得还不够？——

——要是你觉得那会儿我不应该让你清理书架，你怎么不这么说？你怕什么？你一直都可以跟我说。你就得这么说。你觉得不是你该干的活儿，我从来没让你干过一点儿。我让过吗？我让过吗？我也有错。跟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对你不周到——不好？我想知道，我真的要知道。——

——有主人他替我去想。可是你，你不用为我去想，我是个大男人，我自己知道我该干什么。我不是一天到晚都在想着你的东西，你的狗，你的猫。——

——主人。巴姆不是你的主人。你干嘛假装？没人把你想成不是成年人而是别的什么。我的上帝，我不能相信你会这样

跟我说话……这十五年，巴姆跟你有什么鬼关系，这才是实话。你是呆在工具棚里鼓捣那些东西。你天天是在给我干活。我让你心烦了。就是这么回事。你也让我心烦了。人就是这样。——她的火冒上来了。——不过我们不是谈这个的。这跟现在没关系。那已经结束了——

他眏了几下眼睛。——你怎么说那结束了——

——结束了而且取消了。你不再给我干活了，不是吗。——

——你不打算给我工钱，这个月？——

——给你工钱！——她的脸烧红了，闪闪发亮。他继续以一种难讨好的假装的反应迟钝来面对粗暴和令人厌烦的攻击。——你知道我们可以付给你以前拿到的工钱，可是我们不能给你只因为——

——非洲人喜欢钱。——受侮辱使他拒绝迎合她，除了在最低程度的理解的意思上。

——你非常清楚我的意思……因为发生了的事情。在这儿不一样了 你不是一个仆人了。——

——我是你家的奴仆，对不对？——他表示要求他应得的权益。

——继续这样有什么好的？那是在那边，六百公里以外——她的胳膊徒然地在他脸前挥了一下，指着她够不着的隐没在丛林后面的家。——要是我得罪了你，要是我伤了你的自尊心，要是我所想的只是我的友善，我对你的感情——要是这伤害了你的感情……我明白我不知道，我原来不知道，而我该应知道的——她那只胳膊垂下来；她也不知道他听懂了这些话没有，她扔掉了十五年来的习惯，没有把话翻译成非常简单、具体的词。如果她以前从来没有对他用过“自尊心”这个词，并不是因为她觉得他不懂这个概念，没有什么自尊心——只是因为这

个字眼本身可能超出了他所掌握的语言之外。——现在要是我跟你要钥匙，它不是厨房门的钥匙！你不是作为一个仆人拿着它们！是吗？而是一个朋友——他来要，来要……然后他还回来……他再想拿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再来要。——

他用手掌托着钥匙递过来。——拿去吧。这不是你们厨房的钥匙。十五年了，我给你们的厨房、你们家干活，是为了我老婆，我的孩子，我得为她们干活。拿去吧。——

——要是你能想到的只是以前在那儿的事情，怎么不提艾伦？——

他城里女人的名字犹如一个炸雷落在他们中间，这是没有一个人敢提起的忌讳。

——艾伦现在怎么样了？你的老婆孩子在这儿，而过去那些年一直是艾伦陪伴你。那儿在打仗，她在哪儿？她有东西吃，有地方睡吗？你是这么关心你老婆——可她对艾伦会怎么想？——

他立刻停止了嘲弄人的可气的装腔作势。他可能会一把揪住她的肩膀，他们一下子跨越了十五年来两人都不越雷池一步的禁地，她的话把他们俩猛地拉近了，现在他们是在一起了。像两个决斗者，在他们转过身迈出规定的步数之前，互相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或者像两个同谋者，谁也永远别想逃脱彼此心照不宣的东西。她的胜利是装出来的，只要看她顷刻之间变得柔顺的、准备接受一切的脸，她的眼睛空空的，等着那即将到来的，他们两个人的最后结果。

他在侮辱和冲动之下颤栗着，她看到了他脖子的痉挛，知道他永远不会宽恕她这一刻。她的胜利在她心里烧尽了，如同一团火焰在一株空心树里变黑，熄灭了。

仆人兴味索然地回答了那好太太富于责任心的询问。其

实就是让她面对他真实的生活情形，她从中所能找到的答案也并不比她一向知道的多：——我想艾伦她已经回家到博茨瓦纳她姨妈那儿去了。很小很小的村子。跟我家一样。那儿是黑人过安宁日子的地方。——

他把钥匙装进衣袋，走开了。他的脑袋从一边扭到另一边，像一个工头在检查车间或者一个农场主在地里指示要干的活儿。这边，他大声嚷着，给一个女人发命令，那边，向一个修自行车轮胎的男人问话，还对着山谷那头呼唤一个年轻人过来，那是他的汽车教练，也是现在几乎跟他形影不离的人，穿着城里年轻人的牛仔裤，像一个保镖似的沉默着，他细长的脖子上姑娘似的绕着一串珠子。

这位白人观察到那一窝疣猪轮番穿过草地，翘起来的尾巴天线一样显露出来，每天下午它们吃草的时候，越来越近地啃到这边来，大疣猪鬃毛粗硬的背上沾满沼泽里的泥水，微微闪着亮光。这是一幅禁猎区里给观光客欣赏的风景，在有空洞带游廊的平房里，手里拿着饮料，两腿交叉着，从看风景的窗口向外眺望。

那儿有五头小猪，两头长成的母猪和一头大公猪。大公猪长嘴上的獠牙像火车头上的排障器，猪嘴的形状很像一种老式的火车蒸汽机。黑人没有枪，都怕那獠牙，猪群专心地吃着草，带着一般动物对人类深深的、普遍的不信任，跟着吸引它们的随便什么东西走，植物或是草，离小屋越来越近，有时候，领头的猪(其中一只母猪或公猪)一抬头，摇起信号旗一样的尾巴，它们就转回头敏捷地跑掉了。它们沉重的身体反弹起来就像裹着紧身胸衣的女人。看到这种情景，观光客会笑起来；丑陋和威严形成对比，优雅和肥胖相映成趣——这真是逗人爱的动物。

巴姆从朽烂的茅屋顶里抽出枪，带着它出现在七月村里的人面前。他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他有枪；那像蟑螂一样自由地进去每个小屋的孩子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闲扯。他在他们中间走着，不会伤害谁；瞧，他和他的枪都是他们的。有些女人向他微笑着，但大多数女人都没注意他。他自己的儿子维克多领着一帮孩子，用棍子打着玩，吹牛聊天。七月过去总是迷信地

不碰猎枪；他的雇主旅行回来之后，在后院还没解开打猎的行装，他就会把枪盒直接送到巴姆手上，指尖像被恐惧燎着了似的，慢慢吞吞、战战兢兢地递过去。万幸的是，他还没把枪盒扔到一边弄坏。不过他那位戴项链的朋友表现出了兴趣，问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想掌握使枪的方法；巴姆给他示范怎样瞄准移动的目标，向他讲解上弹药的装置。——你以前打过猎枪吗？——

年轻人摇了摇头，其他人都笑这白人的无知。——我从书里了解它。——用的是现在时态。这么说这位前送奶工会讲一点英语。他是读过警匪连环画还是读过几本关于操作枪支的拙劣的秘密小册子……？这样的小册子近十年来曾经在这个国家最无人注意、最偏远的地区流传过——在每一桩黑人政治案的审判里，政府都把它们提出来作为颠覆活动的罪证。然而由于从疲软无力状态中产生的甜蜜和自在(眼下暂时的，直到他们走出这里)，巴姆几乎轻率大意了。——什么时候我会让你试试。你叫什么名字？——

——丹尼尔。——他把巴姆手里的枪朝向自己，直到枪管正好对着他的眼睛。两支瓦蓝的钢管一尘不染地泛着光泽，每一次晃动枪管上都闪出一个个炫目的光环——村里从来没有过比这更完美的东西，他以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他全神贯注地看了好大一会儿，对琐屑的无关紧要的部件也很感兴趣。然后他松了一口气,发出了一声含含糊糊的、不相信似的低语。或许他不能相信死亡会是这么干净；或许他以为他刚往枪眼里回望过它，或许他太年轻了，还不能相信死亡的存在。

巴姆藏在野猪沼泽近旁等候着。他跟一个他约去的约摸十四岁的少年在一起。为了把维克多留在后面村子里，他又是吓唬又是许诺，现在都不得不拚命从脑子里抛掉那些话——他这

类人是不打孩子的，在这儿很难剥夺给这孩子的一些优待或者特权，作为对不听话的惩罚，而这些所谓优待在家里是很容易办到的。——我答应给你猪皮。我们要让七月的一个亲戚教我们怎么保存。——

——那要是你什么也没打到呢？——孩子追着他喊。——要是你什么也没打到你给我什么呀？——

做父亲的没有抬头。他用枪拨开像无数条舌头似的湿草，小心翼翼地摸过去，那少年则像小鹿一样既灵敏又犹豫，就跟在他身边——一方面他在重温以前在家时的周末狩猎之乐，另一方面他又处在这些天来由于他的生活的连贯性被破坏而导致的不和谐的警戒状态，分分秒秒，他的双腿正把他带向巡逻兵或流动哨可能偶然撞见他的地方，他开枪是有风险的，会暴露他们这家白人藏在那些小屋中的形迹——这些习惯和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感受撕扯着他；他提前尝到了冷冷的怨恨的滋味，这种滋味是有朝一日他儿子长大成男人时他将感受到的；他也尝到了被从为人父母——而不是孩子——的乐园里放逐出来的滋味。

他在芦苇丛里等着，和他一起的年轻黑人皱着眉，可怜地忍受着蚊虫叮咬。疣猪群过来了，当它们走到最不容易逃脱的位置时，他朝离他们最近的一头小猪开了枪。打这些野兽的合适的武器应该是来福枪，而不是猎枪；他只能用大号铅弹，希望够得上穿透野猪厚皮的分量。狩猎这古老的游戏，打中和打不中的都手痒，只射中翅膀的光彩，其中捉迷藏似的把戏把杀戮变成一种乐趣，所有这些都让他回到了从前，回到了那个家，他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又跨入了他曾经生活过的另一个孩提时代。第一头小猪倒下了，另一头跟在大猪后头慢了几秒钟，没来得及消失在丛林里，也被他打中了。刚才还像只小鹿似的男

孩这会儿变成了一头食肉野兽，一下子扑到了第一头小猪上；接着这位猎手用一段反复用过的绳子，在每个小屋都被视若珍宝的绳子，把它的腿捆在了一起。这头野兽已经非常安静了。目光落在某个虚无飘渺的地方，很快就奄奄一息了。另一头被打中了身体而躺在地上，因为疼痛正怒气冲冲地踢腾着，或者是正想着它还在撒开腿跟在大猪硕大安全的身体后面飞奔哩。黑男孩利索地捆好第一头疣猪，然后蹲下来等着另一只死。巴姆挥手叫他到一边去，补一枪射穿了它的脑袋。它年青的头骨那么轻，长嘴顿时被打碎了。真可怕，血从那血淋淋的猪脸上慢慢地渗出来，拖着带血污的鼻涕，那干净的死亡从镀铬的枪管射出，冷漠而超然地散发出枪油的气味。鸟类(他通常的狩猎战利品)可是没有脸的，真的，只有属于审美家的单薄的骨架、无血的尖喙，没有肉身，只有一副粗砺的皮囊，以及皱纹纸一样的眼睑——一只珍珠鸟的脑袋死了跟活着看上去没有太大差别。这稀烂的猪脸朝地面垂着，嘀嘀嗒嗒洒了一路的血迹，回到小屋，他提供肉食的功劳才使他安安稳稳地当了重要人物。

他意识到她可能会对这生活的必需品发表评论或者表示悲悯。他当下就对此表现出缄默。他知道，他这是第一次成为凶手。尽管是七月和他的亲戚们剥皮、切割，他还是一个屠夫，就和屠场上那些脚蹬胶皮靴站在一滩稀烂的肠子、肚子、尿水和血污中间的屠夫一样。承认是一种解围办法，他既不想说话也不想争辩。

但是莫琳两手叉腰站在一边。打了卷的牛仔裤下面，她的小腿和双脚脏得像一个流浪汉。——给他们大点儿的那头。——

他不需要关于公正的忠告或者幸存的礼仪。

她只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小的那头会嫩些。——

他只拿了小点的那头猪的一半，还给维克多拿了那张整整

齐齐不带头的猪皮。一个浑身浮肿不能动弹的男人，平时总摆出一副黑色雪人的样子（他有肺病咳嗽，老戴一条肮脏的围巾）在那儿，或者支撑在一张旧椅子上，像一个用破布填塞的稻草人，这会儿也活过来了，剁下了那个破碎的猪头。他羡妒地四下里张望一下，把猪头搬起来就走，有一双手从一家门口的暗影里伸出来接了过去；这男人拖着软塌塌的肥腿走着，晃晃荡荡就像女人捣玉米时的乳房。

巴姆草草拼凑了个烤肉铁叉。没有香料，葱，胡椒——莫琳只在硬皮上揉进去了点盐——这猪肉还是一顿以前从来没尝到过的盛宴。他们和孩子们没吃过烧猪肉，也从来没有两个星期没吃过肉的先例。烤肉的香气——并没有太多肥肉，只有家猪才那样——从每一堆烧饭的火上飘出来。仅仅这香味就让狗咬起架来。半野蛮半怯懦的猫围着莫琳调配好的吃食不停地叫着。她蹲下来，用一根棍儿挑着一个旧奶粉罐，伸进火舌里，接了猪肉烤出来的油汁，再仔细地涂在肉上。湿气和烟浮过她的眼前，她不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缓一缓，巴姆接过去的时候，她对自己大声笑着。

他们不知道肉也是能醉人的。他们兴奋热烈地吃着，就像围着一张餐桌在朋友们中间喝酒那样。巴姆用南非公用语给罗伊斯唱了一支滑稽歌曲。——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吉娜摇头晃脑唱了一首催眠曲，她跟她的伙伴们学的，用她们的语言唱。维克多变成了一个故事大王。过去，现在和远方都在趣闻轶事这一最好的传统消遣里消解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学校干什么吗？星期五那些大男孩们去军训，他们不在操场了，没法儿当我们的头儿——

吹牛和撒谎招来了带点醉意的咯咯笑着的责备，大人吓唬孩子说根本不信。孩子们让大人们开怀笑了。罗伊斯哼哼着，

吮着一根排骨的骨髓，几乎要睡着了。大人趁他迷迷糊糊地不知道抗议，把他抱走，铺平床让他躺好，他还在心满意足地咕哝。——明天不上学，对吗？——以前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同意他晚点儿睡的时候，他会这么问。

他们自从开车逃出来以后，还没有做过爱。在小屋跟三个小孩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是连想都不能想的。这只是一个拿一块麻袋片儿当门的地方。隐秘性的缺乏扼杀了性欲，即便还有一些感觉的话，那些他们如此不熟悉而又关系到每日生存的燃眉之急，大概也已经把这感觉挤掉了。听收音机的时候，他们两人之间的紧张变成了对一声军乐轰鸣的期待。听着在家那边，攻打城市的激战仍在继续着的消息，他们忽而怀疑，忽而预感到不祥，忽而又觉得拯救就在眼前(幸亏还活着，即使是在这里)，种种感受交织在一起，紧张淡化成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困窘。

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了粘在手指上的油腻和肉的味儿。他们一起躺在汽车座这么小的地方，很难保持平衡，只得把胳膊肘交叠起来，把手靠近对方的脸。他们做爱了，缠绵在一起，互相从对方的身体里找到了深深的共鸣，就在发出鼻息声的孩子们面前，在每夜熟悉地从黑暗中摸索出来的老鼠、蟑螂、蟋蟀面前；在沉睡的村庄面前；在丛林面前。

早晨他有一刹那恐怖的幻觉，那时他突然在他的阴茎上看到了猪血——随后才明白那是她的。

好肉吧，姆哈尼？①——

老太太已经很有一把年纪了，到这种岁数的人往往会假装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了，以此作为对那些打算在他们死后还要活下去的人的不断谴责。

——你上回吃到这么好的肉是什么时候？——

她迅速地把一个不值得她注意的话题拉开。——肉很快就坏。你吃吧，明天什么都没了。我的房子该换个新屋顶了，漏雨。冬天会冷的。我想铺上新草…——

——你会铺上新草。——

她故意对儿子做了个脸相，好像正好该问这个问题似的。

——你会有你的房子，你的新草的。——

——他们还住在里头呢。——他的妻子玛莎正在用火灰擦亮一个搪瓷罐，这是他上次休假打在行李里带回来的。——嗨，姆哈尼！——

——我会给你盖一间新房子。你明白吗？你何苦操心这事儿——我会给你盖间新的。

——他们会带来麻烦。我不是在乎那几个——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白人会带来麻烦的。——七月的女人边擦着罐子边弄出沙沙的声响，她没有朝他看，怕惹他气恼。

他像敲鼓一样响当当地说出了他一直不得不重复的话。

① 姆哈尼：七月夫妇对他们母亲的称呼。

——什么麻烦？哪来的？

她知道，不能再对他说以前的话了：来自警察的麻烦，政府的麻烦。

他半笑半哼了一声，如像不屑于指出这两个女人令人恼火的无知似的；然后转过身，为打消她们的心思，扫了她们一眼，如同石子在水面上打了个漂。——要是我说走，他们就得走。要是我说他们可以留下……那么他们就留下。——

他的妻子坚持着，就像她的手指天天不懈地干活一样——她踌躇不决，在捡着干豆子，擦着罐子上的灰浆——根据黄卡车带到她面前的破碎片断，她坚持着把过去拼到一起。她的话带着单纯好奇的味儿。——在城里那儿，那白女人——她跟你讲你得煮这个洗那个吗——

——没有别人会跟我说。要是我说——

她对自己摇摇头，把头低下，好像他不在似的。他不在的时候她养成了跟他说话的习惯，他走了那么长时间，她一个人在闷闷的沉想中就是这么一问一答的。有的时候，他完全消失了；她无论在哪里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这种时候她总是求比她写得好的人给他写信(尽管她能看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的信，但自从她上完三年学以后，那支在格子本上歪歪扭扭地涂写用的圆珠笔，就专为写信这个目的保留着了)：我亲爱的丈夫，我一天到晚想着你在这儿的日子和你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大多数怀孕年龄的女人，丈夫都在她们从来没见过的城里过活。有一大套谈论这方面的话要说。男人写了或者没写信来，钱寄来了或者这个月迟了，他换了工作，他正在“另一个地方”干活。有没有什么别的女人，她男人可能也在那儿干过活？有没有什么人熟悉这些女人从来没见过的那另一个城市的名字？她并不常想到可以去跟别的女人谈谈，谈谈那并不存在的夫妻

对话里提到的问题。甚至也没跟她的婆婆谈过。老太太岁数大了，她的脸就表明她知道答案，她曾有一个在矿上呆了三十年的丈夫。

贯穿于全部季节之中的是一个遥遥无期、久久不变的没有男人的季节，这季节包括播种时节和收获时节，多雨的夏天和干旱的冬天，而只在男人回家的短暂阶段才有所变化。尽管每个男人回家的次数不一样，但对所有女人来说，各自的男人在家的时间长短大体上是一样的。对于每个女人来说，漫长的等待会因男人回家而有所改变，因为在那段时间，她虽然仍像平时一样在其他人中间干着活过着日子，在生活循环中却和其他人处于不同的阶段。男人离家和回家的交替循环对她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是压倒自然人性的生存紧迫感逼出来的。太阳升起来，月亮落下去，钱必须来，男人必须走。

他妻子常常会用固执的抱怨、对丈夫的羞答答的闪避以及拼命的坚持来发挥自己的威力。——不吧，在城里是不是这男人告诉你干什么——

这几乎不值得回答。——你知道我不做饭，有个肖萨①女人，厨子。——

——我怎么知道，我从没见过她——

——诺姆乌拉。他们叫她诺拉，你在照片上见过她，圣诞节的，你拿到的哪张他们给我们拍的照片。跟孩子们一起的，吉娜和男孩子们。一张彩照。你拿到过，阿尔伯特把它和我寄的鞋一起带来的。——

老妇人接着完成了这一描述。——一个胖女人，带着顶粉红色的帽子，这样的——(她把一只手捂在一只眼上)——看起

① 肖萨：南非黑人部落名。——译者注

来她爱喝酒。——

——她结婚了吗？——

——我想他的丈夫已经死了。——

——这么说她没有男人？——

她盯着他等着回答。她看出他在想以前那儿的什么。后院的照片、白男人、白女人和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就是现在——对这些的具体了解她都有了，但提供的线索还是太少，她还是跟不上他。

——还有邦戈尼。那祖鲁人，他在清洗部当检验员。套着一身制服，骑着自行车。他跟诺姆乌拉一起住在她房间里。——

——他住在院子里，他们不在乎……唠。诺姆乌拉怎么样了？她现在上哪儿去了？——

他在小屋里靠墙放着的小矮凳上坐下来，是陌生男人来访时坐的地方。一道阳光从门口射进来，把屋子斜对角分成了两半；一边是女人们，她们身后凹凸不平的灰泥墙面，突出成萎黄色的、颗粒丰富的浮雕，很像她们面庞的肌理，另一边是男人，在暗影里。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她们能看见他的指甲和眼睛。或许他耸了耸肩膀表示他不知道。他的妻子猜到他不愿意费神来回答——而她不管怎么说，也不需要回答；那祖鲁人就是能让她满意的回答，她那关于诺姆乌拉怎么样和去了哪里的问题不过是用来分散别人对她的满意的注意力的——这时他在角落里说话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不知道她怎么样了。要是她到了她家在……——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含含糊糊的，也许他忘记了一个地名，也许说不出来。

莫琳过去作为装饰品收集的泥土容器现在成了她的冰箱和器皿。小鸟、鸡、瘦弱的野猫公开地或偷偷地尾随着她找残渣吃，它们从她手上嗅到食物的味儿，从她的脚步里听到食物走近了，家养的猪也跟在她后头想捡她的粪便，现在一窝小猫的出生又增加了这群动物的数目。母猫在巴姆当枕头用的帆布背包里安了家。他轻轻地拍拍赶它走了。吉娜和维克多用在以前的家那里用来装桔子的那种塑料袋替代背包为这些猫做了窝。但不久一个男人到小屋来了，他一脸受了委屈的不高兴。那张脸很面熟，好几代这样的面孔曾经在后门出现过。那个男人不是想来讨回个公道的，而只是想请求得到点施舍性的补偿。莫琳知道这人是谁，她曾经观察过他。拆散一个桔子袋的合成纤维，把它们抚平滑，弄成一定的长度再打结，然后把几股编成辫子，做成一根结实的、鲜亮的绳子，当时她一边看他干这消磨时间活儿，一边默默地打发她自己的时间。莫琳夫妇明白了他想要回袋子；孩子们偷了他的袋子。

当时维克多的眼光从妈妈转到爸爸，就像一只手在手枪皮套上游来游去一样。——袋子就摊在那儿，整个一大摊，就在一棵树下面，满地都是。我们只不过拿来了一个。——

吉娜就像在学校上讲故事课时那样，听到这严厉的指责便惊慌失措了。——一个旧的桔子袋！谁会去偷一点垃圾！反正，我们买过一袋桔子，对吗，妈，对吗，那堆旧袋子里头有一个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袋子，其中的一个是我们的，不是吗。

你怎么会偷扔掉的东西呢？——

——可是，吉娜，那些桔子袋是他干活用的——

——你用袋子干嘛？什么“活儿”？——

——他做绳子。那是他的材料。——

维克多以大于他的年纪的一个白人男人的愤怒发火了。——他绝不能说我偷了。我只是拿了扔掉的废物，没人想要——

但是他们的父母所做的一切是给了那个黑人一张两兰特的钞票，巴姆还拍了拍他的后背，打了手势表示道歉，也表示认为大人应该体谅孩子们的行为。

那人走了以后，维克多激动的情绪都耗尽了，他勉强支撑着晕头转向地站在那里。——嚯，两兰特买一个旧桔子袋。我可以用它买一辆上好的老式小马车模型了。要是他给我两兰特的话，我也能给他弄几个旧桔子袋。——

他的父亲把同一只抚慰的手放在他身上，一只手掌轻轻地落在他头上。——要是他有买旧桔子袋的两兰特钱的话，他就能买一根绳子来代替了，对不对——

罗伊斯耐心地围绕着这整个问题羞怯地、信任地去接近他的哥哥。——你打算买一辆那种小马车，维克？我是说，要是你弄到两兰特？——

——你上哪儿买去。这个地方不成。杉顿才有，在皮金培商店，那儿才能弄到。——

——问问七月，维克。你怎么不问问七月？维克？——

这男孩突然又激动起来，他的眼皮变红了。——好了，一件事——我懂了一件事，不是所有的非洲佬都跟七月一样好。有些人真讨厌。真讨厌。——

妮柯整天像来回跑的鸡一样在小屋里溜进溜出的，她是吉

娜的朋友，她走了进来，径直走到吉娜面前，带着一种童稚时期的亲密，就像恋人眼里看不见其他人那样。她们手拉手站着，眼光柔和地在一旁瞅着维克多的落难。吉娜从母猫的奶头下面给她们俩一个拉出一只小猫来，这渺小的动物马上收紧了小爪子，呜呜哭着，叫声对它们来说过于响亮，就像对那男孩来说，怒气也过于激烈了。

于是又有父母之一——母亲提出的意料之中的劝诫。——你们不该把它们从母猫身边带走。它们才两天大。——

那位父亲用暗示的隐语跟那位母亲说话，其中的秘密含义是孩子们不懂的。——可能妮柯知道这猫是谁的？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一下子冒出来的一窝一古脑全送回去。——

她看看他；谁从一个不存在的前提出发说话，她就这么对谁表示她明白。

他通过吉娜来问妮柯。这小姑娘咯咯笑了。她皱起鼻子露出牙齿；又问了她一遍。吉娜抓着她的手来回摇晃。妮柯咯咯笑着，这只脚到那只脚歪着。——爸爸，她不明白。她说没人养猫。——

——我懂了。我懂了。人人都有猫，就像猫都有跳蚤。——

小姑娘对他这随便的语气不耐烦了。——不不，我跟你说了。没人养……她说的。——

下午他到河边去钓鱼。他和他全家不喜欢吃有须的淡水鱼，可是其他人很爱吃。他把孩子们留在河边，自己及时赶回来听四点钟的新闻。她正躺在床上；小屋的任何一个占有者，要是发现他自己能够独自拥有小屋一个小时的话，他肯定会立刻找机会利用一下床的。他看着她，像有时候他看着自己躺在那儿似的；而且每当他这独居一室他就想到了囚犯。自从他到这个地方以来，他已变得想什么时候睡就能睡去了；让他自己

在睡眠中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他妻子，离开孩子们，他们正等着他带他们逃离这种地方哩。

没有军乐。

他们听了新闻。接收很糟糕，播音员说话结结巴巴的——这个留下来在国家广播电台那雄伟的花岗岩塔楼上做这么个工作的人是谁呢？

有可能播音已不再是在那儿进行了——电台总是要隐瞒大量情况，它很可能永远不会宣布它已被迫撤离原址，此刻正躲藏在某个暂时避免所播音。电台处于困境中但报道却呆头呆脑地打着十足的官腔，引用"权威人士"市民军的旅长的话对从戴普克鲁夫军事基地"夺取"索维托的胜利进行过评价，而此人实际上是否也和其他人一样早已溜掉了呢？关于远西兰特矿山收复的所谓目击者的叙述——那么勉强地拼凑了一场溃退的描述，而且看来也不符合"我的吉姆·海德林顿"的女儿的出生地的地形特征——是不是战壕里的幻想？与此相反的情况倒是被无可争辩地承认了，这可不是好兆头，昨夜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被"部分摧毁"了。这次没有提到火箭袭击。这du大的建筑一定是被从里边炸倒的，他们实际上很可能就是抛掉赫伯特·贝克爵士在殖民地的那种优雅，用他们的身体和双手在廊柱和沙岩之间进行肉搏战。或者也许他们宁愿自己先炸倒大厦，也不愿意让黑人占领。

已经不可能谈论那里发生了什么。他和他的妻子默默地听着，他下意识地记住了一些他可以在收音机关掉以后评论的细枝末节。——你找着要小猫的人了吗？——它们不再在小屋里了。

她懒洋洋地从床上起来，她刚才肯定打了个盹。

——我把它们放在水桶里淹死了。——

过去当他建议她做某件事——不论从天性还是从见识她都毋庸置疑地要去做的事时，她常常会希奇古怪，冷嘲热讽地回答他。现在不要漏风给帕金森，我不打算去开会因为我不打算投票，嗯。——噢，关于这点我已经跟桑德拉好好聊过了，就是要确定他会去听。

这种巧妙回答属于对市郊生活来说很自然的拐弯抹角。在那主人卧室，它有时候以干脆的冷淡和恼火告终，有时候则导致揶揄、亲吻，或是某种类型的做爱，这往往由房间里的机会和正在做的什么事决定的——在她刷牙的时候，他的一只手会在她的两腿之间摸来摸去，在她弯下腰哗啦哗啦地搅动浴缸里的热水和冷水的时候，他的阴茎朝前顶撞着，他会从后面寻找她。

她瘦了，小腿上的毛看起来很粗糙，过去她的腿毛一直是剃得光光的，现在在脱毛这么多年之后又长出了不均匀的绒毛。她说“放在水桶里”，他明白那指的是什么，那是一种需及时进行的行为的具体明证。

——噢，我的上帝。——他的嘴唇替她做了个厌恶、恶心的样子。

她使劲挠着肋骨，手在揉皱的T恤衫上摸着她单薄的乳房下面的瘦骨。

——噢，我可怜的东西。——

她把T恤从头上拽掉，抖落着。一躺下来就会变成跳蚤们的温床。——你大惊小怪什么。——乳房的袒露已不再是一种亲昵行为，而是意味着他和她的性欲被阉掉了，她站着，像工厂淋浴间里剥光了衣服的男人，或者慈善机关里排成一溜儿淋浴的女人。——我过去老想把它们拿去骗了。——

——嗯，当然你会把它们拿去骗了。——

——着魔一样想让它们少受点罪。我想，现在好了……不

是像这儿的人那样眼看着不管。——

——我可他妈的不希望那样。——

她的脖子被风吹雨打弄得发红了，大量的深色晒斑向下延伸到T恤衫和棉布衬衫圈住的地方，形成一个V字形。这两件衣服是她的全部服装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她年轻时的长发下的白皙温热的脖子，会变得跟她父亲的一样，他还记得老头星期天早晨穿着保龄球衬衫的脖颈。

紧绷绷的T恤衫挨着她的脸拽下来，眼睛、鼻子和嘴都被扭歪了。就好像她在很难看地对他做着鬼脸似的；她还是他的“可怜的东西”，被生活拖得这么松松垮垮，万般无奈地把手转向所有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物。——你怎么不把其中一只骗了呢？——

起先，地里的女人们没注意她，或者只是斜着眼睛不经意地浅浅一笑算是打招呼，注意力仍集中在地上。其中一两个女人——年轻些的——可能在互相议论她，就像有人来评论她们的时候那样——比如一个摄影师，一个监工（到了一定的季节，她们常会到白人的农场打零工除草，被卡车拉到几十英里以外）。她跟着她们，仔细看她们怎么选择、采摘和挖掘——特别是七月的母亲，好像用鼻子就能闻出来，挖土的小棍一点，肯定能发现菜根。她并不指望自己分辨野菜的本领能达到那种程度，只认得野菠菜和其他一两种叶子，她看见女人们弯腰把它们掐下放在篮子里。她两手抓满了这些野菜后，她就把积攒的一捧丢进其中一个篮子里。后来她自己找着了一个盛过肥料的旧塑料袋——人们到村里去或者到农场干活的时候，把洗洗刷刷后能派上用场的东西都带回家——再用一段细绳扎好挂在肩膀上，就像那些没带篮子的人一样。

绑在母亲们背上的婴儿兜，太阳一晒蒸发出湿尿布味儿。女人们把裙子从身后扯起来扎到前面，脚丫张开站着，脚趾缝里淤泥挤上来，跟沼泽里鸟的爪子似的；她们走在硬地上，糊在腿上的一层泥巴在太阳地里晒得粗糙不平，给她们都穿了半截靴子。她把牛仔裤高高地卷起来，露出大腿上黄色的脓疱、破裂的紫红色的小血管，爬在膝盖后面的曲张静脉以及小腿上紧贴着白皮肤的粗硬汗毛，这一切无不显露出她似乎不知怎么地已经忘了她三十九岁的年龄和生孩子的瘢痕，又回到了矿主

家跳舞的小女孩的时代，穿起了简单的短裤。七月那位不笑的妻子这会儿笑了，直直地看着那白腿，莫琳循声盯住她的时候，她也没扭开脸。笑，她为什么不能笑呢？七月的妻子那硕大的臀部超过她身上的其他部位——莫琳也反过来笑她，笑她俊俏的、紧紧地扭在一起的小脸，那张脸上的黑色是从里往外渗的，而不是一种涂在表层的色素。为什么这位白女人被人看到了她的虚弱、瑕疵就应该感到羞耻？她也同样在别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呀。在一起一句话也没说，现在很近地并排站着，你超过我，我赶过你，她们就这样像一劳作组似地沿着峡谷干了一会儿活，后来有人向七月的妻子招呼，她挪开了点儿，手里的活却没有停，像每一个女人那样，单个儿干，但仍然保持着一群鹭鸶的队形，时而这里起，时而那里落，去采下最好的野菜。

全家人就着他们那份青菜吃玉米饭。要是他——巴姆——知道是她自己采的，他不会说什么。但是维克多想要再来点青菜的时候，他很快地回答了他。——你已经吃了你那份。弄到菜可费了不少事。——嘴里还嚼着干玉米糊糊，她一刹那之间有一种冲动，想走过去，俯下身子靠住他，拥抱他，抚摩他，好像抚摩一个被重新记起的人，而不是那个过于看重自己的名誉，偶尔才给大家弄点肉捉点鱼来的人。但她的脉搏仅仅悸动了一下很快又平息下来了。

新闻消息：那天由于尖厉的火箭呼啸声的干扰，完全不可能调到那家电台，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听到只可能是军区广播，即军管地区广播，起初这个系统只用于纳米比亚战争中的边界地区，为的是补充容易中断的电话通讯，最近这一广播网已经延至全国各地。播音正使用一种暗语，但是直接提到了索维托和约翰内斯堡之间的贼普克鲁夫墓地。不连贯的南非荷兰

语的急促语音突然消失了；电波也没了。她凝神看他随意拨着旋钮瞎调，想再找着那段播音节目。他背对着她，好像他在干什么秘密的、丢人的事。他关上了收音机；而且占住了床。

她走出小屋，外面是下午闷热的蒸笼，她没带什么遮挡，一群苍蝇围着她的脸转悠。茅屋顶、旧罐头听和鸡毛，那么单调乏味地闪过眼前。她向藏黄卡车的地方走去，只是因为那儿是另一个地方——车里再也没有属于她的任何东西了。搭过牲口圈的干树枝上，蚂蚁把红土搬上去结了一层泥巴壳。她拿一根发黑的硬树枝刮掉泥壳，扫开蚂蚁唾液粘成的泥粒，毁坏的树皮下面露出了木头；骨头一样白，木头也被蚂蚁啃了，光溜溜地咬成了浅浅的滚槽，好像是用快凿子凿出来的。她沙沙地刮着泥壳，带着孩子般的没有目的的满足，现在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有摆在面前的这一件；她转悠着走前上去，汽车在那里，还在那里。

穿着巴姆的旧灰裤子的一双腿从车下面伸出来。

总是有话可说，碰上车子抛锚时的客套话。——怎么啦？——

七月那夹杂着咕哝声的声音传过来。——没事儿，马上就好了。那管子，一直这样，有点儿松了——

——噢，用到头了。颠颠撞撞开这么远到这儿来了。不能指望别的东西了。——

他好容易爬出来，贴着地面，脊背朝下，闭着眼摇头，弄掉落在他脸上的脏东西。他笑吟吟的，嘴里啧啧很响地感叹着，挺滑稽地表示气恼：——那玩意儿！——然后他用他们的语言向某个人问话；丹尼尔还在车下面。

七月起来僵直地蹲着。他油污的两手在腕子上垂着。——家里咱们有那种结实的线。——

她点了点头。有一卷——太多了，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在双车汽车房里占着地方，就放在装炖肉用的炭麻袋和草坪割草机的中间。

他笑了。——伙计，我真想在这儿弄到点儿那种线！——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东西留在那儿。——

——对对！什么东西都在那儿！我们走的时候我挂上了那么大的（他弯起食指和拇指钩住另一只手的关节比划着挂锁），我锁得严严的！——他后背斜倚着小卡车的轮子，拥有财产的舒心和骄傲使他这会儿忘了是让谁受了损失这财产才聚敛起来的。

——仗打得肯定很凶。——

——你听他们说什么了吗？——

——收音机我们不是总听。我想电台已经完蛋了。没准儿大楼都被炸掉了哩——我不知道。那专门的广播是给军队听的。——

对他来说，也永远有话可说：仆人的俗套话，习惯于迎合主人的心意，用布道课堂上的话圆滑地、宿命论地把争斗和冲突转为老天爷的不偏不倚。——天哪，天哪，天哪。咱们怎么办哪。真可怕，每个人都变坏了，杀……烧……只有上帝能帮我们。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一切会恢复原貌，重新好起来。——

——原貌？——

她看出他并不想换一种方式跟她说话。

——原貌？——

他紧闭的嘴唇拉宽，向下撇到西边嘴角，眼皮也垂着，以前在那儿，每当对她吩咐的一件事不喜欢却又不敢违逆的时候，他就表现出这副样子。——我不想听杀人什么的。这个在杀，那个在杀，别说杀人。——

——不过你不是指回到过去的状况，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吗？你不是这意思。——

年轻而有柔韧性的丹尼尔，轻而易举地从车底下滚出来，站在一边。她扫了他一眼，寻求他的同意，想和他一起拉七月承认她的话。丹尼尔也有可以跟她说的：一句问候，依来坎希太太①。七月跟他讲过。一半是关心地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就吩咐他去办件事：不管三七二十一，这年轻小伙子马上听从命令，沿着山谷往村子的方向去了，大概是去取修理的家什了。

但是他一走出十码远，他们都清楚那只是让他走开的借口。莫琳觉得她来找七月是已经决定好了的事；旁边有人在场就没有用，现在他们又是单独在一起了，就像上次他到小屋来，她意识到他张望她身后有没有人在里面一样。

她在那一刻似乎刚刚走进他的视线；他说话也好像是从沉默中开始一场谈话，好像他们还从未说过话似的。——我变得担心了。——

她懂他用的时态。他的意思是"在担心"。

——你吃不饱。我想你吃不饱。——

她吃惊地淡淡一笑；还有些疑心。——你干嘛这么说？我们都吃饱了。我们都好好的。——

——不……不。你没法子了，得跟那些娘儿们去掐菠菜。——

语音刚落她就回答了。——我去了。我不是没有办法才去的。——

——要是孩子们需要鸡蛋，我给你多送些去。我可以把菠菜给你送去。——

① 依来坎希：非洲话，表示问候。

——我没事儿干。就为打发时间。——但是只有她在甚至最普通的地方也抛开抽象内容，他们才可望互相理解；他的英语是从厨房、工厂和矿上学来的。它的基础是命令和应答，而不是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我没活儿干。——

他微笑了，像笑一个孩子的弄虚作假对自己没好处。——那不是你的活儿。——

这些年来她曾干过好多种半天的工作；每天早晨，她开车去打字、找报社、开会的时候，他常常在她身后关上大门——挥一下手，拖延一会儿跟他街上路过的朋友聊几句。而他也知道她能用双手干活。要是这位倒班老板的女儿整个星期六都在花园里挖地种东西了，他就会（那会儿似乎是对她）同志式地向她打招呼：太太，今儿个干得真不少。——现在他选择了他想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现在是他的；他会把过去安排得跟现在相适应。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让别的女人们来给我家找吃的。我必须自己干。——但是，这里他们两人都清楚这种说法是一种幻觉，即使他们算它成立。七月的女人们，七月一家——她和她一家都是由他们借养，他们救济，他们掩蔽。她看着她的仆人：她们是他们的动物，就像她们的牛和猪一样。

——娘儿们有她们的活儿。她们就得干这个。这是她们的地方，我们一直住这儿，她们一直什么活都干，什么事都得是这么着。你没必要在她们的地方给她们干活。——

当她没听懂他的意思的时候，她也习惯地弄出个不表示什么的手势或者声音，先等着听他下一句讲的，根据前后的内容再回过来搞清他的意思，这样才能指望避免错误的反应。（尽管他夸奖巴姆——莫非为的是刺伤她而不是抬高巴姆？——巴姆可没有这个本事，经常以为明白了他的话而马上回答，其实完

全是误会，把他惹恼了，这个黑人的英语太糟糕了，不能表达他的想法。)他说“地方”可能是任务的意思，或者可能是暗示她应该记住她对这块地方没有权利——“地方”作为领地用——她在这块地上薅了能吃的草来对付孩子们的维生素不足和便秘。她没有等到发现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突然换成了另一种腔调，她对她自己有了新发现而且打算立刻实行。——我喜欢有时候跟其他女人们在一起，再说还有孩子们。我们好不容易能说一些话了。我已发现玛莎能懂——一点儿南非荷兰语，不是英语。只是她太羞涩了，不愿多说话。——

她愉快的微笑还是老样子；同时还有他妻子的名字，她用女人之间才有的那种亲昵提到他妻子。

他稳稳地坐定了，看上去短粗而结实。——你去那儿和娘儿们在一起不好。——

她抓住他的话头。——为什么？可是为什么？——

——不好。——

这些话把他推来搡去，朝他围攻。——为什么？你是不是认为别人会看见我？可是当地人知道我们在这儿，他们当然知道。为什么？巴姆出去并开枪冒的险更大。你开着那黄家伙到处跑的时候……你害怕吗——她盯着他，笑出了眼泪，似乎她的恶毒话喷到了自己脸上；他和她都被她、被她的这一面惊呆了，在他们这么长时间的相识中，她又一次显露出来她是一个自以为是的陌生人。——你害怕我会去告诉她什么事吗？——

仿佛天旋地转，他一刹那间像被抛出了地面。——你能告诉些什么？——他的眼睛迸出怒火。——说我给你干了十五年。说你对我满意。——

知了在他们两人中间嘶鸣。他面对着她，右手攥成拳头放在胸前。她感觉到了那怦怦的心跳，就像感觉到她自己胸中的

恐惧一样。

她从来没有过这种害怕的感觉。在地底下凿井吊桶里碰断了右手中指的倒班老板，尽管手腕子和残手依然像矿工的一般粗壮，也从来不会违拗他这位小小舞蹈家的意愿；她的丈夫——从前在那儿，他怎么着才会成为对她的威胁呢？在这儿也一样；他在这里是什么呢？不过是一位躺在一间泥巴小屋的床上的建筑师，一个没有汽车的男人。并不是说她一想到他就厌恶——占住着同一间泥巴小屋，她有什么权利厌恶他——只不过是她已经踏上了长途旅程，而把他落在了后面，留在那间主人卧室里；和她一起在这里——这婚姻契约之外的环境里的，只是有关他的存在的不完美的想象。

她从来没有害怕过一个男人。现在恐惧来了，在所有其他事情如跳蚤、破布条中的月经之上——那恐惧来自这个人，来自他。是从他扩散出来的；她感觉到的不是他本人的威胁，不是生理的，不知怎么地，却是她自己心里的。在她来到这里以前，她怎么知道，那种特殊的交谈，在他按名分是一名仆人的时候，她表示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交谈，会变成对他的侮辱，变成他们之间可说的、有某种意义的唯一的事情。

十五年

你的奴仆

你满意

她走开去坐在一堆泥墙废墟上，让她凝视的目光远离他们——远离他，还有她——投向灰色和绿色的丛林，从两大洲之间的喷气飞机上可以看见一层积云，那儿划线的日界线消弥了时间，那儿没有地平线。

工具在金属上旋扭着，碰得叮当响，盖过了知了单一的不停的长嘶。她碰裂的指甲——只有左手拇指的指甲，一直比其余的更角质化、更硬些，还保持着从前在那儿的椭圆形状——能够在泥墙上划出道道来。她抬起手并看看她的手掌，沙土粒儿在上面压出了印子，不过一点也没有粘上；在矿山周围的草原上，她曾经踏过那同样又硬又黑的土地，一次又一次地把脚趾头碰在蚂蚁丘上。她站起来，走到他那边，他已经从汽车底下拖出了那用坏的管子，把管子放在叉开的两腿中间，正在粗手粗脚地修着。

摆弄机械玩意儿，他从来不在行。

瞧他在用的那把老虎钳子。就连她都能看出那太小了，没法顺当地夹紧。

而且他正从一个错误的角度伸进去弄。

这管子应该换种法子弄。要是七月往汽车上装箱子的话，巴姆提到过手提箱是怎么样被倒着立在箱盖上的。她不让巴姆跟他说什么，怕冒犯他的自尊——他在其他方面是聪明过人的。

他坚持用钳子和螺丝刀，没弄懂那金属和他的手指头是别着劲儿的。他从来不摸；每回割草扎出了毛病，他拆卸了一半干不下去了，就把它留在院子里等着巴姆回家。

噢，不是那样的。就连一个女人都能够看出来。

有她在旁边，所有这些都传递给他了，在他们的静默中两个人都听到了，从他们过去不曾说出来的东西上知道了。

她说了出来。——你从来不会收拾机器。让巴姆干吧。找他干。——

他没有回答。他不认识“巴姆”，一个被他拿走汽车的白种男人；跟她一样，他认识某个落在滕西雷伍凤凰那儿的人，

那位——回家能把割草机的零件装起来的主人。然而他让她哑口无言：——昨天夜里有人来了。——

她头顶啪地响了一鞭。她慢慢地深深地抽了几口气；她的T恤衫里面，她小小的、扁平的左乳下，心在突突地跳，她意识到恐惧，就在那儿——警察吗？谁来了？——

他让她呆了一会儿。——头人那儿来的人。——

她缓过来了，很不耐烦。——那么没什么啦，七月，对吗——他知道你。我是说他肯定知道你带人来这儿了。——

——他知道我是谁……他打发人来问我留在我屋里的是谁。有人说你们得去头人那儿，我得给他看看。有人从什么地方来了，都得去头人那儿，问他。——

——问他什么？——

——问他好，他们才能呆在他的村子里。——

——我想你说过这儿是你的地方。谁都知道是你的地方，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从我们到这儿以后你一直这么说。说过一百遍了。——

——对，我说过那话。我的地方它是这儿。不过所有这儿的人，所有的村子，都是头人的。要是他打发什么人让我这样或那样，我得听。是不是。要是他说我得来，我就得来。这是我们的规矩。——

——你怎么从前不跟我们说，要是礼貌上的事——是不是去见头人比较好？——

他抬头看了看：她脏兮兮的脚，瘦削的脸，从脸边用橡皮筋扎到后面的头发。牛仔裤的颜色顺着她的大腿和拉链褪掉了。——现在我跟你说。——

——什么时候去？——

他打了个手势；用他自己的节拍。——明天。——

——巴姆可以跟你去。——

他修理的活儿没有停下来。——你，主人，你们的孩子。都去。——

有些东西让她沉不住气了，不是生气，而是一种挣扎，她没有力量和巴姆一起进入一种屈从的关系，这是她和他从来没有过的。丢开吧，她说到汽车，就像她从前说她的割草机。——丢开吧，他会来修好的。——

她向村子那边走去。走到斜坡那儿她转了过来，迎着太阳站了片刻，好像她要对后面喊似的。接着她故意走到她刚才站过的地方。他们彼此离得很近。她的眼睛用手遮着，他的头在汽车下面，谁也看不见谁的脸。她说了句别人听不见的话。——你用不着害怕。他不会把它从你这儿偷走。——

巴姆从床上爬起来，好像一个本该在工作却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睡着了的人。

——很显然，这是个礼貌问题。我想那没什么坏处，对酋长表示尊重嘛。——

他感觉到自己挺可笑，于是有些羞恼。当枕头用的帆布背包在他一边脸颊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好长时间没说话，他的声音有些干涩——我们又不是来作官方视察的。——

——不管怎么着，我们都得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不这么说。——

——你不也没问过？——

——他不肯透一点风。他情绪不好。——

——怎么了？——

她刚才一进门就抓起水瓶，边说话边咕咚咕咚直接从脖子灌下去。终于解了渴。她咧嘴一笑，嘴唇湿漉漉的。——他怕我把他那个城里女人抖落出来。——

——他的什么？——

——你知道，我跟玛莎，他妻子，处得挺好，呃，挺好，还谈不上。我们在地里聊了几句。我发现她能讲点南非荷兰语。——

——噢，他的艾伦。但他凭什么认为你会说呢？——

看着眼前这个睡眼惺忪，茫然无知的男人，她的语气激烈起来，虽然不是对他。——废话。咱们郊区那套通奸把戏别在这儿玩了。他妻子对他在那儿的事儿一点儿也不知道哩。——

巴姆从她没忘了带的手纸卷上撕下一截，起身出去，走进了灌木丛里。他身后留下一股睡觉的汗臭味；从前在那儿，她一直不知道他的气味儿（做爱时的汗味跟这不一样，那是两人混在一起的）。淋浴和洗澡使他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相互了解。她也不了解她自己，不了解自己体内隐藏的气味。小屋泥墙上又没有一扇能开得大大的窗，没法让这个男人的汗酸味散出去。那个她在床上曾用舌头爱抚过多少次的身体——原来一直是这种味儿。她在屋外生了一个做饭的火，带刺儿的、芳香的木头噼噼啪啪地燃起来，烟味儿甜丝丝的，冲淡了汗臭。怪不得别人——玛莎——总是在那些小屋之间点着一只小炉子，确实聪明。只有那些依然想象着自己住在带浴室的套房里的人，才会那么文明地断言说这种习惯不卫生而且太热。

早晨，他们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穿着干干净净的、没有熨过的衣服，他们看起来比七月和丹尼尔更寒酸。莫琳没有费劲地去用那老掉牙的火烧热的平板熨斗，那些女人们凭这种熨斗就能在破破烂烂的裤子上熨出一条条无懈可击的裤缝来。莫琳不住嘴地说话，温柔慈爱地跟孩子们逗乐，跟他——巴姆合谋笑他们的傻话，过去他们全家一起出门远足，去看露天电

影或是去野餐时，她就是这样。他们已经在这巨大的丛林包围中禁闭了三个多星期了：任何进入丛林的活动都是一个特殊节目。他觉得自己迫切需要刮刮脸：他现在很少刮脸。即便是囚犯，到了出庭面对可怕的指控的那一天，被塞进囚车，沿着城市街道开，从铁网后面嗅着、瞥着，大概也会兴奋吧，巴姆开车驶过监狱囚车的时候，曾经看见过那些紧扒在铁网上的手指。

现在堵在他心里的不是恐惧而是——一团确信无疑的预感。酋长想要让他们搬走。三个孩子从小屋里跑进跑出，他们有孩童特有的直觉，他们的抱怨，他们短暂的狂喜，他的妻子拿着块石头，把一枚钉子敲进凉鞋里，还有他，在屋外有亮光的地方刮脸。酋长会叫他们走。酋长有什么责任告诉他们该上哪儿去呢？人家并没有请他们来这儿。手一挥划个大圆弧就够了：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嘛。况且这不是他们的而是文明的惯例；当一个白人农场主卖了他的农场或是死了，他的接替者对那些在那片土地上出生长大而且干活挣饭吃的黑人农工，也不过简单地说一声：走。

他一点也没对她提这种确信无疑的预感，倒不是因为怕吓着她——这位郊外的骑士也没有权利对她隐瞒她不得不害怕的事实，况且隐瞒并不能保护她——而是因为这些天来，他对她说话的时候，不知道是在对谁说。“莫琳”。“他的妻子”。那个在地下干了一辈子的好老头的女儿，那老头一开口就是4号矿井的开采面，6号井的热度，他的伙计们的“坏运气”(很久以前，就在4号井，吊桶撞着了他，他失去了一个手指头)他谈起这些，就像一个人谈论自己家乡小镇的特色那样津津乐道。那个穿着紧身衣、在夜校教黑人跳现代舞的姑娘，她那自己有一套社会道德标准的建筑师男朋友在一旁凝望着她，那个

他的客户在说"我们非常希望您和您妻子来出席宴会"时指的配偶；那个在十五年之后，凭着她腰胯的线条，扭动的臀部、有时在人群中的笑声突然再一次变得无比迷人的女人；那同一个女人，熟悉得就像搁在厨房架子上的一只茶杯。那个对她来说他是"我丈夫"的女人。她是他同谋中的另一半，是他交纳所得税的目的，是学校运动会上他的一个观众；是以前在那儿，在受到恫吓的那些时刻，不用互相看一眼，不用任何身体接触或任何言语，就和他紧抱成一团的人，他们一起面对种种威胁——职业上的嫉妒、政治上的逆流，种族偏见以及他们自身为保住醇酒而可能堕入的保守。

她。不是"莫琳"。不是"他的妻子"。她是这小土屋里无声无息地活动着的一个存在物，有着他所不了解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存在，因为这里没有可借以想象她的行迹的熟悉的区域，没有可以赋予她具体形态的事情；他对她没有更深层的认识；只有彼此找出对方的时刻。今天早晨，她为孩子们选择了以"他们的母亲"、"他的妻子"的形象出现。但她根本不是他能够告诉她酋长会让他们离开的那个人。他完全不清楚她会怎么对待他这种确信无疑的预感。无论对他还是她，以前都不曾有过相同的情形。如何对待，如何接受，如何解释——向每一个人解释：这么多天以来，他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离开。而现在，却变成了如何留下（他的男子汉的尊严受到了正在以玉米饭餬口的他的妻儿们——莫琳、维克多、吉娜、罗伊斯的考验）。

毫无疑问，他们已不再需要丹尼尔，但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和她都没有说过这个小伙子应当留下。孩子们在车里的位置不得不反复安排了好几次才使他们个个满意。七月安排这事，

像他往常摆放衣箱一样。不管怎么说，孩子们都听他的，虽然他并没能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公平，他明显地偏袒了罗伊斯。丹尼尔也坐在后边，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立刻争着要他做游戏的伙伴。吉娜原本想带上妮柯的，现在她把丹尼尔拉在右边顶替她，用他的本族语言，她跟妮柯两人“私人谈话”时学来的土语，大声喊着：他是我的朋友，我的！

莫琳不理会孩子们的吵闹，她拣了前排中间的位置，坐在那儿，她可以为司机和其他乘客传递信息。

司机座旁的门开着。巴姆绕到另一侧去，七月已经先坐进去了。他迟疑了一下，但七月并没有让开的意思。他在他们——莫琳和七月——的注视之下，绕过车前盖，登上了方向盘后面的座位。方向盘给装饰过了，缠了一圈豹皮图案的塑料布，用夹子夹住。这不可能是从印度人的商店里买来的，倒像是出自某个修车厂专卖流行玩意儿的小商店。（他似笑非笑地瞟了她一眼；她则粗暴地从侧面瞪了他一眼：他要干嘛？）

或许七月跟莫琳一样去抢过东西。

七月打信号，他举起胳膊，手指撮成鹅头状，向前一戳：直走，一直往前。汽车沿着牛走的路行驶。荆棘擦着车窗，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长着长长的，怪模怪样的犄角的母牛挤作一团，看着这个黄色的庞然大物逼近。七月摇下车窗，伸出胳膊，用手掌砰砰地拍打着车身表示警告。汽车驶过一座座土屋，那儿的人们正做着的和这些过路人出发的地方的人们所做的没什么两样。同样没完没了地拖木头，劈木柴，烧着同样的火，同样的弯腰洗涮、蹲着挑拣玉米的背影，同样的在那些腿脚越来越不听使唤的老人中间蹒跚学步的孩童。这样一种生活，对于任何不习惯于如此贴近生活的单调循环，而习惯于超凡脱俗的大事——由个人成就和政治风云构成的“新生活”——的人，

是会带来不安和恐惧的。

人们抬眼望着车里的人，带着观看他们曾听说过的东西时的神情。有一两次，七月大声嚷嚷着问候的话。

——呃，我想没有大道吧。——

——甭想！——七月笑着——喂，喂，我们快到啦。——

眼前这牛羊啃得光秃秃的地面是村落的标志，汽车于是慢了下来。他们又置身于土屋、垃圾堆成的围墙和一小片一小片爬满蜷曲的藤蔓的南瓜地之间了。七月指挥着汽车左弯右拐。按路边的标志和数字牌右拐弯是以前在那儿的事，现在即使是多功能卡车，经过坑坑洼洼的大路也很不容易。

——慢点儿，慢点儿。——

——是那儿吗？——

七月宽容而心不在焉地安抚着其他人紧张的神经——我们就停在树下那个地方，就在那边的房子那儿等一小会儿。就在那儿。——

他们坐在汽车里。

他从她的沉默里觉察到她惯常的期待——并不期待过多——只是让他问问七月要去干什么：七月已跳下了车，关上车门，不让任何人跟着他。他压根儿不需要问路；莫非那就是酋长的住处？

在他们看来，那像是教堂或校舍之类的公益场所。那是一幢长方形的砖结构“建筑物”，而不是巴姆曾在一篇论文中介绍过的那种大土坯房(文章题目是《非洲农村建筑的必要性及其手段》)。并非任何一个宗教团体都有钱盖那种早期传教士规定的锡皮尖塔或尖顶门面——显然上帝不会住在黑人的圆形房屋里。那座房子有锡皮屋顶和两扇用纸板补上破玻璃的两扇的窗户。一长条三角铁悬挂在树上，那是教堂或学校常用的钟的替代品，需要召集教民或孩子们的时候，就敲响它。不过周围看不到一具十字架，也没有每所学校作为运动设施都有的那种立着简陋的球门柱的小片泥地。那边倒是有一块开阔的草地，有两棵树没被砍去当柴火烧的多余枝条，似乎象征着某种礼仪和尊严；三匹马拴在树下的拴马桩上；一个男人仰面朝天躺着，斑斑驳驳的树影洒在他靠着树干的肩膀上。丹尼尔一定是随身带了个收音机，流行音乐的强烈节奏和尖声呼喊从车厢后部涌泻出来。

他离开司机座绕到后车门。——这是什么地方？——

罗伊斯和维克多手里抓着一种硬豆荚互相投来投去。吉娜

靠在丹尼尔身上，小手放在收音机的调音钮上，挺有派头地微笑着，那好情绪仿佛从心里溢出来化成了乐曲和节奏。——这个地方？——丹尼尔冲他笑着，搜肠刮肚想找出能让他理解的词儿——这地方，它叫——叫呼比尼①。它是人们……他们来的地方。——

他回到车里，在方向盘的假豹皮上来回活动手指。——重要的地方。酋长的重地。肯定就是法庭了。他们会在那些黑橡树下举行元老会②。只一次。——

——那我们怎么不进去？——

——我怎么知道？——

静了一会儿，他又说话了。——让他去处理好了。他一向精明得很。——

她有点不高兴的意思，没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可是过去他们的想法总是很一致的，"莫琳"是"他的妻子"；她清楚这一点。过去他们看七月在纸条上算钱曾一起忍俊不禁。那些纸条是从他们的报纸边上撕下来的，钱则是他在后院玩的"法飞"③游戏中当替手，凭着每回十分钱的赌注一兰特一兰特地赢来的。他们调侃他的时候，他就用大拇指跟食指打个榧子，再咧嘴一笑：人人都喜欢钱嘛。当然啦——那是夏洛克④的手势，打这手势的人在城里可真是穷得除了自己的一磅肉什么也拿不出来了，除了一个仆人身上那点儿少得可怜的零钱，还有什么可赢的呢。

音乐声停了，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同样急促的、说葡萄牙语

① 呼比尼：原文 hubyeni，南非祖鲁语，特指酋长召开重要会议讨论问题的特定地方。

② 原文kgotlq，为南非祖鲁语。

③ 法飞：Fah-Fee，一种赌博游戏。

④ 夏洛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一个吝啬的犹太商人。

的声音。这声音正以各地音乐节目主持人常用的那种欢快的语调得意洋洋地念着新闻。肯定是莫桑比克电台。但其中有几句用英语提到"阿扎尼亚的自由战士"，也重复了几次比勒陀利亚、约翰内斯堡这样一些地名。巴姆还分辨出来有几次提到美国大使馆。他把头伸出车窗想听得更清楚，接着干脆又跳出了汽车。他把收音机从孩子手里拿过来，但是新闻播完了，孩子们的吵闹声使他没能听到最后一部分。树下的那个人已经踱了过来，打量着他们每个人，和丹尼尔说话。他光着脚，有一张战士般粗糙的皱纹纵横的脸和一双深陷的眼球，眼光似乎随时准备从他所看到的物体上逃开。丹尼尔和这个当地人正在谈论他，这个站在那儿，拿着收音机，想调出其他台的白人；他们谈论他就像谈论一个仰面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小姑娘使劲扭着身子要收音机；音乐又震响起来。他转过身刚想回到车上，七月陪着一个腆着肚子、步态庄严的男人走了过来，这个人穿着假领，打着领带，穿一套搭配可笑的茄克和长裤。他忽然停了一下，让七月不知不觉地超前了几步。看到汽车和车里的人，他仰起了光滑粗壮的脖子上那圆圆的、剃过的脑袋，绷紧了一边脸颊，这才脚步重重地继续走，就好像是走在拥挤的人群中，而七月在前面开道似的。

幸好已经来不及再回到车上了；不站着会面就会显得不尊重人。可是七月似乎不清楚自己的角色，他没有作介绍的意愿——可是如果介绍的话，他会说什么？酋长，这是主人。(多少次了，以前在那儿，莫琳和巴姆试图努力让他改掉西蒙·莱格里[1]式的称呼，但他不愿也不能改，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其他称谓能代替，没有什么合适的叫法能确切地表达巴姆和他之

[1] 西蒙·莱格里：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一个对黑奴极其凶狠的白人监工。

间的关系。但当巴姆家来了朋友住在客房里或是参加星期日酒会和晚餐，这位大家都熟悉的仆人也会同那些白人男女交换几句简短的问候，聊一聊无伤大雅的家庭新闻)。那个大块头黑人低沉而急速地嘟哝着一句问候的客套话(反正他们也听不懂)。他语调坚决，颇带权威性，其中的意味既可以说是欢迎又可以说是接纳。

——巴姆福特·斯迈尔斯。我妻子……和孩子。——他伸出一只手，对方抓住了它。这个黑人慢慢估量着眼前这黄色的汽车，车外的白人男人、车里的女人和孩子，像是要把这一切消化掉似的。他没说话，大家却都听到他发出的声音。他清了清嗓子来引起注意。——你们从哪儿来？——七月肯定告诉过他，他肯定像这周围其他人一样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和他们的经历。这是权威性的盘查仪式。

——约翰内斯堡，和七月一起。——

——我知道，知道。——他若有所思地用力从脖子上的一大堆肉里抬起了下巴，又一次打量了一遍车里的人，颏下的垂肉动了动，算是回答那个女人的问候。曾在镇上开过送奶卡车的丹尼尔跳下车，用镇上黑人们打招呼的方式举起了一只拳头表示问候，然后就悄然站到一边，跟七月差不多并排。

——那你们就来这儿了。你们来干什么？——

微笑着——不自觉的讨好的表示，谁知道怎么说才能使他满意呢？——巴姆用手摸摸后脑勺，只有那里还留着稀疏的、短短的浅色头发。头皮由于阳光曝晒，变得跟长了鱼鳞似的，摸起来很不舒服。——呃，你知道那儿的麻烦。像打仗似的。就是打仗。我们都可能被杀死。我们住的房子，给烧了，炸了。大家只得逃跑，孩子们可能会伤着的。七月把我们带来了。——

七月打断了他的话——他告诉我说酋长在家。咱们现在去见酋长吧。——

他突然意识到这大块头不过是城里的看门人一类的人而已，或者(当然，是对她来说)只是个坐在倒班老板的工人居住区外守着水果筐的看门人。怪不得她没有下车来作为“他的妻子”站在“她的丈夫”身边。但是不管怎样，开车之前他还是再一次跟这个人握了握手。

——他是谁？我是说，他是干什么的？——

七月一向好为人师，可有些事情，他觉得白人不用像黑人必须了解、遵从白人的法律和规矩那样非得清楚不可，他也并不把一个白人对此的理解愿望和理解能力看得太认真。——头人，他是酋长的头人。——

——真正的头人，或许还不止一个？——

又是一阵笑声——有时有好多，好多村子。——

——一个村一个头人？——

——每村一个。不过这个是酋长的头人。他管酋长住的村儿。——

她又扮演起了解说人的老角色。——你还不明白吗？所有头人的头人。酋长的私人助手，参谋——我也不太清楚。——

他驾驶黄色汽车，在人畜、土坯房之间穿来绕去。宗教团体的破旗和色彩鲜艳的圣哥玛斯的职业招牌挂在一些土屋顶伸出来的树枝上。圣哥玛斯是些用扔骨头的方法给人预测未来或注释过去的男人或女人。一处树枝搭成的东倒西歪的货摊上钉着一张尖牌茶叶的广告，但是货摊上空空如也，并没有什么东西可卖——我们该带点儿东西来了。——这话他是对她一个人说的。

——一箱杜松子酒，再加上答应给一艘炮艇？——

——一瓶威士忌。——那是在许可范围内对一个好客户的亲善的表示，或是送给周末打猎时交上的某个热情好客的农民的酬礼。恐怕难以指望这儿这个持有权力和威严、一心想让他们走的黑人改变主意。可是如果他曾想到过这一点，如果七月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么一瓶酒的话（印度人的小店儿里不卖酒），他倒是乐意让他去买一瓶来。

——刚才播了点儿有关美国大使馆的事儿。——

——可用的是葡萄牙语。没准儿讲的是世界另一部分的消息。——

——不，我能听得出来……有好几次提到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他已经把车开到七月指的地方了：一片普通的土屋，其中一间用树枝和波纹锡皮粗略地搭着个门廊。一个年约十二岁的小姑娘牵着一个小男孩的胳膊，把他拉到路边去，她黑色身体上的小胸部已经微微突起。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任何地方一样可能会被提及。

他们全都从汽车上下来了，站在锡皮顶篷的阴影里。每根柱子周围的泥土都被冲走了，形成一个个圆形洼地。洼地的边沿坚硬光滑，像掉完了牙齿的牙龈，颜色也没有两样。这些村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轻易地用一辆推土机一扫而平或是用一根燃在茅屋顶的火柴变成灰烬。只有泥土，极其贫瘠的泥土，被那无数踩踏着它的脚、夯实着它的手和锻炼着它的炉火证实为永恒的存在。一只黑陶罐里盛着加了水准备和成团的玉米面，几只苍蝇淹死在里面。一个男人从阴暗的门里走出来，跟七月说了几句话，又走了进去。那门里实在太阴暗了，不走近就看不见里头，而来访者是不允许靠得太近的。一个头上夸张地耸着几个白发螺旋髻的女人（她们按习惯是在头上戴头巾或帽子）端出一锡盆有味儿的脏水泼在地上。泼完了，她转向把她

指给七月看的丹尼尔，问了他几句话。而他，使出浑身解数，用和蔼可亲的态度、恭恭敬敬的称呼，活泼欢快的口吻，周到体贴地回答了她。另有一个男人走过来；起先露面的那人又冒了出来。谈话像唱歌似地渐渐没声了。什么也不能做，只有等待。孩子们想要爱抚爱抚那儿的几只家猫，但是那些猫被伸过来的手吓坏了，躲在一个蜂窝状栅格上积满铁锈的破旧的汽车散热器后面不出来。维克多想知道他父亲是不是有意买下那个散热器。——真正的莫里斯牌，是条辐车轮型车上的，哎，得了，爸，伙计，问问嘛！没准儿他们想卖呢。不过是问问嘛。——

他觉得没法回答儿子。一旁有个汽车座（不是同一辆车上的），莫琳扑通一声坐了上去。现在，对于她，一切都进行得多么容易呵。如果她不知道期待着她的是什么，她便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她身边坐下。有一次在做切除痔疮的手术之前，他躺在医院走廊的手推车上，也是像现在这样在等待，双脚冰凉，因为服了药而满心焦虑不安，也可能是由于茫然的等待和意志的无能为力而焦虑。

他突然站起身。一个男人出现了。刚才他们已经见过的那些人还有七月和丹尼尔都立即双膝跪倒，双手合十。这个男人衣服下面瘦削的身体丝毫也没有了城里的非洲人的那种闲适自在。怎么才能辨别出一个穿着打扮与其他农村土著毫无二致的黑人酋长呢？只有靠那顶压在下陷的太阳穴突出的青筋上的折边帽吧。

他光着头，面色发红，举止局促，直直地站着被引见给酋长。酋长跟他和他的妻子握了握手，很老练地不去注意嘻嘻哈哈的孩子们，一看见七月和丹尼尔，孩子们就产生一种奇异的敬畏。他们的母亲很快对他们做了个别做声的手势。

有人从屋后什么地方搬来三四把摞在一起的塑料椅子。显然这儿不是酋长的住所而只是一个接待陌生人的前厅。七月和丹尼尔漫不经心地站着，其他人都并排蹲着或坐着。要想知道谁在说话，必须向前探出身子扫示整个一排人。几个头顶盛水的锡罐的女人驻足在几码外，作为听众面对着酋长的与会者。但是女人们并不敢走近。

巴姆坐的椅子上的螺丝松动了。塑料椅面是靠那些螺丝固定在椅架上的。巴姆一边什么也不懂地听着，一边不由自主地用拇指去把螺丝上紧。酋长说话的速度比他手下人都快，他尖厉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怀疑和不耐烦，他好像不会讲白人的语言。为什么他得会呢？他又不必去做仆人或是下矿井。他发出一连串毋需回答的质问，挨个瞅着他的人，瞅着七月，龇咧着嘴笑笑，表示拒绝接受任何哪怕是很微弱的抗议。其他人交谈的时候，他便轻轻咬着嘴角的一根火柴。

七月在当翻译，上帝保佑我们。一切又重新来过。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来这里？——酋长他说，酋长他问，是的，我为你效劳，但他从没见过一个白人到他手下人的地界里来。——七月一脸译员的中立神态，遣词用句丝毫不带他自己的意思和请求。丹尼尔像个轻佻的姑娘似地傻笑着。莫琳也在笑，直直地冲着酋长；显而易见，这么做没坏处，他把这认作是鼓掌，他深紫色的起皱的嘴唇咧开着，发黄的眼睛表露出赞许。接着谈话内容变得严肃而不掺杂任何个人因素了；与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区别的，仍是一种权威的昭示，如果你是在向主教做一次忏悔，或是在接受秘密警察的审讯，或是(学生时代)在同建筑系的系主任进行谈话，那么在你被安抚一番之后，在你等待的未知结果到来之前，总是有这么个个人私下交换意见的阶段。酋长想确切地知道那儿，犹太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种

缩略的叫法不是出自反犹太主义而是发音的问题),他表示他想听一个白人目击者讲讲，在三百五十年之后，黑人与白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谁？到底是谁推翻了比勒陀利亚的政府：从索维托来的那些人吗？

——不止是索维托。到处都有。这次人人都卷进去了。——跟他解释——这次所有的城市都打起来了。——

——他已经知道了。他是问你，为什么警察不抓人，像1976年那样。像1980年那样。为什么警察不开枪。——

——警方的黑人也参加了战斗。他们再也不愿逮捕自己人了。那只是个开始——

——那白人士兵呢？他们没开枪打那些警察吗？——酋长听着自己的问题被翻来译去，半侧着头，噘着腮帮子，不打算上任何人的当。

——这是场战争，不再像以前那样了……黑人也有枪、炸弹(他模仿了个投手榴弹的动作)、各种武器，跟白人的军队一样，什么都能毁了。人们从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莫桑比克回来，带着枪。——

有时酋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他的人作些评论。这个白人就被隔绝在他们的讨论之外了。于是莫琳的注意力猛然转向七月。——他说什么？——

——他说简直不能相信，白人没有开枪，政府没杀了那些人吗？总是白人有枪、有坦克、有飞机。这么长时间了，差不多从1418年乔治王战争的时候，甚至从斯穆茨和涅斯特时代。白人不可能逃跑。不可能。他们干嘛要跑？——

我们和他们。现在，谁是我们？谁是他们？——他们开枪了是不错，但是并非只有他们有枪，甚至飞机。黑人有从莫桑

比克和纳米比亚飞来的古巴兵——

我们和他们。实际上他问的是关于身份地位的崩溃。那也就是指联邦大厦的坍塌和主人卧室的焚毁。

——而且他们想杀死你们。——酋长用英语说道。他未做任何解释，脸上的表情不容任何人隐藏惊讶。

她——莫琳——似乎认为酋长是在对她说话。她又对他笑出声来，打破了一瞬间的死寂。血涌上她的面颊，使她皮肤发红，雀斑明显起来，她瘦削的脸上汗津津的，闪闪发亮。可怜的人儿，她像条赤身裸体地在他们面前变色的蜥蜴似的——她有点儿失控了。

他——巴姆——如果他们想要在阿姆隆谷[1]跟人吹牛，说那白人老板， nkusi，morema，hosi[2]和他全家落到他手里了——那他对他们也没什么话说。甚至七月也没看看那个他一直坚持称之为主人的人的脸色。当展品的人没法向任何人要求自主权。而且他们想杀死你们。如果酋长对此感到有趣或震惊——随便你选用哪个词儿——那也是他的特权。这个性情暴躁、营养不良的老头子，他统领着这快被忽视了的荒原、没有男人的村庄、没有拖拉机的土地。虽然他不过是这些四处流浪的民工和这些衣衫褴褛、终日咳嗽着的孩子们的王，可是他的命令一发布：出去、滚出去，那国王般的权威却足以命令七月再把那辆车还回去。一个在市郊、在另一种他眼看着被摧垮了的权威(甚至白人妇人都到商店里去抢药品)统治下生活了那么久的臣民，会遵从一个酋长的命令吗？

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走开了，或许接见结束了。但这只是暂停。酋长通过他牙齿间的空隙咂吸着，发出刺耳的声音，每个

① 阿姆隆谷：南非地名，即此处酋长所在地。
② 意即白人老板，是酋长所用的谐音。

人都倾听着，仿佛这声音有着可理解的含义。他再开口的时候，说的是他自己的语言。七月翻译他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发现这地方有那些人吗？——

——我不明白酋长的意思。——

——那些跟别人打仗的人。——

丹尼尔给七月提词儿，他们的话里掉出个外来词：古巴人。

——你是指古巴人要来这儿吗？我怎么知道？——

——他说，政府早就告诉他了，我国人和那些——丹尼尔所说的人——要把他的地盘从他手里抢走。——

——噢，政府，他们说了些什么呀。他们告诉当地领头儿、酋长们的都是这种话，但现在是黑人在发起战争，要从白人手中夺回被抢走的土地了。——

——他问，也包括你的土地吗？——

——我从来没有过土地，我不经营农场。——

——你的房子呢？——

——欧，我的房子……是的；城里的地只让白人建房——也许他们会抢走，也许不会。——

它可能还在。空空如也；也可能已经被烧毁了，不过也有可能七月的情妇艾伦已经搬回了他在院子里的住处，在安安静静照管着一切……。

酋长自己又说起话来，讲着英语。——那些从索维托来的人，他们和俄国人，另外那些从莫桑比克来的人，一块来这儿，他们全都想抢我们部落这地盘，呢？他们不是我们部落的，是阿玛祖路，阿玛青萨，巴索色……我不知道，他们已经过了矿区，接近这儿了，要是他们来了，政府就会给我枪，没错！他们给我枪，我们会干掉那些带着枪来的人。——他深深地向前探着身子，瘦骨嶙峋的膝盖弯着，像一把半开半合的铅笔刀。

他仿佛在把一项属于女人的优惠权提供给了这个白人男子——弥带上你的枪来教教我们怎么使。以前，白人不让我们买枪，甚至连我也不让，我是酋长，连我父亲、我父亲的父亲都不行——你明白吗？——我们一直没有枪。那些索维托人和俄国人，随你怎么叫，他们来的时候，你和我们一起开枪。你帮帮我们。——这番话变成了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发表的雄辩有力的演说，他对着他们所有的人高谈阔论。他廉价的尼龙背心后面铁一般黑、铁一般瘦硬的胸膛嗡嗡共鸣，在渐渐低下去的咻咻喘息声中，他威严的讲话以一个重拍手掌似的高音而告结束。

——我的枪。——巴姆福特·斯迈尔斯站了起来，转向坐在那儿、两手握拳放在膝上的妻子。他看见她低垂着薄薄的眼皮，眼珠转动着，变换目光的焦点，紧盯着视线内一小片地面，一群蚂蚁正聚在一起啃一只压死的昆虫。

她看上去快被催眠了。似乎用现实去惊醒她是很危险的。

——我的枪？——

看到七月和那些黑人们盯着他的手，退缩着，他才意识到自己竟不知不觉扬起了胳膊。——你们不能对你们自己人开枪，你们不能杀人。曼德拉的人，苏布库维的人。——（他们会不会已经忘了卢苏里①？了他们听说过比戈②吗？尽管他在纽约、斯德哥尔摩、巴黎、伦敦和莫斯科都很出名，却不是他们"部落"的。）你们不会拿起枪帮白人政府杀害黑人的，你们会吗？会吗？为了这个村子和这空荡荡的丛林吗？而且他们也会杀你们。你们千万别让政府支使你们互相残杀。所有的黑人部落都是你们的部落。——

像酋长，像七月，像所有人一样，她也在听着他讲这些他

①② 卢苏里、比戈：均为黑人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被当局杀害。

和她过去一直在说的话。这是一种悲哀的声音，它穿过那沉寂的丛林从他们的整个生命中寻找他们自己，而在这莽莽丛林里，他们却像松动的钮扣一样从生活的质地上脱落，终于丢失了。

火柴棍儿从酋长的右嘴角移到左嘴角。他吸了吸牙缝——你搞到多少搁在穆瓦瓦提那儿？——他闭上一只眼，抬起胳膊做了瞄准动作。当然了，七月是个白人叫的名字；十五年来，一直没人告诉他们这个酋长的臣民的真正名字。

——那是支猎枪，打鸟用的。打鸟来吃。噢，我还用它打到过两头野猪。——

——你没有别的吗？左轮手枪？——大家都知道左轮是白人藏在卧室里，用来保护收音机，电视机和让人眼热的成套成套的衣服的。

——我不开枪打人。——

一声黑人鼻子里喷出的短促而不屑的“哼”声，一声卡了壳的笑。

当你不被相信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你也会改变，也会接受谴责，变得不相信自己。过去在那儿，白人那句人云亦云的话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想保护你的妻子和孩子？”她丈夫把那只死的大昆虫从她面前踢开。那东西在地上滚了几滚。吓得吉娜尖叫起来，和着外面热浪中黑孩子们的喊声。这女孩跑过去亲密地挤进那群兴奋的孩子们中间。他不得不在后面喝住她，她可能会消失在这间或那间小屋的暗影里，会像往常一样，被屋里的人抱进去找不着了。然而从来没人对他和他的妻子这么做过；亲亲热热一块喝啤酒的熟人也遵守互不邀请对方到家里去的规矩。——我们现在就走，该走了！——

——噢，不……还不要……是回家吗？——

是的，家。回到七月家那一群鸡、炉灰堆和大伙儿共用的玉米饭罐之间，吉娜就是回家了。巴姆福特·斯迈尔斯和他的妻子跟酋长在一起多呆了几分钟，现在站起来了，微笑着，交换看法说真该再下场雨了。他们道了谢，并且说会见实在令人愉快。酋长对他们表露说七月有什么不尽如人意之处不妨说出来。——那儿什么都挺好。他干得不错，你们有吃的，你们还需要些什么？——

这次是她对七月微笑着，说出了不得不想说的话。——我们欠他的太多了。

两个白人走上前去，跟酋长和他手下的年长者一一握手。他同这位白人男子告别好像在接受邀请似的。——我会去看你那杆枪的。你教教我。——

在汽车里，当着七月的面，他们没说话。只有七月一个人在评说或解释(莫琳或许还能明白他的态度，巴姆不能)。——非洲人很滑稽。他们不想知道这个那个部落的。这些乡下人。我们只知道自己是哪个部落的，人人如此。

莫琳像在赞同。——你们酋长想单独呆着，但这不可能。——

——他说呀说呀，说的太多了。——

他们谨慎地尽量少回答，这反而激起了七月的倔脾气。——你们说，他能干什么？你们说？——

——他说过了。他要打仗。——

——他怎么可能打仗？政府告诉他必须交税的时候，他们说他得宰几头牛的时候，你看他打仗了吗？他就得做这做那。他是我们的酋长，可是让他干他们乐意的事儿，他并没有打仗啊。——那可是他们乐意的！现在黑人大兵要来了，说干这干那，他怎么会起来打仗。他怎么可能打？他是个穷鬼。他是酋长，但是他穷，他没钱。要是那些人来了，那些人你们叫什么来着，就是索维托人引来的那些人到这儿了，他们吃他的玉米，饿了，宰上头牛——他会干什么呢？什么也不可能干。就会说，说。——

他们三个人的体热把他们都粘到一块儿了。七月开车，差不多把他们直接带到了屋门前。这小屋原本是他妈妈的住处，他给了他们。他们像熟透的水果水嘟嘟的果肉似地彼此分开

了。接着七月把黄卡车开到了原来藏的地方，带着维克多、吉娜和罗伊斯，把跟他们一伙儿追着车跑的其他孩子也拉上。丹尼尔坐在前排，又和七月并排了。他们回来的时候，七月把车钥匙放回了自己的衣袋里。

还是第一次，斯迈尔斯夫妇不得不回到这样的家：铁床、汽化油炉、放在锈迹斑斑的搪瓷盆里的粉红色的玻璃茶杯和茶托、蒙着报纸的奶粉罐和平时盛糖用的袋子。住在土屋里时间长了，他们已经对这土屋没有感觉了。而现在，这屋子就在那儿等着他们。从明亮的阳光下进入昏暗的屋内，霎时间，嗅觉比视觉更管用——熟悉的草的烟味和泥土的潮气，混合着从各种器皿及人体散发出来的气味，代替了雨水和露水的气息。——他们彼此几乎看不见。从门口斜射进来的一束阳光正照在装着他们全部家当的衣箱上，那儿趴着一只脖子光秃秃的鸡。莫琳读着那些标签条，就像以前没见过似的：斯泰特勒—希尔顿饭店，布宜诺斯艾利斯，艾尔博格 圣洛伦佐，曼图尔，希伦格雷茨饭店，开普敦。巴姆撵走了鸡。

——别躺在床上。——

我们现在能互相看见了，由于眼还花，看得有些模糊。他转脸瞥了她一眼：谁说我要躺来着。她点着炉子，这是家庭的那种油烟气味。他们以前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因涉嫌在这次革命中支持黑人而遭拘禁，她烧掉了在监狱里穿的羊毛毛衣，因为她总觉得在那儿为她保暖的羊毛有一股牢房的味儿。

他打开收音机，把天线转到各个角度调试着，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手指缓缓地拧动旋钮，就像一心一意要打开一把号码锁似的。收音机上抖动的天线宛如他有一次在冈斯拜捕到的受伤的小龙虾的触角。她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一节新电池的两端，举过来引起他的注意。他摇了摇头。星空里已经没有音乐

了，科学扼杀了这种以及其它的各种神话，只有诞生了世界秩序的混乱、嘈杂、撕裂的声音轰响不绝。这个世界之外没有安宁——世界之内也没有。只有在喧嚷停息的一刹那，有一声宇宙的叹息，他们听到时间和空间的簌簌声，那危悬在万物之上的音波。

——让我试试。——

——但愿你手气好……——他们的黑匣子递到了她手上，但这里面并没有关于他们所受的灾难和他们从市郊到荒原的溃退的报道。就是有声音，也只会带给他们来自军管地区广播网的糟糕消息。或许那消息已经播了。她把他试过的各种办法又试了一遍，然后瞎拧一气。——什么臭玩意儿。——将收音机递还给他；他接过去挂在先前屋主挂锄头的钉子上。

代替噪音传到他们耳朵里的，是像七月的——酋长的——那种命令式的声音。有人在一边走，一边哼着歌儿。在某个人背上摇晃的婴儿打着嗝儿的哭声，交织着苍老的嗓音和年轻的呼喊，对这些人来说，这便是报纸、图书馆、档案室和剧院。而且从那头，过了她仍能看到黑色树枝下的黄色汽车的地方，或远或近地总能听到坛子的细颈里慢慢往下滴水的声音——似乎是无边无际的灌木丛中永远也看不到的布谷鸟在呼朋引伴。

——如果我能听清楚点儿，就算是用葡萄牙语，我也能听出是不是——

她脸上期望的神色没有给他增添信心，反而打断了他的话：他张嘴想说话却改成了吸气，好像呼吸不畅似的，他从下巴到喉咙使劲捋着。

——那是什么波段？你记住了吗？能肯定吗？——

——你自己不也每个波段都试过了吗？——

——可能是机体的毛病。等他们回来，我们可以借丹尼尔

的昕昕。汽车在那儿呢，我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我没看见他们。——她已不再担心孩子们了；她只管他们吃。他们和黑人孩子一样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他在屋里她身后的一小片地方走来走去，她听到他在以拳击拳，像以前在那儿谈到他希望能受聘设计的一些建筑时常做的那样。简直无法想象市郊那些林荫路现在怎样了，在那儿，星期日早晨一家家白人一起吃着冰淇淋去买东西，买印着他们名字的T恤衫（“维克多”、“吉娜”、“罗伊斯”），去看主题是黑人城镇生活的摄影展览，以了解他们生活之外的生活。

——那还是去年的报道——我记不得了，可能两三年前——说美国的调查局告诉美国国会他们有可能派飞机搭救遇到危险的美国人。而且——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到这儿后头一个星期的新闻里还提到过。我当时正修水箱……那正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

——你听到了，我没有。——

——……只可能是那次的报道。比勒陀利亚、约翰内斯堡、美国国会什么的。——

她用手捲着有一圈泥边的脚指甲上干裂的蛛网般的硬皮。就那么蹲在门口；曾经那么闲适自在的莫琳，身上总带着舞蹈家的娴雅的莫琳（尽管她算不上一个舞蹈家），以前是常常用自我陶醉的目光审视自己的。现在，除了他们自身之外，其它一切化为乌有了。——飞机只搭救美国人。——

——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叫罗伯逊的人，是他们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不，不是罗伯逊，是库柏逊——总之没错儿。——

没有必要提醒他，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什么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也没有必要提醒她，他们曾经

可以是加拿大籍的欧洲人。如果所有的白人都是黑人共同的敌人，那么所有的白人是否也都是美国人的“欧洲人”呢？

她感到他在盯着她摸着脚趾的手，便伸开腿，把手藏在腋下。——枪的事儿怎么办？——

他走过来，蹲下，说话之前浅浅一笑。——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这里头另有含义。他是打算让我们离开。——任何抚慰都不应该是这样的。

她把头转开了。

她从那边说话。——枪怎么办？——

——你会把我看成个雇佣兵吗？——

他使她看到了内在的他。她一直在被请求注意某个刚刚到来的人，但她却看到了落在后面的那个男人。

——扔南非军队的手榴弹来保护那个反对他自己的人民获得解放的混帐小酋长。——

她从腋下抽出手来疲倦地拍了拍：噢，就那样吧。这是以前在那儿他们爱说的话。

——随你怎么想我。——他的怒气一下子冲上来，不知道发泄到什么上面才好。

——如果他真来了，来上枪法课，你怎么办？——

——真扯淡。一杆猎枪。玩具似的。——这可是丛林战争啊。——

——他只是把它当作一件样品，一个演习用的模型。还会有别的武器的，像你说的，南非军的手榴弹。政府最后施舍给这些土著酋长们的。所以如果他来了……——

实用主义，那就是一切，他们刚刚到达这片垃圾场一样的地方时。她就说过的，而且她还自责学了芭蕾舞却没有学——至少是——一向被瞧不起的法耐该罗舞。而他过去在那儿也说

过，如果那是谎言，那就是谎言。他绞尽脑汁，绝望地想从黑人的语言，从他们自身找出不再是从过去那儿带来的，能表达正在这儿形成的事实的句子来。霎时间，他感到这些单调乏味的日子里蕴含着伟大的戏剧性，正如她一直都知道在处处都一模一样的灌木丛中藏着他们的黄汽车一样。但他找不到合适的话。他们总是局限于一些老生常谈，“农村的落后状况”，“反革命孤立区”，“和平变革的失败必然导致内战”——这些她全知道，在事情发生前她就全听说过了。现在事情发生了，却是一种他们无法预料的经历。用那种表述方法他们过去也并不感到满意。没有适合现在的词句，他的怒气，他的思想，都没有了着落。——你看见去那儿他“让我”开车了吗？……——真是我的荣幸！七月这阵子相当自以为是。他似乎对他的酋长也不以为然。你听他发议论那腔调。——

她缓缓地眨了几下眼睛。——我想七月是在说他自己。——

——他自己？怎么？——现在她确实是在说着点什么了，不再惹得他用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方式暴露自己，他既不想松开那脆弱的套索，也不想由于错误的反应而拉紧它。

——他总是在做白人要他做的事。通行证。办公室。警察局。我们。他又怎么会不去做黑人让他做的事呢？即使他得杀他的奶牛给自由战士吃。——

——但是给他们做事要好一些。——（一些老生常谈还是挺现实的。）——给他自己的人嘛。即使他们真的需要古巴人和俄国人的帮助。——

——所以七月不会为那老头儿打什么圣战的。他既然没趁我们熟睡时把我们谋杀了，也就不会去做什么部落勇士。——

——噢，趁我们熟睡谋杀我们！——他时而在这条时而在那条思路上追随着她，渐渐跟不上她了。——你不认为（他顿了一

下），你不是在想他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要出卖我们吧？是不是？——

——黑人们会怎么想？自由战士们会怎么想？他加入从索维托来的那些人了吗？他带着他的白人跑了。你让我发笑。你说起话来就好像我们不是在躲躲藏藏，敢到河那边去似的。——

——我们当然是在躲藏（他的脖子僵硬起来了，沮丧而不是否认地摇摇头），躲避一时的战乱和无谓的死亡。是他把我们藏起来的。——

——他跟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只要他活着，就没人能搞清楚这关系；就这个，是吗？这倒是给那些为了让他自由付出了生命的黑人的好回答。——

——仁慈的上帝啊！他让我们呆在这儿，就在冒着自己被杀的危险。虽然我想他还没认识到这一点，幸亏。——

——那么我们最好是离开。——

她看着他，无所期待，只是死呆呆地、得意地盯着他，仿佛他从前未曾见过她，仿佛是他亲手杀死了她。——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走。你不可能当雇佣兵，他也没有在城里加入他们自己人。——

原来他们两人都一直在考虑——他能感觉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一个魁梧的浅色头发的男人，发红的血管因痛苦而在生气的眼球上凸现。——去哪儿？去哪里？——

正在这时，他们听到了（又一次，奇怪地，像这对夫妇星期天早晨在卧室里做爱差点被撞见。）孩子们走近的声音。

但她不让他回避他的问题的逻辑性结论。当罗伊斯跑过来，一蹦一跳地跟假想敌拳击（这是他幻想中的成年之后的英雄业绩之一）时，她正在问他——怎么走，到底怎么走？——

这白种女人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要割草，而不去收捡能烧火的叶子。她跟在后面，看着老妇手里那柄把上缠着牛皮条，灵巧得跟蛇信子似的银黑色的镰刀。镰刀是从存放着耕牛的木轭和链子的专门小屋的暗处拿来的。玛莎背上系着一岁的婴儿，头顶一个搪瓷盆，盆里放着一把小砍刀，用布裹着的凉玉米团子和一个满盛着灰白的水、奶粉、茶混合饮料的旧桔汁瓶。她把能想起的几句南非荷兰语说给这个白人听，包括村里那些在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白人工头手下当苦力的男人们从矿区和城里带回来的俚语杂烩。她提到那工头：那玩意儿，东西，管他叫什么。——她的手是闲着的，头在重压下稳稳当当，双肘举着，勾勒成了一个屋顶的轮廓。老妇则眯着昏花的老眼，友善地低声附和着。当她儿媳努力想圆满回答这位白妇人提出的问题并且告诉她一棵草——甚至牛不用嚼都知道得很清楚——和能使她孩子变得结实起来的叶子有什么区别的时候，老妇趁机在近处心满意足地、评头品足地打量了她一番。这种机会少有。这白妇人常常试着扮出一种用微笑和手势来表示尊敬什么的样子，她以为黑人也是那么做的。七月曾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母亲，这个女人在家时完全不一样的。他是指在那个连厕所都铺着白瓷砖的地方。在那儿，连他在院子里也有一个同样的厕所。她从来没给白人干过活儿——在他们农场打工除草除外。而且在那儿的地里他们也没告诉过她该上哪儿方便。她可不愿白人来告诉她这个！

草长得不高不矮。天气也不湿不燥——正是割苫屋草的好机会。老妇知道哪儿有做扫帚缮屋顶的最好材料。顺着河沿往上游走，她已经注意好几个星期了，还在她儿子带他那些白人来之前就开始了。她咧开嘴笑着，上唇包住没牙的牙床，伸出食指，好像要刺穿这个白种女人胸膛似的：你，是的，你。

但白女人并不明白她的意思是说这些草是用来苫她那被白人占着的小屋顶的。玛莎用他们的话责备了婆婆：的确是用来苫那间屋的；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反正这白女人什么也听不懂。可怜的人儿，这位万雅纳（我的夫人，七月的母亲在提到任何一张女性的白面孔时，都用这个过去殖民时期传下来的称呼）。白女人也朝她咧开嘴笑着，表示她理解并接受了这个玩笑，不管她把它理解成了什么意思……他们有钱，要是他们遇到了麻烦，让他们去他们的亲戚那儿，去别的白人那儿。她们一行穿行在灌木丛中，老妇人一路上叨叨着这些。如果她儿媳没听或不愿听的话，这些话就只是一支颠来倒去的歌了。

——现在他们上那儿去过了。他还问候了他们哩。——

在七月带着他的白人们见过酋长两三天之后，他的妻子跟他谈了她的想法。她不习惯于跟他这么面对面地直接交流，以前他的一封回信总是让人等很长时间。那期间，她就把她要在自己信中告诉他的事儿再以别的方式对自己讲上一遍又一遍。一次，她拍了封电报。他弟弟惹了麻烦，打架，一间小屋被烧了。但是那个知道到白人农场商店——也是邮局怎么走的人说，不用担心，他知道你电报里会说什么的。说着就在纸上写了：母病重速归。

现在她男人就在她的小屋里。她给他拿吃的，她说话的时候他就在那儿看着她。——那么酋长可以在他的村里给他们个

地方住罗。——

七月没马上回答，她却等不及——没准儿他就是那么打算的。——

她想把他圈在她的推理中，她以为她是在轰一只小鸡吗？——为什么酋长该那么做？谁那么跟你说的？——

——没人跟我说。——停了一会儿：——你把他们带到那儿去的。——

——那么就是你自个以为酋长会给他们房子住了。——

——你问他了吗？——

他挖出一勺玉米糊糊，用手指使劲捏成了球，塞了满满一大口，然后优雅地举起一只油污的手，示意他有话要说，待会儿，待会儿。

她可以等；或许他就是在试图考虑出一个针对她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的回答，她不懂的东西他可懂得太多了。

——是你要问他，不是吗？又不是我。我看见你把盖屋顶的草堆在他们屋门外了——好吧！姆哈尼的屋，我知道。可是你干嘛那么干？——他又加上一句话，他俩都知道这其实不是他提出异议的理由。——他们的孩子都在那儿玩，他们会扯开草堆把草乱丢的。你白费力气。——

——她说是时候了。草长得正好。她想抢在别的女人之前割最好的。我不能让你妈不干她想干的事儿。我是她的儿媳妇。我得帮着她。没准儿你把好多事都忘了。——

——你什么意思？——

她的头又扭到了一边，以避开他的火气，其实她并不害怕。那是她佯装敬畏的哄人伎俩。——你不得不学了所有他们的一套，这么长时间。打你一走。——

——十五年还多。不错……第一次是1965年。不过那会儿

我不是给他们干活。我在那家旅馆工作，在厨房里洗洗涮涮，那时我还没有身份证，厨房里的人都没有。老板让我们睡在贮藏室里，锁上门，我们谁也不可能把吃的偷出来。——老掉牙的故事，他的故事；她点着头印证每个细节。——后来那地方给烧掉了。那年冬天，他们的煤油炉失了火，他们没跑出来。上帝保佑我。——

他没在白人的城里烧死，回家来带着干活挣的钱，给她父亲聘礼（他已经给过牲口了）。她那会儿已经有了她头一个孩子，她嫁给了他。那是她的事了，她的故事；他每两年回家一次，每次他走后，她就生下一个孩子。明年才是他该回家的时间，可他现在带着他那些白人来了，没满两年就回家来了，这个月她又没来例假。

他痛心地、怜悯地看着她，仿佛这样就可以不再看见别人、别的东西了。他来不及思索，便满心热情地冲口而出——等仗打完了，我就带上你，带你跟我回城里看看。你就留在那儿和我一块儿，还有孩子们。——

她的下巴向前突出，嘴往上翘，眼珠溜到眼角。她仿佛在另一个人眼中发现了自己。——我，去那儿！在那些地方我能干什么！——她的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嘲讽的响声。——你瞧我在他们的院子里吧！我怎么会认识路，谁告诉我怎么上这儿上那儿的？——她笑起来，忸怩地晃着身体，打算把吃的收起来。但他伸出一只手示意他还没吃完，虽然他并不在吃，而是又在看着什么她未知的东西。城里那些来自北部草原的得比利①女人，头上耸着高高的粘土和头发做成的花瓶样头饰，上面又搭着条纹手巾，脚下则穿着旧帆布足球鞋，脚踝上带着一圈圈铜

① 得比利：南非黑人部落名。

丝脚镯。她们在别人瞥过来的目光和叽叽咯咯的笑声中，手足无措地走在街道上。

她依然笑着，脸上的忸怩之态渐渐消失了。从她背上放下来的男婴，伸着手扯她的鼻子、她的嘴唇、她小小的黑耳朵和那串一个部落医生给她的、她总是紧箍在胳膊上用来避邪的脏兮兮的蓝珠子。——等仗打完了，没准儿你可以留在这儿。你说过你的工作干完了，要是咱们有更多的地，种更多的玉米……有拖拉机耕地……丹尼尔说咱们会有这些的。咱们再也不用向政府交税了，丹尼尔说的。你不用向白人交钱拿执照，就可以在这儿开个商店，卖肥皂、火柴还有糖——你知道该卖什么，你在城里见过商店。你也知道印度人是怎么从城里买了东西带到这儿来的。而且现在你也可以开车，给自己开。我见过咱们的人给那些白人开大卡车。可你是给自己开。——

他们之间以前还从没提到过那辆把他的那些白人载来的汽车。他学驾驶的时候，她从没有评论或赞扬过他的高超技术。他什么也没说过；他自然而然地想到她看见他开车为白人服务，觉得就像他给他们送木柴并把他母亲的屋子和粉红色的玻璃茶杯、茶碟给他们一样。

沉默之中有种共谋的意味在扩展。他打破了沉默。——打完仗……要是你能看到城里是怎么打仗的就好了。我在那儿来着。人就那样死了。——有些念头必须得在某个人身上试验试验。——我把钱留那儿了。不管怎么着都拿不回来了。什么都完了，全完了。——

他那白种男人有一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建筑师代表会议，给他带回一个印着阿根廷航空公司字样的挎包。他在那包里藏着一只圣诞节他们送给他的仿牛皮钱夹。多年来，他总是把它放在臀部或胸前的贴身口袋里，已经使它变软而且失去了

光泽。钱夹里有他的雇主每月都得签一次名的银行存折和他的邮政储蓄存折，还有一个建房基金社的存折，那上面的第一笔存款是五年前，他们奖赏他服务十年的一百兰特。他的邮政储蓄存折上的数字时大时小，在一位数和三位数之间起伏变动。有时玩“法飞”游戏，他非常非常幸运地赢到五兰特，他就存上；有时家里日子紧，他就取出一笔钱来寄回去。——离家那么远，唯一能使他保持家长权威的，就是钱。每次休假回家，他就取出两年工作的积蓄，他的整个资本，他在城里生活的全部价值，他用来应付涨价、失业、寒病、年老和贫困的一切准备。他从来没有从联合建房基金社的帐户上取过一分钱，那一百兰特。钱自已在那儿慢慢增多，每年多一两兰特，他们向他解释说那是利息，不必工作就能挣到的钱，白人们为他们自己发明的一种体制。他从来没见过、摸过他们给他的那笔钱，但它确实在那儿。他们帮了他一把，那时他刚开始跟着他们，还带着乡下人的懵懂无知，把钱藏在床垫下的香烟听里。

——多少钱？——她知道他每月的薪水是多少，而且从未告诉其他任何人，因为人们总请求借钱。但她不清楚他手头其他零钱的来源。那些钱有时给她和他母亲——并不总给，也曾看见他穿着新衣服乘铁路公司的汽车回家，最后一次是两年前，他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和配套的拉链茄克，她不知道那额外的钱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他怎么花、在谁身上花的。在这儿，在他家乡，那种赌博游戏是不兴的，那是城里后院背巷里的把戏，满地滚着的是仆人们从白人家挣来的钱。

他们告诉过他，他的钱很安全，都在那些存折上写着呢。可是现在他们逃跑了。那些存折只不过是一些纸片而已，无异于他、他的妻子、他的母亲以及这儿所有的人收在小屋暗处的其他东西，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之外，剩下的几乎没有什么，

一枚什么人从矿上带来的安全勋章、维克多洗澡时弄坏的米老鼠手表，在六百公里外买自行车的收据。

他给她粗略地折算了一下。——一百多英镑。——家乡这儿的人计算现钱从来没换成过兰特和分。印度人的商店里还是用这种旧式英国货币名来标价卖汽化油炉和镀锌尖顶饰品，后者是他们能买得起的，用来换下糊在房顶上保护最上边一层茅草的泥巴锥角。

他就当银行的存折已经用完了。扔了它，他驾着那辆黄色小卡车，口袋空空。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毁掉它。他需要有人——还不知是谁——告诉他：烧了它，让它在河里打漩儿，让水冲掉他们的签名。

一个身穿短裤的男人，在头上顶着个红色箱子，沿着河谷走来。她一直在观察他。那个浅色头发的男人埋头摆弄收音机的时候，她在屋里再呆不下去了。而当她禁止孩子们下河游泳时，他们固执地站在她面前，眯着眼，透过乱蓬蓬的头发看太阳。她能听见他们在发黑的河水中的大圆石上像青蛙似地跳来跳去时的尖叫声。他们混在当地那些这儿没人能叫得上名字的孩子们中间。那些孩子们的身体对水传染的疾病有免疫力。或许他们的三个孩子也已经变得有免疫力了。他们不理会她为他们判定的而今已无法维持的保护措施，他们靠自身的能力幸免于疾病。维克多正在忘记如何阅读，却没丢了他的超人和艾斯特雷克斯①，她坐在小屋外，怎么也不理解《订婚者》的意思。这本书是从意大利语翻译的，却不能从书页翻译成她现在所能理解的意思。只有关于1628年米兰面包骚乱的描述在她脑海里唤起了她对面包的嗅觉印象。然而这甚至也不是对面包(这儿没有，玉米团子就是面包)的渴望，过去在那儿的超级市场，面包总是现成的，用塑料袋包着放在冰箱里——这也不是建在她正常的自我意识和她目前的处境之间的真正联系，而仅仅是对莉迪亚每周一次烤的面包的回忆。在矿上家属区住宅，只要你打开沿着走廊的厨房门，房间里便会弥漫着淡淡的发酵粉气味。那是莉迪亚烤的沉甸甸的、砖块形状的黑面包。那面包没什么

① 艾斯特雷克斯：高卢人反抗罗马人的一个带滑稽色彩的英雄，此指有关他的历史故事的漫画。

味道，味道都散发到屋子里了。

她现在不属于自己生命的任何一部分。她只会偶然地碰到她生活的一个片断，有连续性的背景都沉没了。从在小屋里醒来的第一个早晨起，她没有重新在这持续的现在之间获得一个固定的参照点，来让她搞清楚她自己的生活顺序。郊区不知道是比矿区早还是晚。西区家属住宅区20号，还有建筑设计师的主卧室，这些全都坍塌在同一堆废墟上了。从废墟捡起的一块砖头可能就是莉迪亚的面包。

那个男人头顶着红箱子起先是出现在河边野生的无花果树粗大的墨绿色枝条下的。一点红色突然跃入了她的视野。没人能知道那人来自哪个方向。那边密密匝匝的灌木丛遮掩了一切。她整天整天看着它，什么都发现不了。如果人们来自河那边，他们最初总是在河里露面，拨开漂浮在水面上的树叶，溅着水花穿过河来，然后在岸边整好蹚水时顶在头上的包裹和衣服。这一次，这人顶的却是个箱子或匣子似的东西，鲜红鲜红的。现在透过河边高大繁茂的草丛只看得见红色的斑点。那人弓着两条黑腿，步履蹒跚地爬上她前面的斜坡——没看见她，那儿有灌木丛，有什么人堆起来的茅草垛，而她自己并不在那儿——她觉得。那人穿的并不是短裤，而是穿破后从膝盖处撕去了的长裤。红色的匣子很沉，有几根电线从上面垂下来妨碍着他。他对着面前的土屋招呼了一声，宣告他的到来，又拖着步子慢慢往前走。真费力啊，她能感到在匣子的重压下他脖子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她想，由于血液回流，他举起来稳着匣子的双臂一定冰凉麻木，他出大力流的汗仿佛蒸发在热空气里变成了她手上沾湿了书页的汗。他进了村子，消失在玛莎架在木板上的鸡窝和水箱后面。

下午，空中传来阵阵忽而震耳欲聋，忽而又很微弱的声响，

连续不断。是在试验刚巴-刚巴呢，孩子们报告说。

这儿有一些东西，维克多、吉娜和罗伊斯知道它们当地语的名称，却不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该怎么叫。那个红匣子是这个地区一种类似可移动的娱乐设施的东西。有人从矿区带回个装电池的扩音器。显然，有什么特殊活动时，他就带着它，外加一个录音机，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不清楚这次是个什么活动。斯迈尔斯家的孩子们硬拉着他们的父母去看那个刚巴-刚巴。孩子们不相信那是个他们知道的东西。——你怎么能说出它是什么样的？——对吉娜而言，以前在这个村里没见过的东西就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

这对父母被拉到一块儿去看那热闹场面，像是一对定期会面时的离婚夫妇在保持着一家人的假象。他们同七月，另一个当父亲的，交谈了几句。七月肩头扛着他的倒数第二个孩子。他对农村人的消遣娱乐有着城里人宽容的兴趣。巴姆问那儿是不是要举行婚礼？接着又加一句或许是要开会？七月没离开跟着那个人来回闲荡的散散落落的人群。那人叫了两个年轻人帮他把电线和扩音器的喇叭安装在一间类似教堂或会议室的土屋木梁上——经常有女人唱着赞美诗的声音从这屋子里传出来。——不是婚礼。——至于对开会的想法，他只是笑。——有时我们聚会，就因为有人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他对屋顶的人喊叫起来，像他们的人那样，又是戏谑又是鼓励。他开头的话急促不清，最后几句则拉长语调，一字一顿，重复着一个词儿。

人们从土屋里涌出来聚在那人和七月周围，不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和议论。刚巴-刚巴本身就是件特殊的事儿，那个患水肿病的人（他的腿后来用破毛巾包扎上了），有时根本就是个乞丐，今天——因为通过破旧的红匣子和坑坑洼洼的喇叭传出了

他发布预言似的尖叫声和他的干呕声——坐在凳子上俨然一尊被人们抬出来的古老的非洲的神怪，如果没有这希奇古怪的恐怖凶神的出场仪式，人们就会忘记狂欢节的根源是出自对死亡的恐惧。音乐开始断断续续地从扩音器中传出来。他们已经在把一种喝之前和呕出来都是同样颜色的淡啤酒传来传去。他们的贫穷之中自有其乐趣。这使他们淡忘了现在正处于战争期间，似乎贫穷本身是一个不能被任何东西剥夺去的园地。

七月的白人们走开了。做父亲的不想被迫喝那东西，也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做母亲的认为不宜让孩子们看着——尤其是——一些女人(没有七月家的)，背上背着婴儿，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能走开几步就走开几步去撒尿。

这一家白人回到小屋，发现枪不见了。

如果维克多不和他们一起去看装刚巴—刚巴的话，他们会以为是他干的。他很可能会去吹嘘说他被允许玩父亲的枪，他很可能会想办法爬上屋顶把它拿下来。

那几盒子弹也不见了。

巴姆像他过去在那儿丢失车钥匙时一个样。但手在颤抖，确确实实地颤抖着——她看见了，却假装没看见，像她听见有人哭时常装的那样儿。屋里只有很少几个地方值得搜寻一下。但如果枪不在原来的地方，他又没动过它，它会在哪儿呢？谁会转移它呢？

刹那间他似乎也不敢肯定从酋长那儿回来后，自己动没动过枪了。过去他们出门旅行，总是他提醒她检查一下她的护照是否真的放在了旅行袋里，她呢，则用夸张的仔细劲儿习惯性地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护照举给他看，再把它放回原处，原来她就一直能肯定它在的地方。

她揭起床单，从衣箱里抽出几件他们揉皱了的衣服，寻找一番。

他甚至拿出了从一个老头那儿用鱼换来的圆头棒，把屋外的茅草垛翻捣了一遍，还把包裹什么的一个一个拿起来扔到了一边。维克多和罗伊斯也在翻找，一边多嘴多舌地说着话。——要是有人把它埋起来了怎么办？来，咱们去挖一挖吧，维克？咱们挖不挖呀？——在一处找过了，他们就冲向另一处，渐渐忘了是在找什么，而转向灰堆比赛起了踢那些灰色粉末的游

戏。吉娜则跑过去跟妮柯一起玩跳绳了。妮柯用一根旧长袍带子当绳儿。

——你能肯定你没玩过它吗？任何时候？——

——没有，爸——没错！我发誓。——维克多觉得受了伤害，他被怀疑干了他本来可以干实际上并没有干的事儿。

小点儿的男孩免受了责问，什么事他都是清白的：——我们从没玩过。我可以起誓。——

——因为没有别人知道枪在那儿。——他们的爸爸目光呆滞，呼吸急促，像在跑步，也像他们要哭出来那样。

男孩们站在那儿，等着成年人决定该干些什么。没一个敢冒险告诉他们的父亲其实人人都清楚枪在那里：每只扒来刨去的小鸡，每个四下里打量着小屋——姆哈尼·萨萨瓦妮的小屋，住着白人的小屋的孩子都知道。——吉娜知道。——罗伊斯委婉地说，不过她父亲却不解其中的含义。维克多紧挨在弟弟身边，悄悄用手抓住小男孩皮包骨头的大腿上的一层皮，悠着劲儿捏了了几秒钟，好让他明白真正有麻烦的时候，他们的姐姐也不能出卖的。

——你可以报告警察，爸。——

巴姆往身后瞅了瞅，坐在床上，点了好一会头。

她看着他无言以对孩子；要是他在城里：如果不拿起电话去通知那些她和他以前一直都鄙视的贪婪残暴的警察，他也确实不知道还该做些什么了。

他站起身，尿意使他不得不起步出屋，过门口时低下他的大脑袋。他很快又回到了他们眼前，仰面躺在床上，像他一贯做的那样，而且马上又猛然翻身脸压在床上，这还是做父亲的从没在儿子面前暴露过的形象。

他们看着母亲，可她对他们毫无表情。甚至她的身体——

穿着破旧得像个寒酸的玩具娃娃衣服的牛仔裤，T恤衫紧紧绷着那对扁平的、靠上去软软的小乳房——如此熟悉的身体——他们也知道此时是不能倚靠上去的，正像他们清楚，当小狗小猫推拒他们时，也是绝对碰不得的。

她向下看着这个现在已一无所有的男人。展现在孩子们面前的，是比看那些女人们时蹲下露出的肥臀更糟糕的事。

月亮露出来了，在傍晚蓝色的天幕中，月亮像一团淡淡的雾气。莫琳·斯迈尔斯——这个名字每个月都有权签在他的通行证上——到刚巴-刚巴那儿的人群里找七月去了。他不在那儿；喝酒的人们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劲儿，忽而吵吵闹闹非常快活，忽而又沉入抱怨和沮丧之中。他们已经习惯了她，对她并不多加注意，就像他们不注意那些围在身边的狗和孩子一样。

她走向他的小屋——不是他私人的住处，而是他女人的家。玛莎正把脸盆搁在箱子上给婴儿洗澡。娃娃对着走过来把他从肥皂和水中解救出来的人——任何人——迸出了委屈的眼泪。这些黑女人能在孩子要脾气的时候一直保持心平气和；玛莎似乎没听见孩子的尖声哭闹，眼光谦卑地垂着，不高过这个白种女人的脚，仿佛她们不曾一起在地里干过活儿似的，她低头想了一会儿，说她不知道七月在哪儿，在附近什么地方吧。他的母亲散开裙子在炉灰旁坐着，她不忙忙叨叨的时候，就显得非常苍老而且安静。她歪着身子，手里拿着一根小树枝，轻轻吹着灰白的炉渣，仿佛那就是她自己的生命，她在使它仅仅保持不灭而已。

莫琳在玛莎身旁蹲了一小会儿，帮忙抱着娃娃的头，给他洗头发。

玛莎什么也没有问。七月在城里工作的时候，必须按这个女人的吩咐做事。现在，即使在他的家里，她也声称有权知道他在哪儿。

她不能告诉玛莎为什么她要找七月，不是由于语言障碍，她们以前也曾交谈过。她不能告诉玛莎她感到自己是什么，也不能告诉她出了什么事。她看到玛莎呆呆地像凝成了石头，如同一位怀抱婴儿在往鼻孔里抹鼻烟的圣母，如同一尊膝上横着被机枪击中的儿子的圣母雕像。玛莎曾嘲笑过白女人血管纵横的腿。以前在那儿有一阵子，莫琳产生过来这儿看看的渴望，看来那好像是开了个头。或许会有什么发展。但是不会走得太远。

她离开两个女人和她们的家，快步走下村外低处的草地。这种快步走路的习惯是因为以前在那儿闲暇时也得考虑许多事情：身体的状况啦，对不平事的感想啦，对已逝的生活的领悟啦等等。这些每半个小时就涌入脑海的富于责任感的反省，对正常的日常陋习并不起什么作用。当斯迈尔斯夫妇绕着市郊的街区在蓝花树下跑步时，他们并不知自己在逃离什么。她仿佛随着地图上的一个手指，沿着那个扛刚巴-刚巴的男人走向她的路反向而行。草没过了她的膝盖，在她走过的时候纷纷倒向两旁。带黄色圆点的黑甲壳虫，从被它们压弯的草茎上，从它们赖以生存的地方，飞落在她赤裸的小腿和她的衣服上。毛刺刺的草籽钩挂在她卷起来的牛仔裤裤腿上。总算有人踏入这片草地了。这些草长了整整一季，只等着来个兽也罢人也罢的客。这片死气沉沉的灌木丛消弭了距离，只有这里才有那种亲密的天性。

她并不寄希望于在河边看见他。她是沿着红匣子划过的看不见的轨迹来到这儿的。她并不经常到河边来，除非是为极隐

秘的事儿。而且那时也总是避开孩子们游泳的河段和人们涉水过河的渡口。这里，无人的时候，也就几乎没什么人迹，人们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可乱丢乱扔。泥地上人的脚印和牛蹄印里蓄着浅浅的水，形成一个个水洼。薄纱似的蝴蝶残壳还留在粪块上。她能叫得出这些荆棘树的名字——Dichrostachys Cinerea sekelbos①——有一簇簇低垂的伸出嫩黄花蕊的花朵，粉色的和紫红色的同在一枝上。斯迈尔斯一家过去常常在这样的地方露营。罗伯特写的书和他关于本土乔木及灌木的权威性的著作使得他们不难适应这种荒野。假期结束时，他们就卷起行囊回到城里。

一些不知名的树木静静地纹丝不动，而河水却流个不停。野生的无花果树高大的乳白色树干上覆盖着浓密的树冠，远远看去像一簇大头针。土壤里散发着落果的酸腐味。一只棕黄色的鹞鸟，高高地栖在大树伸向空中的看不见的树桠上，猝然从上面猛扑下来。再一次，她感到自己并不在那里，就像她看着扛红匣子的人爬上坡进入她视线时的感觉。她轻微的起伏不定的呼吸声打不破这沉沉的寂静。只要心脏不再一张一搏，她就会被吞没，消失在这种不需要任何旁观者的存在状态里。她在任何动植物分类学上都不曾有过什么好成绩，只在矿区娱乐大厅听到过人们对莫琳·海德林顿得分的掌声。

她小心翼翼地往回撤了，每次踏上一个小细枝都像踩到了一个陷阱。她沿着那条老路向他走去，那是他和丹尼尔开出的唯一从村子通向汽车的路。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隐蔽所、他们的集会处……。从前她和巴姆曾商量过要把汽车房改成一个房间，放上一只旧沙发，让七月能在那儿会他的朋友们。但是

① 拉丁语，为树名。

两人都知道，一旦他成了整个市郊唯一有这种特权的仆人，那么就会有太多的朋友在后院进进出出，那样太吵闹了。

她发现他正坐在一只他们自制的圆凳上，在汽车的左侧——可能因为那儿曾是阴凉的地方。现在太阳沉沉西落，坐在那儿已不必要了。汽车既没刷洗也没整理。但是刚巴一刚巴和啤酒也不能使他放弃参与分赃。他正握着一支短短的旧铅笔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着、算着什么，像他过去常常整理他的赌博账目一样。笔记本是建材商行每年圣诞节送给建筑师们的一种案头广告宣传品，上面沾着红色的污泥，由于经常翻用，边角都卷了起来。他看到她认出了这本子。看起来他们好像该交换几句对往事的缅怀。

——你得把枪弄回来。——

他恼怒地皱起面孔，挺挺胸：什么意思？

——枪不见了。本来藏在屋顶的。——

她看出他不知道这事。但他并不吃惊。他噘着腮，合上笔记本，把铅笔夹在中间。——什么时候被人拿走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去看他们安装的那放音乐的东西，回来枪就不在了。——

他责备她。——怎么可能被人拿走？——

她把他的正直、他的好德行掷还给他。——这是他一贯坚持在他们之间确立的烦琐程序。——为什么不可能，七月？为什么不？只要趁我们不在的时候溜进屋去就能拿走它。偷走它。——

——现——现在？——

——巴姆现在才发现。不过大概不会是今天下午。不过什么时候都有可能。

——他最后一次看到枪是什么时候？——

——他自己好像也不清楚。但是我们从酋长那里回来的时候枪还在。我们谈过它，我看见它了。——

——你肯定今天下午以前枪还在那儿。因为所有的人他们都去听音乐了。你看见人人都在那儿，嗯？没人会在那时候去屋里。——

——我怎么会知道那会儿枪还在？我告诉过你，我知道人人都去听音乐了。——

——夜里。——他，也让她推想着。——夜里的时候，你们都在睡觉，你们全在屋里。谁能来。——

——不是维克多。——七月也跟别人一样知道这种可能性。——你不必想到维克多。——

——不，不，维克多挺好。有时挺调皮可是不坏。要是他拿了，他会给他的伙伴看，会放回去。不是吗？不是维克多。呃，这儿的每个人今天都在好好地听音乐，大家伙儿都知道那是你们的枪。——

——丹尼尔在哪儿？——

一定有什么事情搞颠倒了，把她弄糊涂了。那个会从汽车底下，从毁弃的小屋里头，一下子钻出来出现在她面前的人，那个常常是一声不吭悄然站在一边的人；现在七月一叫他，肯定会迈着年轻人那种大大咧咧的步子晃过来的。

——丹尼尔不在那儿。——她的声音响亮起来；同时，一种既恐惧又惊愕的感觉，像个暗中投过来的麻袋掠过她的头顶，——丹尼尔在哪儿？——

——丹尼尔他不再来了。——他把一只手伸进衬衫，在脖子上摸索了好一会儿。夕阳的余晖给薄雾笼罩的圆月涂上了一层光彩，月亮变得清晰了，柔和地折射着日光，宛如空中一面调整好的镜子。汽车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在明亮如水的落日

流光中，把它放大了的细部，顶篷架，备用轮胎，都投影在草地和树丛上。——他现在走了一两天了。——

——但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他告诉过你他要上哪儿去吗？

他说起那些小伙子。——他们谁也不告诉，跟谁都不说，哪怕是当爹的。——

——但他告诉过你，他跟你商量过，他肯定跟你谈过。你和他总在一块儿，你就像他父亲，不是吗？你不能跟我说他没告诉过你。——两只被她拍死的小虫粘在她汗涔涔的脸颊上。

——别跟我说丹尼尔他告诉我啥了。我，我不知道他说了啥没说啥，那不关我的事，是不？——

她坐在泥墙上，泥墙吸收了一整天的热气，让人感到十分温暖。它的颜色由下往上依次赤褐、殷红和琥珀色，最上面那一层浅色土估计离地面有一人高。

——你得把枪拿回来。——

她知道他会张大鼻翼。走，他下了决心，走上坡到小屋去，像他去他妻子那儿一样。

他能嗅到她身上凉凉的、猫味一般的汗味。唯一摆脱她的方法是走掉离开她，把他自己的这片地方让给她，这片他发现的、安全地藏着黄汽车的地方。

他把笔记本塞进撕破过又被艾伦用不配色的线平平整整地缝好的衬衣口袋。——我怎么非得弄回枪来？我上哪儿去找？你知道它在哪儿吗？你知道吗？要是你知道，你自己、你丈夫，你们干嘛不去把它拿回来？——

——枪不见了，丹尼尔也不见了。他会用，让他打过一回……巴姆的错儿。酋长说到枪的时候，他一直在听着。他想着那枪是他自己的。他是不是这样？想着他能用枪打肉吃。要不就是他已经找到了个买主。——她的眼皮对着他尖刻地一眨

一眨。——没准儿买主就是酋长。你一定知道该上哪儿找他。他天天都和你在一起(她朝汽车做了个手势)。——

她向他讲这番话的时候，他一直在衬衣下的脖子、胸脯上摸来摸去，然后猛地抽出手，僵硬的手指轻轻叩着胸口，肩胛上两个凹下的黑色小窝儿闪着亮光。——我？我非得知道是谁偷了你们的东西吗？总是这样。你们给我添了那么多乱。在我家里也这样。丹尼尔，酋长，我妈妈我老婆为屋子的事。麻烦，麻烦，你们带来的麻烦我再也不想要了。你明白吗？——他猛地挥了挥两只胳膊。

——你非得去把枪拿回来不可。——

——不不。不不。——他歇斯底里地笑着、重复着。——我不知道丹尼尔是不是偷了你们的枪。我怎么会知道？你，是你说的，你知道。我可没见过什么枪。我也没看见丹尼尔，丹尼尔他走了——那我能干嘛——

她突然有一种想要摧毁他们之间的一切的狂热冲动。她想要把什么东西碾在鞋跟下，像在市郊的院子里踏碎蜗牛和坏鸡蛋一样。——你小偷小摸。为什么？我那时不想说不过我现在告诉你，我那鸟形的剪子，我老母亲的磨刀器。——

——那些东西都是你给我的！——

——噢，不，我给过你……可不是那些。——

——我才不想要你们的垃圾呢。——

——那你为什么还要偷垃圾？……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一想到你会那么干就脸红。——

——你——他伸直膝盖，张开两手拍在上面。开始用他自己的语言跟她说起话来。他的脸上闪烁着坚毅的神色。重重的语调从四面包围着她，大地渐渐变得模糊了，遥远的清淡的月光洒下来，使丝绸般的烟霭微微透出粉红色弥漫在天空中。虽

然一个词也听不懂，她却明白了，明白了一切？他曾不得不是个好仆人，她是怎么给他遮遮掩掩，只是为了使他符合她的理想，但是就他自己而言——能干、忠实、为她争面子——却没有任何意义；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别处另一些人身上。她不是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姐妹、他的朋友、他的人。他又用英语说出应该用英语说的话：——丹尼尔他和像是城里的那些人走了，他参加了。——这个不全规则的动词，用于表示任何承诺：加入一个敢死队，签一个分期付款协定，在矿山或甘蔗园的劳工合同上按拇指印。——我不知道，——没准儿他需要枪干那个。——他靠回身子，没什么要跟她说的了。

——我明白了。——对于丹尼尔这位从城里回到自己落后乡村的年轻送奶工来说，举拳打招呼是一种时髦的举止，而在酋长面前双膝跪倒对于他和七月肯定都只是一种乡下惯例而已。——我明白了。——“古巴人”，这就是他在酋长不知道如何称呼那些让他害怕的外国人时提起的词儿。——那么他是去打仗了。小杂种。他只是选择了他有权做的事。——

七月可能不明白她嘟囔了些什么，也许是不想被迫说话。他让人熟悉的脑袋，新近才让那个在树下给村民理发的人剃过，他胡子下面宽厚柔软的嘴唇，在昏暗中模糊不清的黑脸上白亮的眼睛，所有这些都在微弱的天光下面对着她。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废墟，陪伴着他们的只有一具无生命的机器。他们的话音一落到破败的土墙上，就即刻被吸了进去，犹如泼溅上去的鲜血。就要葬身此地了吧。一股令人欣喜若狂的如释重负的热感传遍了周身每一处肌肤，她觉得又满意又可鄙。她告诉他真相，他一直都是不忠实的。——你想要发战争财，偷一辆卡车。现在你想要它。你不管艾伦怎么样了。她给你洗衣服，跟你睡觉。你想要这辆车，好开着它像个强盗似的四处招摇，想

象你自己是个大人物，是个要人，直到你没钱买汽油为止。没有汽油可买，它就会瘫在那儿。七月，瘫在那些树下，就在这个到处都是破屋子的地方。而且孩子们到里面玩的时候，它还会变成碎片。一点儿用都没有。跟其他那些一样，又一次失策。又一件垃圾。——

难以描摹的温柔夜色包围着他们，仿佛误认为他们是一对情人。她踉踉跄跄地走过去，靠着车篷站稳。她的样子看上去怪异可怕：紧绷绷的牛仔裤卷到了膝盖，汗津津的额头反射着月光，乱蓬蓬的头发一簇一簇竖立着。她弄出这副母夜叉样子对他没任何影响，他可从来没去过总有诱人姑娘的汽车展销会。她大声地笑着，粗鲁地拍打着汽车挡泥板，很像他平时吓唬那些挡道的牲口。村里传来一声刺耳的声音。一点家一样温暖的灯火开始在那边闪烁，像是一根划着了拢在手掌中的火柴。那些正在吃晚饭的人们点起了第一盏灯。

巴姆正在给孩子们拿吃的。他盛出煮好的玉米饭，他们就用手指抓着吃。她出现的时候，他们正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没招呼她，好像以为她一直在场似的。他没问她到哪儿去了。他拿着那把沾满玉米渣儿的锡汤匙和孩子们一起吃着。她什么都没吃就走进了黑暗的小屋，摸索着找到水瓶，然后就站在那儿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长长地喘口气再喝，像个躲在一边儿偷偷过瘾的酒鬼，把整瓶水喝得点滴不剩。看来“瘾君子”的家人不知如何是好，因为索性佯装不知，或许确实不知道。

刚巴-刚巴又响起来了，播放着仅有的四五张唱片中的一张。宝贝，宝贝，来吧，嘟兹——嘟兹——嘟兹，几声迸发出的高调混杂音打破了歌曲本身的和谐，越过一座座土屋，传入了灌木丛，回荡在沉沉的雾霭之中。没有星星。宝贝，宝贝嘟

一兹，嘟一兹……如果有一群打游击的自由战士从村外经过，远远地就能听见这古老的音乐，它属于索维托，戴维敦，泰比萨，玛若贝斯塔的，他们正是从这些城镇突围出来并且分散到各地去的。

他看她打算上床睡觉，便提醒她她的脚脏极了。她起身用七月拿来的肥皂，从满盛着河水的七月的油箱里倒水洗脚。她在油灯的暗影里说话。——他就是这样的吗？——从来不用提“七月”这个名字，他就在他们脑海里，没有别的人。

他懂她的意思；但这么解释的话就太简单了。他用一只手梳理着脑后的那一圈浅色头发，小心翼翼地用手摸着秃了的地方。

她把记忆中七月寄人篱下的状况跟自己现在的情形对比了一下。——过去他什么事都请示。一片阿斯匹林，我能用电话吗？那栋房子里没一点东西属于他。——

——不过……他什么都不缺。我们什么都给他。——

——我想知道那使他改变了些什么。——

油灯还亮着，可他的蓝眼睛已经闭上了。——会跟我们一起变老然后拿着退休年金。——

枪在丹尼尔手里，他拿走了它，为了他自己。

她的嘴唇动了动，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她盯着那闭着的眼皮看了许久。

一夜薄雾使空气变得鲜活清新，驱散了令人作呕的鸡粪的氨气味、浓烈的霉草的恶臭以及腐烂的垃圾的臭气，那些垃圾——破布烂片、小牛的颏骨、土屋之间雨水冲出来的凹地里落着的一层层发亮的大蝇。女人们扯出一条条裹身和包小孩的棉布晒上。明亮而强烈的阳光给这些发霉的布片平添了一股芳香，给茅草屋顶和土坯墙涂上了一层金色的釉彩，一切似乎都变得生机勃勃了。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季节，这一时刻的村庄都合乎摄影师对村庄的典型镜头的要求。从远处看，村子的圆形小屋都被风景环绕着，很像一双神灵的手用荷兰或瑞士的高超的凹版照相印刷术制作成的一幅非洲人与自然交融为一的景象。

妮柯早早地就出现在门口了。她柔软的鬈发滤着阳光，一只脚掌粉红的小脚勾着另一只纤细的黑脚踝，她在等她的朋友吉娜。两个小姑娘抿嘴笑着，她们的友谊那么深厚那么秘密，所以当着别人的面她们什么都不说。

两个男孩把从锅里刮下来的玉米面碎屑搓成脏兮兮的小球，把它们作为钓饵装在他们用铁丝弯成的钩子上，那铁丝是从谁家围鸡的一张菱形破铁丝网上抽下来或偷下来的。他们俩干得那么专注，那么和谐，嘴里还叽叽咕咕说着话。他们跳起来去问七月有没有（啊，求求你老伙计七月）细绳，七月正在把他们父亲翻乱的茅草重新堆好。他放下手里的活，走开了一会儿，拿来了一根卷成一盘的真正的塑料钓鱼绳，在手里一拉一松。他们

三个站在一起，罗伊斯仍然像小男孩似的激动地手舞足蹈；而维克多——

只见维克多把沾着玉米糊的双手轻轻地拍了拍，庄严地把手合成在一起，恭恭敬敬地接过了这份礼物。

立刻，男孩们又跑了回来。他们低头忙他们的活儿的时候，脊柱上的骨节能数得清楚。不一会儿，他们把父亲从小屋里拉了出来一起去钓鱼，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和小娃娃。被他们惊起的几只红黄相间的织巢鸟，轻快地掠起，又欢快地尖声聚到一起，像开花一样疾速落在高高的草尖上，几乎压折了纤细的草茎。

在这样一个早晨，活着真好。

接近中午了(从太阳的高度和灌木林的幽静可判断出来——她的手表已经坏了)。莫琳·斯迈尔斯一个人坐在屋里，然而并不是一个人在村里——从来不可能有人单独在那儿的。四周一片静谧。忽然，她感到下意识中能分辨出来的声音动静发生了一些变化。远处有空气在震颤，就像风浪卷起的气流撞击着凝然不动的空气，在天空中。她正在缝儿子们的一条开了线的短裤。是普通百货店买的，质地不错、结实耐用。孩子们从没穿过富有的白人们买给儿子的美国式休闲服，也没穿过贫穷的黑人们瞎买的那种俗气的小绅士套装。

那声音听来不像较熟悉的运兵机或侦察机在经过。她把针别在短裤上，站起来眺望。通常会带来一场午后雨的云彩，早早就堆满了西边的天空，早晨它们还使天光暗淡，现在却在灿烂的阳光中蒸腾着水汽。气流的震颤就来自云层后面。她的眼光在竭力跟着听觉。一阵哒哒哒的轰响震荡着天空，旋转着向她头顶冲下来——此时全村的人都出来了，犹犹疑疑地放弃了干活、消遣，在直升飞机的盘绕下畏畏缩缩。也有几声欢呼，大概是孩子们喊出来的。她感到一阵严重的耳鸣。全身都在震耳

欲聋的轰响声中打着哆嗦，同时有一股力量侵入了她的身体，挤压着，抽动着，将她带进了一种巨大的性高潮似的兴奋——那架直升飞机就在她们头顶上穿过炽热炫目的云，它的着陆架像伸开的腿。飞机正挥舞着回旋的长柄镰刀和空气搏斗着。

他们所有的人都尖叫着，一个女人从莫琳身旁跑过，恐怖地笑着，她背上的婴儿剧烈地晃荡着。他们的呼喊声变了调。那刺激人的可怕的东西又一次向上冲出了人们的视野，钻进云层去了。刚才在机身和震动的机翼下，她一定是闭紧了双眼；她讲不出它的颜色，它的标志，不知道它是载着救援者还是杀手，而且——就算她辨别出了标志——也不知是冲谁来的。

七月的人们全在她周围跑起来了。那水肿病人拖着脚从凳子上站起来，两条无用的腿拚命保持着平衡。他以一个勇士表示效忠抑或挑衅的姿势向空中举起了他的圆头棒。人群中还可以认出玛莎一只手挑战似地叉着腰的姿势。他们与其说恐惧还不如说兴奋。以前她们也见过飞机，但从来没这么近过——这个飞行物比扩音器里的声音更富于刺激性和娱乐性。

她追踪着在喊叫、惊叹、议论和笑声之上的云层后面的飞机的声音。她现在集中起全部感官来跟踪它。她又一次看见了那架飞机，一个小小的回教苦修僧摇摇晃晃地冲向丛林。它再次升入云天，轰鸣着又盘旋了一周，然而，忽高忽低的巨响变得平稳了、缓慢了，听起来懒洋洋的。

她没有看着飞机着陆，但她知道它在哪儿。当她凝望的目光投过去又从丛林的地平线那里收回来的时候，丛林依然一如既往。然而她知道它接纳了什么。知道空中的轰响消失在哪个方向、哪个区域。

她已经把缝了一半的短裤小心地折叠起来了，这是个为保持橱柜整齐而养成的习惯。她走进屋，犹豫着把它放在床上。

显然她觉得短裤看起来不令人满意，便以一种被遗忘了的爱抚用手掌把它抚平，接着她站了一会儿。恐惧渐渐爬上她的喉头，扼住了她。

她走出小屋，加快步伐，大步走过茅草堆和鸡笼，颠下斜坡，跳过一块块石头，突然奔跑起来。她跑上茂盛的草地，闪开打在身上的树枝，弯腰穿过荆棘丛。她跑向河边，而且听见了他们，那白男人和孩子们的声音，在左边什么地方，说着英语。她径直跑到渡口，扒下鞋，从一块圆石跳上另一块，尽力保持住平衡。没有石头了，她便走进水中，像重生的浸礼会会员一样。水没到腰间后，她便高高地伸开双臂（鞋都拎在一只手上）稳住身体。用大腿蹚着水往前走。水是温乎乎的，发黑，有一股浓重的泥土气息。河底似乎突然倾斜了，她的重心变得不稳起来。她向右斜倾着，突然间踏上了对岸，双脚落在了高大的无花果树下的泥地上。这一边河岸她从没来过。她把湿脚套上鞋奔跑起来，差点儿撞上一只驼背的杂种母牛。它惊慌地躲开了。她奔跑着，在前前后后树丛的寂静中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机器还工作着的轰隆声，发动机没有关掉，还在那儿空转着。这片丛林比哥里姆和迪斯尼的浪漫森林更能富于创造性地制造真正的梦幻色彩。煮熟的土豆味（她辨别不出是哪根藤上发出的）好像在表明有一个厨房、一所房子就在下一棵树的那边。这里有几小片屹立着枝叶疏朗的结圆刺果实的树的土地。树下是没长矮树丛的草地，盛开着一簇簇巴伯敦雏菊和遍地的繁花，那么规整有序，简直是某个公园的人工景观。她奔跑着：怀着一生中所有被压抑了的自信，还有警觉，像一只独居的野兽，正处于既不找配偶也不养幼仔的季节，活着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要求责任感的一切都是敌人。她仍然可以听到震动声，在那些树那端更那端，而她就向它跑去。她奔跑着。

我儿子的故事

(1990)

莫雅平译

献给雷恩霍德

你曾有个父亲，让你儿子这样说吧。

——威廉·莎士比亚

“十四行诗·13》



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我当时在欺骗他。

那是十一月。我请了自习假——高年级学生在考试之前可以请假两个星期在家里复习功课。离家时我往往说要到一个朋友家去和他一起做功课，然后却偷偷溜进了电影院——各电影院是一年左右以前才向我们开放的。这样做我可以享受双重自由：一是可以逃学，二是可以在城郊白人居住区的电影院的褐红色尼龙天鹅绒座位上开心一番。我父亲并不富有，但父母不愿我姐姐和我在年青时像他们从前那样因囊中羞涩而举步维艰，因此我的零用钱还是有保障的，而且相对于他们当时不稳定的经济状况来说也是够多的。那一天我在综合电影院的观众休息室等待，正准备进入其中的一个放映厅观看五点钟开始的电影，恰好我的父亲和一个女人看完上一场电影后从另一个放映厅走了出来。

我的父亲在那里；碰到一起的时候是我先发现了他，而不是他发现我。我们隔着来去匆匆的观众相对而立。然后他和她向我走来，带着人们从电影院的黑暗中走到光天化日之下时露出的那种眼花缭乱的神色。

他说，你还记得汉娜，对吗——

她立即和我搭讪，脸上漾动着微笑想引开我盯着他的目光——因为我正在用疑问、答案、体会、轻信和惊愕劈头盖脑地轰击他，这一切也使我的两颊变得紧绷绷的，我感到好像冰

凉的水正沿着我的脖子往上淹似的——她立即搭话说，我是汉娜·普劳曼，我们当然认识。

我说，你好。是他迫使我问好的；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柏诺奈城外草原那一边的陋室小家，我被迫克服六岁小孩见阿姨大婶或表兄表妹时的那种难堪的羞怯。你来这儿看什么呢？他问道。他说话时往后退了退，好像我会在他身上嗅出她的气味似的。他们勉为其难地微笑，几乎大笑起来，几乎显得像是在进行日常谈话似的。但我原准备看的那部影片的片名已从我的心上被抹去，同样这次不期而遇也不得不被抹去。得把它们踩入脚下的土中，两者一起埋掉。是由贝托鲁齐导演的——一部意大利电影——这部片子好极了，他说。他没有顺理成章地用“我们认为……”，小心地回避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她热情地点头表示赞同他的看法。威尔，这可真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他说——这声音是来自另一种生活的回音，在那种生活中他是我的父亲，常用他那谦和适度的方式向我提忠告。然后，他向我做了一个“自己玩去吧”的手势，她也有礼貌地咕哝了几下，尔后他们俩就离我而去了，和走近我时一样步调一致。我注视着他们的背影，好使自己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个女人赤裸着瓶子似的粉红色小腿，脚着一双粗笨的凉鞋，身穿一套来自不同的农民文化的风格杂乱的棉套装，他则穿着他仅有的那件好茄克衫，我曾多次把它搭在手臂上为他送去干洗店洗过。他们一走我就离开了电影院休息室，像一匹戴着眼罩的马一样向前猛冲，目不斜视，免得看见他们朝哪个方向去了，然后我上了公共汽车，回家，回家，一到家我就把自己锁进自己的房内，唯有那些熟悉的课本能够使我感到安全。

他曾是约翰内斯堡城以东一个小镇的小学教师，那些小镇

很久以前是在含金的礁岩地带成长起来的。关于他的曾祖父或祖父来自何处没有任何记载——那几代人的粗手既不会写字也不会记事；作为砖匠和木匠之类，他们唯一的生活证书是他们的工作证和各种折叠得皱巴巴的许可证，正是这类纸片使他们能够在城里被雇佣，能够在城外面由市政当局指定专供他们这类人栖身的地带居住。他认为他的曾祖父可能是从金伯莱的钻石采集场移居来的；口传家史已随先人入土，只有一张相片流传下来。相片上有一群拿着淘金筛的工人，白人工头旁的那张没有几颗牙齿的微笑的脸和小学教师有点挂相。

小学教师自己的父亲继承了来自开普顿的妻家的祖业，在一间汽车房开了一个家具修理店。由于没有汽车，他的宝贝儿子索尼只能在椅子和沙发中裸露的弹簧上蹦跳，弄得满头都是棉绒。这孩子是家族中第一个抛开土地、水泥、木材和木棉而拿起笔和书本的人，也是第一个学成毕业的人。毕业之后他当了小学教师，长辈们以他为骄傲。由于他是最先出生的男孩，长辈们给了他“索尼”①这个表示性别的昵称，不想这一称呼将伴随他度过往后的各个人生阶段。

索尼一直在同一所学校教书，由于他的能力和资历，不仅他的收入逐年增加，而且他的地位也一步步提高了，另外，在这些年里，他和他的妻子艾拉结了婚，先生了个女儿，然后生了个儿子。这个女儿，也像父亲一样，被赋予了一个昵称，叫“贝比”②，同样这一隐含性别的称呼也将伴她度过一生，此外她不会有任何别的名字。儿子叫“威尔”，这是威廉的昵称。这个名字是按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取的。索尼家起居室那个镶玻璃的书架上摆的那一套仿皮封面的书正是《莎士比亚

① 索尼英文为Sonny，有“乖儿子”或“宝宝”之意。
② “贝比”英文为Baby，在俗语中有“女孩”之意。

全集》，这可不是用来附庸风雅的。索尼满怀热情地把它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尽管封面上的镀金字已被虫子蛀蚀了，一旦他需要读其中的某一册，即使在黑暗中他也总是能够一伸手就把它找到。

长辈们为他而感到的骄傲，不仅仅是贫穷和无知之辈的势利——津津乐道某人已升迁并离开他们那个阶层，其中还包含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悲哀——他已弃他们而去——这种悲哀总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们的狂妄向他们掩盖了这一点罢了。为他的与众不同感到的骄傲是出自一种本能，就像探找水源者为自己的魔杖感到骄傲一样。尽管他比家族中其他的人肤色更黑——通常这是会降低他在他们之中的地位的——他们仍然为他而骄傲。他的长相和行为都表明他与众不同。他那张在青春期就已开始成形的脸修长而匀称，两道眉毛又浓又密，眉下的黑皮肤环绕着一双又大又黑的敏感的眼睛，这些身体特征好像都表明他有深邃的思想。就连他那双儿时还是胖乎乎的手如今都已那么不同寻常，十个长得很长的手指与掌上的曲线配合得恰到好处，一举一动敏捷、灵巧得像有点神经过敏似的，但在握手或抚摸时却给人以平静之感。他与一个好像是专门留给他去迎娶的女郎结婚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只有他才配做他所做和获得的一切。他俩的婚姻不是父母操办的那种，她家祖辈有父母操办婚姻的习俗，而且这种婚俗在她那个家族至今仍徘徊不去，尽管年轻的一代已忽略或抛弃与之结伴而行的宗教仪式。艾拉是那么沉静寡言，其他的人恼火地感到她的美是明珠暗投了，浪费掉了；小伙子们、男人们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才能引起点反应。她那黑亮的瀑布般的鬈发好像永远不会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飘撒。要想象她衣服下面娇小的胴体是何模样是不可能的。她那可爱的双唇和牙齿流溢着微笑，向男人致意和向老

妇或小孩没什么两样；她好像不懂得男人的亲近对她意味着什么。

只有索尼知道她用对她这样的人唯一可能的方式——沉默——拒绝的是什么。她说话了，和索尼说话，他第一次去看她的时候，他当时被她的兄弟之一引荐没几天(在她那类家庭，这才是接近女孩的正确方法)，两人一见如故，彼此好像早就已经交谈过了——在与别人相处时的那种沉默中，她已和他进行过交流。别人误以为她的温驯是一种轻蔑，也许他也误解了，用另一种方式——误以为那种温驯只是表露出来的那些东西，而没有看到它轻柔地包裹起来的那种意志的力量。即使在彼此理解最深的男人和女人之间都会留有某种奥秘，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艾拉还不知道怎样调情，从来没有想过选定任何一个别的男人作那个独一无二的人——终生的朋友和情人，一个为她而活的“丈夫”；假如她没有把自己人格的某一点滴留给自己作为一种独立的自我，那么，即使她把别的一切都给了索尼也价值不大。也许正是由于索尼不知道那种保留是什么，除了他们彼此共享的爱，索尼对她还怀有某种特殊的、心照不宣的尊敬———种超越激情与爱意的神圣品德。

他们之间的确有激情和爱意。他们正式订婚之后结了婚——他甚至为她买了一个嵌有一小块钻石的戒指——直到结为夫妻之后彼此才成了情人。他们在公开场合从不使用昵称或用亲昵行为证明彼此相爱，但在她的衣服下面的确有一个真实的胴体，一个为他而存在的处处可爱的胴体：供他衔在口中的黑葡萄一般的乳头，光洁的腹部上娇小的肚脐，柔润如她母亲给她作新婚内裤的绸缎的私处。他们在如梦的缠绵中长时间地谈论彼此相识之前各自的生活，谈论他们今后将共同去创造的生活，然后，随着他几乎是偷偷地进入她体内，对话用另一种形

式进行，其中的极乐每每使他们彼此感到惊奇。他们彼此都被对方深深地感动了。这种情感具体表现为彼此的精神感应和心心相印。他们经常不用讨论就能在事关他们的生活的问题上做出同样的决定；即使是讨论，他们也总是能合二为一，讨论作为一种日常交流，已成为他们默契地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彼此互相适应，就像一对猫儿在火炉前蜷身相依共享温暖一样。

他们决定生孩子，但不超过两个。穷苦人家往往不负责地生出众多儿女——他们就出身于这类家庭——他们可不愿再那样。他们相信孩子有权幸福地成长，但他们不想娇惯孩子，只准备为孩子们提供必需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他们新婚之初的亲昵包括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彼此都反对任何宗教信条，尽管为了使长辈们高兴她偶尔也出席一下宗教仪式。他们俩发现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意义——或许有点神秘莫测——好像已包含在有用的生活之中。他们知道生活的意义不在于仅仅为自己、为儿女或为家庭而活。他们还拿不准那意义到底是什么，还没到时候。他们只知道那必须是与对社会的责任相联系的；而社会只能是他们被拘于其中的那一个社会，他们属于那一个社会，首先是因为法律告诉他们那才是他们的栖身之地，其次是因为日常生活的依赖和生活在那个社会的共同忧虑迫使他们隶属于那个社会，那个他们的社会。

索尼感到对他来说有意义的生活显然在于对自己所教的孩子们尽特殊的责任：首先是尽责尽力地教好自己的课，进而就是为全校学生的利益竭诚奋斗。他发现有必要让学校和社会联合起来，因为学校长期以来都是孤军奋战——教育已沦为一种奢侈，一种与父母们的生活急务脱节的特惠。他暂时抛开莎士比亚而买了其他的书籍，这些书他读了一遍又一遍，以便理解

和运用把学生的家长、亲友和邻居所进行的社会教育视为学校功能的一部分的理论。他发起成立了一个家长教师协会和一个少儿教育咨询服务社，筹集资金为残废儿童购买特制的学习生活的用品，还带领高年级的男生和女生到养老金领取者家中做义务修补工作。此外他还能做什么呢？为了他那个社会的进步，他大胆地走向设在白人区的“扶轮社”和“狮子会”①，彬彬有礼地恳请它们仁慈派出医生、律师或业余戏剧演员和音乐团体到学校的礼堂去演说或演出。

艾拉要找到自己的生活道路可不容易。瞧她，留心地等待着，却一声不吭。她也曾在学校注册学习过，但她从小就生活在她家那个闭塞的女人窝里，十八岁就结婚了，从未在社会上闯荡过。索尼需要的不是一个家庭主妇似的妻子，而她又想成为他所愿的那种人，因此她选修了文秘课程并通过函授学习了心理学，以便过一种有用的工作生活。他微薄的收入也使她有必要去挣钱；不过这一点不是他们夫妻最关心的。在她第一次怀孕的那些月份里，他们把每天晚上都花在函授学校寄来的材料上，他帮助她学习和完成作业。女儿贝比出生之后，年轻的母亲常常坐在桌上的碗碟旁读书，间或去做点家务琐事，年轻的父亲则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批改学生的作业。有时他会来点小插曲，向她讲上几个笑话，夫妻俩在轻柔的会心而笑中感到无比舒心。贝比有时候因肚子痛而哭叫，他们这才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有时他把修长的手指伸过桌子抚摸妻子的脖子，或者她把手在他的手上放上片刻，这些身体接触往往成为做爱的前奏。

① 扶轮社是由一些富有的商业巨头和专门职业者组成的联谊会。这一国际组织1905年始创于美国芝加哥。狮子会也是类似组织。

他们是通过分期付款买下家具的。每逢星期六，他们上午都进城买东西，开始是坐公共汽车，后来是开他们省钱买下的小汽车去。贝比穿着有白色褶边的短袜，威尔则穿着配长裤的猎装，和他父亲星期六的装束一样。索尼和艾拉用塑料袋兜着一周的生活用品，袋上的那些标明大贱卖的文字表明了他们这类在街上随处可见的打工人家的身份。他们这类打工人家不得不在最廉价的店里购物，每周好不容易能有一次买点奶油冰糕或花生米让孩子们过过瘾，自己则排长队在酒吧另一边和白人隔开的地方享用几杯难得的啤酒。像雨后猛长的青草一样，这些人一到星期六就大量涌现在镇上，黑压压地遍布大街小巷，有尾随大人的小孩，有注视窗户的男人，有在琢磨分期付款的首次交款数的妇女，使她们动心的那些卧室用品和西装便服被冠以“格拉那达”和“凡尔赛”之类牌名，这样命名好像是为了给她们那些不堪压迫而摇摇欲坠的蜗居平添宫殿之宽阔与华美似的。而在星期六以外的其他日子，这黑压压的人群会从城里消失，温驯地被逐回镇外专供他们栖身的地区。工人们回到了工厂，小学教师索尼他则回指定让他教书的那所学校，男人们，女人们和孩子们——每个人都不能离开黑人限居区那些狭小破烂的生活之路。与此同时，在城里，律师们、房地产商们和市政官员们走在扫除了星期六的垃圾的宽敞的大街上，自由自在，互不相碍。这个城市是白人的。

索尼和艾拉都不贪恋“格拉那达”和“凡尔赛”之类，对莎士比亚的理解使他们不易于受骗上当而成为左右世界的大商人们的猎物，这种人往往赚了你的钱还使你误以为占了便宜。(虚假价值——他这样称呼这类买卖是以后的事了。)但这对夫妻在外表上与和他们属于同一阶层的那些每个星期六都到镇上去买白人的东西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拉着孩子们的手走过城里

的两家电影院时，他们不在意他们从未进去过——不能进去。一家子饿了的时候，索尼就会到一个希腊人开的商店里去买些小片食物，孩子们走在路上吃完东西之后，他和艾拉会小心地把沾满醋的食品包装纸揉成一团扔进当局设在路边的垃圾篮里。那个希腊人的店里摆着几张桌子，桌上摆有沾满蝇粪污点的假花和番茄酱瓶，顾客可坐在桌边就餐，但索尼一家不在其例。假如孩子们需要上厕所，索尼夫妇——总是这样的——就会拉着孩子远远地奔向火车站，只有在那里才有可供他们这一阶层的人使用的厕所（尽管在百货大楼有一个厕所，但那是为别的顾客而设的）。就像某些逞王称霸的野兽划定自己的捕猎与嬉乐范围，不许别的野兽进入一样，市政当局好像也用某种警告的气味——某种不变的权威的气味划出了一个势力范围，禁止星期六的人们进入其中。星期六的人们能嗅出那种气味，他们总是能辨出它来，因为它是时刻存在的。没有必要大量设立把那种气味形诸文字的警告牌，这种牌城里只有几个，例如公用板凳旁边就有。图书馆里没有这种警告牌，但是谁也不能假装不知道这幢建筑散发的正是那种气味，只不过在这里它已改头换面，化身为书本的气味，日益变黄的破纸和磨蚀的皮革的阴森的霉味，还有它们从书架上吸取的木头的香味，就像白兰地酒也吸收了酒桶的木味一样。

索尼这个莎士比亚崇拜者从来无权进入城里的公共图书馆，因此看到白人用胳膊夹着书本从其中走出时他不怎么想进去；他没有去注意那幢大楼——包括它的盾形徽章及高柱顶起的大门上方的箴言“莫失良机”——对他来说代表了什么。

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我父亲的情妇。当然如此。她能是别的什么模样呢？别的什么人怎么可能迷住他呢，这个男人可是超凡脱俗的，既没有我们这类人的卑贱行径，如酗酒、吸毒、打老婆、狂呼乱跳、厚颜乞讨（行行好先生行行好老板），也不为谄媚拍马、腐化堕落、裙带关系等所有高级恶行拖累——人们一不留意就会落入这些陷阱，为获得好处牺牲别人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自尊。自尊！这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它从未使他失望过，一旦他想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它总是能成为他的试金石、他内心的路标。要做能使你保持自己的自尊的事情。这就是他赠予我们——我姐姐和我——的智慧。它与你接受某种聊以生活的东西时涌向你的信念的温流结伴而来，他本人言行就是它的明证。假如某个人的自尊从这个人身上要求并获得了许多——放弃了他所热衷的工作，走出了冥想和隐居生活，转而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发表演讲，落入监狱，受到审判——假如这么个人也会落入陷阱的话，那当然是在猥琐的生活小节上栽了跟斗，掉进了最庸俗腐败的泥淖，溜进厨房吃我们的食物同时在上面拉屎的肮脏的苍蝇在这种地方营生倒是挺合适的。

她当然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我（一个从未与女人睡过觉的在校男孩）在咸湿梦中梦见的尽是金发碧眼女人。这是法律的影响所致，法律决定了我们是什么，而她们——那些金发碧眼

的人又是什么。结果，所有我们这类人都成了病毒携带者，血液中带有病毒，本人也许并未发病，却能把病毒传给别人；他也仍然没有摆脱病毒携带者的身份，尽管他已如此令人羡慕地解放了自己——噢是的，我的确崇拜我的父亲，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人们说某个人“染上”热病；而他染上的竟是这种病，落到这一步。

当然“我们彼此认识”。他被拘留的时候她来过我们家。是我把她领进屋的。我亲自为她开的门；他不在家的时候，总是由我去应门，这种时候，对我母亲和姐姐来说，我这个男学生是家中的男主人。每次应门，我都要先酝酿表情，说不准又是警察来家中搜查了。但登门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妇女，一张赤裸的脸微笑着，露出去救助别人的人所表现的那种表示歉意却又自以为是的神情。这是她的工作，她是某个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奉命监督对政治犯的拘留和审判，帮助我父亲这类人和他们的家庭。我们不缺日常用品，我的学费已经付过了，我母亲和贝比(课余)都有工作，我们不欠房租，因为我们搬进城来住的时候我父亲买下了这座房子。这座房子所处的地区后来被称为“灰区”，因为在这里我们这类黑人居然公然违抗法律和白人杂居在一起。

因此，我们不需要她。她坐在我们的沙发边上，一边喝茶一边向我们提供所谓道义上的支持。她谈到我父亲可能受审，可能受到种种不公正的指控，面对这类案子辩护律师们总是会作出预言的，说什么某某会遇到一个“糟透了的法官”，一个来自兄弟会的秘密成员。她讲述着审案内幕——但不是炫耀，面对我们的家庭困境她完全是谦恭的——她参加过一次次法庭审判，在法官临时休庭去喝茶的时候，常常和律师们会晤，还隔着听众席和被告席之间的栏杆和被告偷偷交谈，那些内幕知

识她一定是这样获得的。看起来我那文静的母亲是多么紧张，她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美丽的双腿优雅地交叠着，好像她的丈夫在场赞赏她的举止——那种自尊似的，她打起了精神，是自尊给了她支持和鼓励。

我当然认识她。她那类人的带粉红色的白脸五官宽宽的，不像我们这类人的那么拥挤。我们的嘴唇是黑的，眉毛和睫毛浓密而黑亮，重重阴影使我们鼻孔的轮廓更显得幽深。略带粉红，白色并有柔毛——有点模糊；她粉红的双唇未涂唇膏，一件绣花宽松衫罩在某种无形的软垫上(一定是她的奶房，她动作时它一起一伏)，用又粗又厚的斜纹布做的裙子缀有几个游击队员的口袋——莫非她拿不准到底该怎样穿着才好，让人觉得她刚离开一个园会，还是刚从灌木丛中“自由战士”的隐藏地来呢？一切都是不明确的；只有那对眼睛除外。碧蓝色的，当然。那双眼睛不大，像在一幅未完成的素描上点上的两个小色点似的。

即使我从未见过她，我也能把她的形象拼凑起来，像报纸上看到的那种用以验明罪犯正身的拼凑画像一样。一个男学生的咸湿梦。我父亲的情人。但是那天晚上我没有色情狂想。我在黑暗中醒来。对一个青春期的男孩来说允许自己哭泣是难以忍受的；那哭声很可怕，我想恐怕是因为碎掉的是他的声音。

小学教师有一种渴望——他想那就是提高自己。这与成为有用的人不矛盾。假如他本人能够“丰富自己的心灵”，他也只能提高学校以及城外草原上的黑人社会的生活质量——他是这样想的，他不能陷入城里的任何政治论争。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有多大损失；读当地的报纸时他注意到，那无非是为入主市长办公室和市议会争斗而已，两群彼此互有偏见的人，说阿非

利堪斯语[1]的人和说英语的人，互相攻讦，双方的目标主要都是保住自己的工作、板凳、电影院、图书馆——整个城市——白人的。他不能参加城里的任何文化组织——如业余演员剧团、室内音乐协会，两者都是由德国犹太人难民发起的，这些犹太人战时来到南非，不仅给这个以矿业为主的小城带来了文化，还带来了煮上好的咖啡的技艺，此前这里的人只知道喝吉尔伯特和萨利文两种酒以及煮开的菊苣混合液。他不能加入星期天的玩鸟者协会，虽然他喜爱大自然并且有时也乘火车带孩子们去动物园——这里每周只向他们这类人开放一次，有时也去不属任何人私有的地方，即他的社会与城里的社会之间的辽阔草原，在那里了解狐獴和生活在矿碴之间的蜣螂的习性。他也不能加入国际象棋俱乐部(这是德国犹太人为在一个毫无心智生活的小城创造心智生活的另一首创)。

他没有钱多买书。他想应该有个读书指南，告诉他什么书是重要的，或许它们能满足他的渴望，但他还拿不准到底什么能够满足那种渴望。他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想得到什么。他也参加了函授学校的学习。他选择了比较文学并发现了卡夫卡，从此，除了莎士比亚，他又多了一个自我超越的思想泉源——藉此他得以摆脱破旧的教室、星期六的人们的拥挤、墙壁单薄的陋室内的混乱，同时又能以全新的面目回归于这一切，对生活在这种氛围中意味着什么有更深刻的认识。卡夫卡阐明了他无法名状的东西。星期六的人们在其外围逡巡的这座城市就是卡

---

[1] 阿非利堪斯语(Afrikaans)是由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在南非定居的荷兰、德国、法国移民使用的荷兰语演化而成的，因此它也称南非荷兰语。偶尔它也被称为“布尔语”，“布尔”意为“农民”，因南非布尔人即荷兰人，他们到达南非后主要以农牧业为生，故有此名。从1925年起，它已和英语一样是南非的官方语言之一。

夫卡[①]笔下的"城堡"，把他拒之门外的图书馆的大门就是法律的大门，卡夫卡的主人公K曾坐在那门外等待，一年复一年，每一次都被告知他必须获得许可才能入内。小学教师这类黑人被禁止进入指定的区域，做任何事，如生孩子、出生、死亡、工作或游玩，都被视为非法——这些人的罪过和约瑟夫·K的那种罪过是一样的，K受到一种隐身在万物之中的强权传讯去伏罪，他不知道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只知道假如那种强权说他有罪，那么他就会被判罪。

这种哲学冥想使索尼得以自慰，这是一种极富失败主义色彩的抑止热望的缓流的方法。他能够超然旁观他的一家无法在其中入座的市政厅和希腊人开的茶馆并从中得到满足，当然是在上述意义的满足。他常常想入非非（以此锻炼心智），把强权想象为一种抽象，一种超宗教的奥秘，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利用神话人物来阐释各种奥秘的，有一种宗教甚至拙劣地抬出一个生自处女的半神半人的人物来，目的是为了使那种特别的神话显得更加可信。尽管卡夫卡比莎士比亚更好地阐明了小学教师索尼的生活处境，但索尼还没有走到卡夫卡那一步，不相信把人们弄得如此无能为力的强权只存在于人们自己的屈服之中。

他所知更多。强权势力除了以上所述，在市政厅里有地方立法者、市长、纳粹式的地方长官之类，他们的上方是已故市长们的照片和"莫失良机"的箴言。

我相信在我姐姐和我还小的时候他们夫妇是幸福的，那时我们还住在城外的镇区。就孩子对父母所能了解的程度而言，

① 卡夫卡（1883—1924）是奥地利表现主义作家，代表作有《变形记》、《审判》和《城堡》等。

我们的父母是考虑周到并体贴人的，完全不同于那些酗酒的粗暴父母，我们的某些邻居就属于这类，他们的丑陋生活隔着墙壁都能听到，他们的孩子由于害怕父母向他们显示的一切而躲到我们家来。有时候一个妇女会跑来请求我父亲和他丈夫“谈谈”。我呆在父亲身旁，爬在他的旧扶手椅靠背上，或是倚在他的腿上，像有外人在时我常做的那样，我零星地听懂了她说的一些话：她丈夫打了她，他每天晚上都喝得醉醺醺的，他不久就要被一个建筑商炒鱿鱼了。我好奇地盯着那张被恐惧扭曲的涕泪横流的脸，这种形象在我们自己家里是从未见过的。

我父亲享有的不仅仅是自尊；人们都尊敬他，就连醉汉都不会咒骂他。我不知道是什么使各类男人和女人觉得他能为他们找到出路，使他们摆脱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债务、无知、混乱和不安全感的困扰，迅速越过一个个肮脏的生活障碍。我估计部分地是因为他在学校里的作为，然后是他说服镇区长官允许他组建青年俱乐部的举动；人们把他视为他们的一员——无权无势——但却有一种特别的自尊(是的，又是它)，这使他有可能影响他人——用一种与市政府、法院和警察局的老爷们截然不同的方式为他们的生活负责。他用对待我们——他的家人的方式对待其他的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自然而然地给予，他们也是顺理成章地接受。

不过我父母没有多少朋友。没有邻居们所谓的那种朋友。我们去别人家里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时看到的那种星期六晚会在我们家是不常见的。我家的庭院里也没有横七竖八地放着的啤酒瓶和白兰地瓶，更没有收音机在屋前游廊的台阶上颤抖着轰响而人们和着音乐乱扭并傻笑的情景。叔叔、阿姨和表兄妹们有时到我家来喝茶，他们偶尔还会在星期天来吃午饭，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得用星期六一整天的时间准备传统食品，她做传

统食品的技艺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她那被整洁的宽罩衫和裙子遮住一半的东方之美也是如此，而她祖先的其他遗产却在一代又一代人与异族的通婚和文化融合中泯灭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一起干活的——我母亲、父亲和我们两个孩子。在对男孩子感兴趣之前，贝比常常在母亲为她做衣服时当帮手。我家里有一块马蹄形磁铁，从前我特别爱用它，先是把整罐小大头针倒到地板上，然后把它们像仙人掌的刺似的吸到磁铁上，它们扑向磁铁的样子真像女孩(我父亲这样慈爱地称呼它们)。我父亲教过我怎样换保险丝和为我母亲的蒸气熨斗换电线。他那时总是把家里的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我们没有钱请专业人员来做修补工作。但他没有教过我修汽车，他自己也一直没有学会——幸亏我的一个表兄是机械工学徒，他每到周末就来我家打杂赚几个零花钱，这样我家那辆二手货福特车才勉强可以开动。他常常把油腻的工具盒放在我父亲搭起来作停车房的小屋的肮脏地板上，我很喜欢那些黑乎乎沾满油的工具散发的气味，它使我想起我父亲曾带我去露天博物馆看过的巨大的蒸汽机火车头的巨轴。他曾许诺要找一条仍然有这种火车头在运行的铁道线并带我去坐一次这样的火车，我记得这就是他没有兑现的那一许诺。也许他发现像我们这类人是无权享用火车的，但他不愿告诉我。

我们——我姐姐和我——那时对我们是什么没有多少特殊感觉。我是说，尽管我们的生活被局限在有限的区域内，但我父亲使我们的生活小圈充满了温馨。某种意义的温馨。我明白我现在不愿承认那种温馨，因为它现在对我已变成一种足可非议的东西，但事实上它从前的确给过我们某种安全感。一般地说来，他并不向我们隐瞒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去，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的事实；但他从不试图把我们带向这样的地方，相反他

代之以很多我们能做的事情。我姐姐学习跳舞，他则教我下棋。我获准在星期五晚上很晚才睡——第二天没课——在晚餐的盘碟收拾开之后，我们常常围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他那双又大又黑的双眼注视着我，严肃而充满鼓励之情，随即是一丝微笑泛过他那幽黑的瞳人，这种时候我真没有勇气离去。每逢星期六全家进城，他都要为我和我姐姐各买一本连环画，不是除超人发出的拟声叫喊外没多少生词的那种（我常偷偷从朋友那里借阅这类书），而是从英国进口的书，给我的连环画不是讲勇敢的飞行员，就是讲“亚瑟王的圆桌骑士”，而我姐姐的则是浪漫寓言连环画。

为什么我说“他”创造了我们天真无邪地生活在其中的温馨小圈呢？我母亲也同样用温馨环抱我们。但是，尽管他们共同计划每一件事，假如需做出某一事关全家人生活的决定，或者遇到什么可在我们姐弟面前讨论的事情，我们往往会发现他一边看着她（就像他和我下棋时看着我一样）一边听取她的意见，因此我把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温馨和安全氛围的功绩归于他是没错的。看起来他好像总是明白她想做什么，为了他和我们，而她也好像总是知道他会想出办法协调好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因为她想要的，在本质上，总是他想要的，这看起来简单且像纯粹的屈从，而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当时并不——现在也不——假装理解那是怎么回事。那是他们之间的默契，对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是不可企及的。

海滨旅馆、海滩泳场和带游泳池的游乐场不向我们开放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我们根本付不起住旅馆的费用，每到复活节都有杂耍团来我们所在的地区为我们表演，马戏团则在圣诞节期间来露上一手，此外我们还不时去草原上不属任何人私有的地方，在矿碴堆之间野炊，那里夏季有一条小溪从芦草间流

过，我父亲正是在那里告诉我们织巢鸟是怎样织出它们那悬挂着的巢的。正是在那里，坐在自己的毛毯上，不被任何外人看见，远离了隔壁的酒鬼和市政官员，不受任何人的侵扰，我父亲常常安然地把头枕靠在我母亲的膝上，我们姐弟俩则依在他们身上，承受着他们的手臂的温暖。幸福的童年时代。

但到了十五岁你就不再是孩子了。

小学教师索尼一方面教书度日，另一方面又和市议会一起实行他那些助进社会进步的计划，盾形徽章下的市议会坐落在草原的那一边，而真正的黑人——他们比白人人数多得多，包括“有色人”和印度人——则住在草原的这一边。他所属的团体和真正的黑人之间有某种联系，同时又通过管理星期六的人们而和市政当局有某种瓜葛，但两者很不相同。这些联系没有正式名义——正因为没有名义，所以从未有人对它提出过疑问，相反大家都像遵守禁忌——在遵守它的同时无人愿承认的某种东西——一样接受了它。黑人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无非是叫卖土豆、洋葱，修筑栅栏，挖掘沟渠，或者是在比小学教师家更富有的那些家庭中洗晾衣服而已。他们的话语、他们的笑声从一个街区传到另一个街区，整天都在不停地嚣嚷，像知了在炎热时分吱吱嘎嘎闹个不停一样。一旦工作做完了，他们又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远离社区，就像社区远离白人的城市一样。免得造成妨碍。这样更好。一看见他们你的内心深处就会出现阵阵悸动。正是由于他们，小学教师所属的黑人社会才落到如此地步：被抛弃在城市之外。需要提高地位。正是由于他们——他们的黑色素冲淡了白人之城的血液，在它的血管中注入了一股黑色的浊流——黑人才不配享用电影院、图书馆、厕所和盾形徽章。面对女人们友好而神气地耸起的巨大臀

部、男人们粘满灰尘的脑袋和耷拉在母亲背上的婴儿的美——你肯定只会明白，假如你想拥有一种想必能被白人之城接受的自我（你有权这样），那么你也有足够的理由具备另一种自我——这可是一种诅咒，不堪设想——被他们称为同类。那种黑色素导致了更多的限制，他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向警察呈上通行证，不得不干更脏的活儿，在更糟糕的地方生活直至死亡。最好是让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不去注意他们的任何特征。但他们是有用的，从城里享有公民权的白人身上看到自身的某种东西的那一自我，在接受这种相似的同时也接受了城里那些白人的自负，也就是认为黑人生来就是为了做那些你不想去做的事情的，和你的地位相比那些事情太卑贱；没有比他们的地位更卑贱的了。

小学教师一直用另一种方式注意黑人；不过，他那模糊而持久的责任感所含的这种关注还是远未成熟的。在他从自己的鬈发中除去父亲沙发店的棉绒，带着书本走出尘埃飞扬的阴暗店铺的那些岁月里——正是在那个阴暗的店铺，他的父亲蹲在地上为城中大户人家的沙发蒙上天鹅绒，像裁缝为女人们缝制衣服一样——早在那时候黑人们已在为一些博大的想法集会。平等。一天该挣多少钱；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提出的工资要求是很低的：每天挣一镑，仅此而已。他所属阶层的人也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挣的钱比同一级别的白人教师要少。于是他开始挑灯夜读以便提高学历，或许还可以获得大学文凭哩；他是用这样方式改善自身处境的，而不是通过参加集会或者在示威游行时被捕。平等；他从莎士比亚著作中寻找平等的定义，这比草原上临时搭建的讲坛上的那些定义更具权威性。麻烦的是，他并不觉得自己低等——低于什么，劣于谁呢？他太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生活了，因此当他

冒险走出黑人社会时，他对射向他的重重羞辱和轻蔑毫不在意。假如他是塞巴斯蒂昂①，像他其余的同类一样，那些利箭是穿不透他的自我意识的。假如他们——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黑人？——那他或许早就加入那些示威并挥舞拳头了。他用这种旁观的方式向黑人表示敬意，同时又把游行示威留给了他们。那看起来更像他们的事；他们在长相方面和城里的白人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因而不会在将来某一天被白人们以某种方式接受。作为这样一个旁观者他并不孤独；黑人社会有黑人们的希望，同样也有对这些希望的怀疑。人们在门廊和院子里谈得热火朝天，他们会把巷子铲平的　等着瞧吧　他们让比勒陀利亚的布尔人屁滚尿流真是太棒了　你以为你讲对什么了　他们会给他们套上绞索的　举起手来顶个屁用前有手铐后有子弹你们搞不过白鬼的。只有少数人愿穿过草原加入他们的行列。

索尼有几个表兄弟在开普敦，他们正投身于黑人自己组织的反抗运动，其中一个和他的同志者回老家来度周末，同时试图从黑人区拉起一支示威队伍进城。尽管索尼很聪明，而且他对他们示威的目标的准确理解首先使他们大受鼓舞，但他们最终还是发现他不会成为担此重任的那个人。一两天之后，他一边回想他们的表情，琢磨他们那些零星的评价，一边自言自语——他必须先拿到更高一级的学位证书，然后再视情况而定。在返回马伦堡的火车上，他的表兄把他排斥出了他们的行列，称他为无用之辈和叛徒，说他一心只想捞一张毫无价值的破纸片，无非是想成为官方豢养的施舍性教育的代理人

① 即圣塞巴斯蒂昂，他228年被绑在树上用乱箭集射，继而被乱棒打死，因此成为弓箭手的保护圣人。由于射在他身上的箭像针垫上的一排排针，因此他又是卖针人的保护圣人。由于他原为卫兵队长，因此又是卫兵的保护圣人。他的节日是1月20日。

而已。

他通过读报纸追踪了解一桩桩政治审判案；他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人，尽管这些人的名字像商标名称一样已在黑人区家喻户晓。他已读完在他还不到二十岁时的一次黑人大会制定的宪章中的一册，私藏这种东西的人一旦被查出是要坐牢的。后来到某个时刻，不能确切说出是什么时候，平等已化为一声没法辨清的叫喊，被听错了或被解释错了，最后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某种更精细的东西。自由。正是它。平等不是自由，它不过是想变得和城里的白人一样的错误欲望。谁想变得和那些令人恐惧和憎恨的人一样呢？妒忌不是自由。

结婚之后，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尽管他知道他担负责任的本能已超越他的本分，不再只是维护由婚姻联系在一起的两家人的安全，但是从他投入黑人社区的公益事业的时间，精力和想象以及他全家人为之付出劳动，他想他发现了这种本能的自然局限。扶轮社和狮子会在向艾拉及她召集起来设立托儿所的委员会提供赞助，因为小学教师索尼那在草原上众所周知的高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说他的声誉，假如他们不愿用“高尚”这个激动人心的词来形容索尼这么个小学教师的话，索尼不过是在星期六用别的活动取代进城购物的人之一。贝比已成为青年红十字会(黑人区分会，和城里的分立)的会员，经常和一个小伙伴拿着募捐箱庄严地走家串户。小威尔还只是一名狂热的童子军，这时候，另一个小男孩在和高年级的学生们一起冲向警察时被枪杀了，一家报纸的摄影记者摄下了另一个孩子托着他的尸体的照片，作为“圣母哀基督”像的翻版，它反映了在真正的黑人生活的草原上随处可见的苦难。

对小学教师来说，黑人和真正的黑人、他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响彻云霄的呐喊——“平等”已开始

变成“自由”——不知不觉就实现了这种转变，这是对某种一直存在的、有待去理解的东西的认识，它是一直存在的。对他是一直存在的。在“圣母哀基督”的一幕在城外草原上的各黑人区重演的时候(他有一张发生在罗马的“圣母哀基督”像，是从他书架上的一本书中翻拍下来的)，他所任教的学校的学生开始了罢课示威，他们在学校的院子里集会，脖子挂着一个个纸板做的标语牌。标语牌上的文字写得歪七扭八的，语意也不完整，但它们是那么眼熟，在反映真正的黑人区的事态的照片和报道中常可见到，因此不难读出它们的大意：我们不要这垃圾教育　种族隔离是奴役　警察滚出我们学校。他们是在模仿真正的黑人，校长在教职员工会上说，他不允许这类事情发生。他们不愿长大之后再带什么通行证，他们的学校比黑人们的更好，他们条件更优越——不，他没有这么说；他们没有黑人那么黑。但是教职员工中最勤勉、最优秀的那位却在想孩子们是怎样通过模仿别人而提高自己的——首先是模仿他们在父母身上看到的成熟模式，然后是随着能力的增长逐渐有意识地实践它们；他们为什么不去模仿另一些早熟的孩子——他们的同胞兄弟，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去履行一些责任，从而为自己学到某些有关他们自身的东西呢？把真正的黑人视为同胞，这已是够恼火的了，没有哪个被触怒的校长会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校园的疯狂——如戴酒瓶盖做的项链，在厕所里互相传递大麻烟。

小学教师走回他那间空荡荡的教室，独自一人站在讲台旁；然后他拿起一支一端很粗的粉笔，离开教室走到男女学生们中间。学生们畏惧却故作勇敢地动了动；别的老师已多次跑来叫他们肃静，大声向他们发号施令，甚至还要他们头脑放清醒点。但他只是从一个标语牌走到另一个标语牌，为这个改正拼写错误，为那个添上漏掉的介词。孩子们之中立刻爆发出一

阵嘻嘻哈哈的笑声，像风卷过院子里被踏得破破烂烂的地面而扬起飞旋的尘埃一样。——我们还是把标语牌拿回教室重写吧。假如你们想把某种东西告诉别人，你们必须知道怎样恰当地表述它。这样别人才可能对你们郑重其事。——结果他们都顺从了他。

但事情并不总是这么好办的。由于知道他对他们不是敷衍了事，因此他们对他寄予了厚望。不仅是他自己教的那个班，其他高年级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很快学会了不少混杂的革命术语，它在当时取代了学生们的俚语，他们的要求也和他们的行动一样变得越来越尖锐了。他们跑来找他，希望他能出面和校长交涉。在他们下定决心要穿过草原去示威游行，以表明他们与那些因罢课而被警察拘留在校外的孩子们团结一致时，他说服了校长允许他和他们一起去；黑人的团结。他负责不让他们扔石头。他做到了。破天荒第一次，长辈们看到他的与众不同得到了一家报纸的认可。那不是一张重要的报纸，而是一张为他们这类人出版的周报。他的照片赫然登在报端：他鹤立在一大群孩子的黑炭一般的脑袋中间，又高又瘦，两只眼睛嵌在眼窝中像黑洞一样。照片被剪了下来并在表兄、姨妈和叔伯们中间传阅。这也很可能是他的照片第一次进入警察局的档案。当警察真的闯来他的学校的时候——因为一些学生在受挫之后点燃一辆汽车发泄怒气——这时学生们希望他能出面和警察交涉；他没能像说服他们不要使用石头那样成功地阻止他们使用汽油和火柴：在其中七个学生被拘留之后他去了警察局。但他所做到的一切是，为了弄清他们被关在哪里，他不得不向警察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地址，这样一来警察也就把他和报上的照片对上了号；结果他什么消息都没打听到。

他是在为学校、为整个黑人区的孩子们奔波。艾拉知道这

一点。他什么事都不向她隐瞒。她知道有些家长已在埋怨他和学生们一起穿过草原进行示威游行：做老师的是不允许鼓励这类事情的。她知道校长向他通报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在向他发出警告。校长看起来好像要说他的这位教五年级的属下期待他说的话了；但是校长大人在他这个特殊的教员面前犹豫了，他什么二话也没说。艾拉不用丈夫详细解释也能明白，此事与全家人的生活休戚相关，不过，美好的愿望使他没有顾虑这一点：他冒的是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危险——失去工作，没钱付汽车和冰箱的费用，没钱买每个星期六都需要买回的生活用品。在接到校长发出的警告后，他们照常若无其事地工作度日。但是一回到卧室里，看着她叠放一家子的衣物，用刷子刷他穿去学校的茄克衫，他意识到，在那天晚上，这是保卫她的家的一种仪式——坚忍地用熟悉的行动对抗未知的东西；他已放下书本并在看着她（他在她后面，躺在床上，她在镜子中和他对视着），对她来说，这种注视是一种默契，它将使他们一起去迎接未卜的一切。他们并不是真的害怕，只是为孩子们着想。假如只需为他们提供衣食就够了该多好！贝比差不多十二岁了，一些像她这么大的孩子已手拿石头激动地和示威群众一道冲锋了，那个被枪杀的孩子就是如此。贝比对这种团结没多大兴趣——她迷恋的是舞蹈课、影视明星和知心密友，但谁知道这能维持多久呢？威尔太小了，冒不起险——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他不像草原上那些黑孩子，他们不管年纪大小，没有谁是不能上街冒枪林弹雨的。

难怪家长们希望把他们中的一员，那个带领孩子们走向危险地方的人逐出学校。

是什么使他允许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和他的情妇一起出入公共场合呢？是什么使他和她一起去那个为地下商店和餐馆环抱、有电梯和管乐的电影院的呢？我去那里的原因是，我原以为谁也不会看见我。谁也不认识我。那里是富有的白人居住的城郊，他们一直是住在那里的；而在我们和白人杂居的灰区的廉价电影院，必定会有人认出我。认出他。看见他和她在一起。

因此我们俩都穿过城市，互相欺骗，试图在异国的领土上乐而忘返。在我逃学的那天下午，他当然没有把我放在心上，而我，才十五岁，当时却惦念着他，我的父亲——或许我有点抬高自己。你是否曾在某个时候忘记过他们——你的父母呢？犹豫不决的时候你总忘不了他们——不管你是服从还是反对——他们的意见——你从哪里获得它们呢？——他们的意见决定你正在做的一切。因为即使你不服从父母，欺骗他们，你仍然信任他们。

当时他就在那里。你准备看什么呢？他说道。但我已经看过了。他和我保持着距离，因为他认为他身上一定还残存着她的手臂和肩膀贴着他时留下的气味。也许他一直在黑暗中抚摸她，他的手缓缓伸进她的衣袖，抚弄她的乳房。在晚会上有人把灯关掉时，我们曾这样碰过女孩。

他让我看到了本来永远不该让我看到的东西。

我走进厨房吃晚饭的时候，家里其他的人都已在桌边坐好了。我在门口停了停，然后才走了进去，我的整个身子都躲躲

闪闪的。他坐在他通常坐的位置上，好像他又变成我父亲了，而不是和他的金发情妇站在电影院休息厅的那个男人。我一声不吭地溜到我姐姐旁边，坐在他自己做的那条板凳上——我帮助他做过它——当时他正在为我母亲修建自助式“早餐角”。在家中的和睦气氛里，我们吃饭前常常不用互相致意；那会像是自己对自己说话。因此我没有必要打招呼。他正在往他的食物上撒盐，我看着他的手，并不是非得看他的脸不可。我母亲在小声地说话，正在评论一定是贝比提起的某件事，一边说话一边在火炉与餐桌之间忙碌，像一只鸟飞来飞去叼着食物放进雏鸟张开的啄子中一样。——坐下来吃饭吧。他会自助的。——我父亲就是那样说我的；他对我母亲说话时充满了温柔的体恤之情。然后我抬起头看他，也许他正希望我这样做哩。我们又看见对方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我母亲说我看起来累了。——我想他该服用维生素了。——

——噢，艾拉，别相信那种瞎说！——他正在朝她微笑。

——噢，我做学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把这归结于迎考的神经紧张。威尔，你不想喝杯牛奶吗？索尼，你看他真是够用功了，他一整天都在复习功课，他应该抛开课本，早一点睡觉。告诉他。——尽管我父亲已不再是教师，但她在事关对我们的教育的问题上还是习惯于把他当作一个可以请教的专家。他那对深邃的眼睛从桌子对面注视着我：——那可真是个好主意。睡眠是最好的补药。你下个星期要考的科目是什么？——

我第一次和他说话。——生物学。星期二考试。——这样我们俩之间结成了一种同谋关系，是他把我扯进这种关系的，好像他不是我父亲似的(做父亲的永远不应该做这种事)。但他却是我父亲，因此我怎么能拒绝他呢？我怎么敢拒绝他呢？

校长甚至可能保护过小学教师一段时间。或许是良心——校长自己的，可惜他没有对它遵从到底——或是对他的敢于反抗城市势力和政府权威的同胞的忠诚——感动了他；在黑人区里，没有谁那么死心地想避免麻烦，而不对某个不怕惹麻烦的人暗中怀有某种敬意。在学生们把学校搅得天翻地覆的那些日子里（好像他们是真正的黑人似的），小学教师没有被革除教职。

但是他不安分于他那有益无害的工作，要不他是能够从“扶轮社”和“狮子会”讨来资金的，而且还能每周在城中特选的宾馆和他们进午餐一次哩。他的冒险行为使他的名声传到了别的黑人区，传到了德兰士瓦省的其他地区——也许这首先是由报纸上那张照片造成的。《政府报》正在这些地区颁布公告——就像剧本内容被演员们的声音和动作表达出来一样，政府的卡车和推土机也如实地传达了这些公告——卡车强行把黑人们以及他们的财产运走，推土机则把他们的家夷为平地。那些既不是真正的黑人，又不是白人的商店老板也被赶出了他们的店铺，尽管他们几代人一直都是这些地处白人的城市的店铺的主人。这些人中有些人像他一样，他们感到自己的责任超出了家的范围，他们真想找到一个以社会为己任的人。他曾经穿越草原示威游行，他被看中了。尽管在他居住的那个地区还没有哪家人失去家园，但他这种人显然会意识到，千家万户像他这样的人事实上属于一个大家庭，而且假如其中某些小家这个月或今年受到了白人的城市的威胁，那么下一个受威胁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家园了。有些人来找他在本地创建黑人运动委员会，他被选进了当地的执行委员会。他钻研了放在铁皮箱中的由市政当局发布的公告文件，还有前几辈人保存下来的地契；他站在一家教堂的大厅内吱嘎作响的木地板上做了他的第一次演讲。

他曾使孩子们放下手中的石头。但是言辞，也是石头。现在，他已拿起了投石器——又一个大卫① 挺身而出了——虎视他的又是歌利亚的眼睛。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演说表明他是整个黑人运动中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因此每逢周末他都被邀请去省内各地发表演说。他的名字在各个村落的广告上随处可见，当地的白人不是把它们涂掉，就是把它们撕掉。在演说者们的名单中，“索尼”这个加引号的称谓被印在他的真正名字与姓氏之间，这一孩子气的名字自然带来了某种政治上的便利，缩短了他和他的听众之间的距离，突出了他的平易可亲。与真正的黑人举行联合大会时，他自己的黑肤色与他那些黑色较浅的大多数同胞的肤色形成对比，无疑既减少了他与皮肤完全黝黑的人们的外表区别，又使他和那些有点白人血统的混血者们相距不太远。他那些在政治上更老练的同事们发现了这些特征的有用之处。不过他本人对这些特征的用处茫无所知，他只是感激自己多年来的苦读——他现在已开始把它看成一种富于个人特色的潜心修炼——多年的苦读终于能派上用场了，一旦他要表达某种思想，一个个恰到好处的词就会接踵而至，从他个人快乐的源头径直飞向他的舌头。别人赞扬他说得好极了时，他笑一笑并且不好意思地说，他是一个教师，一个每天在教室里发表演说的人。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校长来到教师家。艾拉为他开了门（校长一直认为她很美，但她的美太典型了，像从外国带回来的那种时装模特儿似的），他从她脸上立刻感觉到了那种洋娃娃似的美并对它有点诚惶诚恐，因为他以前从未来拜访过，所以他举止

① 据《圣经·旧约》，大卫是以色列国王，曾用投石器杀死比他高大得多的非利士人的勇士歌利亚。

显得有点滑稽可笑；我刚好路过……她把他引进屋，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她去后院叫丈夫。后院是个隐秘的地方，被他种植的葡萄树荫庇着，他正在那里和他的同伴们开会。他们一看见她的脸，就立即站了起来。

——不是警察。校长来了。——

那些同伴又坐了下来；其中一位做了个松了一口气的手势，为这一打岔原谅教师索尼，就像他本人宽厚地允许某个学生离开教室那样。

主管他们这类人的教育部已通知校长开除索尼这么个教师。

索尼微笑了一下，像令人恐惧却在意料之中的事情降临时一个人表现的那样——已有多少次他凌晨四点钟仍未入眠，但为了不打扰同床的人，只好静静地躺着。

——伙计，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我曾努力阻止这种事发生。——校长的下颚直往外突出并把他的双唇和小胡子推向鼻子；他手下的教员们对这种滑稽的鬼脸太熟悉了，无论何时他要说什么令人不快的事，他都会露出这么一副鬼脸，他脸上的肌肉会用一种可怕的怪相掩盖他的紧张，就像无力自卫的动物改变颜色或竖起刺毛。

——那没关系。

——索尼，我曾阻止他们这样……我告诉他们说，你是我最好的教员之一。我曾告诉他们你多么受孩子们爱戴。还说了你为学校做的一切。——

但校长又说错话了。正是索尼为学校做的一切使他在当局挂了号进而被开除。在尴尬中校长好不容易说出了最坏的结果。——你……你明白的……是够糟的。教育部不允许任何一个学校聘用你。——

艾拉用托盘端着茶走进了后院。

她没有抬头看其中任何一个男人，一声不吭地放下茶就走了，让他们继续沉默。

柏诺奈——忧伤之子。

我父亲没有大学文凭(和他那么倾慕的那个女人不同)，但他自幼具备一种积累偶然知识的天赋，这种天赋是所受正规教育有限但心智很高的人所独有的，他习惯于吸收点滴的知识，就像我用我母亲的马蹄形磁铁吸大头针一样。有一次他告诉我柏诺奈城的名称意为“忧伤之子”。我不知道他是从那儿得知的。他说“柏诺奈”是希伯来语。

我生在那个城市，是他的儿子。我现在觉得，自从我们离开它，忧伤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甚至在那之前。从他被迫中断教职那天起，他的职业与他的社会工作就不再是互相交融并使他成为一个整体的东西了。从那天起，我们就不完整了。

反对强制搬迁委员会的人为他在一家印度人开的批发商店找了一个工作。——现在他的社会活动就是反对白人的强制，他们带着他走遍各地，到我们住的黑人区以外的地方参加会议，在一个个平台上发表演说。他不再有职业；他的职业变成了会议、演讲、论战和赴当局请愿。他的工作——记帐或者他很快学会的别的什么类似的活儿——和教书不一样；为养活一家子他必须干这活儿，每天清晨乘火车进城，晚上很晚才回来。这种活儿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位置。他从不把它带回家来，它在我们家里不显露任何迹象，而在当教师的时候，他总是带回某种书香气氛。我当时才十一岁，他每天早出晚归；我从未见

过铁道那一头的那家批发商店。我曾问过货仓里装的是什么，他说是男人和男孩的衣物。想象一下，他呆在那么一个货仓里，周围是一窖又一窖的鞋——有鞋无脚，空空荡荡，还有叠着一堆堆或挂着一行行灰色和褐色的毡帽——帽下既无头又无脸，了无生气；从前他可是有活泼可爱的儿女绕膝的呀。每逢上没有会议的夜晚，他常常给贝比和我念书。贝比不愿听，往往带着她的小收音机躲进厨房。在我还不到五岁的时候他就教我识字读书了，但我还是最喜欢由他念给我听。有时候我要他为我念他自己才看到一半的书，尽管我并不完全理解。我学到了很多新单词——假如我叫他停下来，他会打住并向我解释我不懂的字句。在成年人们问他们常向孩子们提出的那一愚蠢问题时，假如贝比想给来客留下深刻印象，她会回答说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假如她想莽撞无礼，她会说想成为一个“大美人”，而我则什么也不说。但是他——我的父亲——会说，“我的儿子想当一名作家。”我只亲自回答过一次，结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曾被带去观看圣诞节马戏表演，我说我长大以后想成为一名小丑。贝比乐得大叫起来——欢乐的小公主，所有的人都赠雅号给她——“因为你的双脚已经够大的啦！”我母亲不愿看到我的感情受到伤害，试图把嘲笑变成理性的反对。但小丑是悲哀的，威尔，她说。

小丑们在自己脸上画上另外的脸，画上向下翻的大嘴巴，每只眼睛的正上方和正下方还画有一些小点，它们使人想起流出的眼泪。不知那第一个晚上他坐在我对面时在我身上看到一副什么面孔。从那时起他就迫使我戴上了面具，以便向我们——我母亲、姐姐及我自己——掩盖他的真相，掩盖他的所作所为——我所了解的内情。

假如我们始终没有离开小城外我们生活的黑人区，那么这

一切或许永远不会发生。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去那个电影院。她——他的金发情妇，也就永远不会找到他和我们。我一直在想，假如我没有在考试前的一个下午在那家电影院和我父亲遭遇的话，有很多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些事情一直困扰着我，因为由于我在电影院碰到了他，由于我看到的不是我不惜逃学去看的那部电影，而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真相，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下去了。

尽管他已在城里工作，我们却仍然在那座建在礁岩上的小屋里住了一段时间。我父母靠分期付款偿还买房的市政贷款，月月如此；我母亲在托儿所做管理工作，最后她因此获得了市议会发放的市政津贴。因此我们仍然保持原貌。除了他，家中的一切都没有变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在后院里扎的秋千没有改变，他在我的帮助下为那条他带我去选购的名叫米基的狗修建的狗窝一点未变。在他周末离家外出去开会的时候，我母亲便和我们姐弟俩一起做过去我们全家人一起做的事情。离开老家之前我们的最后一次野炊是在冬天进行的。最后一次，在冬末。那时草原上的枯草已被烧过，好让新草长出，太阳消融了夜晚的寒霜，灰烬味和着凉凉的水汽从地上蒸发出来。地上残存的草梗又黑又尖，它们冒着像烟一样的水汽，还弄脏我们的袜子，因此我母亲在小地毯下面垫了一块塑料布。我们带了很多我们爱吃的东西，其中有柑橘，贝比把它那鲜艳的橙色外皮在黑黑的地上摆成花的图案。他当时是否说过“我女儿将成为一名艺术家”呢？因为他也在场。那最后一次野炊，我们坐在矿碴之间的老地方，他和我们在一起。他和我一起在草地上漫游，每碰到一个土丘或小洞，我都要用棍子去拨弄几下，以便找到一些我自己也拿不准的宝物；他告诉我什么东西是宝贵的，为我找到了一些；他总是能找到。我们找到一堆被火烧死

的小鸟的骨头，他说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回家并用细线把它们复原。他还替我找到一种昆虫蜕下的外壳，像我的中指一般粗细，我把它举起来，能够透过其中的小管道看见天空。冰蓝的天空，黄色的矿碴堆，黑色的草原，它们像旗帜的原色。我们的被烧掉的野炊。我们在那里，她本来是永远找不到的。

但是她去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的时候她已经找到他了。在履行仁慈与正义之职的时候她已经去监狱探望过他了。

在离开礁岩镇之前，前小学教师已和他的妻子讨论过搬迁的事，他们历来都是凡事彼此商量的。他们商量了好几个月(彼此很亲密的人常常这样)，谈面临的任务，或是娱乐和休息，与此同时照常和睦度日，这就是他们共同生活的氛围。他换水壶的零件的时候，她则在切菜做价廉味美的佳肴；贝比和威尔睡觉之后，她在浴室的时候，他会走进浴室，继续他未说完的话题；他和妻子都上床之后，彼此即使已转过身子并互道了晚安，慢慢地夫妻俩又会接着谈起来。

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最大的决定。婚姻不是吗？爱已使他们如此温柔地结为夫妻。如今要决定的是离开他们开始相爱的地方，离开他们生下孩子的地方，离开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们，都知道她是索尼的妻子，贝比和威尔是索尼的孩子的地方。艾拉的沉默诉说了这一切。

——但这座房子是什么呢？不过是一间你当牛做马想使它变得体面些的茅舍而已。让贝比和她弟弟合住一间小房的局面还能维持多久呢？——她现在已是个大姑娘了。向市政当局交利息，再交二十五年、三十年，遥无止境，结果我们却不能为孩子每人提供一个小房间。我们无权投票选举议员，他们却拿走我们的钱，而且，作为回报，让我们住在这么个“黑人集中

营”。他从未对她用过这一术语，用它形容他们的家，伴随所用词汇的改变，他已从以前的索尼变成了政治角色“索尼”——此名作为绰号被置于名与姓之间。她知道他正在把她导向一种不同的生活，双方都确信她能逐步跟上他，双方都有耐心。在他们夫妻的谈话中，她以提问为主。——但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对吗？我们准备住哪里呢？——作为反强制搬迁委员会的成员，他比一般人都更明白，对他们这类人来说住房历来是短缺的，几十年、几代人以来都是如此。“解决住房”意味着找到一间用幔幕隔开的房间、一间停车房、一间单坡锡皮顶小屋。其次是她的工作问题。在约翰内斯堡她上哪儿找工作呢？适合她的工作。——我想我可以做些别的事……应聘进工厂。——他知道，艾拉指的是他与那家服装工厂的关系；这使他警觉起来。真不堪设想，通过他艾拉将坐在一台机器旁俯身忙碌。和女工们在街上挤来撞去。他得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他不愿表露自己的警觉。突然，他十分精确地看到了她那会儿正在做的事情，就在他面前：她正在把绿色的菜豆斜斜地切成等长的小片，把黄色和红色的辣椒切成同等厚度的薄片，它们像马赛克一样美丽而脆弱。艾拉的双手并没有因做家务而变得粗糙干燥；每晚和他一起睡觉时她的手上都要涂上护肤油并戴上棉手套。这一暂时的分心其实算不上分心，它像是一个焦点，使他一下子洞悉了艾拉的生活的有机秩序和美学原则，而他正在从根本上损害的正是她的生活。

她正坐在浴室里用肥皂洗脖子，她的头发盘了起来，用一条和浴巾一起挂在钩子上的用旧的紫色头巾扎着。他走进浴室的时候已深深吸了一口气做好了说话的准备。——他们给你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津贴，以便你能为他们管理托儿所，你凭什么要对此“感激”不尽呢？——

——不是为他们，是为孩子们。——

——噢，不，不，是为他们。那样，他们就可以坐在市政厅里，自夸他们“改善”了我们的孩子在其中长大的黑人集中营的生活状态。我们被限制在这么个地方，被指定在这里生活并老死。这是个动物园。麻风区。精神病院。接受他们的施舍不是件光彩的事，艾拉。让他们自己留着受用吧。——

她提的问题永远不是异议；它们是表示认可的实际结果。她并不反对搬迁。她注意的是怎样使孩子们乐于搬迁。孩子们已做好准备无情地离开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学校、家中的四壁和他们在其中玩耍的小院。贝比正值十几岁的年纪，可向往她想象中的城市生活哩；威尔还只想到把狗也带进城去。去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没有谁问它到底在哪里。有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在操心就够了。

他知道他们将去哪里居住了，乘火车从批发店回家的路上，火车在铁轨上的快速滑动每每使他异常兴奋，但是每天晚上他穿过熟悉的街道走回旧家，踩着扔在卖鱼肉和油炸土豆片的商店外的油腻腻的纸片，经过有黑亮亮的大型灵车随时准备供穷苦人作最后一次堂皇旅行的殡仪场，经过他曾任职的那所窗户破烂的学校并看到信手写在墙上的呼唤至今仍未降临的自由的口号时——当他要离开这一切的时候，他意识到，对他全家人来说，一个栖身之所正在被抛弃。丑陋、掉架的栖身之所——但毕竟是栖身之所。就他本人而言，使命的力量足以武装他，但对他的家人——对艾拉可是另一码事。因此在告诉她之前他先抑制了自己的异常兴奋。而且不能当着孩子们的面说。

——我们将搬去白人区住。这是已做出决定的策略，我便是自愿先行者中的一员。假如你同意的话。——

她宽厚地微笑了一下，表示不相信。委员会已争论过多种抵抗策略，但什么结果也没有。——说的什么呀！告诉我。怎么回事？——

——这已付诸行动。当然，是搬到城南郊区的白人区去，不是富有的白人居住的地方。荷兰裔白人中的一些工人想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住，他们索价很高。

——我们无钱买任何东西！在约翰内斯堡！我们从哪儿去弄到所需的钱？——

——所需的钱已为我们筹措好了。我们将支付租金，像在这里一样。——

——但那是非法的，你怎么能在白人区拥有住房呢？——

——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不接受他们的种族隔离，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告诉他们，我们正在这样做。——

——我们？——短暂的停顿。——说到点子上了。——

她对委员会指导她家的生活的设想提出挑战是最近才有的事。

——那的确是一座好房子。三间卧室、一间客厅、还有一间房可以放你的缝纫机和我的书——想象一下！我能有一张桌子了。我们将重新装修厨房，我还要为你建一个早餐角。还有一个大庭院，一棵大杏树。威尔可以在树上修座小屋了。——

听到房子的每一特点，艾拉都轻微地点点头，好像在列一个清单似的。他说话时她用水灵灵的黑眼睛感激地看着她，但她接着把眼光转开了。艾拉理解每一件事，甚至包括他不想立刻全说出来的那些；他什么也没法向她隐瞒，她的沉静能从他未成形的想法、犹豫、掩饰内心活动的脸部表情推断出言外之意。由于她本人很少说话，因此她不必依赖别人说话为她提供信息。看起来在他穿过无聊的街道从车站回家，一路上大声地

把他们的破落的处境称作某种意义的栖身之所的时候，她好像一直与他在一起。艾拉说：——荷兰裔邻居。——

——噢，孩子们之间很快会混熟的。所有的脏膝盖颜色都一样，可不是嘛。他会和白孩子交上朋友的。那些白人父母会回避我们……假如我们幸运的话，那是他们将做的一切，不过我们也不需要他们。

——不。——

她的话，哪怕只一个词也有分量。她带着某种确信说出了这个积郁着强烈情感的单音节词，夫妻彼此的习惯已使他们不像新婚时那么感情外露了，但他还是动情地走近了她。她转过身子去做某件家务。她笨拙地把一只手在他的后颈上放了一会儿——她只有在黑暗中，在床上的时候才抚摸他。她往果浆罐中倒入了开水，一股草药香味从罐中蒸发出来。——为谁弄的？——

——威尔感冒了。——

——我给他端去。他躺在床上吗？——

他走开了，为的是对儿子说他们将一起修建的树上之屋。在他们的新家，高高在上，把黑人区抛在身后。

我不明白怎么贝比不知道。我父亲常常整天不归，有时候一离家就是好几天，当然，这事儿没有任何意义。在他入狱之前很久，他就已不得不习惯于经常把我们抛在家里了。我们也不得不习惯这一状况。他不再是一个小学教师了，那时他可是每晚都呆在家里的。从搬进约翰内斯堡的第一年的年底起，他就不再在那家批发店工作了，因为委员会需要他作专职组织者。然后委员会又和刚获准成立的黑人工会结成了同盟，对其他的团体我一无所知。别的各种各样的人，积极反对政府的各

种组织。希望各黑人组织团结一致的人中总少不了他，他总是不断地谈论这一点。他在家的时候，有时整个星期天家中都有会议，来的都是黑人，我们这类人——幸好这座房子是按白人的标准修的，有足够的空间供他们闭门密谋。

他一出监狱这类活动就又开始了——我父亲可不是那种因从事政治活动被捕就被吓倒了的人。或者说，他过去不是那种人；现在我不知道他变成了什么人。他走出门，离家而去，回来的时候，他走进门，做过去习惯做的事（从冰箱里为自己倒一杯冰水，把钥匙挂到我们刚搬来住时他装好的钩子上，问我们当天过得怎么样），这种时候他其实是在演戏。表演他过去的那个角色。难道我姐姐觉察不出来吗？那不是某种看得见的东西——关键在于，他的一举一动看起来和过去一样，听起来也是一样。但是感觉变了。他不变的衣服下的身体变了。不管他抚摸什么，他的手都是刚从她身上离开。他身上有种异味。难道我姐姐闻不出来吗？不是香水之类的气味，不是那么回事。我想他一定感到很羞愧，他已变狡猾了，不会用香水的。他自己的气味——他的皮肤的气味变了——从我还很小而他常常拥抱我的时候起我就记住了它，前不久我和他一起洗澡的时候它还保持着原样。但现在那种气味没了。原有的气味消失了。我现在在黑暗中认不出他来了。

为什么不得不了解这一切的偏偏是我呢？这算不算得上一种特殊照顾呢？（他怎么想的！）贝比比我年纪大，她凭什么能够整天乐呵呵地和男朋友们东奔西跑，能够把手指甲涂成银色，能够穿着T恤衫欢快地去商校读书，而且每天还偷偷地抽烟！

我想把一切告诉她，那她就会明白了解真相的滋味了。为什么她不该知道呢？我曾尝试过。我告诉过她，说他自从出了

监狱以后就变样了——我的意思是，你认为爸爸一切正常吗？她笑了笑，对我很不耐烦。她总是那么急匆匆的。——一切正常！出了监狱谁不感到高兴呢？难道你希望他也像你一样整天郁闷不乐吗？

当然，她与他的身体没什么接触了，再没有了，她现在抚摸的是男孩们。我母亲也同样不知道他的改变。我是唯一知道的人。

像径直走去冰箱倒一杯冰水一样，他过去常做的另一件事是叫艾拉几声。假如他一进门不见艾拉的话，他过去常常会叫道：艾拉，你在哪儿？但现在他不叫了。假如艾拉在另一间房里忙事，他一声不吭地回到家里，约半个小时之后艾拉才知道他回来了。艾拉纯真地以为这就是我们为自己、为黑人事业和为自由争得的好处之一：这座房子里有个人的清静与隐私，与在黑人区的老家大不一样，在那里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大家在一起的。这是他应得的空间。我们必须为此而感激他。他为诸如此类的原则蹲过监狱。在他们来把他带走的时候，她站在旁边茫然地张望四周，好像有一把屠刀劈掉她的一部分而她却茫无所知似的，她叫我去肉铺的时候我曾见过屠刀把一头羊劈开的情景。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但我的手不是她失去的东西。我想，由于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总是一起干的，因此她无法相信他就那么平静地(他的确是这样)离她而去，要独自去经受他们年轻时谁都没有想象过的厄运了。(结婚的时候她才十八岁，几乎和我姐姐现在一样大。)他曾一次又一次地离家去开会，但这并没有使她做好迎接这厄运的心理准备，每次开完会回来他总要叫几声"艾拉"。他从监狱出来之后就不同了，狱中生活是他独有的，她无法与他共有，他对我们姐弟俩的教导也与前不同了。他出狱后我们搬到了约翰内斯堡，他教导贝比和我对住

在同一条街上的白人要以礼相待但不要害怕他们，因为害怕意味着承认我们无权和他们住在一起。与其说我母亲好像并不企图缩小由他独力熬过来的那段经历造成的差距（探监时你只能获准会见所探望的人几分钟，贝比和我有时与她一起去，他被从牢房里带了出来，我们从未见过那牢房，他隔着玻璃和我们说话），毋宁说为正义事业坐牢已把他变成一个特殊人物，平常人是不能去探问他的个人思想的。她自己就是平常人。我们也是。她有一次告诉贝比和我说，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祖父从麦加朝圣回来时戴着一顶白色的穆斯林头巾，那模样太不同寻常了，使得她一见到他就跑开并躲了起来。

我想知道的是监狱是否给了我父亲去做他正在做的一切的自由，是否只要她不知道那就是对。那就是在电影院遭遇后的那天晚上他迫使我隔着桌子看着他时迫使我认可的东西。不过，另一方面这也有两重好处。我无论何时想逃学都可以；他不能问我要去哪里，从哪里回来。因为我知道他要去哪里，从哪里回来。他不能命令我在假期预习完下个学期的功课。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我在他的鼻子底下读《运动日》杂志，而不是他能整段整段地引用的《李尔王》[1]。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齿更能伤人。我并不想和他成为共享隐私的知己。我不想向他要求任何东西……假如要求的话他是无法拒绝的。我敢打赌我现在又可以重提买摩托车的事了，或许我还真的能得到哩！

拒绝要求任何东西是容易的。但他知道我不会泄露内情——向我母亲；我无法拒绝成为他的知己。

我不再是一个孩子了。假如人们从监狱出来，被弄成了剪

①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

掉了棱角，陷入了迷茫；仍然有爱存在。有爱吗？爱能弥补任何损失，人们都这么说，从你还是孩子的时候起他们就这么说。大人们这么说。在教堂、在学校这么说；在色情杂志里这么说。怎样去爱，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爱。她从浴室里走出来，用微笑向我道晚安——除了在生日，在其他场合她不吻我了，因为我年纪不小了——然后她走进他们的卧室，她的头发编成了黑亮的辫子垂在睡衣后面。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但他刚从另一个女人那儿离开，他还会和她做爱吗？我以前从未往那方面想过他们——他和我母亲。我现在不愿去想它了。我不愿设想他会把她当成一个肥硕、柔软、白里透红的金发女人应付，就像我用从色情杂志撕下的金发女郎裸照充数，在梦中对她们为所欲为一样。

索尼没有做好准备迎接那位替一个人权组织做监督工作的人获准对他进行的访问。朋友们甚至亲戚们申请来探监都没有获得批准；政治同仁们则不敢露面，生怕他们也被关起来。有三个月时间他没有同狱外的任何人见面。后来他只见到了艾拉，有那么一两次孩子们也获准和她一起来了。这完全不出乎他的意料。早在他带领学生穿过草原回到礁岩镇老家的有色人居住区(黑人区，他那时一直这样称呼这些地区)的日子里，他就已经知道他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假如他当时并不知道的话，他也应该知道；在本能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活动的同时，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明白了这样一点：他和艾拉过去隐约地感到包含在有用的生活之中的人生意义的奥秘根本就不是奥秘。对他们来说，对他们这类和别人一样黑的人来说，人生只有一种意义：政治斗争。(与他的莎士比亚的丰富语汇相比，那些表示政治概念的拙劣的缩略词实在令他难以忍受，但他不得不使用它们，像其他的每个人一样。)

家务事。按监狱的规矩，探监时只许谈论家务事。好在这正是艾拉和他一直谈论的话题。他问她威尔的算术是否跟得上，贝比帮着做家务还是整天泡在晚会上。艾拉使他确信一切正常。仅仅她的神色就足以向他表明这一点了；在家里，的确一切如故；她的黑色头发平整地盘着，一条项链映衬着她那身由她自己缝制的优雅的花呢外套，为她增色不少。她美丽的双唇小心地绷着。和从前一样。他俩就家务谈得越多，这种一样

的感觉就离他越遥远。此前他多么渴望回家。在家里亲密地呆在一起的时候，艾拉和他之间的那种沉默是那么自然而惬意，而此刻他们之间的沉默却是一种真正的沉默，不传递任何信息。他曾学过多种斗争策略，因此他有可能用拐弯抹角的隐语和亲密的人交谈并从他们那儿获得信息，但艾拉好像跟不上他。她很平静，但他看见她把双手紧紧地夹在两侧，好像要避开站在他两旁的看守似的。说什么隐语呢？他们之间有多种昵称，有对难以言传之事的柔情而调皮的委婉语，有暗示他们自己的生活轶事或是他们的某个孩子的古怪行为的关键词汇。但谁能期望艾拉把私房爱语用作监狱暗号呢？

那个来自人权组织的人和他没有家务琐事可谈。他不知道她是怎样获准来探监的，但是显然她获得了许可并且已见过他的几个同志。她巧妙地用抽象的词汇传达了这一信息，那两个正在无精打采地眨眼睛甚至打哈欠的看守听不出个名堂，过了一会儿显然就不再理会他们的谈话了。他不知道她获准能谈些什么，或许只能问他是否能得到合口的食物、锻炼时间或医疗护理。她明里是和他谈论食物，暗里却告诉他，他的一些关在另一个牢房的战友们正在进行绝食斗争，与此同时，她带着貌似随意地对他谈起天气——告诉哪几个城市有大量降雨——其实她是在拐弯抹角地告诉他在那些城市他的很多别的同志被捕了。然后她开始说比勒托利亚① 如何闷热，与降雨形成对比，这时她很快发现他迷惑不解，正在吃力地琢磨她的言外之意，于是她暂停下来并注视着他，一种极富活力的沉默为他注入一点灵犀，使他很快领会到她的意思是，她已去过最高法庭，与他同时被捕的其他人正在那里受审。——人拥挤的地方自然会

① 比勒托利亚是南非(阿扎尼亚)的首府。

闷热。——她长着一双细眯的蓝眼睛，也就是不很深邃或表情不太丰富的那种，像实实在在地缀在毛茸茸的玩具娃娃头上的有机玻璃眼睛似的，但它们表面的颜色还是足以引人注意的。他渴望地领会到她给他的暗示：他的案子可在不久的时间内受到审理。

一个陌生人没有私房爱语可谈，但她却不自觉地成了为他找到与家联系，与家的可能性联系的那个人。她问及他在狱中如何打发时光，他本来是可以随便回答的，可偏偏这时一个看守醒了，干涉说不许谈监狱里的事。

——我想你大概是成天聆听石头的教诲吧。——她好不容易把别人告诉她的一些信息传递给了他，弄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然后她羞涩地对着监狱的墙壁猛地扭了一下头。

他微笑着接受了此举，另一种信息，几乎可以肯定她没有注意到，他为能意识到这一点而欢欣。——多谢您来看望我。——

那个年轻妇女不很优雅，或者说穿得不好——不是他所喜欢的那种女性打扮，他喜欢她妻子那种即便是在黑人区也能显示地位和教养的装束。但是打扮不好有什么关系呢？对很多事情索尼都不得不另眼相看了，因为他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他那可笑的名字"索尼"的含义也改变了——这名字最初是他多情的父母给他的，然后它成了一个绰号，在黑人集会时向他们保证他是他们的一员，再往后则作为他的全名的附属物被列在监狱档案里："又叫'索尼'"。一个有别名的普通罪犯。

汉娜。她一开头就是这样自我介绍的，监狱会客室可不是拘泥礼节的地方。只是到了后来他在狱外和她重逢时，他才看清她第一次去监狱探望他时的整个模样。当时他只看见她的头

和双肩，他把她当时的形象铭记在心，不管到哪里都是如此，就像把一张照片夹在随身的身份证里放在胸口的衣袋中似的。当时是六月，外面一定很冷——不过无论如何，监狱总是给人以冷的感觉的。监狱会客室扫得干干净净的，光秃秃的，唯有毛茸茸的浮动的灯丝在锥形灯里闪亮，透出些许活力。当时她站在镶于木制隔板上面的玻璃后面，只露出胸部以上的身体，从她上身可以看出她穿着好几件衣服，外面是衣袖宽松的毛线衣，往里是一件帆布做的马甲什么的，再往里是几件领口颜色互不谐调的T恤衫。她松开了带条纹的围巾，热情地袒露出她那宽大而无光泽的白脖子（这为以后他不隔着玻璃时看到的形象抹上了独特的一笔）。她的双唇因干冷而有点皲裂，比她那稍带粉红的脸更加苍白，在她用隐语瞒骗看守的时候她的脸色时有变化，露出某种不调和的容光。一张大大的脸，脸庞的骨架不甚明显。两个冻得发红的耳垂在草草修剪过的鬈发间时隐时现。金发碧眼。当然，皮肤白里透出粉红。不折不扣的金发碧眼。但她并不是有意表现出这一点（而别的很多白种女人都一味想表露这一特色）；她的心思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他没法回想出她跟在一个看守后面离开时的整个形象。她那有少许斑点的小腿连同脚踝强健有力，他看到的只是它们把她带到他面前时的模样，而不是它们静止的形象，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她来探监时出现，在运动着，总是现在，不是过去。

他受审时她也来了。这是她的职责。她经常在法庭露面，当他和其他同时受审的人排着队走出法庭下面的牢房并且微笑着扭过头寻找旁听席上的亲戚和朋友时，她举起一只手向他表示亲切的问候。艾拉只能偶尔来一下，她在城南一个印度裔大夫的诊所里当接待员，而在大夫不营业的星期天，法庭又不开庭。那位大夫在准假方面对艾拉挺慷慨的，但艾拉对自己的工

作是尽职尽责的，这也是她和索尼的共同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她对他的忠诚和支持的一个部分，尽管他身在监狱，但他不愿让政府摧毁他们的生活原则。能来法庭的时候她都为他带来用干洗机洗好的茄克和裤子——他不再是一个被拘留者，而是一个未获保释的法庭被告，因此他可以按章获得这类人道主义的优待，再说这也是一种策略，使他能在法官面前表现出高昂的士气，能在一日复一日地与看起来像商人的革命嫌疑犯对质时更显得精神。艾拉认识监督判案的汉娜·普劳曼——就是那个友好地去家中拜访过一次的年轻妇女，当时索尼还在监中候审，她采访是想向他提供她所属组织的帮助——但在旁听席上她们并不坐在一起，那个年轻妇女和她的同事们在一起，他们有的来自教会，有的是外国使馆的代表，她和他们在悄声耳语，对辩护进展进行分析并交换看法。艾拉和其他被告的妻子、母亲和父亲们坐在一起，其中有戴着卷叶饰帽子的胖滚滚的老农妇，她们把变形的双脚搁在踩偏的鞋子上，有怀孕的年轻妇女，她们那饰有小珠子的娇发下的侧面像带着挑战的神色，还有穿着羊毛衣的老头，他们佩戴着基督教会的徽章。索尼没有一眼看出她来，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罩衫，戴着一串用小珍珠做成的项练，项练穿过罩衫的蝴蝶结。她把用干洗店赠送的塑料薄膜套裹着的带给他的衣物平整地放在她的膝盖上，以免把它们弄皱。

在法庭临时休庭，法官去吃茶点的时候，旁听的人们和被告的亲友们热烈而友善地交谈起来。被告们隔着被告席的栅栏与他们的妻子互相拥抱，但艾拉和索尼是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对口亲吻的，[3]他们的亲昵总是那么隐秘，从不外露。她伏在被告席的栅栏上，他用双手握住她的双手；接着她把手从他手中抽出来，她的双眼是那么黑，那么亮又那么严肃，然后她把

干洗好的衣服交给他，告诉他哪些斑点是无法洗掉的，好像这就是他们夫妇间最重要的交流似的。他们也谈了几分钟的家务事，其实在法庭，除了政治方面的事只可耳语外，其他别无限制。他们的谈话时不时地被打断，因为他不时地把手伸到她背后与别的被告的亲友们握手，或者是不得不转过身——同时抓住她的手腕或上臂，透过衣服与她那隐藏的自我保持宝贵的联系——和听证的人谈论他们在寻找国外有影响的人物对辩护的支持时应该阐明的一些重要观点。索尼不得不这样支配短暂的休庭时间，因为他已成为其他被告的代言人，作为一个当过教师的好学的人，他比别人更善于言辩。

学校放假期间审判一直在继续，威尔出席了听证会，还有贝比。威尔长得很高了，两道眉毛已开始互相连接成弓形，像索尼自己的一样。威尔拥抱并亲吻了他，笑了，不愿和他分开。但是贝比哭了，一阵不同寻常的痛苦直涌上他心头。休庭小憩的人们在法庭内吱吱呱呱地谈着话，法庭的每一个出口都有警察把守，那些警察站在那里，像佯装得懒洋洋的狗一样，随时准备向胆敢动一动的人扑将上去。自己的所作所为真叫他感到苦涩难堪——他已使自己沦为被告，每天的听证会结束之后他将被关进牢房——他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真想翻过被告席的栅栏，抱起他的可怜的小女儿冲出法庭。艾拉正上着班，孩子们是由律师中的一个带来法庭的。那个监督审判的年青妇女，也就是到过索尼家中的那位，出现在贝比身边，在安慰她；索尼的冲动一下子消失殆尽了，没有谁注意到他片刻的软弱，这比他女儿的那种自然的感伤更加丢人，因为她毕竟不过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

第一次见到她——那个监督审判的年青妇女时，他对她的形象的了解是零星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样

地，他也是后来才琢磨出她跑来安慰他女儿的那一瞬间的意义的，这种意义对他的影响日益增强，成为某种信号。正是从那时起他和她之间的故事就开始了，不可避免了。需要汉娜。他不会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称为“爱”和“堕入情网”，除非为说话方便，而是用政治行话表明，他之所以牺牲教职，不搞个人奋斗，宁愿蹲牢坐监，都是为了他的同胞。出于对囚犯及其家属的职业性关心，她自然而然地穿过第一法庭的旁听席，走上前去抚慰他的女儿，不想这一举动像门一样砰地一声关上，把他和她关到了一起。

这就是他们开始时的创世神话，不过当时他们不是这样看它的，只感觉到它的美。他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因促进抵制政府运动并参加非法集会而受到审判。检查官放映了警察录制的有他在讲台上演说的录像带。辩护律师就他是否参加了其他的集会进行了辩护，干巴巴地提请法庭注意被告“脸上显而易见”的事实——他长着又浓又粗的眉毛，结果使得除法官以外的每一个人都笑了起来。这类显然的轻松时刻以及休庭小憩时如同机场重逢似的欢快气氛为整个诉讼抹上了些许人性的色彩，但诉讼的目的是把这些已被拘留几个月的男人们当作罪人送回监狱，把所有对政府的异议锁进牢房。索尼像他的同志们一样在聚精会神地写条子以供律师为他辩护时使用。由于要准确地回忆出到过哪里，见过谁，三年内在一些场合说过些什么——政府就是凭这些立案的，因此所有最近的印象，不管是多么令人难忘、不同寻常，都要抛弃掉。

索尼被判处五年徒刑。经过上诉，另一名法官把刑期减为两年。

——两年还是可忍受的。——在他被转送往最保险的监狱之前艾拉䒤准去探监的时候，他首先对她说的就是这一句话。

——不知不觉两年就会过去的。——得找点事儿干干，以便更快地度过时日。——贝比得为升入大学好好攻读——我希望她能在升学考试之前受些额外训练。我自己肯定也能获准学点什么东西的。——他就很多具体事务嘱咐艾拉——但并不想显得像是在立遗嘱似的，他不过只是离开她两年而已，而不是终生永别。她把这些嘱托视为在他出狱之前维持他们共同建立起来的生活的支柱。他们充分利用了这次探监的时间，迅速而坚定地就种种计划交换了意见。——不是五年，记住，只有两年。——他们连续不断地相视微笑着。在艾拉必须离开的时刻，他抛开了老一套——如表示相信她能够安排好一切，告诫她多多保重——他本来是可以把这次离别当成他们的生活中注定有的时刻而聊以自慰的。其实他们之间的这次离别有更深远的意义。他说，要写信给我，艾拉，你必须写信给我。她没有说话。她用双臂抱着丈夫，在他嘴唇上吻了起来，就当着看守们的面。他明白，这不是使他蒙羞，而是给他力量，她假装没有看见他眼中涌出的泪水。她走出监狱会客室时，他看见她举起一只手整了整一缕散乱的头发。

欣然迎接战斗。

艾拉每个月都写信来，谈的都是家务事。每封信五百字。这些是监狱规定的限制。每封信都是这样的结尾："我们都无限爱你。"一个像是在监狱的最后一天的日子，一封信封完全不同的信被交到索尼手里，信封上的地址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这是她——汉娜·普劳曼的信。从信中他第一次看到了她的手迹，听到了她在远处说话的声音。这封信不过是一个字条，说每个人都轻松了许多（他认为这指的是减刑的事；作为了解内情者，她很清楚他没有被判五年以上已是万幸了）。不管我们（指

她的组织）能做什么帮他扫清发现自我的路或是照顾他的家人，他只需告诉他的律师就够了。她这封一页纸的信的最后一行抛开了表示集体概念的词“我们”。这封信是这样结尾的：“我知道出狱后你会欣然迎接战斗。”

他意识到“欣然迎接战斗”这一妙语一定是摘引别人的，他被感动了，真想知道引自何处，引自何人。对他来说，这几个字蕴含着超过其格言意义的某种预言，而这一预言本身恰好又阐明了他的整个生活——她，一个陌生人，怎么竟然能猜测出，正是在他，一个文静的小学教师，挺身而出并带领放声歌唱的学生穿过草原去迎对警察的时候，欢乐第一次降临到他身上！那种不寻常的先见之外的信息——它会以先见为基础扩展，能在他与写信人之间确立一种共同语言——显然是她假定他能理解的。不管这一妙语是谁说的或写的，它所代表的东西不仅对他身在监狱的现状，而且对包含这一现状的整个思想与行动的氛围都是特别适合的。这一妙语不是出自莎士比亚之口。对这一点至少他想他很有把握，尽管他一时无法从家中镶玻璃的书架上拿下非常熟悉的《莎士比亚全集》来证实自己的断言。他所受的教育确实有不少漏洞，不过他的父辈们却满以为他的学问已高深得无法形容了，因此把他的教师培训合格证装在镜框中挂在厨房里，以便能够随时看到它。

有那么几天，“欣然迎接战斗”这几个字帮助他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也就是在他完成深呼吸、原地跑步、学习和读书等自定的狱中训练后剩下的时间。囚犯们被迫像小鸡和孩子一般早早就寝。牢房里的灯早早地就被熄灭了，而他的成就还不够，还没有到达使他可能获准让灯亮至深夜供他学习的地步。欣然迎接战斗。他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心中不停地念叨那一豪言壮语，它多么简单，多么有分量，是那么大胆，又是那

么令人震撼，与此同时，威胁与欣喜、鲜花与血液、坐在阳光下的人们和被汽车炸弹支解的尸体，狂暴而辉煌地在他心中同时出现；从监牢的某个地方传来谐调好的歌声，还有某一次在人群中一条警犬扑向他的脸时的狂吠。

写信给他的是汉娜，她用屈指可数的几个字就可以表达一切，更不用说用五百字了。

他写信请她向监狱主管部门申请来监狱探望他，但她回信说她不想占用他的家人肯定需要的探监限额。

需要汉娜。

噢，艾拉，艾拉。

为什么艾拉从不说话呢？为什么她从不说他想要她说的话呢？

家庭事务。他一直未能和威尔一起修建那树上之屋，而现在威尔长大了，对此不感兴趣了。贝比已开始学女人的知识了，由她母亲教她。至少他已能够在贝比变成一个女人的过程中为她提供一间她自己的房间了。

噢艾拉，艾拉。

我不知道在多长时间内我们能够确信我母亲会蒙在鼓里。他和我。我们太聪明了，他已把我们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演出队，滑稽演出队。瞧他把我，他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多出色的小丑，让我踉踉跄跄跟在他后面模仿他的谎言。可怜的汤姆模仿他的李尔①（我本该把这句话告诉他的，这表明我的书没有

① “可怜的汤姆”是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李尔王》中的人物，本名爱德伽，葛罗斯特伯爵之子，因受异母弟弟爱德蒙陷害而亡命荒野，装扮成一个疯癫癫的乞丐，在风雨交加的荒野，被不孝的女儿推入绝望和疯狂境地的李尔王和他相遇，两人曾竟相癫狂地数落人世的险恶。看到疯乞丐汤姆赤身裸体，李尔王说：“……你也不向蚕身上借一根丝，也不向野兽

白读，他一度是喜欢我的类似表现的)。我认为他从未直接地撒过谎，至少我在场的时候是如此。离家去找他的情妇之前，他从不说他要到别的地方去；他没有必要撒谎，因为我母亲尊重这样的一个事实：一个从事地下政治活动的人(他一出狱就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地下工作)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的，否则就会牵连并危及他的家人。

这座作为白人的住家设计的屋子的墙壁和柏诺奈城外我们的旧家的墙壁不一样，那时候隔着单薄的墙壁我们能听见邻居们的争吵和做爱的呻吟。我不知道我不在场的时候——他们单独在卧室里的时候发生些什么事，不知道他是怎样行事的。他们的卧室摆一张带两个小床头柜的床，它们像手肘一样成直角立在床头两旁，上面各摆着一盏灯，她为它们各做了一个灯盏。她那边的床头柜上放着闹钟和柠檬护手霜瓶，他那边的则摆着一堆报纸、盛在贝比小时候替他做的烟灰缸里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最近在读的书。我只能靠想象，只能凭我对她的了解，凭我知道他已变成什么样的人来想象他们之间的事，想象他在解开他和那一个女人一道起床时系好的鞋带的时候想到对艾拉说些什么话。也许在结婚很长时间之后婚姻便成了你们驮着走的一个共同的避难所，从哪一点讲都是如此，一方这么想，另一方也明白，连驮着它前行时彼此都竞相对它说三道四。所有的卧室，所有的夜晚，都像那样。但他出入都是经由秘密通道；

身上借一张皮，也不向羊身上借一片毛……只有你保全着天赋的原形；人类在草昧的时代，不过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引朱生豪译文)说完，李尔王扯去了自己身上的衣服。在这一点上，李尔王是在模仿汤姆，但李尔王是真疯，汤姆是不得不装疯，因此本处有汤姆模仿李尔王之说。也是在荒野，当他的老父亲，被奸人挖掉双眼的葛罗斯特伯爵在绝望中欲自尽时，可怜的汤姆使父亲恢复了活下去的决心。

他有很多想说却不能说的话。他一定是不得不留心自己的每一句话。

而且不仅仅是留心言辞。有一次坐进汽车后座的时候，我在车内地板上发现了某种奇怪的东西。每一件东西，任何东西都激起我对危险的警惕。我母亲正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入座；我一直等到汽车开动，在他们决定是否有必要先加油然后再去银行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在他们毫不注意的情况下捡起那奇怪的东西。那是一个干枯的向日葵花。只是一个葵花籽已落尽的硬硬的圆花盘。真像一个圆圆的蜂窝。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到车里来的。不知道它为什么在车里。我只知道他无法就此向我母亲作出解释；自从电影院的事之后，他已没有必要向我解释任何东西了，他已经告诉我该看什么，该对什么视而不见。

在我看来我母亲仍然是从前的老样子。不过由于我了解他的隐情，为此那么替她担心，因此好像有某种空间环绕她并把我们——我和他——同她隔开似的，所以我屏住呼吸，生怕闯进那空间中去。我也不想在屋子里单独和她呆在一起。但是假如我躲着她，她就会知道出了问题，凭她那种单纯她会认为是出了点与我有关的事。假如我试图与她接近，以便掩盖他疏远她的真情——那就会使她去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我不想要她思考，我不想让我母亲对他有别的想法，只愿她一如既往地对他温柔、信任，事实上从在礁岩镇的那些日子到现在，她只是对他多了一份特殊的尊敬和对他的隐私的尊重，她用行动告诉我们这是他通过监狱之行赢来的。

只是从贝比切腕自杀未遂的时候起我才得知我母亲早已知道他的事了。当然，在开始并不知道（甚至连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不知是否在电影院的事之后），但她已知道很久了。她无疑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我父亲

获释几个星期之后，我母亲和其他两个和我父亲一起被捕的人的妻子决定为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举行一次新年晚会。在她和我父亲一起开列将邀请的客人的名单时，她提出请汉娜·普劳曼，他一声不吭就写下了她的名字，好像那仅仅是另一个客人的名字似的。以我母亲的为人，她决不会出于某种狡诈而请汉娜，以检验我父亲的反应，以考验那个女人是否有勇气来我们家。

竟然那样去设想我母亲的为人！但是在你撒谎的时候——用在餐桌边的举止撒谎，用脸部的每一表现撒谎，做习惯做的每一件事时撒谎，回家和去学校时撒谎，和朋友在电话中自然地开玩笑时撒谎——这时候，你再也想象不出任何东西不是欺人的。

整个世界在说谎，通奸并且说谎。

我参加了那次晚会。贝比和我都在，先是帮助准备食物和摆桌椅之类。贝比拿着作礼物的点心跟着他去邻居家致意并告诉他们那天晚上音乐会放到很晚；从我们搬来那天起，我母亲与白人邻居们建立了良好（或许遥远）的关系。他们不了解监狱的事，也不了解他的政治活动——只需看我母亲一眼，他们那种荷兰裔白人的恐惧——生怕我们的黑皮肤意味着肮脏习惯和爱吵嚷——就会变得毫无根据。肮脏习惯与吵嚷只有表现在他们白人身上时他们才能容忍。每个客人都喝了不少酒——不过我父亲喝得不多，我母亲更是滴酒未沾——而贝比则是全副武装，用她那狂野的舞蹈使来客们个个目瞪口呆。她跳得真好，不过是在向男人们炫耀。喝了一瓶啤酒后，我也跳了几次，但是每当有某个家伙说我长得和我父亲一样英俊，我就感到气不打一处来，我能看见他，他脸上抹着一层好客的油汗，闪着自豪的亮光。我记不清他是否和那个女人跳过舞。我根本想象不

出她在晚会上的模样了。她进屋的那个时刻我正拿着葡萄酒瓶走来走去为客人斟酒；那是自电影院遭遇之后我第一次再见到她，而且由于我对她那张脸想得太多了，因此当时几乎认不出她了——这张粉红色的脸刚洗过，一头金发挂在脑后像落水狗的皮毛似的，她一定是在来赴会之前刚洗过头。她对其他人的致意报以同志式的微笑，但没有对我笑。一时间我简直难以相信：她已经物化了，他的女人，我经常挂在心上的女人——他更是对她常记不忘，我知道——已消失了。我母亲正在房里那一边的客人群里向我示意谁需要葡萄酒。我母亲乌黑发亮的头发像王冠一样紧紧地盘在头上，发上插着一把漂亮的梳子，她整洁而美丽，参加晚会时的打扮尤其别具匠心；她是那么乐于招待客人。

贝比是在和一位朋友共度星期六之夜时切腕的。她甚至不在自己有一个专用房间的家里自尽。在未听过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你会把她的所作所为视为疯狂。她没有死。她把别人的浴室弄成了乱七八糟，她手腕的内侧缝了好几针，就在皮肤下面你可以看到曲直不一的大小血管。贝比的肤色不深，像我母亲，与我父亲和我不一样。杰苏德大夫，也就是我母亲为之工作的那位，为贝比缝好伤口并使她镇静了下来，然后贝比就躺到了床上。贝比躺下之后我母亲走进厨房并坐了下来，当时我正在厨房看报纸，因为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好；而他，我的父亲，早在那天早上就拿起了公文包并说那个周末他不得不离开家人。他看起来脚步很沉重，好像他是不得不强迫自己走似的；她一定满以为是某一严重的政治危机迫使他离家外出的。她坐在她的椅子边上并且看着我，好像自她出生以来她就认识我了，不是从我的生命在她体内萌生的那时候起才开始认识我的。她那样看着我，好像我既是她的儿子，又不是她的儿子。她说杰

苏德大夫刚刚和她说过，在他看来贝比显然吸过毒，她那种超常的活泼是深深的郁闷的结果。杰苏德大夫也参加了那次晚会。

她对我说：——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说“我们”一词时的稍带强调的语气突然表露出来，因为我母亲已知道我父亲的事。她也知道我了解内情——尽管不知是怎样了解的。她不完全信任他了——现在，她不能信赖他了，不能求助于他了，不管他是在哪里，哪怕只是在角落那边她没看见的地方，他都离她太遥远了。我理解她。我们的家已变成这样，我们能为我姐姐做些什么呢？我们俩同时想到大夫诊断出的贝比的“深深的郁闷”是与什么有关。

就是说贝比也知道内情，只是她对待她所知道的一切的方式不同。她带着忧郁的神色从一个街角荡到另一个街角（我母亲看不到，我看见了），说话轻佻而粗俗——她可是受过我母亲的柔言细语和我父亲的莎士比亚诗歌的熏陶的呀，即使遇到的是小事她也会情绪爆发一番，我母亲把这一点归咎于她的月经周期尚未确立，加之同时我父亲的被捕和受审使她情绪紧张不安；她过早地使自己远离了她和我共同的孩提时代——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她企图处理好所知内情的一片苦心。

当她对我说，难道你希望他整天抑郁不乐吗？——说这话时她是否在袒护我父亲呢？她当时是否以为我暂时不知内情，但以后可能明白呢？天啊！她是否一直在帮他与我母亲作对呢？我是否也在帮我母亲抵御他的伤害呢？女性和女性作对，男性和男性作对。因此我们如何能为她做什么，如何能在她的苦心白费时阻止她切腕自杀！

我母亲能为她做什么！

我，她的亲兄弟，能为她做什么！

他把我们的家弄成了这样！

可怜的汤姆冷着哩①。

① 可怜的汤姆是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李尔王》中的人物，"可怜的汤姆凉着哩"是装疯的乞丐汤姆(爱德伽)在风雨交加的荒野和李尔王相逢时一再重复的话。参见前注。

欢乐现在经常降临。在监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娱悦感官，甚至没有足够的灯光可供读书学习，而出狱后欢乐却大量涌来，欢乐来自各种小小的刺激。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他和她再一次相遇。那一聚会被称为汇报会；刚出狱的人在会上叙述狱中经历，说为了那些随时可能发现自己已陷入监狱的人的利益，为了那些竭力寻求最好的办法支持受审者（这样的人很多）的个人和组织的利益，他们是怎样抵抗审讯、恐吓和孤独的。她穿着长裙坐在那里，裙下的双膝宽宽地分开，膝上是一个公文包，她把它用作桌子在上面记笔记。其他人说话的时候，索尼说话的时候，她都在认真地作笔记。他停下来的时候，她会抬起双眼注视他，那对细眯的蓝眼睛，双眼皮一眨一眨地流露出隐约的微笑，上下的金色睫毛一闪一闪地互相呼应。

欢乐。

汉娜和索尼约会，不是一起喝咖啡，就是进一步讨论问题。带一张黑脸进咖啡厅已是可能的了。有一个白种女人做伴；替她摆好椅子并坐在她对面。从早些时候起黑人和白人一起进咖啡厅就已成为可能了，但索尼来自一个小镇，那里的种族隔离禁令即使被废除也速度慢得多，再说他在监狱里与世隔绝地过了两年，因此索尼仍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他并不真的在咖啡厅里，好像正在进行这种普通的约会的人不是他。然后他们喝起咖啡来，她一边抽烟，一边透过起伏的烟雾说他一点没有改变。两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你显得很健康。太好

了。我在那次聚会上想的就是这一点。——

她的称赞是照在他脸上的阳光。他微笑着把眼睛闭了一会儿。——艾拉已准备为我补充营养。不过如你所见——我在狱中体重增加了。但不是长胖了，对吗？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有规律地锻炼过！入狱前我从没有时间。——

——比起我在狱中见到你时你现在气色好多了。——

——是啊。……拘留真可怕，比判决更可怕。判决之后你能拿准什么时候出狱，即便是几年之后——你和我一样清楚。——

——没有你那么清楚。没有在狱中呆过的任何人那么清楚。我只能从其后果略知一二，假如我见到有关人员的话。——

我再也不想重过那种生活了。——这是一句心里话，他们俩都知道他有可能再度被捕。

——看到你在狱中熬过两年之后还这么健康，真是太好了。我想假如我在过去的两年中去监狱见过你，可能就不这么吃惊了。——

他突然发现和她交谈很容易，使人感到那么温暖。——对我来说，收到那些信就像你来探监一样。在某些方面，信甚至更好……因为你可以把它们读了一遍又一遍。探监会很快结束，而且你和对方不能说你想说的话。告诉我——有一件事我在回信时从未问过你，我那时想问你，就像我们现在……我是说，我现在想问你……在你第一次写信给我时，你说了那么一句话……你知道我出狱后会欣然迎接战斗——

——你的确是如此，不是吗？——她这话平平淡淡地说了出来，出于仰慕，不是奉承。

片刻的沉默。

在沉默中，索尼不拘礼节地细看着她的脸，从前他没有放

开胆子这样做过。她的脸很饱满，皮肤呈珍珠色，脸上有一些稍带红色的擦痕，也许是她的指甲或粗硬的衣服擦下的痕迹；她眼睛的颜色也很特别，像他在那本关于古埃及艺术的书中所见的那种能给米色石彩盘带来生机的珐琅做的眼睛似的。他注意到她的口中湿润润的，她的金发一定有自身的香味。

——“欣然迎接战斗”。——他又低声说了一遍。——我一直想问这句话的出处——我想弄清这是谁说的。——他笑了，为自己的想法乐了：——想读读下文是什么，对我自己有好处。——她观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很高兴他有这种热情，兴奋得下巴拉向后面，都贴着她的脖子了。

——那是罗莎·卢森堡[①]的话，在给卡尔·考茨基[②]的信中说的。我会把那本书拿给你。噢，她的信中说的东西太多了！我希望能听听你的读后感——

欢乐。这就是和汉娜交谈的收获。照耀长时间的思想交流的是欢乐之光，而不是只能照亮家庭琐事的六十瓦的灯泡。

很长时间过去了，从前他的政治活动被局限在他自己那类人——由法律划分的一个黑人分支——以及迁居的问题上。在监狱里他学会的东西，比从艾拉安排他参加的由地方政府举办的函授课中学到的多得多。同监狱的政治犯们教他学会了从解放的一系列原理中引出的多种斗争策略，使他明白了应该怎样根据问题的大小、地点和事态的异同而不断地发展、变通和灵活使用这些策略。哪个黑人区的黑人生活在悲惨的状况之中，他就愿意奉命前去那里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居民联合会；一旦他

① 罗莎·卢森堡(1870—1919)，是波兰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女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翼的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②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中派”的代表人物。

们明白拒绝交房租是一种很好的抗议办法，他就会与同志者一道去教导黑人们怎样组织好自己的斗争。哪里的矿工、在政府打工的人以及糖厂或砖厂的工人在罢工，就必须举行集会支持他们，必须让大街小巷都出现写有支持口号的T恤衫和标语，直到声援活动遭到禁止，甚至在它们遭到禁止之后，都应该有些有思想准备的人对禁令视而不见，至少让支持口号在胸大肌或乳房前不屈地起伏。为了缅怀那些在暴动、罢工、罢课、抵制交房租以及与警察和军队的街垒战中死去的人们，必须在一个个特定的日子组织纪念大会。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秘密地、不留姓名地去做，以便逃过警察的追击，不论白天和黑夜，最好不让家里的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行踪。

索尼不是整个运动的领袖，但他经常作为一个主要发言人在可能在某所教堂或大学半合法地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汉娜每次都到场。四月一个反常地寒冷的日子（德拉肯斯堡格山过早进入了冬季并下起雪），他和同伴们拥挤着走下城里一所教堂的讲台，加入了从边门离开教堂的几排听众的队伍，在流动的人流中索尼和汉娜又碰到一起。这并不使他感到意外，幸运点罢了，他在台上时看见她坐在听众席第五排。他们走出教堂大厅，扑面而来的是刺骨的寒风，还有正在等待这类集会者的警察的摄像机镜头，就像在别的国家摄像师等待电影明星在节庆活动结束后出现一样。

他们在角落拐了个弯，朝与众人相反的方向走去。他迎着风抬起了脸庞，同时在向她微笑。——这么说我们被他们拍下快照了。——

——你认为他们会送给我们一张照片吗？——

他迎风耸着肩并在大笑，他们停顿了一会儿，不知道他们沿着那条街在往哪儿走。他只穿着一件衬衫和一件薄茄克，而

她总是有衣物可供别人用，这是她的风格。她脱下自己那条带条纹的毛线围巾。来吧。披上它，不然你要得肺炎的。继续走吧。——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同志似的。——多谢。——

他把那条围巾围在脖子上，把有毛边的两端塞进他的茄克里。那围巾带着她的体温。在街上的凛冽寒风中，那种感觉留在他的后颈上。

欢乐。来自这么细微的小事。

他们做了一段时间朋友之后才成为情人。唯一可能与他共享做爱的极乐的女人，只能是这样的：她也在和他并肩战斗，对她来说共同战斗的那些人构成她唯一的家、唯一的生活和她所理解的幸福——他现在也是这样理解幸福的。后来她告诉他说，她知道他允许自己成为她的情人是有困难的，能够做他的朋友她就心满意足了，假如他只满足于这一点的话。但在他们第一次赤裸裸地躺在一起的时候，她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前提条件。——我想和你这样。但假如这会用某种别的东西取代我们的友谊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一切。——

他在她床上用手肘支撑起身子，带着床笫间不应有的认真看着她。她满以为他会借此机会当场告诉她说他爱他妻子——她曾见过他那个美丽的妻子，曾去拜访过她，为他的事和她一起担过心——并且告诉她必须严守分寸，不应对他有非分之想。但他重新躺到了床上。——你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朋友。这就是我的感受。现在的感受。这就是和你做爱告诉我的东西。——

疑虑的消除使她恢复了巨大的勇气，使她进一步闯入亲昵的领地。她戴着一枚古董店的那种金丝细工的戒指，开始用指甲刮起戒指凹陷处的干肥皂来。——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艾拉

的……——

她并不把艾拉排除在外。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并不想把艾拉从他心上抹去，这是他在她身上发现的值得称道的感人品质之一。她把艾拉看作一个平等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击败的敌手；她没有用“你的妻子”指称艾拉。他充满了……感激，没错。和她在一起，没有负罪感，也用不着隐瞒任何东西；从前一直未获满足、受到抑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一切通过一道道大门径直朝她涌去。

——我们当时太单纯了。你现在几乎无法想象。住在柏诺奈镇区。那么单纯的一对儿。又那么年轻。我想，你知道，我们的理解来得太轻易了。只是表层的……请你相信就这些，就这么回事。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我当时弄不清我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汉娜。而现在她就在他身边，她已帮助索尼发现了他自己。她是一种像脉搏一样自然的幸福感，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伴随着他；他离开她后回到家中，这种幸福感仍然伴随着他，使他有可能忘记他儿子的敌意（自从在电影院意外地碰到他之后就这样了），有可能扮演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丈夫！艾拉不是那种感情上要求很多的女人——想象一下艾拉！她已习惯于夫妇间的那种静悄悄的同床，但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同床的次数越来越稀疏了，这比真正的做爱肤浅得多。到了女儿开始露出乳房轮廓，儿子的声音在电话中被误认为是父亲的声音的时候，热恋时在父母家中不得不秘密地分享的那种快乐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摒弃了；索尼和艾拉这对结婚已多年的夫妇现在感到在儿女近旁做爱是一种禁忌了——孩子们只和父母隔着卧室的墙壁，而且他们现在同样也有了性欲望。当然，艾拉和他两人都决不会挑明这一点；但这一点一定在起作用，这就是说艾拉

不希望——她不希望他希望——经常对她做爱，偶一为之够了。而他在监狱的两年无疑又加强了这种定时性。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身体接触。相反，一旦床头灯熄灭，艾拉总是一声不吭地依偎到他怀里，贴着他的胸部或搂着他的背，双方都不会因他那贴在她身上的生殖器的温暖或被他握在手里的她的双乳的形状激起情欲。他们常常这样入睡，只有在睡去之后才彼此分开，这是多年来他们的习惯，就像他们在睡前刷牙而且她还要往手上涂润肤脂一样。

在他开始对汉娜做爱之后他不得不对他妻子做爱的头一次——与其说是由于已隔太长的时间未和她亲近了，不如说是由于他很快意识到，对他这么个初次骗妻者，最容易使他露出马脚的莫过于避免与他妻子做爱——从妻子体内退出之后，他带着悲哀和对自己的厌恶浑身颤抖。抚摸是一种容易的表演，已在婚姻的习惯中重演过无数次，不带任何感情，只为尽义务使艾拉高兴，但他性高潮的那种难以抑制的动物性兴奋却那么可怕。他真想起身离开那张床、那座屋子，去找汉娜。除了汉娜什么都不想，连同他自己，一切都被汉娜的存在弄得模糊不清了。他过着一种小心安排，处处留心的生活，时不时地，在他觉得应该再一次亲近艾拉时——假装需要可怜的艾拉，噢我的天——与艾拉做爱弄得他精疲力竭并感到羞愧。有时候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愤怒，针对艾拉，于是精液变成了毒汁。

有那么几个月，他与汉娜的新生活的最宝贵的一面是这种生活的隐秘性。像地下政治生活一样，它与日常琐事毫不相干。他们彼此拥有对方，因为他们的欢聚不和任何人分享。别人甚至想都不曾想过他们会在一起，更不用说找到并打扰他们了，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谁知道他们在哪里。索尼这个人历来与骗局无缘，而今那些别人以为他将去参加的会议，那些别

人以为她在工作过程中将去比勒托利亚进行的采访瞒过了人们的耳目，他和汉娜得以远离他一直在其中生活的平常世界，到了谁也看不见的地方，这一切在索尼眼里真有点像玩魔术。他过去从未想过可能有这种事。当他和她同时出现在同一公共场合时，一想到在场的人谁都不可能像他俩那样彼此对对方的隐私了如指掌，他们就感到无比快慰，对他们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特殊关系的巨大魔力所在。他们的关系是那么隐秘，致使时不时地有人把他们引荐给对方：我想你们不认识吧……这是……

索尼和汉娜——被陌生人、被第三者介绍给对方。隐藏起彼此间的隐情，由此他们获得多少隐秘的快乐！索尼已意识到他在生活中所缺的东西有一部分正是色情乐趣。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俩分别单独离开——在会上彼此都对各项决定全神贯注（因为对共同热衷于同一政治理想与斗争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风流韵事的亢奋状态能增强他们对他们所热衷的政治活动的注意力和积极性）——离开十五分钟之后，他们却又在互相宽衣解带了。这样一个下午使他们相互沟通的范围变得多么广大！他从不知道有多少事他能够去做，从不知道。那需要这个女人的秘密参与（在每个地方都保密），只有这个大个子女郎——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才能使那一切对他成为可能。几个月以来，在做完爱之后，他们谈论的都是他们想一起去隐居的遥远地方，或是远离大陆的海岛，或是高山的森林深处，除了海鸥和猫头鹰别无他物。像所有的情人们一样，他们试图变成词语，变成将来时态，在个人自由的幻觉中自我扩张。而一旦他们恢复理性，他们又会再次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再次为一系列的琐事如工作、失业、饥饿和痛苦等烦扰，匆匆走上大街，发现世上还有别的人存在。

但是，即便上述海岛和森林只是性交后狂想的产物，他们还是拥有汉娜的别墅，汉娜的床，它不同于索尼所知的任何别的床，不仅仅是由于他和她在那里所做的事与众不同，而且还由于那根本就不是一张床——不过是一张直接铺在地上的很大的垫子而已。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他认为那说明她还没有安顿好；或者那是出于某种日本式的想法。来自他那种背景，对很多嗜好他是所知无几的。像榻榻米？她立即说道，并且笑了起来。噢，不，不是出于日本式的奇想，不过是由于她喜欢与木头地板以及下面的泥土贴得更近罢了。她想得多有道理！根本不必摆什么床头柜，也用不着有手编灯罩的床头灯，有了床头灯你就得十分小心了，弄不好睡着之后你就会把它们打翻在地。柔软的垫子下，唯一起作用的只有重力定律。

如果说他对汉娜需要得要命的话——以一种美妙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说他对别的任何东西或人都不需要。她对诗歌了解甚多——与她相比，他的莎士比亚知识少得可怜。她教给他一首情诗，这首诗他从未听说过，更不知道它与死亡有关，而每一个修过英国文学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对它都能倒背如流。这首诗完美地描述了他们那几个月的状况，在那几个月里，汉娜的一个房间对他们来说就是“无限世界”。

在索尼和汉娜自己觉得他们正远离世人去做不可能之事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的隐居的确相当完美。他们之所以过得那么热火，是因为这种隐居不能久长。外界的每一事物随时都会破坏它。环境，良心——得承认，他们非常担心——随时可能把她从他怀里夺走，把他从她身边赶走。但几个月过去了。他们彼此从世界失踪得非常成功。不料现在他们进入了并发症的第二阶段，由于从前没有过这种经历，索尼意识不到这一点。几个月来与世隔绝，生活在柔情蜜意之中，不理会家庭琐事，也不

用在社交场合与别人分享快乐。这一度使他们感到无比美妙，可现在他们感到不满足了。因为他们不能在一起做的正是家务和社交之类平常事。因为它们属于艾拉，属于艾拉和孩子们。他可以和艾拉一起去拜访朋友，让她和别的女人们一起在她们通常坐的角落谈些日常琐事，而他则和男人们在房子的另一头讨论重大问题；假如汉娜在场，她肯定会投身于男人们的讨论，和他们一起发表意见，互相补充对方的观点。他可以和艾拉、他儿子和女儿一起去看戏（自从他们搬到城里住之后，他一直在鼓励全家人去黑人剧院散散心），不过他不能期望妻子和儿女会对所看的戏有什么深刻见解，而要是和汉娜一起看戏，她每每会有许多精辟之论，简直是在对他的思想提出挑战。因此在他心中，也在她心中——他知道这是违反理智的——一种强烈而大胆的欲望在萌动：让人们瞧瞧他们彼此属于对方。彼此相互炫耀。他们不承认这一点，但知道它在起作用，就像他们在自己选择的隐居生活中互相了解对方的一切一样。

有一次，想一起去看一部电影的不可抗拒的执拗欲望攫住了他们。这种平常的事，任何别的情侣都能做到。因此那天下午他们没有隐在密室中做爱，而是穿过城市去了富有的白人居住的郊外的一家综合电影院。他们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那里的白人则从不参加示威游行，不认识任何曾经是政治犯的人，即使碰到了政治犯本人也认不出来。本来，他们是该想到或许会有意外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会出现那次遭遇，那完全是违背可能性的事。他们走出漆黑的电影院，径直进入下午耀眼的日光下，撞到了他的儿子。他们炫耀自己，想不到是向他儿子。

本能使他们恨不得马上回汉娜的别墅躲藏起来。索尼一言不发，双眼尽可能地避开汉娜，两道浓眉紧锁在深黑色的眼睛上方。她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但是他没有离开她，没有说你

毁了我的家。她发现他已大大地改变了；她在不知不觉之中使他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他们谈论那部意大利电影，而不去谈他的儿子。傍晚时分离开她回家的时候，他热烈地拥抱了她；他显得那么镇定，一定已拿定了怎样和儿子交涉的主意。他只说了这两句话：——这事儿不要担心。也不要担心威尔。——

无论如何他总算平息了此事，后来的情况表明，那孩子没有对他母亲，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此事。——他没有对你提过那事吗？——

——没有。好像那件事从未发生过似的。——

汉娜则总是说：——那不可能。——

汉娜的秘室毕竟不是一个无限世界，因为它不能包括众人一起做的平常事情，不能包括通常的无聊快乐，不能包括已僵死的日常生活状态——婚姻的状态？——他俩的关系所逃避的正是这些东西，也高于它们。

他们从自以为拥有一切变为一无所有。甚至更贫乏。他们开始离开她的床和别墅外出作短期旅行。她有一个朋友是一个长年外出的农庄主。他们曾去那位朋友的农庄野炊。他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没多久刚好经过建在礁岩上的那个小城，他曾在此地的黑人区长大，教书，星期六早晨拖着小孩去买东西……他转过头，看着从矿井里抽出来的水集成的湖泊上的波光，还有由废弃的垃圾堆成的淡黄色土坡，他顿时感到某种刺痛似的兴奋，似曾相识，却又像是身在异国。她向他许诺说农庄上有大片大片的向日葵地，因为他很喜爱那幅凡·高的《向日葵》复制品，这件复制品和一些黑人孩子的画一起挂在她的小厨房里。但她把季节搞错了。农庄的向日葵都已枯死，广阔的田地上无数株向日葵低垂着黑乎乎的花盘。走过草地的时候，她懊悔地

依在他身上；他们笑了，接起吻来。在折下一个枯死的向日葵花盘给她作纪念时，他的手中扎进了好多小刺。

他有多种很好的借口。像所有的情人们一样，他们渴望整夜整夜地睡在一起，一夜又一夜。索尼可以在外面住宿而不用说明原因，大多数旅馆和休养地都已废除从前那些对黑人的禁令。因此他们很自由，有一次他们俩在东德兰斯瓦省的某个地方自由自在地住了两天，甚至曾在一家鳄鱼养殖园和星期天去游览的白人(其中包括老太婆和尖叫的孩子)站在一起观看过小鳄鱼。除了政治任务暂时使他俩中止约会外——他和她都不曾忽略自己的工作——只要能够找到与工作有关的借口离开家，他们都会一起去某地幽会，即使有时只是呆一个晚上。他已再次答应整个周末和她待在一起，他进行了安排，根本没有尴尬地对他的同志们撒任何谎——对他们也这样——不过只是假装他不能与外界接触，因为他要去做一项他不能对别人说的秘密联络工作。在星期六早上离开家的时候，他第一次内心感到某种凶险的不安，而不是异常快乐；有那么一个片刻，在他儿子退往一边让他从走廊走过去时，他几乎掉转身子并放下公文包(公文包!)留了下来。但他一离开屋子就立即忘掉了那一片刻。在鲁斯腾堡附近一个掩映在橘花丛中的约会地点，索尼和汉娜度过了一个难以言传的销魂之夜。人们说一个人会为这种快乐去死，但也会为它去杀人，并把不能带来这种快乐的其他人有权对他提出的所有要求都一笔勾销。橘花的香气就是空气本身，白天和黑夜都如此，吸入的每一口气都流溢着隐秘的快乐，那是他们在做爱时合二为一的躯体分泌的浮动的暗香。

索尼星期天晚上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女儿已切腕企图自杀。

贝比的绝望之举，并不能阻止他偷情。

我们正坐在厨房里，我母亲和我——好像我们回到了柏诺奈的老家似的——突然我们听见他回家了。我们听见公文包被放下的声音和他的鞋底的辗轧声，但我们一声不吭地呆着，因为贝比在走廊那边睡着了，她的两个手腕用绷带扎着放在被单外面。我母亲站了起来，走上去阻止他进入我在其中的厨房。我听见她在用轻柔的声音向他说已发生的一切——然后她突然提高了音调：——别这样！——与此同时他咚咚咚地快步沿走廊走了过去。

他慢慢地走了回来，进了厨房。他已见到我姐姐，但没有弄醒她。我母亲又坐在那儿不动了。我和她坐在一起，自从事情发生之后我一直和她在一起，他不得不面对我。我也不得不面对他。他迟缓地走到冰箱边，自己倒了一杯冰水。他站在那儿喝水，他的头在动着，准确地说他并不是在摇头，他的头隐隐约约地动着，像一个老人在情不自禁地颤抖似的。但是对我表演这一套毫无意义，他并不是一个心神错乱的可怜的老父亲，他不过是太强壮，太健康了，一个操女人的家伙。我父亲能说什么呢？假如贝比星期六死了，他不会在场目睹她弃世。没法找到他。他的行动保证了这一点。没有谁知道他在哪里。看见血的是我母亲。还有我。

——会留下伤疤。——

这就是他有勇气说出的一切。

但这一事件没能阻止他继续偷情，没能阻止他们。它只是使我变得残酷了。那个星期六之夜。我真想走回我的房间，从我的旧足球鞋和旱冰鞋——你决不会扔掉的孩儿用品——后面拿出那朵枯死的向日葵，把它往他砸过去。

他从不试图解释任何东西。他对我们已不太在乎，因而也就觉得不必费劲去使我们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了。噢，他那天晚上受到了挫伤，没有任何人帮助他。我们三个人都待在厨房里，而他很孤独。我本来曾设想——我想过吗？——他会因不胜孤独而情不自禁地悔过，我们会哭起来，事情会就此了结，他会把我母亲抱入怀里，我母亲也会把他紧紧抱住。"会留下伤疤"，再没有下文了。我母亲和我在旁边使他浑身不自在，他孤单单地去了客厅——我父亲和母亲都曾为它感到自豪，她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地方。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黑暗中。她把牛奶放到炉火上加热，我看着她做好可可茶并把它拿进客厅给他喝。我不知道他是否对她说了什么。她好像知道他不会喝的。仍然对他这么体恤，我母亲就是这样，仍然这么尊敬这个曾为我们这类人的未来蹲过监狱的丈夫和父亲。

贝比是他最喜欢的孩子——我从来就知道这点——他的女儿是他的宝贝，他的美人，虽然他对我引用莎士比亚的话，希望我能成长为一个作家，给他带来荣誉——纯粹为了取悦于他。但是，在他昔日深深爱着的女儿想去死，即使只是疯狂的一瞬，而同时又没有谁敢问她是为什么的时候，他却不能回到她身边。他不能和我一起待在屋里。在我姐姐"好些"的时候——她对自己的戕害变成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种疾病或意外事故，我们在家里只能把它当作疾病或意外事故对待——她与我父母谈论过她想做什么。一切都被归因于找个适当的工作的问题。他正好是可供咨询的人，他曾经当过教师，对就业问题

了解甚多。关于她的整个前途等，我父母说了一大堆平常的父母们说的那些话，好像他们是一对平常父母似的。我姐姐自然也就顺水推舟地逢场作戏了。我听见她说了，噢，她讨厌读书。她想找一份工作。干一段时间；然后她再去读书(我知道，她补充这一点，是为了照顾亲爱的老爸和他那由来已久的雄心：使孩子们成为受过教育从而有用的公民)。她知道我母亲不会相信她的话，我母亲知道她想找到另一种生活，一种没有事先为她计划好的生活。无疑，他也知道，是某种东西把她赶了出去；他没有留在家里弄清原因。他带着那个公文包又离开了家——我父亲是否在包里带了一柄牙刷呢，他是否和那个女人亲密到了连用牙刷都不分彼此的地步呢？

令我不解的是我姐姐怎么让他那么轻易就脱身了。也许她是看在我母亲的份上，但客观上这样做起到了为他开脱的作用，使他摆脱了开头那几天他必须承受的内疚；她使他的痛苦能够和她的绷带一起脱落并被摆脱。伤好后她的两个手腕都戴上了色彩鲜艳的手镯——非洲工艺品。他并不是非得看那些伤疤不可。她有一头笔直闪亮的秀发，像我母亲的一样，而她把它弄成了鬈发；在恢复期间，她在屋子内外走来走去，我的一件旧衬衫被系在她赤裸的乳房下面，像是露胸时装表演似的，她的沃克曼牌轻便放音机则别在一条宽宽的腰带上，两个耳机插在她的耳朵里，随着别人谁也听不见的音乐节拍，她一个劲儿扭动着臀部和脑袋。这一切都被默默地接受了，被看成了女孩气的独立的自然表露，她想赢得一种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她为此已付出代价。

她曾对我谈起过那个星期六之夜，仿佛那是一种值得夸耀的特别大胆妄为的越轨行为似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切腕；她本来是该找他倾诉的，真的，那是该他过问的事，就像他别

的事情一样。她已决定向我说明原委。——你从未说过什么，但我想你一定在纳闷为什么有人愿做这样一件蠢事。——

——什么蠢事？——但她知道我是在卖关子；而她又不愿对我和盘托出，说——“我想自杀”。

——我和马西亚闹翻了，她总是那么好管闲事，对每一件事都要插上一手，她老爱把粘乎乎的手伸进我的头发。我怎么也弄不清，我为什么让她纠缠得愿意和她一起过夜。吉米、阿文之类一大堆人当晚去了马西亚家，因为他们知道她的家人都不在。我受不了他们那些人，真的。她说杰姬、多恩和它们（多少年来我的父亲一直在努力纠正贝比与其伙伴们共犯的语法错误）要来，但她在说谎，她这样说是想劝诱我和她一起过周末，因为他们从未来过。在那里除了吸烟无事可干。因此我非常冷漠，在超然旁观，当我想离开他们，离开他们讨厌的瞎扯、尖叫以及醉酒的野兽一般的狂舞时，其中一双男女已在床上忙开了。他们甚至连门都没有关。——

我点了点头，头却一直扭在一边。她看出我不想听这种故事，不想看这种表演——又一种表演，在我们家里。

——浴室是唯一可脱身的地方。——

吉列特剑牌，大麻烟，还有自我怜悯。我真不愿我有那么多的想象，我希望别人的生活不要向我敞开。

——他们只能叫我恶心。我厌恶他们。——

现在我明白了贝比真正告诉我的是什么。我知道她所谓“他们”指谁，我们俩都明白，不是指星期六晚上在马西亚家的那伙人，那些人不是我的伙伴。

她需要某种反应帮助她诱使我——她的无邪的傻弟弟——采取她所希望的态度。她在努力和我套近乎。

我只听不说；她不得不自己说那些她希望由我说的话。——

我想本来我是能够回家的。路不远嘛。但你能想象出来，我凌晨两点回家会给妈造成多大的麻烦，她还以为我正被一个密友压在床上格格直笑哩。这就是自己没有自己的小窝的麻烦所在。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母，真好。即使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也不像他们，我们真是与众不同。一旦你长大了，你不得不忘掉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去过那种生活好了，那是他们的事，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你不得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她看着我以弄清她是否成功地表达了她的意思。——不能匆匆奔向他们，他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

现在她岔开了话题，转而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她与杰吉、多恩也许还有两个印度小伙子合用的一套位于另一个白人黑人杂居区的套房，一旦她找到工作他们就会接纳她入伙。在她装模作样地坦白她为什么想在一个星期六之夜死在陌生人之间时，我明白了她向我说的一切。贝比是在包庇他。包庇我父亲。她在告诫我不要介入他的生活。可怜的贝比。他的贝比，仍然是他的。

他能够如此快地忘记往事。

她鼓励了他——尽管她长得像我母亲，她毕竟和他一样，她像他一样不老实，在撒谎。她在一个保险经纪人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想此人就是和她一起合住那套房子的男人之一，而且也许她还和他一起睡哩)，在她觉得合适的时候，她常常飞也似地跑回家，带着鲜花或是让我母亲缝补的撕开线缝的衣服，假如我父母偶然在家的话，她会钩住他的脖子并亲吻他的耳朵，假如他不在家，在她带着我母亲给她的糖果离开的时候——口里还塞着糖果——她会大声说：——别忘了告诉爸我爱他！——她长得漂亮，健于言谈而且非常有趣，不是模仿什么来逗乐，就是开怀大笑，还爱对关于家里人和她再也见不着的朋友

们的闲话刨根究底。

我不知道我母亲是否曾对他说过杰苏德大夫针对贝比的异常活泼而说的话。她把粗俗劈头盖脑地泼向我母亲。但我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只要贝比有事可干而且过得快活就行了——我母亲也是在表达别的意思：既然我们对杰苏德大夫诊断出的我姐姐的异常状况毫无办法，能看见贝比能够化解心中的郁闷，使之服务于她自己的目标，我母亲也就谢天谢地了。

你或许会认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我们在某种可怕的正常之中安顿下来，为了方便他而接受了对我们的生活的重新安排。事实上我知道，有几次他带我母亲去参加在某个白人家举行的晚会，他的那个女人也到场了。我母亲不得不和她一起坐下并吃东西。

我到过她的住处。就是他去找她的地方。是他叫我去的。你能相信这一点吗？

有某个人一直知道索尼在哪里。

那就是秘密警察。他知道这一点，汉娜也知道。这不被视为见证或侵扰。秘密警察都是偷偷工作的，就像偷情一样。

一个被判过反对政府之罪的人会不断地受到监视，只要这个人还活着，或那个判他的罪的政府没有消亡；看这两者谁的寿命更长。一个与这样一个男人过从甚密的女人会受到监视。介入这对情人的隐私的第三者是秘密警察，这位第三者没有名字，也看不见，政治活动家的隐私就处于这种状况。那些把索尼带走并拘留起来的男人们了解一切。了解他的隐私，参与了他的隐私。不过他们一时没有兴趣泄露它。假如他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革命领袖，他们就会（很容易地）在他和她幽会的某个乡间旅馆装上窃听器，还会把幽会的录像材料送往《星期天报》，

以便搞臭他的人品。他们可以让司法当局颁布一项命令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因为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他在经常和他的情人约会时也可能引导他们找到他的一些他们还不知道的地下同伴。

几乎就在星期六之夜出事(这是他自己能够接受的关于贝比切腕一事的唯一的表述方式)之后,索尼意识到该有某个别的人知道应到哪儿去找他,以防万一有什么事真的发生了。家里应该有这么一个人。但他能挑谁呢?假如我姐姐正在浴室里流血,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他能对谁说到这个地址来找我呢?假如艾拉在厨房里晕倒了,假如他——威尔——在插电灯插头时触电了,他能对谁说把我从汉娜床上叫起来,床离大地很近呢?他常常单独驾车——有一次在去瓦尔河三角洲的黑人区的途中(各黑人组织正在那里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房租运动),他正在考虑怎样对在反对腐败的议员的斗争中自然出现的暴力行为做出最好反应——突然,他会一时冲动而双手放开方向盘。放开方向盘。车子载着他直往前冲,拐过去拐过来。每次出现这种冲动,他猛然回过神来时都大汗淋漓。他最终还是握住了方向盘,没有失神重演那个星期六之夜发生的悲剧。

汉娜不了解这类瞬间的情况——这也许是他向她隐瞒的第一件事——但是她的本能告诉她,为了保护她自己,她应该鼓励他谈谈他女儿——贝比的事。他笨拙地念叨的是那个女孩的名字,汉娜看见他在倾听这个名字,同时他想象她也一定在听——这种愚蠢的、像糖一般的、低级廉价的多情,属于那些住在小镇黑人区的贫穷无知的人,在那种地方你甚至无权使用图书馆。他尴尬地意识到,用"贝比"这么一个代号称呼一个已经长大的女孩实在是愚蠢而粗鲁。那个女人,她现在已是一个女人,像艾拉,也像汉娜。——你还记得她吗?那天你出席了

我家的晚会，她在晚会上跳过舞。

——当然记得。——她怎么都不可能忘记那个晚会的每一个细节，那只不过是她第二次在他们自己家里看到了他名正言顺地所属的那一家人，而且那时候他刚出狱，她还无法把眼光从他这个具体的人身上移开。

——女人们安排的那次晚会，有音乐等等。

——是的，你邀请了我……

——我看见那些男人们看着他，你知道……用男人看女人的那种方式，我也在看她，看见了她那小而圆的臀部，那臀部时高时低地在那裙子或衣服(管它是什么)下面扭动，随着她的摇摆，一对乳头在她薄薄的衣服下面隐约可见。——

——她扭得多么令人想入非非！——汉娜想逗他和她一起笑并轻松地接受他纯真地坦白的事实——他被他的女儿激起了性兴趣。

——那个小女孩，她过去经常用院子里的泥巴为我做烟灰缸，尽管我从不抽烟。她是一个可爱的年青妇女了。尽管我这么说，但她那时是那么漂亮，对了，还有一副可爱的表情。充满了活力。——

——瞧你这样谈论她，好像她已死了似的！——汉娜感到很不舒服，奇怪地笑了起来。——索尼，她还活着。不该说她"过去"怎样！该说她现在漂亮，现在充满活力！

假如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索尼对汉娜说——此时已做完爱，他仍留在她体内并感到安全——她喜欢让他呆在那里，被她宽大的双腿夹着，她此时若赤裸着在屋里走动，双腿会打颤。他还感到了宁静，因为它就在他们合而为一的体内。他们停止亲昵和爱抚，转而担心地谈论起警察蓄意破坏在教堂举行的抵制房租集会的行动来。

幸好还有个威尔。要是没有威尔他真是毫无办法。只有向威尔他才能用某种方式暗示，假如出了什么事能在哪里找到他。像秘密警察一样，威尔也将参与其事，威尔已经了解他不归家的秘密。威尔没法不被进一步拖入其中。

索尼别无选择。需要汉娜。

我是骑着那辆摩托去的。那时我已得到它了。他们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我。对我说此事时，他脸带一个慈爱的父亲宣告一件令人吃惊的喜事时特有的微笑，现在你能在十六岁拿到驾驶执照了，不是吗？于是我得知他要为我买一辆摩托车了。我从未要求过但他们把它给我了。为了我的安全还配备了最新式最昂贵的头盔，他一定已被追向我母亲许诺过。

我是戴着有护颚和护目镜的头盔去的。从街上你看不见那个地方，他去的那个地方。门口有几条狗，一个花匠不得不来开门让我进去；我想它们只对某个经常光顾的人摇尾巴，它们通过嗅他的气味便可辨认出他。那儿有一座很大的房子，但那儿不是他去的地方。她住在花园尽头树丛后面的一个小别墅里。也许别墅有一个秘密出入口，但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不想告诉我。别墅的前门敞开着，里面一览无余。

他一定告诉过她了，她正在等我。噢是威尔，没错吧——好像头盔和护目镜不让她认出我来，不让她记起那次在电影院发生的事似的。这还戏谑地意味着，我有点粗鲁，没有脱下头盔，尽管我决心表示友好。因此我脱下了头盔，她这才看清是我，威尔，没错。我把他让我送给她的东西给了她，鬼知道里面是什么。那是一包书或别的什么东西，他告诉我说"普劳曼小姐"急需它。——你现在是家中的信使了，瞧你的摩托车多棒——你好走，孩子。嗨，不要像地狱天使似的到处乱闯。——

在我母亲面前的完美表演。

这就是他隐居的地方。他对它就像对我们的家一样熟悉，不论是我们现在的住处还是我们在柏诺奈住的老屋，因为我们的家就是我们栖身的地方、我们的家具、我们的东西、他的《莎士比亚全集》、我母亲炒的菜和她放在桌上的花的香味。但是这地方根本不像一个家；没错，这是一个小别墅，但不同于你预想中一个白人会住的任何一类地方。纱门上到处是孔。光秃秃的地板，一幅像是泼洒在地的颜料一般的炫目的巨画，一台电脑打字机，一台在播放风琴音乐的高清晰度收音机，在烟灰缸中被掐灭的烟头，水果，一袋一袋的麦麸片和麦芽精，放在电热器上烘烤的一连串揉皱的妇女内衣——还有一张床，铺在地板上。瞧那张床，不过是一块放在地板上的很宽大的垫子，上面盖着一块绣有大象、花朵图案并镶有小块镜子的什么布——那张床，就像这样，摆在一间谁都可以进去的房子里，我现在正好手拿头盔站在其中。

因此我现在明白了。

谁是汉娜·普劳曼？

不仅仅是他父亲的金发碧眼女郎。不仅仅是被那个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出于自卫的愠怒、轻蔑——和嫉妒而排斥的那个女人。不仅仅是秘密警察所知的那个有反政府前科的黑人的情妇兼旅伴。个人所知的自我出身的历史其实只是这个人有把握的一切，它只能追溯到这个人记忆所及的往事。她的出身的历史是从她的外公那儿开始的，至少她知道，她的名字是照他的贵格派①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尽管他本人是一个英国圣公会②教徒——边境地区英国保护领地的一名传教士。在一些级别较低的英国皇室成员来到，看见英国国旗被降下，独立的旗帜被升起之后，传教士也就退休了，和一些年长的黑人神父住在一起，他相信他已拯救了这些黑人的灵魂，他们的语言也变成了他最爱用的那一种。有时他为主日学校做一些宗教著作的翻译工作，有时则和老酋长们一起追忆往事。他的兄弟早已来到南非并成了一家金融公司的总裁，独揽采矿业、玉米生产加工业和包装工业。在汉娜从她与当地的黑孩子共读的村中教会学校毕业后，正是她外公的这位兄弟出资送她去英国读书的，她母亲曾在当时的罗德西亚③学护理，回到传教士身边时已怀有身孕，后来生下一个女孩，也就是汉娜。汉娜被告知她的父亲是一个士兵，由于她知道有很多士兵在历次战争中战死了，因此她想

①② 贵格会和圣公会都是基督教的分支。

③ 罗德西亚原为英属殖民地南罗德西亚，1965年宣布独立。

自己的父亲也死了。后来她才发现自己的生父是一个已有妻室的布拉瓦若警察。汉娜的母亲在由独立政府主管的教会医院当护士时碰到一位犹太医生，她和他结了婚并迁居到了开普敦。在母亲随继父移居澳大利亚之前，每逢学校放寒暑假，汉娜总有一段时间呆在外公位于传教区的土砖茅屋里，而另一段时间则在开普敦市郊她继父所藏的现代画之间度过。

一种富于个人特色的生活，汉娜的生活，但它也随着她所处社会的权力更换发生了改变。因此她现在真正是什么，是一个“那时候”和“当年”的问题；当年她本可以获得种种资格证书，可她对自己到底该做什么毫无把握。她继父本来会出钱送她进迈克尔里斯艺术学校去学习的，因为在学习他的藏画时，她虽然没有绘画知识却表现得那么富于创意，可是她偏偏热衷于傍晚时分在已变成城镇郊区的传教村四处游荡并与小伙子和姑娘们聊天，那些小伙子她早就认识了，他们现在穿起了啤酒厂分发的T恤衫，那些姑娘们则是她从前一起玩的伙伴，刚从假日宾馆做完清洁活儿下班回来哩。和外公在一起的时候，他建议说，假如她能获得在她的母校——由他创办的学校——任职的资格，那对她是一大幸事，但是她沮丧地打消了这一念头。在开普敦时她遇到过很多年轻人，其中有大学生，有来自她继父那样舒适而有教养的白人家庭的儿女，这些年轻人已在为工会、法律咨询办公室、地方艺训班和非法居住区的人权事业工作了——而她则将去教孩子，充其量只是为了使他们适合于往瓶中装啤酒和清洗旅客弄脏的浴盆的工作。她不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但这不是社会计划好的，可以这么说；她不得不更现实地选择在哪里安身立命，而不是凭所谓南非处处都是家的孩子式的幻想行事——南非有边界、条约、带倒刺的铁丝网以及重兵把守的边防岗哨。

南非在那个地区是一种把人们聚合到一起的向心力，不仅仅是由于经济需要，而且还由于政治斗争的诱惑与魅力。早在她住在教区的土砖茅屋的时候——那里的尘土染红了她那北欧人的头发和淡红的双耳——她就受到了诱惑，这种诱惑来自她外公为了上帝的利益针对人们内心的邪恶而进行的斗争。而她的动机则是为了人的利益反抗邪恶——为整个人类。(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很关心男女两性的问题。但她不愿把这视为“邪恶”——对她来说这样太虚伪、太伪善了，尽管表现在她外公身上不是如此。)她为那一目标曾为分布在南非各地的一些组织工作过。有些组织被取谛了，因此她不得不迁往别处找一个相似的由社会委派的工作。她一度曾和一个年青律师结婚并生活了一段时间，由于政府践踏法律，她丈夫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并劝她移居他国；他先去了伦敦，在那里恢复了健康，但同时也爱上了另一个人，此后她就永远和他离异了。高保真音响设备、录音机和书籍都通过海路邮寄给了他，她只要了从特大号床上撤下的那块大床垫(因为有了它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活)和由杰克逊·波洛克的门生画的一幅画，这是她继父打点行李赴澳大利亚前给她的。由于依赖于国外的慈善捐款，雇佣她的托拉斯公司和基金会对她付酬很少。但假如你的贫穷是自己选择的，那就不能说你贫穷——假如她愿意的话，她本来是可以开设一家妇女时装用品店或是以公关为业的，有她外公的兄弟的支持足够了，这位叔公已用不同于他向她说的方式“成功”了。

她所做的工作的性质意味着感情的大起大落。它是从危机之中生发出来的。它所处理的是与分离有关的问题——即人的生活中出现的有必要用特殊方式作出反应的种种遭遇。监督审判也就是“监督”人们的情感曲线的起落，这些情感促使男人们和女人们采取行动，同时又对他们造成危害；勇气、畏惧、

背叛的曲线起伏；还有从勇敢学到了的狡猾，由修炼获得的勇气——以及其它无法用任何曲线图表示的东西，它们总是那么强烈，根本没有高峰和低谷之分。那些被记录下情感变化的人们，在接受长时间的徒刑时告诉法庭，他们毫不后悔；在当局愿对他们实行大赦时——条件是他们愿意把大赦当作“自由”接受而放弃他们为之入狱的那种自由——他们宁愿选择终身坐牢。这种不可思议的选择是任何没做过这种选择的人都无法企及的。用精神扛起世界，就像阿特拉斯①的肌肉支撑起世界的物质重量一样。这样的人是无法监督的。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具备这种不正常的——汉娜有一次和索尼谈到这点时，对自己的说法做到了纠正——不，不是“不正常的”，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而是神圣的力量,和他们相识能使一个平常人(像汉娜)获得更广泛的感情源泉,即使只是意识到那种力量确切存在都是如此。

与良心无愧的囚犯们——政治犯交往是一种特殊气候，有利于丰富和升华感情。这些囚犯们为人类反抗邪恶，因此牺牲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可是法律却通过一盘盘录音带、警察拍的录像带和政府选定的证人之口慢慢把他们的牺牲变成指控，称他们从事了邪恶活动。出席法庭的听证会，隔着栅栏和那些在取笑看守的被告握手，拜访被监牢隔开的妻子们，丈夫们、父母们、孩子们和同志好友——所有这一切都用某种汉娜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可能的方式拓展了汉娜的感情，处于爱之中。她处于爱之中，这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爱，不同于她从前与她那位律师的爱，那时她才二十三岁，她和他早已不再相爱了。处在爱之中，这种爱，是由共同承受的紧张，相互间的感应构成的一

① 阿特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受罚而用肩膀扛起世界的巨人。

种温度和气压；是充满信任的眼神交流，而不是相互的爱抚；是毅然去做对方所要求的任何事情哪怕是最卑微的事情的那种重要而充满豪情的责任，而不是私下里动情的山盟海誓。一种爱的生存状况。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她变得坚韧不拔，敢于大胆地撒谎，毫无顾忌地用国际行动的压力胁迫监狱当局允许她探望被拘留的人。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她理解了她去访问被拘留者的家人的使命。

她驾着一辆沃克斯瓦根甲壳虫车穿过索维托的街垒战场，发现老人们不知道是否该信任她。在波斯蒙特和雷纳西亚郊外一个整洁的隔离区，她受到一些妇女的接待，她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分期付款购到那些光亮亮的家具。在擅自建起的宿营地她迷失了方向，这里没有门牌地址，留在夏日的泥泞与腐土中的条条车辙是唯一可辨的道路，那是去位于路边的酒类商店买啤酒的人们的手推车留下的车辙。被拘留的黑人之一带着家小非法移居进了郊区下等白人区的一座房子，这座房子有一扇可旋转的锻铁门，还有一只灰泥做的塘鹅，它那么逼真，简直像是从活塘鹅翻造出来的，它们无疑是前白人房主留的。那个黑人的妻子很美而且举止得当，神情自若，穿着长袜和高跟鞋——这一切产生的效果是使汉娜感到并未打扰对方但来访纯属多余，因此汉娜用谈话来掩饰这种感觉。那位妻子一直都在乐意地聆听，使得汉娜的思绪更加混乱。这位文静的妻子显然习惯于别人顺从她。她叫女儿端来了茶，这女孩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不过显得有点冒失。那女孩还是学生，周末才去打点工，那位母亲有一个好工作，她非常清楚而有礼貌地表明，没有孩子他爸在家也照样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任何外人的参与。那位母亲带着缓缓流露的难以察觉的微笑（对一个中年妇女来

说，她的牙齿真是太完美了；汉娜才三十岁的时候牙齿就大量修补过了）把手搭在一个看起来长得过快的男孩子的肩上，这孩子在让汉娜进门之前出于怀疑让汉娜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现在我儿子是家中的男主人。

一座散发着不新鲜的烹调香味的屋子。墙上是一本旅行推销员用的哈里尔·纪伯伦①读本但在前面镶有玻璃的书柜里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小文库，其中不仅有可邮寄到的仿皮封面经典著作，这类作品通常被视为渴求知识的标志；还有马克思、列宁，法农、甘地、恩克鲁玛、曼德拉和毕柯等人的著作，这类作品则被视为在政治方面自我修养的标志；甚至还有卡夫卡，D·H·劳伦斯的作品；她说呀说呀，偶尔瞥上书柜几眼，注意到了这些书。

她另外还去过那幢房子一次，但那是以后的事了。那是笑声和音乐打破屋子的寂静的时候，为了便于跳舞，第一次去时所见的东西如家具之类被推到了一边。她与那个黑人的美丽妻子、女儿和儿子坐在一起时的那种爱的生存状况也被推到一旁，被可怕地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对那位曾是囚犯的男主人的热情关注。他和她第一次做爱时，在欢乐中她奇怪地感到会好景不长，她曾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把这告诉他，以便向她自己解释清这种潜在的威胁。他并不真的理解这一点；性爱具有无可匹敌的肉欲优势，能在做爱的当时成为一切的保证。一旦肉体说话，一切都洗耳恭听。

因此从她第一次来访那天起，那座屋子中她所记住的每一样东西都受到她的珍视，因为它们是他的一部分。在她不能真正了解的他的那一部分中，这些是她所知的关于他的一切，而

① 纪伯伦（1883—1931），黎巴嫩诗人、散文家、画家，他的散文诗代表了现代阿拉伯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作为《先知》。

且她已把这一切和他这么个情人视为一体。这一切正是他和她在她的房里所忽视的东西。

她想必愿意成为那个女孩的年长的知心女友(看来她好像需要知己)和父母之外的家长,这对那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孩——他儿子的生活也有益处。甚至连那些装订简陋的伪哲学读本在她眼里都成了那个男人的品德的温柔的明证,其实他留下来让贫穷无力的人们享用的不过是关于改善现状的一些虚假的安慰而已。她把她第一天对他的家的感觉贮存在记忆深处,就像珍藏一个如今已长大成人的孩子的一绺头发似的。

同时与妻子和情妇一起露面是偷情者常用的伎俩之一。这不过是通过表明没有任何东西可隐瞒而达到掩饰阴私的目的。但索尼毕竟还不太精于此道,他不知道怎样平息他内心那种促使他与妻子和情妇同时露面的真正的冲动。他知道这类抛头露面不是出于任何不可避免的社交需要,回避必要的社交料想会引起嫌疑;安排这类露面不是为了保护艾拉和使她放心,也不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万一人们看见索尼和汉娜一起出入公共场所,他们会觉得不过是两个政治上的同志者偶然碰到了一起,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在索尼对怎样使罢课学生在不放弃他们的政治目标的条件下复课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时,一个律师和两个教育家在专心听着,他们都是国家教育危机委员会的成员,与此同时,他听见身后某个地方传来那两个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声音,它们和别的谈话声混杂在一起。两只鸟儿在他感情的晴空下欢唱;他听不见别的女人们的饶舌,那些吱吱喳喳的麻雀声。他变得雄辩有力了,两个鼻孔带着信念张开,他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么有力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这是第一次,他非但没有泾渭分明地在内心把那两个女人分开,相反他

同时占有她们俩。与这种亢奋相反的是他生怕艾拉了解真相。

后来，远离他人，感到孤单和羞愧，他明白了。他寻找途径（甚至是想方设法）和他妻子一起到他的另一个女人也可能去作客的人家露面。

让那两个女人同时出现给他带来莫大的性兴奋，这种亢奋就像从杯子缭绕而上的水蒸汽一样令人陶醉。

她使我想到猪。我们的祖先不吃猪肉①。

一些亮亮的柔毛像细细的玻璃丝一样嵌在她嘴巴周围的粉红色皮肉里。

关于她，关于我父亲与她，我有一些可怕的想法。我想象他和她……我怎么也不会那样去想象我母亲！我对自己感到恶心。是他迫使我那样去想的。

他为什么派我到那里去呢？我不时地回想那个地方的情景。我看见的东西，他迫使我看见的东西，是她晾在散发器上的内裤和乳罩。那张床，就在你进门的地方。难道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私生活吗？她那样的人，那么热心于我们的自由，曾想方设法去探望我们的囚犯，站在我们的家门口。我本来是不该让她进屋的。那时我真是个傻小子，我当时竟被称作家中的男主人。他们把你养大并教你讲礼貌，然后把你推入他们从未告诉你可能出现的困境之中。

他为什么把我派到那里去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随着我的长大，改变——在你年青且正在发现自身的时候，每一个月都与上个月不同——我的答案也在改变。被禁的猪。粉红色的猪。我认为他是想拉我入伙。男人的感觉都这样。现在他

① 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由此及前面所说索尼家存有阿拉伯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纪伯伦的作品的事实或许可以推断索尼的祖先信奉伊斯兰教。

大可以把我看成一个和他本人一样的男人了。一个想性交的人。一个为此有负罪感的人；他信赖我，我这么一个因有这些狂野的情感而内疚的孩子。在我的确是小孩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东西完全相反，每当我试图掩盖手淫时在内裤留下的印迹，他就会说，孩子，没有什么可自责的——我对自己做的那事儿是自然的。现在他想让我看看她，看看他享有的东西，让我和他一起为他所感觉到的东西负疚，因为我明白我体内也有那种东西。一种束缚，被捆了起来。父亲和儿子更像好伙伴。

这就是我所想的。

然后再一次——我已逐步理解了一些别的东西，我想我理解了。这种理解来自我的体内，是这样。（假如他相信我从自身学到了东西，那他就对了。）我认为他想要做的就是炫耀他的大丈夫气概。他的大丈夫气概的证明，就是那个蹩脚的女人，就是那张他干那事儿时用的床，就是他按其节奏干那事儿的卖弄的音乐，就是干那事儿时他在墙上看见的那幅炫耀的画，就是她从那些他能够摸弄的部位脱下的内衣内裤——是他能摸，不是俺，不是俺。（不是我——他会纠正我的用字。）他派我去她那儿，是想告诉我还没轮到我哩。他还没有离开女人们的肉体好让我上。我没有必要心存妄想，虽然我和他一样高了而且我的两腿之间也有他所有的同样的东西，再说（那些家伙不让我忘记）我正在"像他一样英俊"地成长，我甚至免不了要长出使他的眼睛那么性感的那种该死的浓眉——我不应该妄想他非得让位于我不可。老公牛仍然拥有母牛，他仍然有能力侍候他的妻妾，我母亲和他的金发女人。

我相信我父亲对这些针对他本人的想法一无所知。只有我知道，只有我。

在小学教师带领孩子们穿过草原的时候，他的行动是出于他自己的冲动和责任感。那种天真再也不可能有了。——为自由而劳作没有自由。——他能够这样对汉娜说，然后他们俩会大笑起来。这种笑之中包含着骄傲和怀疑。你不能对艾拉说诸如此类的话；在艾拉和他之间有一种老习惯，那就是崇尚有用的生活。在艾拉面前，他在言谈方面不得不保持原貌，在其它方面也一样。在他坐牢的那段日子，她显然没有扰乱历年来的各种习惯，而是以某种方式继续按老习惯行事；现在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秘密的生活结构、受委员会指挥的活动、时时存在的危险——可她仍然像从前那样对待他，仿佛他仍然是一个小学教师，只不过在一所新的学校找到了工作。其实他已成为国家的敌人。在他向她说起他可以向她说的有关他的工作的为数不多的一些情况时（他不得不针对某些事情和她谈谈，不得不寻找某种东西排遣艾拉与他之间的沉默），她用心地听着，就像从前她听他在教书过程中遇到的那些小问题一样，那时他和她刚结婚不久，住在悲伤之子——柏诺奈城外的一个黑人区里。

他在最高层以下的某个机构参与略策的决定，然后他还参与对别人的活动的安排，反过来他也奉命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一个活动家该暴露到什么程度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必须视目前被拘留或在受审的同志的人数而定。在需要有人出面以保持运动的势头的时候，关于谁应该在哪里露面，都要有组织地商讨和决定。他不是图图，不是博萨克或奇卡恩，再说他

还应该肤色更黑一些，但是，作为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并且受过监狱的血腥洗礼，只有在他最能发挥作用而风险又最小的场合才能启用他。和汉娜在一起，这事又可引出微笑了。黑人隔离区是军营，随处可见的是牵着警犬，全副武装的警察，而不是牵着狮子狗在购物场合轻悠的白种女人。工会总部和抗邪教会组织经常遭到警察的洗劫，有些甚至被神秘地炸掉或烧毁了。市内到处有全副武装的警车停在路障边，每一个开车的黑人都被拉下车搜身。随着罢课运动和抵制房租运动的结合获得意外成功，使得整个黑人社会纷纷起来抗议政府，在大多数需要有某个来自黑人组织国家教育危机委员会的人出来抨击政府的教育制度的场合，索尼往往都奉命出阵。在大学校园里和黑人社区，他的昵称“索尼”就不再出现在广告牌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假如警察想把他抓起来的话，至少他们预先不会知道他会在某个公共讲台露面。

但是在有些时候，原计划举行的某个集会还来不及取消，另一猝然事件往往又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人上台却又没有选择人员的可能性，那就只好就地推举适合的不管哪个人上台了。

索尼把这些告诉了她们俩，艾拉和汉娜。

他在家的时候说到过将在黑人镇区的墓地举行的纪念大会。在他告诉他妻子的时候，他的女儿在场。——她常常几个星期不归家，然后在某个谁也拿不准的时刻从厨房门闯进家中。她坐在厨房里吃她的玉蜀黍片，那个可爱的小女孩。那个男孩则老是回避和他一起吃饭。星期天的早餐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看到他的贝比坐在过去常坐的位置，他就有点神志恍惚，好像在他突然走神的一瞬间一切又回复到了过去的状态。

但是他的女儿穿着一件黑缎子做的宽松衫，胳膊下面弄得皱皱的，两眼周围不必要的眼影膏（她的眼睛本来已够引人注目的了）更加深了眼角因睡眠不够造成的黑影——看起来她更像是整夜都在外面游荡，而不是为了来她的老家吃顿早饭而起得太早。一阵伤心和气恼涌上心头，不过立即被压了下去。没有时间去管那种事；现在，永远找不到合适的时间了。

——那地方在哪里，爸？——

他还来不及回答，艾拉已把视线从她正在灌水的水壶上转了过来——在比勒托利亚那一边。在北边。——

——噢在那里。但你怎么也进不去。军队把那儿给围住了。

他看见艾拉正准备沏新茶。沏茶的时候她总是要往水壶中注满凉水，她从不用热水烧开水。——我喝水壶中原有的水。我没有时间了。——

——即使你扮成一个神父，我亲爱的老爸——他的贝比生来就爱在对父亲说话时撒娇，甚至从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起就这样了。——无论如何，你太与众不同了，即使你披着牧师袍什么的伪装，他们也会认出你来。瞧你的眉毛！我替你拔掉眉毛好吗？老爸？来！——她跳起身来，伸出钳子一样的手向他扑过去。

——别傻了，我可以化装成任何人。——

那女孩嬉闹的威胁变成了拥抱，她的一条手臂搂着父亲的脖子。他们一边笑，一边彼此抗议，然后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她狠狠地吻了一下他的脸颊，他觉得她的颌骨撞着了他的颧骨。

——这次集会是替那九个年轻人"扫墓"，他们是上星期在米比亚大厦外面被警察枪杀的。他们昨天被安葬了。各街道委员会已要求发表某种墓地演说。那些青年人都是同志。——

在他说到“演说”一字时，他儿子最后还是走进了厨房。在他投向儿子的致意的一瞥中，他感到一种尴尬的抽搐，好像他在盗用莎士比亚的话时被人逮住似的，他过去经常引用莎氏名句，以便至少把伟大艺术的自由给那孩子。

他们围坐在早餐角的桌子边——早餐角是索尼在威尔的帮助下修建起来的——就像从前在柏诺奈他们一起做事一样；星期六的采购，小学教师对一个处女的爱，生下第一个孩子贝比的幸福，然后是以天才之名命名的儿子的降临——那时候这一切使他们夫妇油然生出万种柔情。艾拉站起身来，不是拿酸乳酪，就是盛人造黄油，衣服从不在杯盘或桌布上扫来扫去，然后她又轻快地回到她的座位上，一举一动都那么优雅。贝比正在叙述关于她刚参加的驾车考试的经过大肆修饰的故事，她还企图以此惹恼弟弟，诱使他像从前那样和她互相奚落对方一番——噢，我非常有信心。我甚至在初学阶段就开起大卡车来了。你知道吗？叫我担心的是你们这类骑摩托的野蛮人的作风，谁都说不准你们会从什么鬼地方闯出来。你们以为只需让车灯老亮着，所有的人就不得不为你们让路，好像你们是消防队似的——我不明白在你缠着老爸要买那种破玩意儿时他为什么竟然迁就你了，我真不明白，威尔。——

他迟疑了片刻，同时在挑一个苹果。——我从未要求过买它。——

抬起头来仔细端详她的时候，他发现她那双涂了眼影膏的大眼睛里有警告的神色，尽管她很快大笑起来：——噢不，我敢打赌你从来未要求过！做梦也没想过！你的鬈毛脑袋里从来未闪过那种念头，我的老弟！——

热乎乎的罐子与杯子被从一个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报纸上的一个大标题被念了出来，瓷器的碰撞声，刀子切烤面

包的嘎扎声，倒茶的哗哗声和零星的对早餐的评论声混杂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已被重复过无数次，这一切并不是真正地在进行：一种回音，例行故事而已。那些琐碎的谈话被他们之间的沉默包裹着，餐桌边的每个人都能听见那种沉默。

索尼早已说过他时间很紧，以便在那个男孩出现之前离开。他不得不证实自己的诺言。他从桌边站了起来，但就在他起身的时候艾拉也站了起来并且在他之前离开了厨房。

——回见，威尔。——

再见，他说。那男孩时刻都在想着要让索尼感觉到他儿子希望他再次被捕：这或许能阻止他的那种行为。再见了。永远别回来了。

那可爱的女孩已用她母亲的抹碗布擦掉她的眼影膏，不管昨夜她是怎么过的，现在一点也看不出痕迹了。——小心点，爸爸。给——帮我把这放在墓地。——她从餐桌上的花瓶里折下一枝玫瑰递给他，这些玫瑰是在艾拉的花园里培植出来的。

艾拉拿来带拉链的万用旅行包在走廊里和他告别时他手里拿着贝比的玫瑰。他知道包里装着些什么。里面有牙膏、牙刷、毛巾、肥皂、睡裤、供换的袜子、内裤和毛线衫。假如你足够幸运地在家里被捕而不是在进行扫墓演说时被捕，那么你能获准带入监狱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这些。她离开厨房还不到一分钟哩。——你怎么这么快就把东西清好了？——

——我早就把包准备好了。——她在微笑。她像是自我解嘲似地耸了耸两肩。

——这是多余的。我一点儿事也不会有的。——

他用拿着玫瑰的手提起万用旅行包。——贝比的花，要放到坟墓上。——出于习惯，他向周围看看，找到了公文包，他用另一只手提起公文包，然后她为他开了前门。

没有说回见，没有说再见。——不要担心，艾拉。——

——我会去的。我去听你演讲。无论如何，我会与被捕者父母支持委员会和黑带子协会① 一起去。

和汉娜一起吃早餐时他有的是时间。一杯咖啡和半片她烤的涂鱼子酱的面包。——她还穿着睡觉时穿的那件特大号T恤衫，当她抬起手拿桌上的食物的时候，她肌肤柔软的手臂下方从腋窝到手肘的小小的空荡处的衣服一颤一颤的，这吸引了他的视线并使他侧过身子去品尝她的口唇的滋味。她的乳房和肚子与他只有一层棉布之隔，它们使他抚摸她的手暖融融的，好像那只手是放在一堆余火上似的。

——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去？——

她微笑着深深地呼吸以便恢复自我控制。

——最好不这样，你看呢？——

——当然。或许我能够开车送你回来。你会找某种借口。——

一起做那短暂的旅行的确是一件诱人的美事，她微笑着抚弄起他的手来，最近她曾把淡红色的水彩颜料擦在他这只手上，然后把整只手掌印在一张纸上，现在掌印就钉在墙上。——不。除非我叫他们让我在比勒托利亚下车，那我就能够——我们约定在某个地方碰头好吗？

——在司法部大厦前碰头怎么样？——他正是在那个约会地点受审的。他出狱时高傲的露齿一笑，真令她高兴。欣然迎接战斗。——可惜我得匆匆赶回来。五点左右我有个会——我想纪念会要到四点三十才能结束……假如警察不早早冲散集会

① 一个妇女反种族隔离组织，原注

的话。你是不是先把衣服穿好呢？你们的车什么时候离开？

——噢，不用十分钟我就可以穿戴完毕……那花儿是给我的吗？——他已把万用旅行包放进小车行李仓，但是不经意把那枝玫瑰和手提箱带进了屋内。

——那是献给墓地的。——

——多可爱的举动。——

他无法对她撒谎。——那是我女儿让献的。她早上回家了。——

——她真好。我也应该在路上摘一些花。——

一个从来不事化妆的女人的脸和她的身体是协调的。汉娜美丽的睫毛沐浴着早晨的阳光，一闪一闪的，她嘴角上方的茸毛在早晨的阳光中显露了出来，像小猫的胡须一样闪着晶莹的光泽，看着这一切他也就看见了她的全部，他明白了毕加索为什么把女人的所有器官都在画的正面表现出来——头、双乳、眼睛、阴道，鼻子、臀部和口——好像它们从来就是一起出现，哪怕只是偶然一瞥都能对它们一目了然似的。——在他自修的那些日子里，毕加索的画的复制品可是叫他大惑不解的。假如没有汉娜，他能明白什么！

她托起他的手，把她那既大又柔软的脸埋在其中，同时吻他的手掌。抬起头的时候，她的脸颊胀得红红的，因骄傲而热辣辣的。——我真高兴你被选为墓地演说的人。——

星期天的安宁。

往返于黑人居住区和市区之间运送黑人，一路播放强节奏的南非音乐的小型面包车，现在装载的是一种奇怪的货物——白人。黑人区街道委员会的人提忠告说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带进去，车子本身的性质会告诉集会的黑人，这些来自黑人区之外的使者是获准而来的。

穿过白人住的郊区，一路可见保龄球场上一些高年级的男生和戴镶边帽的女生模样的人屈膝跪在球旁，射箭俱乐部充满了罗宾汉式的奇情异想，私人园子中传出星期天照例打网球的人的高呼，穿着带尼龙饰边的黑套装的教徒正在离开教堂，还有一些年青女郎带着装满衣服的小柜赤脚漫游，她们的工装裤自大腿处剪掉了裤管。一路上还经过一扇扇上方饰有灰泥老鹰的电动大门，以及顶上装有铁刺和尖玻璃之类的围墙，围墙内有孔雀尾巴一般的喷泉在花朵上方绽开，还有鸟儿在歌唱。星期天的安宁。假如不是由于小面包车上漆有它的主人所在的黑人区的名称和地址的话，这一行人马没准会被当作去野炊的慈善捐款者哩。时不时地有没有注意到车子开来的步履缓慢者使车子减慢速度。

机械骑士们——裹着厚厚的钢板和锁子甲的军车——镇守在通往黑人区的岔道口，车前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士兵分腿站着，他们带着自动滑膛枪和R4型步枪。

对大多数坐在小面包车中的白人来说，那些黄色的钢甲军车，那些被黑人们形象地称为“河马”的笨拙的褐色装甲车以及那些手中掌握着死亡力量的呆头呆脑的家伙就像孩子们玩打仗游戏时排列起来的玩具一样；或者说就像某个人一按电视机的节目选择钮就闪现在屏幕上的一小串画面一样。起居室的电视中的暴力是那么单薄，一个在起居室走来走去的人的脑袋的阴影就足以使它模糊不清。而现在不同，你能看见某个警察前臂上的汗毛了。不管旁边座位的人是否站起来，不管他是否左右晃动，装甲车和警察的枪总是在那里。空气的钢鞭在阳光下挥动。德国狼狗——一度是令人惬意的美的爱畜，如今夹着尾巴如临大敌似地缩着身子，随时准备发起进攻——也成了训犬警察控制在手里的武器。

每一辆小面包车上都有一个司仪，车上每一个人都受到了行动指导：镇静地接受警察的挑衅，把舌战留给指定的人去进行。有些人站起身舒展他们的脚，以证明他们并不害怕，不过他们还是奉命坐回了自己的座位。各团体的律师们和民权领袖们在和来自黑人区的同志们一起商议对策，这些同志是乘一辆时行时停，行动迟缓的破旧的美国车来会面的。其他的人在与警察交涉。人群时而散开，时而聚集，一些在打手势的人一会儿挤进这一群人中，一会儿又离开跑向另一群人。人们一边争论，一边移动，从封锁线的这头走向那头，在争论的竞技场上走过来走过去；这一切有如一幕哑剧，坐在小面包车中的人们伸长脖子想探知其中的意味。看那儿！那个警察在挥舞拳头！噢我的天，你看见了吗？就在河马旁边。他打他了，他打他了！噢我的天……没没没有谁受伤！快看那些野蛮傻瓜，其中某个家伙没准会像搔痒似的轻易扣动扳机……噢你别担心，在向我们开枪之前他们会三思而行的——我们是白人……那个少校或管他

什么军衔的人——他走开了——发生什么事了？不，他没有走开，他不过是在发号施令。他们在逮捕某个人！逮捕谁呢？看不清楚——噢，我的天，那是戴夫！戴夫·西顿。不，那不是戴夫……

惊恐和激动被焦躁和一种新的厌烦取代了：在非常形势下是否可能厌烦呢?在某一辆小面包车里，一个穿短袜的凡俗修女在让大家轮流喝装在一个塑料瓶中的水，于是有了薄荷糖纸被剥掉时的沙沙声。区别在于，假如我们是黑人，我们至少也在放声歌唱。嘿，唱起来吧！我们被嘱咐不要参与……歌唱！不要歌唱！可不，自由的歌声能成为一种挑衅……谁知道歌词……一些学生知道，他们属于向黑人学习的新的一代；但自由之歌需要音量，而来自教堂和民权运动组织的老人们只能用微笑表示他们的支持。

一个年青的女司仪拿着步话机跑过来跑过去。她全身的一切都处于运动之中，长头发、一对乳房和橡胶带凉鞋都在起伏旋动，与带着武器一动不动站在岗位上的警察形成对比。她爬上每一辆小面包车的车窗，受到骚扰却在露齿笑着。——他们说我们不能进去。但是阿兰和戴夫让他们看了法规，那是违反法律的，他们不能阻止我们！——没等别人提问题她就溜下车窗跑开了。人们在咕噜咕噜地做着各种推测；别人的沉默中隐藏着失望——或宽慰。谁能从他们脸上分辨出这些情绪呢？过了几分钟，那女郎又跑过来了，一路上用她张开的手指把头发从前额高高地梳向脑后。——他们说我们会被杀死。我们进去是拿自己冒险。——她在努力抑制自己兴高采烈的情绪。她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坐在面包车中的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她已经走开了。有些人爬出了面包车，聚在一起交换着意见和听来的谣言，有的口出豪言壮语，有的表示应谨慎行事。司仪

们像护羊狗一样在他们之间走来走去，让他们回到面包车中去。谁都没有坐在先前坐的座位上，每一个人都竞相说话以引起注意，我认为，我说过，我曾告诉……接着律师们轮番发表了高论。然后是一阵沉默。——我们已决定进去。街道委员会的同志们即将来护送我们进去——里面有很多他们的同志而且一路上他们都陪伴我们。但是，假如有人出于家庭原因或其他考虑觉得他或她不应忽视警察的警告，那么他和她现在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离开我们。有车送想回城的人回去。请自便。这样做不会招致任何骂名……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之中没有谁会做出任何冤枉人的结论。所以……——

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勇气站出来并且离开，没有比那更可怕的了。像是窒息的一个片刻。然后所有人的脸都转向他：——你们准备进去？——大家欢呼起来，互相喝彩，为他们自己喝彩。假如此后再也不能相见了，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把这一时刻视为自尊的时刻。那些河马、警察、士兵、军马、狼狗和枪支让开了一条路。黑人司机们已习惯于每天和警察周旋，因此一直带着受雇的旁观者的超然在聊天和抽烟，但这时他们跳进了他们的车子，带着乘客们向乘客中很多人从来未去过的地方驰去。

穿过草原。

汉娜坐在其中的一辆小面包车里，当然，她从前已很多次穿过草原往返了很多城市、小镇和村落之间。她静静地坐着，沉湎在太阳镜给人的幻觉之中，以为太阳镜有一定的掩蔽作用，使戴它的人能够想最为隐秘的事，无疑她周围的人也有各自不同的秘密思想——她忧虑的是索尼是否选择了另一条通往镇区的路而躲过了警察。——而最令同她肩并肩坐在一起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是——他将在墓地对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对她说

的。因此此行对她与对别的任何人都不一样，她从前经常遇到警察的干涉，她已成为他们的电影明星之一……假如某个警察从被护送来的白人队伍中认出她来(她摘下太阳镜)，他很可能知道那个即将在墓地演说的前政治犯是她的情人。有时在她和便衣警察对视的时候，他们的奇怪眼神向她证实他们了解她的隐情。

面包车队进入了黑人居住区——它是经历三代在山谷中成长起来的——进入了星期天密密麻麻的人群之中，平时所有的人都分散在草原上的各个工厂区和城里，一到星期天所有的人都挤回了谷地。每一个人都回家了，以街头为“家”，一个没有栅栏的住所，断墙残垣间有人栖身，摇摇欲坠的栅栏间也是一个住家——其中有罐头盒、车毂盖和正在腐烂的木板等等，一个个垃圾堆图腾。工人们晾在外面的粗布工作服是挂起的一面面旗帜，上面呈十字形绣有各建筑公司和不含酒精饮料厂的广告标志。坐在面包车中的被护送的白人颠颠簸簸行进在溪谷和坑洼——也就是街道、孩子们挖的沙坑、漫流的粪水以及猪、鸡和狗出没的草场上。如果说路不是像白人所习惯的那样是由弧形路面和人行道边的小沟界定的，那么界定它的就是跑向面包车队和在它前方分站成两排的人。一条被往车窗里张望的黑人的脸庞夹在中间的路，两边的黑人靠得那么近，面包车不得不把车速放慢到和黑人们步行的速度保持一致，免得把人撞至车轮之下。这不是野炊会；车中的白人立即发现自己处在黑人的包围和注视之下，他们盯着这些黑人，正是这些人曾在公路干线上用石头袭击白人司机，正是这些人把这个地方从白人当局的手里夺了过来，正是这些人发起反抗白人不许他们在草原上太近的地方居住的斗争，并且拒绝为他们在这一消耗战的日益破烂的废墟上生存的权利付钱纳税；这些人处死与警察勾结

的人，因为他们无力阻止警察杀死他们的孩子。尽管黑人们住在草原另一边，为了解黑人大家都从报纸上看有关他们的情况，读到的都是这类东西；汉娜感觉到车内同伴的恐惧像温度一样升高了。她打开身旁的车窗。进入车内的不是石块，而是一只只黑人的手，它们先是触摸她的手，然后是车内所有把手伸出去的人的手。所有的车窗都打开了，车外的黑人挤挤撞撞地涌上来承受车内白人的手的祝福，那能祛邪消灾的接触，有些人从未见过车内的白人的脸，却握住这些白人的手，直到车子的行进使他们不得不把手松开。车外人群熙攘，无数张表示欢迎的脸在涌动。"万岁！万岁！"欢呼声此起彼伏，在白人们跟着这样喊的时候，黑人们更是群情高涨，此外还有那语调深沉、含糊的古老的问候——"nkos"，这一问候语太古老了，没人理解它的意思，只知道现在如对白人这样致意便意味着可耻的奴性。在周末醉酒者迷雾般的微笑中，白人队伍也是众多幻象的一部分，这些幻象使一周的劳动的现实变得虚幻，使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人群开始歌唱了，当然也跳起了"托依托依"舞，一边跳舞一边跟在车子两边前进，车子里面的大多数人都庄重地响应，举起拳头局促不安地显示出某种帝王挥手一般的庄重气派。

在墓地汉娜见到了他。索尼，被捕者，政治犯，温柔的情人——这几重角色第一眼就同时进入了她的眼帘。他和马耶基索神父及几个来自反征兵组织的白人站在一起。她注视着他黑色的鬈发被夹带尘土的风从头上高高扬起，在随同车的白人代表团一起前进时，她被一个破旧的纸花塑料圈绊了一下，一个衣着破烂肮脏的黑人男子迅速拉住她并把她扶了起来：对不起，对不起。他们都来了，除了跟随车队的人，还有从黑人区各个方向涌来的人。这些人身上还残留着头天晚上的炊烟留下

的刺鼻的烟熏味。旧坟和歪斜的十字架在活人的脚下消失了。人群在九座新坟前停了下来。汉娜想说——只对他说，他和马耶基索站在那里——这些不是坟墓，还不是，远没到时候，它们是床，那九个躯体蒙头睡在里面，长满细草的红土是他们柔软的被褥。她知道躺在土里的那些小伙子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六岁之间，她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她从她买的那束鸢尾花中摘下一些花朵并把它们给了周围的人。

黑人们习惯于拥挤。他们挤在一起排队等车，等工作许可证，等住房分配，等决定他们的命运的盖章的所有证件；被装在过分拥挤的火车和汽车里往返于草原上，一大家人住在一间房子里，他们没有自己的空间——看不见的另一层皮肤——白人们则各自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做什么都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只有在做爱和与孩子们亲近时除外。但是现在。在墓地上，白人代表团的成员们不仅彼此分开了，而且他们本能地保持的自己的空间也消失了，他们被溶进了由黑人区的大众組成的在涌动的、巨大而单一的群体之中。那个凡俗修女紧紧贴在一个黑人男子的胸前。一个赤裸的小阴茎在一件衬衫下摆来摆去的黑孩子紧抱着一个白人教授的腿。一个白人妇女的法国香水味和一个黑人醉汉的汗味混杂在一起，像是他们俩共同的呼吸似的。但这些都没有使白人们感到惊恐；事实上，与别人接触、对别人的体味和体热的那种古老恐惧已消失了。所有人的身体合并成了一个基本的身体，具有一致的呼吸和一致的心跳，而上方是下午无限开阔的天空的自由。

某个人做了一个手势，白人们随之转过头，墓地这边与黑人居住区相对的山头上，所有的警察和士兵都集合起来了。黄色的军车和褐色的河马形成了一条地平线，它们前面是骑兵，最前面的则是步兵。他们半蹲着，他们的步枪和槽膛枪直接向

下瞄准这个身体，这个由与会的所有人合成的身体。黑人们对此不屑一顾。警察和新兵混在一起，大部分情况下都很难区分他们，因为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迷彩服，一起在黑人区的足球场驻扎了好几个星期了。他们是躲避不开的。他们是生命；也是死亡。他们枪杀了躺在墓中的那九个小伙子，坟上的泥土至今还是松的。

神父带领大家用特瓦萨和佩迪土语祈祷起来，接着圣歌，声音的旗帜，被扬到了空中，被送到了山头的阵地。几个拒绝应征加入山头那些人的行列，随时准备为这一决定坐牢的白人小伙子中的一个向与会的群众阐明了白人为什么来和黑人一起集会的原因。我们来这里是想让你们明白白人来这里并不一定是为了杀戮。我们来这里是想分担你们为我们这些兄弟被杀感到的愤怒与悲痛。我们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们我们决不会加入那些对你们实行杀戮的军人或警察的行列。口译员把这席话译成了黑人们自己的语言之一，于是群众中响起了一支支歌唱自由的歌，但是街道委员会的同志老练地带领大家转而唱起了圣歌；一定不能让山头上那些全副武装的旁观者找到任何借口说这次集会是一场颠覆活动。

汉娜了解索尼的演说。就是说，她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政治纲领的方式，只要切实可行，他就会采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一部分是从他和她的长时间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他内心的某一源泉，就像从人类还是由别的什么元素构成的生物的时候起，大海就已在人类的血液中一样。她不知道他体内的那种原始元素是什么，他也设法使她了解他这一点。他或许甚至会觉得，这一原始资质太单纯、简单，因而为它感到羞愧；他不知道她把它看作他得以吸引她的一种品质，比他们之间共享的任何东西都更有魅力。她把她不会对任何人说

的话留给自己，当然不会对他说——他的奥秘：他是一个好人。

索尼穿着她给他的那件手工染的紫红色衬衫，衬衫耀眼的色调衬出了他的黑色——谁也不能说索尼不够黑因而不能成为黑人的代言人，无论从他的肤色还是行动看，他都当之无愧！假如他要谈论拘留和监禁，他本人就在监狱里呆过；假如他要谈论那九个遭警察残害的小伙子的死，他本人也曾拿自己的生命冒过这种死亡之险。他的存在使她确信：这才是权威的真正含义，它和山头上武器的权威截然不同。假如他使用政治词汇，因为有些词和成语已成了每个人都理解的代号——不需要任何翻译，即便它们是用英语表达出来的，在每一个听众耳中它们也都带有索尼本人的挫折、要求和欲望的意义——但这类词汇通常导致的矫揉造作的文风与索尼是无缘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演讲的时候，他从不事先想好该做什么手势。在进行反问的时候，就像平常谈话一样，他会双眼凝神注视某个人，而对方的反应也会影响他自己的见解。当他在解释某一观点之前稍做停顿的时候，他不会为自己造成的暂停感到尴尬，相反他自信听众会接受它，而且他往往会加上在私下里讨论问题时常用的手势，以便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明晰，也许是把手掌转过来并低下头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在其中追寻血脉的运动。他还具有即兴发挥的天赋，常常把他对他前面的演说者的反应融合到他自己的演说中，因此他的演说从来不像是事先准备好的，相反，好像来源于他的同事和眼前的听众的活力。注视索尼，听索尼演说的时候，她感到她终于能够为真诚下定义了，而且——真诚决不是一味说自己的观点。她还理解了坦率：坦率，一种美丽却危险的东西。为非法之爱找的借口使得爱的各种情感有可能坦率地表露，为拒绝找的借口使得坦率的拒绝在一个说谎的社会里成为可能。索尼曾经说过，压迫者们所称的颠覆活动暴露了

政府的腐败。

我们今天纪念的这九位同志的死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九个人几乎还没有长成男人，但在反抗那些在你们的家里包围并恐吓你们的人的斗争中他们却是男人。这九位同志以及其他成千上万被种族隔离政策的代理人、警察、军队杀害的同志，已经为这场斗争献出了这场斗争将为我们赢来的未来生活中属于他们的那一份。他们再也不可能和我们所有的人在未来的日子分享这个国家的财富了，今天我们的劳动只是为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三的那部分人提供了世界上最高水准的生活，而同时全国的其他大多数人却养不活他们的孩子。他们再也不可能体验将来离开黑人隔离区(如这一个)而住进有电和清洁的自来水的体面的房屋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再也看不到未来的那一天了，在未来的日子我们生病时不会再躺在种族隔离医院的地板上而为白人专设的医院里却摆满一张张空床。再也看不到那一天了，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年迈的父亲和母亲再也不会只得靠只相当于白人所得的零头的那点养老金挨饿度日了。他们再也看不到不分肤色和种族的统一的开放教育，即我们的民主教育，成为现实的那一天了。再也看不到拆散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儿子，制造出娼妓和无家可归的街头弃儿，并使被称为“艾滋病”的可怕疾病广泛传播的游牧式的劳动制度成为过去的恐怖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在我们的土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土地上自由地阔步了，他们所经历的只是在一天的劳作之后被送回都市的垃圾堆(像这一个)，被送回位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内却被冠以种族名称、被称为“外国”的郊外贫民窟。他们再也不可

能在我们的斗争将创造的那个单一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国家中生活了。他们死去而没有自由；但他们已为自由献身。为我们的自由。我们已听到一位年青同志的心声，尽管他是白人，但他没有加入山头上把枪口对准我们的那些人的行列。城里来的白人同志参加今天的纪念大会，这无疑证明九位烈士也是为他们的自由献身的。正是为了全国所有希望看到压迫被摧毁并且随时准备为达到这一目标而投入这场人民的斗争的人的自由，他们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这九位同志的死对我们的意义。

这么年青的小伙子们死去了，人们谈论一种没有意义的死是不足为怪的。生命竟然这么短暂，被这么野蛮的扼杀了，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愤怒。诚然，对那些上个星期枪杀这九位同志的人来说，这些人的死没有意义，因为这种杀戮以及黑人区和监狱的其他所有杀戮都无法阻止我们去赢得我们的自由。对这个政府来说，这才是埋在这里的九位年青同志的死的意义。这才是死给我们的启示。这些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再多的杀戮都不能使对我们的人民的压迫继续长存。对我们施加的任何暴行都不能阻止我们和平与正义的斗争。

无人知道演说内容到底有多少随风传到了山头的阵地上，但那一次次在预期的时刻打断索尼的自由的呼声（索尼知道在何时为它们停顿一下）一定传到了那里。有那么一两分钟，马耶基索神父在纪念大会结束前的祈祷没有平息仍然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呼声。深沉的“阿门”声传遍整个人群，好像要把人群带向那些新坟似的。同志们稳住了他们；墓地一片沉寂。一阵阵风在雕凿泥土松软的新坟。沉默来自那底下，来自时间之外，

使得汉娜不知道它到底是持续了几秒钟还是几分钟，她只知道在那种沉寂中她忽略了索尼，在那种沉寂之中他不存在。沉寂过后那个修女走上前跪在地上；同时把一支花放在坟上。人们排成凌乱拥挤的队伍从九堆坟墓旁走过，把一束束用亮闪闪的锡箔包好的花枝放在坟上。黑人们纷纷到墓地四周寻找鲜花。小孩们还误以为那些花儿是给他们的礼物哩。汉娜带的鸢尾花分别由很多人放到了坟上。那九堆新坟很快变了样，披上了转瞬即逝的盛装；色彩、香味和花瓣都不能持久。她又见到索尼了。他正在把他女儿的玫瑰献给死者。他们只相距几英尺远，彼此隔着坟瞟了瞟对方，好像彼此是互不知道姓名的人似的。

墓地边缘的人群开始疏散了，人们慢慢地开始离开墓地。小孩子们如获至宝似地拿着单朵单朵的花在奔跑。年轻人则一边怀着敬意离开死者，一边放声歌唱，我们欢迎你，曼德拉，召唤我们吧，曼德拉……用的是进行曲的节奏，歌声柔缓和谐而不是慷慨激昂。汉娜和其他的白人跟上他们的速度，随人流一起前进，人群从身边涌过，生命正在离开墓地。在后面的某一个地方，索尼、马耶基索——纪念会举办委员会——被街道委员会的人、老太婆和醉汉拦住了，这些人想摸他们的手，以求获得据信重要人物能够散发的某种说不清的福佑。接着行进的人群中出现一阵地震般的骚乱。没有叫喊声，但所有的人都开始彼此互相碰撞了，某个人突然停了下来；就在那边，山上的士兵和警察端着枪朝参加集会的人冲下来了。有秩序地疏散的人群一瞬间惊跑狂奔起来，年轻人跑在最前面。人们一边跑一边从衣服的某个地方掏出一块块布，或从头上摘下头巾，把它们扎在自己的鼻子和口上面。白人们尴尬地小跑着，他们不习惯于被迫逃避任何事或任何人。某种愚蠢的尊严感，某种安乐椅上的勇气观约束了他们。就连汉娜都从未经历过黑人们每

天都准备承受的这一切，黑人们随身携带抵御催泪瓦斯的布块和头巾，就像白人们携带信用卡一样。一枚枚榴霰弹在人群后面炸开；恶臭的硝烟追逐着人群，接着一声枪响——子弹横空而过，也许只是警察和士兵在垃圾和灌木间穿行时走火——像鞭子一样在人群上方抽响。

汉娜年纪不大，她那两条长斑点的强健的腿能使她跑得很快，但是某种痛苦的制动器在违抗这种逃命的本能。她想停住脚步；她停了又跑，跑了又停，不时和别人相撞，不时向后看看，向各个方向看看。这时出现一声尖叫；警察已从山上冲下并进入人群，充满恐惧的哭号声被干巴刺耳的枪声打断，那些枪声像钢一样坚硬，它们四处横飞，穿透皮肉和骨头，直抵正在挣扎着想逃走的心脏，直抵发出惊叫声的喉咙。她在往回跑了，从旁边侧翼返回，被挤到了边上，有时则被某个执意冲一条出路的人抓住。她受到了催泪瓦斯的侵袭，风又把它吹向了小山，她的双眼在流泪，透过泪水她看见了他，索尼，他乌黑的鬈发亮亮的，两道粗粗的眉毛横在绝望的眼睛上方，那双眼睛像他头上的两个黑洞。他那么用力地抓住她的手臂，差点使她的手臂脱臼了；她想她正在为见到索尼而哭，催泪瓦斯弄出的眼泪是某种别的东西。——到面包车中去！到面包车中去！去！——她挣扎着不愿离开他，他则推开她让她去面包车中，接着又传来枪声和尖叫声，他开始和她一起跑了，好像他和她是被链条锁在一起似的。人们飞也似的奔向他们那些位于黑人区街上的蜗居。远处的黑人区，成百上千的黑人聚集在墙上和屋顶上，眼睁睁地看着发生的一切，他们的低语汇成一曲喧嚣的哀歌。马耶基索神父与索尼和汉娜跑到了一起，他的手臂高举着，他正在用他自己的语言大声吟诵；但是惊慌的人群从他们当中的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的代表身旁狂奔而过，

没有什么能够驱散这些人的恐惧。接着是一声和别的枪声一样的枪响：这一次一个年青男子扑面倒地，刚好在索尼，马耶基索和汉娜的前方。人们尖叫着扭头就跑，拚命逃离已被射中的目标；一个妇女跪倒在那个倒地的小伙子身边，哭号着把他翻过身来。翻转他的时候，鲜红的血液从他那坚韧的黑发丛中涌了出来，鲜血模糊了他那件工会T恤衫上的口号：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

由于进攻来自各个方面，索尼和汉娜被狂奔的人群卷走，他们想变被动为主动，转过身子试图冲出一条路返回那个小伙子倒下的地方。马耶基索和他在一起，那个妇女在歇斯底里地捶地哭号。这一场面一下子显露出来，一下子又被逃命的人群挡住了，然后再次出现，再次消失，索尼和汉娜左冲右突想返回小伙子倒下的地方，和别人的肩膀、背部和搞动的手臂冲来撞去，这时子弹开始擦着他们的头呼啸而过。索尼突然盯着她，好像在进行一次可怕的发现似的。他的脸被极度的痛苦和神智紊乱扭曲了。他用他举起的手把她的头压下，然后他们又跑了起来，随人群一起逃走。

在索尼的车中，汉娜张着口喘着粗气，两个口角都流着口水。——别的成员会找我的……没有我，面包车不会开的。——

——司机们看到我们了。他们会告诉他们你和一个人走了。——

——我担心他们会以为我出事了。——

他一时间没有回答。他的头耷拉在放在方向盘上的两只手上。然后他恢复了神志。——汉娜，你没出任何事。——

她那只一直被他紧紧抓着的手显得毫无血色。像情人们在这种时刻想象的那样，她确信她会对他抓住她的手时的那种感觉至死不忘。

那么，她溜出厨房为他做什么呢？他们在走廊里说了些什么呢？现在，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我保密了。她没有权力背着我和他谈话。

我走到厨房的窗户前，然后我看清了——噢，她把万用旅行提包给他了，那就是她离开的全部目的。我看见他在进入车中之前把旅行包扔进行李仓内。

我回到餐桌边时我姐姐当着我的面把我的盘子推到一边。——你想窥探他的什么东西？你以为你在试图做什么，伙计，想暗示……“我从没有要求得到它”——

——噢我知道你非常乐于被收买——他允许你离开家而住在别处。离开妈妈。离开我，让我和他们呆在一起。——

——假如你那么纯洁，那你为什么接受它！——她又在说摩托车的事了。

——让我自己呆着吧。你不住在这里。不过跑来吻遍他全身，把你那些该死的衣服拿来让她像个仆人一样缝补。

——听着，伙计。你的麻烦在于，你长不大。瞧你下巴上方那个大大的笨东西，还长着头发哩，但怎么说也是——发育不良。这是自愿的。——

现在我禁不住要嘲笑我姐姐了，我怎么也不能让她为我把她当回事而洋洋得意的。——嘿，这一套你是从哪儿捡来的？搭上某个学心理学的男朋友了？还是学医学的朋友？这就是你在你那堆迪斯科朋友中津津乐道的废话？噢！噢！——

——你一个朋友也没有，这就是你的问题。你皱着眉头在屋子内外四处游荡，一副鬼迷心窍的模样。——她停顿了一下，蛮横地圆睁着眼睛瞪着我，简直可以说是在威胁我。——家以外还有个广阔的世界。

——没错，还有抽大麻烟、四处歇宿及与任何人厮混。我们不相信你竟会去工作，一半时间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她像放下武器一样放弃了对我的进攻。——说得对。——

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毛病。她坐在那里撕她剩下的面包皮；我母亲历来都强迫她吃下面包皮。一个惊人的念头顺理成章地闯入我心中：——你没有怀孕吧，对吗，贝比？

她用她那做作的方式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把头和头发甩向后面，她在大约十四岁的时候就学会在男人们面前这样笑了——其中甚至包括我。——当然你想象不出我会发生别的什么事！噢可怜的威尔！——我也笑了起来，感到一阵轻松，为我母亲轻松。

但是我母亲进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她，免得她看出我的厌恶情绪。经过与我父亲的谈话，她的气色好些了（管他谈的是什么），谈完之后他又去执行他的一项重要使命了（黑人中有那么多的葬礼，有那么多的“扫墓”活动；有了这类托辞，他就有足够的理由在星期六离家外出了）。她知道——我们知道——假如我回避她她就会失去主心骨——这不是说我能引导我的母亲，我太年幼而且无知，没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我的关注对她来说有点像一个平常的旧袖珍电筒，我把它握在手里倒退着走在她前面，凭借它的亮光，她得以沿着她自己的路前进。那个星期六早晨我做不到这一点。我知道那万用旅行包中装的是什么。她不在屋里的时候——他则几乎总是不在屋里的——我常

偷看他们的东西。那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它没法不强烈，因为他教给贝比和我的有关尊敬别人和自尊的原则之一就是永远不要翻别人的抽屉和读别人的信。(结果，过去我们姐弟俩在互相偷玩具和书的时候经常告发对方，于是少不了又是一堂矛盾的伦理课，噢——一个人不应该背叛。他让我自己去发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的自相矛盾。)

她惯于把那个万用旅行包放在卧室里她那一边的床头柜里——可怜的人，必须把它放在她的旁边，那么万一他在深夜被捕，她就立即可以拿到它。床头柜上头的架子上放的是护肤霜，她用它们保护她的皮肤——为他。我过去经常闻到她手上的香气，假如她在我们姐弟俩有人做恶梦的时候进入我们的卧室的话——贝比和我共用的卧室，在柏诺奈的老屋里。她在那个万用旅行包里放有牙膏和一支仍然用塑料薄膜包着的新牙刷、毛巾和肥皂、干净的内衣裤、袜子、睡衣裤、一件绒线外套。这一系列东西都暗示出她的恐惧，她生怕他下一次像第一次那样毫无准备地被捕，没带任何东西以保持他自身的清洁——这些用来体现自尊的用品对他是如此重要——和温暖：那件绒线套衫是她对他的爱的表示，不管那对他是否重要。她把万用旅行包给他，和那公文包一起提走！我怎么能看她！

我能感觉出她因我不理她而产生的沮丧，能听见她在怯生生地做着坚决的努力以缓解气氛，为女儿、儿子和她自己；像通常的星期天早晨那样在餐桌边留连不去，为她自己倒茶，低声问有没有谁想再吃一块烤面包。不过贝比在睁着眼睛看她。我看见贝比正准备开始说话，不过在说话之前，她深深吸了两口气，同时眨动着她那长长的睫毛。贝比一说话，我就立即把视线转向了我母亲，至少在贝比说话的时候我是站在我母亲一边的。——妈，我想告诉你。我不想再让你受惊了……——

在她想把她买的一袋土豆放进小汽车后部的行李仓时她在其中发现了那个万用旅行包。她打开旅行包，拿出里面的新牙刷、牙膏、毛巾、肥皂和衣服，把它们放到日常生活中它们该在的地方：洗漱用品放进浴室的小柜里，她丈夫的衣服则放进在柏诺奈时分期付款购得的衣柜中……在柏诺奈的日子，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全家外出的任务之一，就是用教师的薪水去交定期付的款项。

他看着艾拉从旅行包中拿出东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地忙碌着。

——真想不到我不在的时候她告诉你了。——

艾拉没法空出整整一个抽屉放那件厚厚的绒线套衫。她在慢慢地仔细地重新叠它。

——我是说在我离家之后。——

艾拉把套衫塞进抽屉并把它关了起来。

——你竟然不知道。——这句话用的是陈述语气。她不带挑战性地看着他。

——假如我早知道了，我还会不告诉你！——

瞧他说的什么话——好像他真的告诉了她什么似的。——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你是什么意思？你不会以为我与这事有牵连吧！你说呢？是那样吗？——

艾拉站在他们的卧室中央。真是滑稽——瞧艾拉，多么沉静，多么庄严，多么无恶意——但他感到他没法越过她，假如他试图走开她会走到他的前面。——那是我想你应该知道的事情。——

——可我没法知道。每个群体对别的群体的活动了解得越少就越好。但你对那是非常注意的——你是这样。尤其是在招募人员出去游行示威的事情上。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不管这类事

情。那是别的人管的事。她一定是和他们在一起——也许这几个月来都这样，而我们从前却不知道。她已受过很好的训练，这是显然的。她不想连累你——我们——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带着某种渴望；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与艾拉分享，她站在那里。——聪明的小姑娘，怎么说也是如此。——

——也许你还能看见她。我们不会知道她什么时候去。——

——你想要我说服她……——

艾拉慢慢摇动她那偏向一边的头，不是表示否定，而是对他的成功表示怀疑。

他突然产生一种冲动，真想冒险和艾拉谈谈，真正地和她谈谈，他感到所有的一切都在横隔肌下面往上冲：说，说！——这整个事件真使我感到不知是何滋味。

——重要的不是你感觉到什么，而在于你怎样感觉它。——

——我想我不能相信此事。我的感觉不是这样。贝比。她已搬到外面去住，由于这一点我想念她，我一直在想念她，那是不一样的……没有她……而现在她不回家，出于另一种原因。——但是他在说的一切好像都是别的事；他带着像呻吟一样的哽噎停止了说话。他感到自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一步之外就是艾拉，艾拉——

她拿起那个空的万用旅行包并把它夹在右臂之下。她在等待着；但这是否纯粹是她的礼貌，那种即使在他们亲近的日子都从未被忽略过的礼貌呢？艾拉，艾拉。他感到一种可怕的诱惑，真想撕开她的衣服，哇地大哭起来，进入她之中，毁掉他自己，就像他的贝比在切腕时无疑可以毁掉她自己那样。——你不太心烦吧，艾拉？我能做的是……我能尽力使她明白她不必卷入任何如此危险的事情之中……但你好像是安然处之……？——

她脸上带着巨大的悲哀看着他。他以前从未见过那样的脸色，尽管他知道自己疚有应得。她脸上还流露出痛苦，她拿不准是否为他而痛苦。

——事情不像那一次那么糟。——

艾拉，艾拉，她那样说话。那一次，他并不是在墓地演说，他和他的情妇躺在床上。他记得他搜断枯肠找到的对艾拉说的唯一的话是：会留下疤吗？现在她相信，她的确相信，的确信了，是他把他的女儿变成了一个革命者，让她去流亡，住在营地，永不回家，或许还去死，即使那一次她没有流血至死。他已做了这一切，尽管事实上他甚至根本不知道她已加入黑人战斗队。这一事实并不是所有的事实。

危险逐渐从他身边流走。他的心脏每次跳动都犹犹豫豫。艾拉用手臂夹着那个万用旅行包走了出去，他则跟在她后面。她把旅行包放进客厅的柜子里，其中放有旧报纸、清洁用具以及他们用以把他们的家当运进城里的那架行李车。他拿起他的公文包离开家去找汉娜，需要汉娜。

一阵风暴横扫天空。隆隆的巨雷像坦克一样滚过，道道闪电划破下午乌云密布的天空。

就是说他们睡着了：他的眼睛盯着百合花。这些百合是他从一个街头小贩那里买给她的，那天刚好是扫墓纪念会前一天。上个星期他送给她的是玫瑰。红色的玫瑰，像伞一样合拢着花瓣；玫瑰有性的香味，她说，百合则有性的形状，和汉娜在一起的时候他发现了所有这些欢乐。在这类被夸大的感觉中，他们走出了睡乡。

两人都醒了，但还没有醒到可用正常速度说话的地步。一到她的别墅他的情绪就改变了：女儿的出走——她已完全出人

意料地投身到了革命之中——变成了一件值得骄傲和激动的事。——她自己做主！她自己做出了那一重大决定！我那个小女孩！——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了和艾拉在一起时被掩盖的东西；被艾拉本人的存在掩盖了。

汉娜被感动了——也感到骄傲，为他而骄傲。汉娜的情感是他和她所共有的那个献身的世界的情感，是经过险恶的环境锤炼的情感，它使人能胜任在家庭事务中不会遇到的各种局势。汉娜曾安慰过那个女孩，现在她正走向自由战士的训练营地，而在她父亲受审的那个时候她只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小孩；汉娜安慰她时不是“像一个母亲”，不，而是像一个对另一个人(索尼)的处境毫不陌生的同志。在那一天和今天之间有某种细丝般的连续性。和汉娜在一起他感觉到了他应该感觉的东西。现在他的贝比不再是从前那个小学教师的纤巧的小女儿了。艾拉必须明白他们不再是卑贱地住在柏诺奈城外指定的地方……

他对贝比的高昂情绪自然地转化成了对汉娜的强烈欲望，没有任何玷污它的嫌疑，因为在她体内——需要汉娜——性快乐和政治热情是合一的。他们没有脱光衣服就做起爱来，然后两人就睡去了。

他在似醒非醒的迷蒙中注视着那些百合花，各种支离破碎的印象和回忆在这种恍惚中联成了一体。贝比的玫瑰。坟堆上鲜花的花瓣和叶子，汉娜……她的声音，有一天他们正在谈话，批评黑人运动中的某个人……——但所有的行动都出自自我保护动机——荒谬吗？假如某个人溺水了，我跳进水里去救他，我的同情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同情——没错——燃起我的勇气，因为我是神圣的)？是不是由于我担心在我落水的时候别人会走开，对我见死不救呢？——随着心脏的一阵挛缩他突然被惊醒(监狱里耀眼的电灯泡瞪着他)并明白了在他全神贯注于贝

比的事时被完全回避的东西。在他们做爱和睡觉之前，它一直没有显现，不管在谈话中还是沉默中。那个被枪杀的人再一次倒在他们前面，而索尼自由的身体，因受逐渐灌输给他的那些原则以及柏诺奈黑人区的陈旧宣言的驱使，转向后面并拚命想钻过人群去扶起那个倒下的人，然后一颗子弹差点打中她的头部，离她的金色头发还不到一英寸，于是他违背初衷并和她一起逃走了。马耶基索在那个倒下的男人旁边；马耶基索瘦骨嶙峋的额头汗淋淋地闪着亮光；这一不相关的形象在他脑际萦绕着，证明了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无论如何，那个年轻男子很可能死了。根据传闻，马耶基索也死了，没有谁去想这能有什么意义，料想他是在向那个死去的男子俯下身子时被枪杀的。有幸的是(这是上帝的意愿，戴十字架的马耶基索会相信)那些子弹都没有打中马耶基索，尽管他并没有回来。

柏诺奈黑人区的陈旧宣告：不要为自己个人活着，等等。不仅仅为自己个人活，那样才合格。她不是一个个人；她不是，那个倒下的男人也不是。她和他都有另一种生活——自我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是跑开，还是留下，这是在她和那个倒下的男人之间作选择。谁能说出哪种选择更有价值呢？这个用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脖子的女人，她是不是一个个人，是不是他的所需呢？

救了他自己。

从现在起有某种东西他永远不会说，不会对任何人说，当然也不对她说。

假如她得意地把它视为爱的证明该怎么呢？女人的沾沾自喜。那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呢？会影响他对自己的判断。会影响他的信念，也就是，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妇女，他和她的关系形成于一种特殊的，不同的道德——在斗争中对爱的意义进行

的痛苦的重铸，它使得他能欣然接受和他自己的女儿的分离。

但是她的心游离在他的心的外围，也许通过他们的肉体接触，不是在探寻他正在她旁边经历什么，而是绕着它的危险氛围盘旋。——当人们借助暴力检验到底谁对谁错——你明白我的意思——这种斗争并不比压迫更可取，因为即便是被压迫者施暴也是不正当的，那只能使被压迫者降格到压迫者的水平上，等等……那样做的人是天真的……甚至可以说是无知的。我的意思不是为他们辩白。但他们含糊不清地唠叨，像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而孩子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因为他们还生活得不够，因而不能把字词和行动的现实联系起来。这里的大多数白人都生活得不够——没有过这里真正的生活……假如你用最普遍的经历定义一个国家的生活的话。要是他们那一天在场，一次就够了，要是他们看见警察毫无理性地从山上扑向我们，当时我们正在离开墓地……他们大肆地开枪，有三个人被枪杀……那个小伙子，死了，要是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在场，这种暴行每天都在国内的某一个地方发生，只要他们能够亲临其境一次，他们就会明白人们要用能拿到手的任何武器杀死向警察告密者的原因。——

她已为他开辟了一条通往抽象概论之海的安全通道。

——是的，但不仅仅如此。假如你阐释何时暴力是必需的，那你就是在肯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它行不通。这种论点是难以接受的，即使在这里，即使现在。——

——噢索尼，在我们被迫认可暴力的时候，至少有一点我们在内心是明白的。我们知道军队极其整洁的军容不过是为了掩盖战争就是流血、痛苦、腐烂和污秽的真相。战争从来就是这一切。马格努斯·马兰所吹嘘ARSCDR①的高技术。那种异

① ARSCDR，估计是一种武器的简称或型号。

常精确的最新式的杀人武器，叫什么鲁依卡特，他们说这种坦克的射程和火力都超过俄国人和美国人制造的任何坦克。拿破仑的大军拖着冰坏的腿一瘸一拐地从莫斯科败退。日本人被扔在广岛的那个东西活活剥皮至死。这就是著名的军事传统。我们的战争——即兴出击的零散游击战争已打碎了军容整洁的堂皇谎言。再也不会在送行军乐中出征了。假如你在放置炸弹时自己被炸碎了，去收拾那些残骸的只会是警察。即使以劫机者和绑架者为例，在他们被围困时，要么是他们枪杀被劫持的人，要么是他们自己被击毙，或者两者都被丧命。除了痛苦什么都不是，任何战争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因此，假如我们不得不认可暴力，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是在替它涂脂抹粉。我觉得这对我们有帮助。——

——对我不是如此。我从未想过我会认可暴力，即使我可以不必自己去施暴……即使别的人可以替我去做。我参加各种会议，参与制定行动决议，这些行动所包含的反暴力……我们的暴力……想来理所当然地扮演着一个完全必要的角色。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它的，一个角色，我也这样称呼它。像在演戏时一样；我担任的不是那个特殊角色，但我是全戏的演员之一。

——你能自己去做它吗？——

但这是一个奥秘，索尼甚至不能说他不知道。在他当小学教师并远离政坛的日子里，他对这一奥秘没有考虑过，梦想过，尽管那时他沉湎于哲学玄想，在对权力——操纵生与死的权力的超宗教的奥义苦思冥想。他或许只能说，我具有的一切是做一个受害者的勇气。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风暴后的淡淡天光映在每一朵百合花向外翻出的单层花瓣上。它们像是湿漉漉的白色大理石雕，雌蕊从雕出的阴影中升了起来。

——没有香味。——她在回想他女儿的玫瑰，进行比较。他抚摸起她来。——你怎么会知道，你吸烟太多了。——他们之间一段长时间的宁静。

——你能使我把烟戒掉吗？——

——怎么戒？但愿你能告诉我怎么做。——

她转过身，用她那种眼熟的方式靠两肘支撑起身子，再一次看到他那黑色的微笑，那被黑色的鬈发环绕的轮廓分明的面貌，以及那双从她想象中的森林深处望过来的眼睛，第一次去探监的时候她就透过玻璃隔板发现了这双眼睛的特点。

而在他眼中，她面部的肌肉稍微有点前突，使她的双颊变得更加丰满。她的双眼——由于他生来就生活在柔和的黑眼睛之中，已有既定的感觉，因此他一见到她眼里的蓝色就感到新奇，没有一次不是如此。——告诉我怎么做。——

——我不知道。只有你能发现。——

到哪里去发现呢？是到她那对贴着他晃动的垂着的乳房间，还是到她那有点肿的苍白的双唇上，是到她腋下那颜色似海草的毛发间，还是到位于他进入她之中的那个地方之上、像被梳往额头上方的儿童的头发似的那束卷毛之中？不在其中任何一个地方。在别处，在他自己体内。

尽管他们经常一起谈论他的家庭，但她很少提及她的前夫；这是因为，而且他也理解，她很少想到他。现在，轮到他在她的心的外围游离了。——德拉克过去经常喝酒……喝很多。他曾想写些东西，他一直想写些东西，后来在他厌倦了法律的时候，他真的尝试了。大量地喝酒，这往往——好像是这样——我不知道——使他变得更加敏感。他常常说出一些非常美妙的话来。他常常告诉我他准备写什么。但到第二天这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显然，假如你以酒刺激灵感的话，你不得不立即写下

你一瞬间捕捉到的东西。那是头脑中稍纵即逝的亮光。一旦酒精燃尽它就烟消云散了。他第二天无法记住它。他从不写下捕捉到的东西。我发现酒竟那么能抹掉记忆；打开一扇门随即又把它关起来。这真叫人惊心。——

——你没能使他把酒戒掉。——

出于习惯，她的手不知不觉地从她旁边的地板上拿起那盒香烟，抖出一支并把它放进了嘴里，然后，在片刻的茫然之后，她把烟从口中拿了出来并尴尬地把它放到了枕头上。——不，我和他的事了结啦。我弄不清是怎么搞的。我不能为他做任何事。——

索尼陷入了恐惧之中，而从那张着吞噬之口的冰冷的泥淖逃脱的唯一途径是讨厌的怨恨——女人，这两个女人都有威胁和伤害的能力。而现在，这一个女人只有被人需要的纯真的能力，她正把她那抚慰伤痛的嘴唇歇息在他的嘴上，因此，随着床单的狂乱掀动，他翻过身子伏到了她上面。

他们为贝比比为我更感到骄傲，就连我母亲都是如此。直到获得从卢萨卡① 来的消息，我们才知道贝比走了，她去了那里，当时我母亲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像你在电视中看到的那样，我用一只手臂环抱她并轻轻拍拍她的肩膀。那消息是由一个男人，他的一个熟人带来的，但她只是在那个人离开我家之后才哭了起来。后来我没有看见她再哭过。

我获得三项荣誉和一份大学入学通知，因此他将通过他的白人同志兼朋友为我弄一笔奖学金。我准备学什么呢(一旦你中学毕业，大人们就会问你这个，他们不再屈尊地问你准备当什么了)?他对此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希望我能用上他那些破旧的《莎士比亚全集》之类，但我已报考了贸易专业。我将成为一个受过贸易专业教育的有文凭的商店老板，而说到商店老板，我母亲的一些亲戚就是，他们的经营传统是摆水果和蔬菜摊并把已变质的农产品兜售给黑人以骗取金钱。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我要做货真价实的大买卖，像那个出于慈善而给他一个工作的批发商一样，此人有时到我们家来，他也是黑人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他靠卖工作服给他和我父亲正在努力解放的被剥削的广大黑人发财——你所看见的穿在黑人保姆身上的褐红色卫生衫就是他提供的。

我父母想举行一个晚会庆祝我的成功。他们是否认为他应

① 卢萨卡为赞比亚首都。

请——他的金发女人呢？

我们仍然举行由我母亲主持的茶话会招待从柏诺奈城外我们的老家来访的祖母外祖母、阿姨大婶、堂表兄妹——我的祖父和外祖父现在都去世了。假如在我母亲和他之间不存在任何别的东西了，那一定是出于某种我不懂的原因他们才表面上共同张罗这类聚会。每逢这种日子他都尽巨大努力留在家。我不知道他会对他的同志们说什么，假如他们需要他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会对她说什么，假如她正等他去那间杂陈着她的乳罩和裤子的房里幽会。(我母亲总是用熨斗把我们的衣服，他的和我的，熨得平平整整的，把它们叠得那么美，你简直会以为它们是刚从衣服店买回来的。)

在那类星期六下午我也必须在场。有时我告诉她我想去外面某个地方，目的不过是想着看她那张可爱的脸全神贯注地注意我，并向我证实假如我不在场她会感到像是被遗弃了——但我当然不会真的去外面。我不会做她女儿做过的事，不会留下她独自哭泣。

亲戚们一边吃盛在椰子壳里的丰盛的甜饼和精制饼干，一边有问有答地谈话——甲某现在多大了，乙某结婚没有，丙某是否生小孩了，丁某现在住哪里——它们引发出标准的结论：那真好，噢真的，真是好福气，唉丢脸啦。还有对贝比的关心：艾拉，贝比在哪里？我们会看到贝比吗？我们最后见到她时她已出落得漂漂亮亮，现在一定更迷人了，我告诉你们，当时我正在看一部电影，我对妈说，那女演员和艾拉的贝比不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吗……

我母亲有她的答案。贝比出远门了。去海外了。

海外！噢那太好了。由于老人们对全家族中我们这一受过较高教育的分支感到骄傲，加之模糊地感到研究学问的地方都

被一劳永逸地赋予了特殊的名称，就像用“山上”表示“布道”，用“麦加”表示“黑石”一样(按照他们的宗教信仰)，因此他们满以为一定是说贝比在伦敦甚至美国——假如她们进一步问她在那儿做什么，我母亲会这样回答：上学深造。

因此是我母亲在说谎，而不是他。他说的是真话，贝比在学习必要的东西，在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必不可少的东西。他是一个教师——尽管他们知道他因政治活动蹲过监狱，但他们几乎毫不怀疑地相信他还在从事教育工作，他们对这一职业充满敬意，把它视为学问高深的标志——他的话往往使他们这些在门口观景的人大开眼界，看到位于远去的大道尽头的壮观景象，他们无法进入那片远景，而他和他的孩子们却可以自由地溶身其中。

他们不用我们的方式说话(他们怎么可能这样，他们没有一个教师在家里纠正他们的语法错误)，再说，我父亲这一方的亲戚们总想尽量多喝啤酒——那是他们的自我娱乐方式。整个下午我们家从沉静中苏醒，热闹起来了，有出进盥洗室的重重的脚步声，有粗野无聊的笑声，有孩子们的欢叫和哭号，有手拉手的恋人们的格格笑，有足球场上的啦啦队似的高呼声，还有交流烹调经验的声音。他们是我们的亲戚，我们本来也是他们那样的，只不过我们的父母改善了自身。贝比和我也得到了改造。你怎么能把我父亲和盖文叔叔相提并论呢，盖文叔叔总是打扮得温文有礼的，即使在自己家里都是如此，连他的草帽都缀有一条佩兹利花呢饰带哩。这个正在为拉长的口香糖胶和善地笑着的人，肤色像蜂蜜，目光敏锐，神情狡黠。他把偷来的汽车运出边境到斯瓦兹兰变卖，靠这样捞钱使自己在运输生意上有所建树，他也因此曾服过徒刑。“服徒刑”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坐牢”(我父亲就坐过)的委婉说法，它还意味着对生

活的意义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所含的危险。在亲戚们来拜访我们，或我们到他们家拜访的时候，我能看出这一点。我父亲进入监狱是为了他们——仍然住在我们已离开的黑人区的阿姨大婶、叔叔伯伯、堂表兄妹和小孩子们。我还发现我父亲打心底里爱他们——更有甚者，他尊敬他们，他并不是出于什么个人野心而离开他们的。他没有任何“盖文的卡车和汽车出租”之类的招牌炫耀他曾服过徒刑。我将做什么呢？当我看见我父亲这模样，就像我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溜进他正在其中演讲的大厅的后排坐下时那样，我又爱起他来了，忘记一切地爱他。忘记我母亲、我自己，忘记那个女人。

我们非法居住的这座位于白人街区的房子分外引亲戚们注意，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维维安堂兄（我们这个族的人经常给孩子们取一些特别的名字，这是在白人眼中一钱不值的人们可能追求的一种出人头地）是在我父亲住过的那同一座屋子里长大的，他灌够了啤酒之后开始大声对男人们演说起来，装出一副他想象出的某个电影中的匪徒的气派，尽管他本人其实只是超级市场中一个货架管理员。——听着，我的孩子，我告诉你吧——索尼将为我们做一件好事，可不……一件好事。——他茫然注视的眼神在柱子呈殖民时代风格的客厅拱门上扫来扫去，但是，早在街区衰落因而我们得以冒险住进来之前就住在这里的某个白人留在拱门上堂皇的虚饰物，并没有引出他醉醺醺地在寻找的确切答案。——不是开玩笑，我的孩子。我永远不会接受。我决不会。我他妈接受才见鬼哩。事情会大不一样。他们甭想大屁股坐着享清福而我却被每周一百五十块钱弄得浑身骨头都散了架。啊上帝！决不会，我的孩子，我在告诉你……一件好事。他们愿去哪里就让他们去吧，我们一起上，把他们赶出去好了。噢，索尼，不是瞎说吧，呃？一件为我们做的好

事。——

忘掉它吧维夫老兄，得了，多大的一张嘴巴，让老维夫自己歇着吧，他没事儿。

但我父亲扶着那个儿时和他睡过同一张床的（他已多次告诉我们）神志不清的无知男人的手臂，而且还感谢他；这不是一个清醒者在扶起一个醉汉，而是两人间的相互扶持。我不明白。

我的任务是打开特意为聚会买的罐装啤酒，还帮她把茶和点心端给每一个亲友。他们问起我将做什么时我说我将进大学学习。当然，在白人中上大学。那正是他们对索尼的儿子的期望。索尼从来就是亲友们心目中会远走高飞的聪明人。我母亲则让女人们参观她的厨房；她们充满了羡慕之情，在她们眼中，她被索尼选中，随他远走高飞是多么幸运，她一直那么幸运，瞧她多优雅，一个真正的贵妇，这一切她受之无愧。

亲友们都离开了，表演也就结束了。他走出电影院进入耀眼的日光，撞上我。

想象一下女儿的事使他在他的同志们中获得多大的威信——他的女儿，跑到国外加入了自由战士的队伍！她把自己献给了她父亲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个父亲，如儿家报纸所说，最近在一次墓地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当警察袭击会场时，他几乎是“死里逃生”。作为黑人运动中颇孚众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行踪常常是对外人保密的，因为有时候他不得不转入地下。在抵制选举运动那段日子里——通过这种选举我们可以投票选我们这种肤色的人进入议会，但白人们有权否决这些议员的各种决定——他晚上不在家中歇宿，因为警察往往会在晚上到家里来抓他，在外面歇宿对他再适合不过了——不过我想警察同我一样清楚该到那张大床上找他，你一进那间房子就可以看见

那张床。因此他不太可能会利用他那绝好的借口而在她那里过夜。我想无论如何她都不会让他那样做的。她是同志们所说的那种“好姑娘”，他们的意思不是说她和男人们相处不随便。他们的意思是她为人可靠，可以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母亲不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因此她不享有这种优先权。有时在他看着我的时候，他的眼神告诉我要记住这一点。

假如他的那个女人不是一个好姑娘，那么我对她表示厌恶完全没错。

我说服了父母出资让我外出旅游一周以庆祝我顺利通过大学升学考试。我骑摩托车南下到了德本城，而且我当天晚上就召了一个在长凳上应召的女郎。那很容易。某些凳子现在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开放了。就这样我和一个女人共度了六天时光，与她性交，与她同睡一张床，事后则再也不愿见到她。

索尼其实太清楚他自己的优势了。艾拉毕竟是艾拉，不能期望她像他那样面对女儿的牺牲(她是这样看贝比出走的)。她无法像他那样接受贝比自己的人生抉择。而他之所以能接受它，是因为他同样把自己献给了政治斗争。他非常清楚，对艾拉来说一切都是损失。没有收获。她的眼睛变了——他注意到她那有黑纹的眼皮有点儿下坠了，她不再像年轻时的艾拉那样目光锐利、敏捷了——但她还在用老眼光看问题，她所理解的“不仅为自己而活”，仍然局限在当年小学教师索尼业余在草原某个社区进行的促进社会进步活动的范围内。他把她抛到了后面，抛在了草原上。

可怜的艾拉。

但是没有谁比他更爱贝比，没有谁！那个男孩是“她的”孩子；而贝比则是“他的”；而在他还是黑人村落的一名无足轻重，无声无息的小学教师的日子里，全家人安居乐业，全家

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划分从未被承认过。但它从来就存在；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他不是那种只会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此外对他那无家可归的种族毫无贡献，在社会上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他为贝比企图了结她那还没有真正开始的生活而深感痛苦，那么艾拉做过些什么来缓解他这种痛苦呢？什么也没做。她只是沉默。加于另一种沉默之上的沉默。他不得不到别处去寻找抚慰和理解。“我不能为他做任何事。我俩是缘分尽了。”汉娜突然产生一种瞬间感觉，它一扫她先前对他的不祥之念，使她在他的黑暗之中看见了艾拉。瞬间的感觉使她顿然开朗。艾拉不能为他做任何事。他也不能为艾拉做任何事。感谢上帝，幸好她还有那个男孩。从别的各方面看固然令人失望，但对他来说至少还有这一点可说。

开始的时候，索尼发现他决定带领一队孩子去示威游行的举动不过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初试锋芒，不过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表露出的准备学习和从事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一种征兆。然后，在学习过程中(他仍然保留着教书匠的那种信念，认为这一过程是永无止境的)，索尼真正尝到了把同仁们的决定付诸行动时的令人鼓舞的快慰。再往后是监狱的束缚，是狱中难友们之间的兄弟情谊；生活在狱外安全世界的人们无法体会这种兄弟之情，他们只能通过授圣职仪式或入会典礼上的那些走过场的考验来摹拟它，其间他们不是发誓守节自律，彼此忠诚，就是喝得烂醉，共享酒肉情谊。在孤独的监禁中，除了清心寡欲和恪守节操别无选择。没有祭祀也没有庆典。初入监狱者之间的暗中交流是通过用指关节轻敲墙壁进行的，一个人在墙这边敲，另一个人则在那边用耳朵紧贴墙壁细听。当有人要被绞死的时候，圣歌就会从一间牢房响到另一间牢房，伴随那个不认识的人走向刑场，于是血缘之情借那歌声得到了交流。索尼曾听过那可

怕的合唱。在他和汉娜在鸟儿的鸣唱声中醒来的时候，他已向她谈过那些黑暗的早晨。他说出了关于它们的一切。——假如某个人从那些圣歌中感觉不到任何东西，那该是什么滋味？假如我就那样茫然地死去，没有祈祷和神灵的福佑……天亮时分躺在那里……我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我听说他们常唱歌颂自由的歌曲。——

——接着看守们会跑过来踢牢房的门并大声咒骂，我不是在谈恐惧……正常地说来，像我们这种人从不去想恐惧会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不是罪犯、杀人犯和该上绞架的人。我们不去想。但是在那种政治犯们被绞死的地方，当你身在其中并听见那歌声的时候，你会想一些你从前根本犯不着去想的事情。——

学习过程仍在继续。

尽管解放运动努力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反击，但由于它是对强权的反抗，它不得不随时对强权在握的人的所作所为作出反应，不得不依据他们准备采取何种行动的征兆而动，不得不去预测每一先发制人的行动可能或不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反击。“要考虑时刻变化的环境”，这一准则就像农夫必须考虑天气变化的原则一样重要，而且其中包括的变化因素多如天上的星星，四面八方变幻不定的星星。索尼最新的政治意识是由一种自命不凡而又带点奴性的道德观慢慢发展起来的，它保证了索尼的观点从不脱离原则，而他在被捕和坐牢之后毅然重返斗争前线的举动则证明他是一个果敢、实际的人物。由于这些背景以及他的演说才能，他得以雄居别人之上而进入决策者的行列。他所享有的地位也反映了他个性的多样合一：他被人们视为激进分子，但是就连谨小慎微的人都感到他令人放心；他能用他们所能接受的方式阐释各种决定。可喜的是同志们有一种战时

心愿，那就是希望有统一的战略战术，能够步调一致地抨击政府及其支持者——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不管是国际的还是本国内的。一旦某些同志被捕了，立即会有另一批愿接替他们的工作的同志奋勇顶上去；领导权的这种替换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严令与监禁。在国家遥遥无期的分裂状态中——档案被扣押，办公室被烧毁，同志们变成了睡眠无固定时间和地点的政治流浪者——怎样组织群众的大问题继续列在议事日程上有待解决。怎样在握锄头和穿工装的大众中重点发展阵容强大的支持者队伍，同时又不放过机会去争取那些正被政府用中产阶级的廉价糖果而不是人权诱惑的人呢？怎样清除受政府庇护的腐败的议员，同时又避免出现百姓为泄愤而擅自把他们处死的情况呢？怎样同穿T恤衫并举着旗帜，用出格的方式进行斗争，结果使政府有机会指控运动领导者们煽动谋杀的青年委员会和街道委员会保持适当的联系呢？什么样的行动——迁居白人区、罢工、罢课、联合抵制——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最有效呢？

还有一些内部问题。索尼都把它们带回家中——也就是说，带给汉娜。汉娜理解各个不同的人的主张背后的推理，他和她常常共同讨论并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团结在同一思想路线下的同志们有时会显然难以解释地出现意见分歧。索尼和他所放心的某个执行委员就是如此。——他并没有让步，不过是含糊其词。——他和汉娜谈论的是联盟问题；他和她正坐在她那位于花园中的小别墅外，他们自在地享用着花园，因为原来住在正屋的人已到国外去了——除非我们已确定至少必须在政治方针方面达成什么程度的共识才能接纳某一个团体，否则我不同意我们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说法。——索尼扩张开的鼻孔是他精神紧张的熟悉标志——只有在我们让这些人面对

达成共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判定他们到底是带着真诚的信念来和我们结盟，还是想用某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目标。所有的人都微笑了事，那么接下来你就要面临一场宫廷政变了。这就是广泛联盟的问题所在——而这种联盟是我们想缔结的，是我们所追求的，是我们必须具备的——每一个组织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但那并不意味着可以暗地里搞破坏。这种暗中使坏的伎俩从前有人使用过，将来也会有人再用它。我们可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出现。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她柔软的双乳在领口很低的衣服中起伏着，她穿这种衣服是为了更多地享受阳光——一层涂在她的白皮肤上的水彩，但他正瞪着眼睛等待她的反应，没有看她本人。——我想那可能是一种夸大。这种状况好像并不表示拥有大量的拥护者。若是想达到使坏的目的，他们必须寻求执行委员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必须借助于有影响的人——你们这类人——

——那正是我所担心的。在具体情况出现之前，我就和那名执行委员全面讨论过建立同盟军的原则问题——而且我们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为什么今天他却什么都不说呢？——

——他已改变主意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个人替他改变了主意。——

——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们历来都开诚布公——你知道——在我和他之间，所以他告诉我他已改变主意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应该说明为什么，彼此讨论它。——

她笔直坐起并把蚂蚁从他袖子上捉下来。——和他结伙的是什么人？——

——是两个从前他不太感兴趣的人。假如你可以称之为结伙的话；如我所说，他什么也没说，就这么把自己给卖掉了。我认为这就等于和他们拉帮结伙。——

——你最好是脱下衬衫。瞧你身上爬满了蚂蚁。——他抬起手臂，她帮他把手臂从衣袖中脱了出来。在拍打、抖动衬衫的时候，他把手在他的胸毛上捋过去捋过来，在自得其乐哩。

——喂，我亲爱的。——但他没有把衬衫从她那里拿过来，她把衬衫放在膝上坐了下来，——你常常不愿说出自己在想些什么。——

——是的，我不愿。但他这个人野心勃勃……我从前就对你说过这一点。噢，我是说，正当的雄心；他相信他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他自以为他更清楚怎样与反对我们的某些力量周旋。他感到他才是懂得大事情的人。他还自认为熟谙白人们的心理……他更是喜欢更经常地在报刊上出风头……你知道吗？——她为他不情愿意识到这一点而笑他。——假如他能笼络一帮支持者，能以他为中心拉起一个宗派，他很可能会感到名正言顺地排挤别人，排挤出领导层。——

她为了让他说话继续说道：——或许有什么办法可以了结此事。——

——什么办法！想推举候选人参加地区性议员选举是那些群众。我们不得不说服他们取消提名。——

——你准备和他谈谈吗？——

——在和别的人谈过之前我不想和他谈……假如有别人可谈的话……要找出他们。——

——小心点儿。别来宫廷政变，别搞政治迫害。当然不该由你牵头做这些。——

这些日子里他们就这样坐在花园里交谈，好像是在举行他经常参加的另一类秘密会议似的，他俩没有做爱。考虑到花园的主人不在他们才这样呆在花园里，此外别无正当理由。在汉娜用她那隐秘而有洞察力的方式表述她自己的同样也是他的思

想的同时，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敏感。这是一种肉体感觉。他通过皮肤表层，也通过视觉和嗅觉，感觉到那叫“花园”的东西在他上方盘旋并向他逼近。没有阴影的淡紫色花瓣完全绽开，就在他的脸旁流溢着芳香，羊齿类植物在浮满睡莲叶的池塘边上摇曳着绿色的翅膀，刚割刈的青草地腾着暖洋洋的水蒸气，一些不知名的长灰尾巴的鸟儿在无花果树中沙沙作响，把一种叫人心儿痒痒的宁静送进他的耳朵，送上他的神经末梢。在他与汉娜坐在一起的时候，已变模糊的生活年代之流一时间凝滞了。绝对的存在，一株阿尔卑斯松树，刻画在正在变黑的大地上渐渐消逝的昏光之中，最先出现的小而明亮的星星之蛾，正从天空的迷蒙之光中轻快地飞出。云朵像影子一样遮掩天光；随着白天的热浪升起，北边那棵松树抖动着羽状的枝梢。擦得红亮亮的门廊，那日趋腐朽的窗子，那间房子，连同那张床，还有那幅画上的支离破碎、充满喧嚣的形体——所有这一切都停滞了，好像等着某人举手发令似的。在那一瞬间他看见了那棵异国之树，那像他一样超然的元素，它庄严地倒下，追随着它巨大的影子，这影子正落下来并扫过花园里的这对男女。随着锯子割开粗壮的树干，树的年轮在纷扬的木屑之中显露了出来。

感觉到很近的东西突然远去了，他和它被拆开了，这种隔离显示了它的意义。这是一个富有的白种男人的静寂而美丽的领地，为绿树荫蔽，远离惊恐的尖叫和愤怒的高歌，远离肮脏破败的黑人区和被枪弹弄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这一领地与他无关。他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

他从椅子中站起来并走进那座小别墅，走进那个单间。

有一些事情他不知道。这一次我不是在管闲事。我独自一个呆在屋子里，听见一个来自农庄的妇女在沿街叫卖玉蜀黍。她的叫卖使我感到饿了；玉蜀黍是我们最喜爱的食品，作为孩子，我姐姐和我喜欢各种能在玩的时候用手拿着边玩边吃的食物。透过我的放音机播放的强节奏音乐，我听见了那陈旧的叫喊“青——青——玉——蜀黍”，我赶紧跑出屋子去追那叫卖声。她把袋子往脑后一甩搭到了背后，她身上的一切都又短又粗，便于负重——赤裸粗短的双脚，胖墩墩的躯干，又短又大的脖子，被重负变宽了的脸和头颅。这些女人，她们总是那么黑，阳光下的劳作更是加深了她们的黑色，好像大自然不仅赋予了我们的先辈恰如其分的黑色素以便他们能在这块大陆上居住，而且还给了他们一件合适的外衣以便他们能穿着它屈从于奴役。你假如是混血儿就没有这种保护色。她剥开玉蜀黍的绿叶，把它的须从穗轴上拧向后面，伸出指甲积满泥垢的手指把牛奶注到玉蜀黍上，因为我要的是鲜嫩的玉蜀黍。她那张黑黑的脸我不认识，而我的黑色较浅，再说，作为我父亲的政治行动之一，我们住在这条一半居民是白人的街上。她不知道我与她有什么关系。关于他与黑人大众的一致就说这一点。

接着我发现自己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她。她那泛红的黑脸颊上沾着的油散发着和从前一样的那种油腻味，她衣服上的烟熏味也没有改变，但玉蜀黍的价格却从我们在忧伤之子——柏谐奈城的日子起就已上涨了。我们的一个白人邻居——

荷兰人后裔也走出来买玉蜀黍了，她插话说她替我付足钱——嗨，别担心，你以后可以还钱给我，小事一桩——一旦你使他们中的一员把你当作例外的优待对象了，他们的邻居之谊是无限的。我母亲的高贵品德和美貌使我家成了例外，尽管我父亲说例外优待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他们不过是在确认群氓种族主义。对他来说，我们住在这条街上是为了向普遍的种族主义提出挑战。

我跑回屋子寻找我母亲存放的零钱，像我姐姐和我过去常做的那样。但厨房的架子上没有果酱瓶做的蓄钱罐。她去上班了，想必把手提包带走了；我想她梳妆台的抽屉里准还有一个钱包或一些零钱。我了解我母亲，知道她那些简单的，容易找到的贮物“保险箱”。在放她的化妆品的那个塑料盘下面有一张五元的纸币和一个盖有护照相片出售机的印戳的信封。

我再次跑向那个黑女人，她围着一条毯子作的裙子，漠然而耐心地坐在那里。还有那位欧裔白人的年轻妻子，她神气十足地分开穿着高跟鞋的两脚站着、双臂交叉在她的双乳下方，她在朝我微笑，好像我是一名向终点线冲刺的运动员似的。这又是一个皮肤粉红、头发金黄的尤物。但她没有解放，不像另一个，她不是一名操监者或情妇。她在玉蜀黍叫卖者那个方向挤出一丝尖酸的微笑向我致意。——她们只收她们认为你愿付的钱，你愿付多少就收多少。我已告诉她，每买一个付四角钱，而不是五角。噢不，等一等，那太多了——你只欠她两毛钱。——

我父亲的护照已被没收(他在被捕之前曾出国去德国参加过一个会议)，贝比是非法越境出国的，我自己从未得到过护照。我母亲也没有过。我回到他们的卧室去看她在那化妆盘下面放了什么。照片不像信件，任何人都可以看。照片共有六张。

她就在照片里，瞧她昂着脖子的样儿，就像闪光灯一闪而过时你端坐在自动照相间那样。她显露出一丝略带反抗性的尴尬神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形象对谁有意义。她的头发刚梳整过，她戴着她那串用小珍珠做的项链。

她要去哪里呢？她要离开他吗？胡思乱想……我的母亲！不知她有什么地方可去。她有个做会计的表兄几年以前移居到了多伦多，星期六的茶话会不时有关于他在那儿混得不错的消息。

就是说我对她一点也不了解。像他一样，我不知道痛苦对她的侵害；她受过他和他女儿的蹂躏。

我母亲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假如从六张之中拿走一张，她会发现吗？

艾拉拿到了她的护照。只是在护照被批准和颁发之后她才告诉她丈夫。

他有一种奇怪的印象，那就是她一定提过、暗示过她的这一想法。一张撕下的纸片被充塞在他心中的一大堆问题湮灭了；一系列强加给他的同志们的新禁令带来了一场危机和职责改组。

有那么一会儿的踌躇。他的妻子显然已决定——他们没有瞟上对方一眼就决定了——把那过失视为诚实行为接受下来。他本来是希望她在采取必要的步骤申请护照之前能向他进行无条件的起码的咨询的；但看来她在听取他的意见之前就早已自行其是了。艾拉一向清白无辜。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作为妻子去监狱探望他以及为应付他再次被捕的局面而把一个装满洗漱用品的万用旅行包准备好。当然与他结合及对他忠诚是有罪的。艾拉不得不表明她没有卷入政治活动，她不过是一个呆在家里

的主妇。那一充满柔情的昵称“索尼”——她就是通过这一昵称认识她少女时代唯一的情人的，民众也是通过这一爱称知道他的——它在警察的档案里以“亦名索尼”的形式出现——在她填写申请表中“丈夫的名字”一栏时，“索尼”这一昵称并不是非得填在他的名字和姓氏之间不可的。艾拉拿到护照的最佳措施就是使自己远离他，远离他的档案记录、他的活动、他的生活。

一个呆在家中的主妇——并且是一位母亲。另外还有贝比的问题。秘密警察肯定知道贝比的情况；但也许不知道，年轻人的非法越境在当局看来或许只是奇怪的冒险行动，当局可能会不加理会，直到(除非)某个非法越境者被抓住并在审讯中供出了非法越境者们的名字和活动情况。

索尼知道艾拉会去哪里。——还获得了签证吗？——他几乎是谦恭地问道。

她获得了签证，一切都通过夫妇俩都认识的一名律师安排就绪了。律师们具有有时达到荒唐的地步的谨慎习惯或无意的轻蔑；索尼经常见到那个律师，他是工会的一名关系密切的法律顾问，不过他只字未提为艾拉办理护照的事。是的，那律师也在为别的事情操心。无论如何，确信艾拉有人关照，未陷入麻烦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贝比的母亲和父亲，他们谈到了钱的问题。——我想我该带些衣服去。我在做一些保暖的衣物——他们说那里很冷的。——是的，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总得先把缝纫机从桌上挪开，他注意到了这一点，尽管没有去想艾拉做缝纫活儿的用意。——她时刻都会需要钱的。不管你在哪里都需要——(他克制住自己不去援引他在狱中的经历作例证，那样会使艾拉惶恐不安的)。——除非你身陷某些处境，否则你是不会知道钱的价值的——

他笑了起来，作为一种解释，一种坦白：他和艾拉儿时生活在一种总是把钱和贪婪联系在一起的环境里。

他对政治事务最为了解；他们在银行有一小笔存款，她准备取出来带去。

——准确地说共有多少钱？——

她拿出存折，他们俩头挨头站着查看上面的钱数。——噢，比我想象的要多。我忘记算利息了。——艾拉微笑起来，几乎和从前笑得一样。

——你没法全部带去。我敢肯定，那一定超过了外汇兑换额度。去邻边国家的外汇额度比去海外国家的要低。

——他们怎么知道呢？我将把所有钱换成现金带出去。——

——艾拉……——他回过头去继续读报纸上关于体育运动的文章了，不时用刀片裁下一个个栏目。

——用某种方式。我能做到的。——

不耐烦是他身上新出现的现象；同样，他蓄八字胡是为了表明他现在是另一个人了。但尽管如此，这个人仍然对她负有责任。——艾拉，看在上帝份上，你不能做那种事情。你知道假如你被查出来会发生什么事吗？你能想象你会落入监狱吗？去看看贝比，享享天伦之乐。忘记我关于钱所说的话，把衣服和别的不管什么都带去。那些类型的游戏是不适合你做的。——

他翻着一页页报纸却看不下去，然后他强迫自己去读并且开始用刀片沿着报纸的空白处干净利索地切割。他的手在摸找钢笔记录文摘的日期，她仍然在屋子里，尽管屋里寂然无声，他仍然知道——他在想她在场的特殊性质，过去在走进屋里同时习惯地呼唤她的名字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这种特殊性质。——你能去看贝比真是太幸运了。——

她在做什么——在看着他吗？转过身去了？他不愿抬起头

来，他手中的刀片在干巴巴地切割报纸的纤维质，那微弱的切割声是摧折用来造纸的树木的电锯声在家庭中的回声，那棵松树……他的话语则是涌上他心头的那种嫉妒的同样微弱的回声——嫉妒她有选择远离政治斗争的自由，嫉妒她拿到护照，嫉妒她有权作为在场替那女孩包扎过手腕的人去看她。

——我知道。——

这就是一切吗？就是在他们谈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时可望从他妻子那里听到的一切吗？谁能忍受艾拉的这种平静的无可责难！

他听到了她那一连两响的脚步声，先是高跟磕在地上，接着是鞋底轻轻落地，他以为她已离开房间。但是她停住了：——我希望你能够去。——

和她一起去？和艾拉一起去？还是他独自去？代替她去？艾拉从来就没有外出旅行的喜好，她不知道该怎样和官吏们打交道，她甚至觉得当着监狱看守的面和他说话都困难。

或许她希望他没有去做他已做的一切，当然她不会用这一切来责备他，不管对那男孩，对贝比，还是对她自己——因此致使他失去代她而去的权力的原因不仅仅是他没有护照，不仅仅是他从事政治活动。

是不是由于我的原故呢？

自从我母亲走后他一直在家呆着。他甚至把棋盘拿了出来。我们在一起玩棋玩了几个晚上。但我是小心提防着的。现在，我不知道他（或许）正在努力使我陷入什么样的境地。为我俩做晚饭的事由我做。有一次，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和他说说话，——你没有会要开吗？——

他等了片刻，借此向我表明他理解我真正的问题，这是只

限于我们俩之间的一种默契，然后他回答了。——不。没有会议。我将呆在家里。

我立刻跑去拿出头盔和摩托车钥匙，把头从门边伸出来向他告别。——那好！我走了。——

他正在玩那台他很喜欢的录音机，放的是莫扎特的某个序曲，他以为他只需布置好所需的情景，我们就可以一起做某件富于教育意义的事或看电视上的足球赛了，爸爸和儿子同乐。但他也知道这些日子我从未离家去过任何地方。

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而灯光还在亮着。我满以为是他在等我，就沿着走廊径直向我的房间走去。但我注意到屋子里有声音，是男人们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更清楚了——他们的强调声、他们的闲谈——不知道是哪个人，但一定有人离开客厅并在门口留了一会。随即传来他关前门和闩门的声音，传来他拉灭电灯时的嘎嗒声，还有他整理东西时尽量降低的吱嘎声。然后他来敲我的门了。又来找我了。我没有说请进，我说，有什么事？

他慢慢地打量我的房间的四周，我想进房之后他一定呆了一年，甚至更长。他的眼睛周围已开始出现细小的皱纹了，与其说是我觉察到了的变化，不如说我证实了我对他所持的印象。他走过来，站了一会儿，头仰在后面，好像他不是在他儿子的房里，而是在一个艺术画廊，面对一幅沙漠广告似的。全新的风景。只有空间。我不知道是什么沙漠，在哪里——我希望他不是在等着我说话。

他坐在床的那一头，他的重量绷紧了盖在我脚上的被子，我感到被钉在了床上。——终于开完了一个会。在这里开的。——

我父亲有一种迷人的微笑，他的脸棱角分明，起伏有致，

坦然的情感深深刻在其中，那么激动人心，——难怪他能迷住听众，能迷住女人。迷住我母亲和另一个女人。我长得像他，但我的脸只是从他的脸翻造出的一个面具，我只是透过这一面具往外看，我不像他那样住在其中。我突然警觉起来，觉得他要和我谈她，他的女人，以及电影院的事了，是的，终于来了，那整个故事，这就是他来我房里的目的，贝比是对的，你不能和他们住在一起，你应该离开他们。

我不得不赶快说话。——我听见有人离开。——

——我知道。真不幸。你离开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我已准备静下心来读书，因为有一次……不知我上次是什么时候读完一本书的。我常常把书读到一半就搁下了，等到我再次去读它时又忘掉了前面的部分。你现在是否在读书呢，威尔？

我们彼此间说的一切都有言外之意。这就使我感到难以和他一起呆在屋里。他正在承认他对我没什么了解，只知道我了解那个女人的情况，知道她是谁，住在哪里。他现在不再插手丰富我的生活了(他过去是这样看的)。尽管住在草原那一边的时候我们不能成为当地图书馆的读者，但我不应该忘记他曾买儿童读物给我们并为我们朗读它们。

我没有告诉他在过来的一年里我几乎已读完他书架上所有的书。假如那时他有足够的兴趣、假如那时他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知现在它是什么，忏悔的危险已被避免了，但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而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来到我的房里，那他就能在我杂乱的桌上发现他的格拉姆齐[1]或他的卡夫卡了。我张开一只手指着多恩布什和费歇尔写的《大经济学》，这是我的二年课程的阅读书目所列的书。

---

[1] 格拉姆齐，安东尼奥(1891—1937)是意大利学者、政治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其思想现在还有广泛影响。

——对的，这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读书的顺序与你的不一样……你知道，我先读一些其他的书。如诗歌之类。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对什么是必要的看法不同。那是一种错误的方式——他抬起双手，看来好像要把其中一只放到我的脚拱起的被子上抚摸我似的，但他没有这样做。——无知。——

我不自禁地打起哈欠来，我并不是有意想对他粗鲁无礼。我根本不知道我是急于摆脱他还是希望他留下。

——威尔，今天你没听见任何人在这里。你没听见任何人说话，也没听见任何人离开。——

在他说了他来我房里想说的话之后，他继续坐在我旁边——多久呢——只坐了一会儿，但使人觉得坐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站了起来并轻轻地走出了房间，好像我已睡着了似的。

就是那么回事。某个在逃的人，或是一个来自外部的渗透者。或者是与他的某些伙伴举行的他不愿其他的伙伴知道的一个会议；由于他更多地呆在家里了，我已看出他在他那伙人里已陷入某种麻烦之中：这类情感不必用隐瞒他的风流韵事的方法掩盖起来。不时有人来和他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公开登门赴会，我不必为我自己和他的安全而假装我没有看见他们。各报纸的报道在推测各组织的改组和重新结盟，其中包括他的，正是这些组织构成了黑人运动的核心。那是他的事，他没有任何必要与我结成同谋关系，只需告诫我闭上眼睛和嘴巴就够了。这就是他出于其他理由教我做的一切。这就是他为我的深造做的唯一的贡献，仅此而已了。

也许我母亲曾嘱咐他在她离家期间留心看护我，于是他才觉得他应该为她做那么多。因此他是在牺牲他本来能够在那张位于地板上的大床上度过的一个个夜晚；好像我会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半夜或拂晓）悄悄进来，尽管我年幼而且一到时间就

会上床，一上床就会睡去。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很晚都不去睡。

每天都在家里。这是否可能是因为他想和我呆在一起呢？是为了我吗？

每隔三天，在约定的时间，他都会独自去那间房里等从莱索托①打来的电话，她去莱索托了，因为她祖父去世了。那座小别墅已被锁起来。她把钥匙留给了他。她当然是经常独自一人呆在那间房里的，但他以前从未在没有她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在那里呆过。他试图看看书但看不下去；房间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时而是这东西使他动心，时而是那东西让他着迷。在那里他是他自己的生活的旁观者；瞧那桌子的边缘，他做完爱后睡觉醒来，睡眼惺忪地走去厨房或浴室的时候，曾在上面碰撞过不知多少次；瞧那电脑打字机，从特定的视角看它是一种形状，现在换个角度看又是一种模样；瞧那幅流淌着各种颜料的巨画，它是那么眼熟，与其说被看见不如说被感觉到，他在床上把一条手臂枕在脑后的时候，就已与画表面崎岖不平的颜料建立了某种联系，她已告诉他那堆砌的颜料叫作厚涂。对他来说，这是一幅丑陋的、没有意义的画；关于所爱的人总是有某种东西——某种小小的习惯——志趣的某种表达方式——你不喜欢，但你什么也不说，或者撒谎。也有可能她考虑到了他的背景——缺乏理解这样的作品所需的文化素养，因此他不得不假装他觉得这幅画挺好的（以便维护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现在他是独自一人面对这幅画，它那一大堆紊乱无序的颜

① 莱索托：旧称巴苏陀兰，非洲东南部一内陆国，全境为南非环绕，1884年沦为英国保护国，1966年宣布独立，改名为莱索托王国，为英联邦成员国。

料在床头的上方，躺在床上至少是看不见它的。当然，对她来说它是某种传家宝似的东西，就像那个戴着眼镜并留着剪短的白发的女士的旧照片一样——也许是她祖母——这张装在一个小镜框里的照片立在书架顶上。这些东西属于一种没有被继承下来的生活，一种被抛在一边的连续性，不知怎的，他从未想过她和家庭有什么联系。在星期六下午的茶话会上，她从未被安排在妻子、儿子和女儿们那一组，相反她和他一样，不管他感觉如何或做什么。

有几天电话拖了好久才来。她出于谨慎用的是邮局电话亭里的电话，而且按他们事先之约，他不应往她祖父家给她打电话，因为可能有别的人在旁边偷听到谈话内容。他看见那缕太阳光横穿过空荡荡的床，过去它经常照在他们身上，像时钟的指针一样穿过属于他们的下午。他有条不紊地脱下他的鞋子并躺倒在床罩上缀的小镜子和绣的花朵上。他必须利用这一时间反思他与他的同志们的关系中出现的问题，这毕竟是一间独一无二的房子，唯有在这里能够对这一类问题进行公开的检查，不用担心任何人利用他的坦率或自责。但是，没有她，没有她汉娜在场，它就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房子，变成了一种见证；而艾拉不在场的时候他全家所住的那座屋子却不会有这种变化，那好像只不过是艾拉在屋子的其他某个地方因而没有碍他的事似的——也许那是因为那个男孩仍然在那里，他和那个男孩处在艾拉的所有家庭装饰物之中。

他躺在床上，一个破门而入的流浪汉。他离开床站起，在房内徘徊，不时瞅一瞅汉娜匆匆留下的字句，但他没有去看那些写给她的已打开的信。然后，电话响了，电话一响，房子又变成他们的了，他急匆匆地穿着袜子走过去，热切地想听到她的声音，他们俩都没有用对方的真实姓名(出于谨慎考虑)，总

是有那么多微笑和大笑，他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激起了情欲，她肯定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一天，继开头的欢悦而来的是一阵急迫的暂停，然后她告诉他说：——不要紧张……不是好消息。我已是P·I'd① ——我想是这样。

——噢，我的天！你是怎么知道的？

——昨天收到一封信。我被正式通知必须申请一个签证。但我确信一切会顺利过去的。——

——你告诉伦敦方面了吗？——

——我当即和我的头儿说了。他们已在办理此事了。还有这里的几个人……我相信在我了结完自己的事情之前会安排妥的。总之往后的几个星期我都回不来——我不得不决定怎样处理老房子，还有那些书——我准备不要那些家具了，它们就那么回事，但是那些书……还有那些书信，文件……书信、文件之类必须保留下来。你看呢？他们想把它们收入这里的一个不大的档案室，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自己保管它们——

焦虑袭向他全身。——听着。我们这头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我会想出办法的。——

——不，别这样，请别这样。我不想让你牵扯进来……——一种用沉默进行的斗争在他们之间展开，它穿过遥遥的距离嗡嗡直响。是他为他俩打破了沉默。——但你必须回来，你必须回来。——

放下话筒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是因为我的原故。因为这间房子，才发生了这种事。但她走了。他绝望了，无力立即再拿起话筒并告诉她，是因为这个地方已成为一个无限世界，他们知道了这一点并且以为你被引诱了——不是乖乖躺在这张床上，而是东奔西跑为那囚犯和他的事业通风报信。

① P.I'd为"被宣布为受禁移民".——原注

但三天后他们俩再次通话的时候，他没能告诉她，他在电话里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没能告诉她他怎样一边和儿子下棋，以便稳定情绪使他能理性地思考问题（感谢上帝艾拉不在那儿，感谢上帝他不是独自一人），一边权衡并屏弃一种又一种旨在撤消禁止她再次入境的命令的措施。他在自己心里试着向他的同志们中的一个倾诉他的心曲。此公是一位好斗的凡俗牧师，他的解放神学包含了对男人的爱的责任的理解，不管是遵循还是超越传统道德。神父，我需要您的忠告。但是不。作为问心无愧的政治犯，你被拘留过，受过审，你不过是为你的所有人民的自由而被判罪的，这种良心超越了对妻子和家庭的任何一种良心，让他们好自为之好了，这种良心也比任何你所需要的女人更重要。同志们也许知道她，可能知道。不过是作为一个和他不相干的人。要紧的是斗争本身；而他和他们在献身于那一斗争这一点上是同一的。他不应让任何人从他身上发现有任何东西使他的注意力偏离了那场斗争，他可是为解放事业奉献了他女儿的啊。尤其是在现阶段，在这内讧的阶段。他想起了那个商人，从肤色来说他是他们的一员，捐款支持黑人运动的就是这个人——为将来保险，或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也一定认识不少高级政府官员，这些官吏想必也求他支持他们扶持中产阶级的政策，或许他是可求助之人。他想到那位正在向政府挑战的白人的编辑，他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抨击政府压制新闻自由，因此在白人中颇有些影响，即使他想见内阁成员们都无人能拒绝他。或许可以恳请他帮点小忙……但是报界人士——他们嗅出女人的香味的本领就像某些动物嗅出埋在地里的松露的能耐一样（小学教师早年读书的时候就积累了这类古怪知识）。游行集会演说家、前政治犯“索尼”和一个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汉娜。接下来，就会有一个记

者等在他家门口，假如他本人不在的话，那么，他儿子在场也帮不了任何忙。记者会向威尔提问，问他是否能就他家那位监督政治犯审判的朋友申请签证被拒绝的事说些什么。

像一个所有个人问题都转变成了一种可诊断的疼痛或痛苦的忧郁症患者跑去找他的医生那样，他跑去找在他被拘留和受审期间代表他的那个律师。梅特金看起来像一个犹太法学博士，他像精神病医生如患者所希望的那样听着索尼说话；面对这位至今仍幸运在桌上的电话与对讲机之间的当代和古代智慧与先见的代表，索尼好像一直被某种肉体冲动折磨似的感到丢脸。他解释说他想把那件事完全交给律师处理；他本人无力为任何与当局冲突的人做任何事情，在这个国家，这个人找不到别的任何人为她说话；她和她那些寥寥可数的亲戚没有什么联系，再说那些亲戚也不是那种会为这类事情出面的人。不管政府做什么他们都会相信是正当的。

但他从律师的脸部表情看出，他什么也没有解释清楚，他再做了一次尝试，同时避免那种彻底的理解。他重新在桌子另一边的椅子里坐下来，注视着那双和他自己的一样黑的眼睛，那种古老种族的眼睛。——她是一个价值难以估量的人。——

尽管律师令人不快地揣度出了他的隐情，他还是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在面临政治判决的时候，你必须把每一隐藏的动机，每一矛盾的形迹，每一有疑虑的目的告诉律师，这样你才可能得到有力的辩护，哪怕是违背你自己的高尚原则，吐露秘密固然危险，但必要的时候还得冒这个险。这件事已开始办理——律师常说的抚慰人心的话。至于结果嘛，必须耐心等待；正如她所说，她在几个星期之内是回不来的，无论如何……

从第一天起她就不及索尼那么惊慌，他意识到他忽略了她正沉浸在失去祖父的悲伤之中，她祖父既当爹又当娘，好不容

易才把她拉扯大。她又在老家整理老传教士的书信之类和别的简陋财产了，儿时她不知整理过它们多少次，但即使在路过的时候她都无法向他指出这个老家的确切所在，就像她和他驱车而过的时候他没法向她指出柏诺奈城外草原上他的老家一样。援助她的活动在国内和伦敦同时进行，为此他正忙碌着策划和主办讨论会——“抵抗教育”（他为这种活动造了这个新名称，被接受了）——这类讨论会在简陋小屋和用泥土建成的教堂内举行，打的是当地俱乐部集会的幌子，因为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被一项禁令取缔了。在忙碌之后的空闲时间，从前他本来是能够和她在一起共享欢乐的，现在他却只能呆在自己屋里，感谢上帝，幸好屋子还是静静的，只有那个男孩在周围。再说威尔也没那么富于敌意了。有时好像甚至有可能抚摸他似的。噢，一旦没有女人参与，男人们之间总是存在的那种下意识的紧张气氛就缓解了。这孩子是个男人了，几乎是个男人了，他可以被信任，假如他没有证明他可以被信任，那他甚至不会直视你的眼睛以表明他记住了。假如要他忘记他听见有人来家中拜访过，他会像他必须做的那样忘记的。

那天晚上来的那些男人们在设法成立一个阴谋团伙（政治词汇多么贫乏而通俗）以罢免某些领导人。他们正在对来自几个组织的人分别进行“火力侦察”以弄清谁是“所见略同者”——含糊其辞的委婉说法。他们发展新成员的努力没有如愿，但他们觉察出“索尼”有点儿魂不守舍，因此侥幸地相信他会把他们来过的事置之脑后并且不会叫任何人提高警惕。

门廊处有一个东西，一个包裹。

穿过掩盖通往花园的侧门的九重葛属植物，他停住脚步，看见了那个东西；他顿生疑窦——政治犯的朋友们的门口有时

会被放上粪便之类秽物，还会被放上一触即发的炸弹。他一步步走近，看清那是一个睡着了的人——一定是某个服用兴奋剂的家伙发现靠在这弃用的别墅上露宿很方便——接着，他发现那睡袋是新的，还看见被拦住的脑袋上方露出一只男人的手（一个年轻白人的手，手腕上戴着一只有一天二十四小时刻度的军用手表），他又一次停住了脚步。

索尼凭什么身份来阻止这个私闯民宅者呢？他自己怀揣别墅的钥匙来到这里，他又怎样对此做出解释呢？他最好是走开。晚一点再来。电话会响起来但没有人接。他大喊起来好像那别墅是他的似的——嗨！你以为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只手迅速从脑袋上移开了。一个年轻人从睡袋里挣脱出来，睡眼惺忪地瞟上他几眼，以辨认他，确认他，一点都没有尴尬的神色。

索尼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个人。

那个年轻人为放松筋骨转动肩关节同时深深呼吸。他长着花粉色的头发，剪成穗状而且那么短，即使睡觉也不会被弄乱，他还长着女人式的秀鼻、睫毛长长的眼睛以及男人的才刮几天又猛长起来的胡子。他带着一丝微笑，向索尼点点头，好像他是如期赴约的人似的。

——这是私人领地。你想在这儿干什么？——这个人认识索尼，也许是在报上的照片里见过他。

也许可能是在录像上见过索尼成为秘密警察的一名影星。他相信他已学会常怀警惕而又不变得像是偏执狂，但是这个私闯民宅者在这个地方等他——显然，在等他——她的别墅，他们的房间，他将一次又一次再回来，没法不再来——另外，当局严格限制她的入境时间，以便在不逮捕她或驱逐她的条件下把她除掉——诸如此类险恶情况对他并非不可思议，经验足以

使他像那些制造这种情势的人一样揣度出这样做的居心何在，那些人了解他的一切，那些少校和中士曾在他被拘留期间审问过他，还曾透过牢房门上凶险的独眼窥视过他，他们还留意过(尽管没看见)她什么时候在这座别墅里把他迎进她体内。像所有他这类在政治斗争中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也了解他们；了解那些少校和中士们。他知道紧接这类险恶情况而来的是什么，再次被捕、被敲诈——不是勒索金钱，在警察和革命者之间有更高级的交易，那就是出卖信任。假如问题回答得不令他们满意，他们不会用家务事敲诈他，如对他妻子说他在外面到处玩(那是他们的用词)。他们知道“索尼”不会为那种事出卖他的同志们，再说他妻子也知道他的金发情妇的事，无论如何她属于会原谅他的那种柔顺的女人。那么，利用什么敲诈他呢？用什么呢？利用他那个在莱索托的情妇；但是假如他们想和他做一笔要命的交易(由于她了解你告诉她的众多政治秘密，我们将逮捕她，除非你也告诉我们一些)——可他们假如真想那样做，那他们就该把她留在这个国家，而不是把她拒之门外！

那个年轻人站在那里，瞧他那牛仔服、胶底运动鞋和头发，和任何一个在路边举起大拇指想搭便车的人没有区别；可他是出现在她的门口。——我们最好是进屋去。——

索尼发出一声命令似的高声大笑。——听着，拿起你的包离开这里。马上离开。——

——我有些事想告诉你。但必须在屋里说。我是你的一位朋友介绍来的。前天我和她在一起。——

——我不在等任何人的任何消息，我只想叫你离开这里。我不想知道你叫什么，来自哪里。——

那个年轻人带着自信和谦恭的理解听着。——好了。我有一份特别介绍信。“石头中有教诲，万物中蕴含着善。”——

那个年青男子现在住进那座小别墅了，而他则得回到家里和他儿子威尔呆在一起。汉娜送来的信息，她要求于索尼的是：让这个人住在那座别墅里，把钥匙给他。钥匙？他站在一家五金器具店里，正好有一产品处在依样画葫芦的複制过程中，一阵缓缓袭上心头的沮丧使他低下头凝视着使别人的生活改观的那些工具和小巧机械——在位于黑人区的第一个家中皆大欢喜地做修补工作时，他星期六的购物项目中就有这类工具，它们也曾为他自己的生活增色不少。

那个年青男子自称尼克，因为他必须有个什么名字让别人称呼他。汉娜一定想过别墅的隐秘性还有别的用途，对一个渗透者来说这是个好地方。既然人们知道她离开了，没有谁有任何理由去别墅。连住在正屋的人都是这样吗？他们怎么样呢？在和汉娜通话的时候，索尼被这类问题哽住了喉咙，他没法问她任何东西，甚至不能向她暗示那位客人已到并且在通电话的时候正在房间里，因为来客只是在晚上才外出。她是否明白对她的情人来说和这位客人呆在一起哪怕只是打电话那么一会儿功夫都是危险的呢？假如这个人被发现在这个国家，被盯梢和被逮捕，那么索尼也会和他一起被逮捕，会被审问他和这个人的有什么关系，不管这个人做了什么，索尼都会背上教唆的罪名——索尼无力细究那会是什么后果。从事政治斗争应遵循的原则在他们之间当然有效，各人管各人自己的事。但在那个年轻人入睡之后（他在白天睡觉）索尼会去查看一下碗橱和别墅中类似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最有可能被偷偷放上武器或炸弹之类；他不愿让这类东西出现在别墅里从而连累她，使她无端被指控犯有私藏枪支弹药之罪。他没法告诫她说她一回来可能就会有秘密警察的车在恭候她。他只能说：别急着回来，好好利用时间……

那个年青男子睡在那张贴地的大床上。在索尼观察他时，他没有醒来。他的袜子搭在散热器上，从前她的内衣裤就是放在那里的。索尼每次来都在她厨房里为他留下些食物，然后就离开两天，一回到家他就会习惯地喊，威尔？但他总是知道那男孩在还是不在；他就像母亲，在或不在都可以感觉出来。

所有的狗都喜欢我，没问题，在他问起那些遇上陌生人走过花园就会吠叫报警的狗时，那个年轻人这样告诉他。但不管怎样，住正屋的人们一定注意到了有某个人在别墅来回走动。那是别的什么人，而不是索尼本人——他们一定以为索尼是她的男人。也许，和他不一样，他们料想像她这种单身一人自在地生活，同时做一些左派倾向的有益工作的女人，会乐于借用已改变信仰的崇拜者的住处，会乐于让男人们来来去去。也许他们在认识他本人之前还认识来她别墅的别的男人。

一天下午那个年青男子走了。在汉娜按时打来电话的时候，他也无法告诉她这件事，但他说话时的那股精神劲儿以及他发自内心的安慰的絮语一定为他说了这一点。他确信她不久就要回来了。他以前从未打扫过屋子——在他那种家庭里，扫地和煮饭之类都是女人们的事，只有他那个想用各种方式与众不同的儿子才去厨房里帮忙——但这一次他干起来了，撤下了床单，扫了房间，还找到了刷洗浴池的工具。那个男人脱下了他那身搭便车者穿的衣服。他一定在他的使命的下一站换了角色。浴室里有一瓶打开的头发漂白剂，瓶上有一幅一个微笑着的金发女郎在梳理飘飞的头发的图片。但索尼的汉娜既不需要把头发漂白，也不需给它染色。他把漂白剂和那捆衣服一起扔进了垃圾堆。这天刚好是一周中垃圾工人来郊区白人居地运垃圾的日子，他从隐蔽的侧门离开别墅进入小巷的时候，收垃圾的黑人之一从垃圾堆的废报纸和厨房残杂物中翻出那捆衣服，

根本没想到那套好端端的衣服曾是用来作伪装的。索尼微笑了，感到一切顺利。这一结论使得他发现不对劲、被歪曲的某种东西恢复了平衡——一种出乎他的意愿的结局。石头中有教诲，万物中蕴含着善；由第三者的口说出，这话不能成为口令。

她已剪掉她的头发。

我上完课返回那座空荡荡的屋子，为安全起见，我像往常一样把我的摩托车停在门廊里，我打开门时发现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她已听见我砰咚砰咚让摩托爬上台阶，在等待着让我为她的归来大吃一惊哩。我总算认出了她，就像你在某张照片上认出某个人那样——照片是在你还没认识他们的时候或是在你认识他们后过了很久才在某个地方拍摄的。她的脸的形状被梳在脸盘周围的短短的鬈发改变了，她那对从前一直有小饰物缀在耳垂上的扁平的小耳环不见了，她前额流畅优美的曲线也被额前蓬松的刘海遮住了。她张开双臂搂住我的脖子并拥抱了我。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欢快地注视着我，注意力那么集中，两眼之间都皱出一条线了。我母亲从来没有像那样感情外露过。但它们的确是她的眼睛。

——发生了什么事？——

她欣悦地大笑起来。——噢，一切都好。贝比可真是在茁壮成长。你不会知道她怎样了，她那么成熟了，独当一面……——

——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呢？

——你是说这个？——她用手梳了一下短短的鬈发。——噢这头发。这些年来从未变过。够了。你喜欢它吗？你不觉得它很好吗，威尔？——

我只能微笑一下并耸耸双肩；我不是她的丈夫，她当然不

必试图取悦于我。

我们俩走进厨房，我们谈话的老地方。她在桌边我母亲的椅子上坐下，还沏了茶。她向我讲起贝比住在哪里，有些多么好的朋友，那些照顾她的朋友都是些负责任的人，和你联想到她在这里曾和些什么家伙厮混时所猜想的截然不同。——他们那么热情地欢迎我。当然，她是和别人合住，但你能想象得出，她在花园里种了花草——贝比！——

——她越境并不是为了去种花草。她在那儿做什么呢？——大概她不能说吧。——

——唉呀，在那种情况下，你当然不会问这问那啰，但她是非常坦率的，看来她为接待难民忙得不可开交——确切地说不是难民，而是跑出去的人。像她本人一样。他们必须先接受审查。你知道的。——她那双大眼睛在我身上扫视着。

因此我母亲现在理解解放的意义的模糊性了，审查和盘问不是由秘密警察而是由她女儿实施。贝比教导了她。

——这也是贝比的主意？——她知道我是指剪头发的事。

——威尔！你会很高兴看到她现在的模样的……有一天她在看着我梳头发，她问道，你今年多大了，妈？她历来健忘！她总是以为我比实际年轻小。因此我告诉了她。她接着说，你一生已花费多少时间料理头发——于是第二天我们去找了理发师，我就这样叫理发师把长发剪了。

她把侧面转向我，好像是想让我看看整体效果似的。

我什么也没说。

——我感到轻便多了。——她羞涩地看着我以便弄清我是否喜欢那发型。——家中一切都好吗？——

我们没有提他的名字，还没有。无疑，她正在想警察的袭击；在想他的安全。我能告诉她别的事吗，说他大量时间呆在

家里，甚至还和我下棋？但是我不能说这些，因为这样无异于评论我们俩都不应知道的东西，即我为保护她而向她隐瞒的现实。——噢和通常一样。只是院子有点儿杂乱。我的确曾除过草，不过我的功课太重了，我有大量的书要读。——

——你有饭吃吗？——

现在我们俩都微笑了。——我煮饭烧菜。看来还不错。——

她知道是我煮给他吃，她可以信赖我，而现在她希望我喜欢贝比对她做的事，喜欢她的头发。

——还有很多事可以告诉你，但我们还是等你爸回来后再说吧。——

刚提到他他就回来了，他在我们之间大声说道：——都说些什么呀？为什么不现在就说呢？——

——因为弄不好我又得重说一遍。——

这个烫着单调乏味的鬈发的女人。她以前从未把我们——他和我——相提并论过；从什么时候起我与她之间心照不宣的互相信任变得和她与他之间的那种沉默一样了呢？

她再也没有回来过。逃脱了。我的母亲，她永远地离去了。

艾拉的任务不外乎是可期望她完成的那一类；她带回了女人的消息，一个母亲的消息。贝比结婚了。但出于安全考虑就连这种家庭情报都不能通过电话或书信传递；不能这样传至这座屋子。贝比本人没有告诉她父亲。无法告诉。索尼及其儿子是从其妻子那里得知的。一件家务事。真应该为此接吻，鼓掌，举行一个星期六茶话会，让叔叔伯伯们喝啤酒喝个够，由艾拉，留着一头短短的鬈发、穿着特意为这种场合准备的自做的新衣服的艾拉担任主持。

那男孩什么也没说，像往常一样。显然他对他姐姐没多少感情。艾拉见过那个男人，艾拉认为他不错，为人踏实可靠，足以般配他们的——索尼的——女儿，他的贝比；婚前没有问过索尼。相反，在他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贝比就和那个男人结婚了。现在他索尼只有谦卑地提问的份儿了。艾拉证实那个男人是贝比在离境之前就认识的；就是说，他俩是一起越境的，这是没有向她父亲透露的另一内情。贝比和一个男人走了，在索尼和他的情妇住在别墅的同时贝比也一直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像她父亲本人一样谨慎，不仅仅出于政治考虑。

那个年青男人——丈夫！——是他们的黑人同胞之一，不是人们料想他的贝比可能嫁给的某个白种外国人（显然可怜的艾拉曾担心过那种事？）。“踏实可靠”——好像柏诺奈的标准适合一个自由战士的生活似的……可怜的艾拉！别人只知道那个年青男子的代号，参加活动的年轻人之中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和贝比没有谈及此事，也许就连她也了解得不甚确切。他在非洲其他国家或海外受过训练。他在国内也有一个家，但觉得还是不把婚姻的喜事告诉家人的好——出于安全考虑。

——他的家庭也没有牵扯进去。——艾拉对这桩婚姻是蛮有自信心的，她破天荒第一次独自担当起了某种责任，在这件关系到她女儿的前途的事情上正是她表明了自己的赞同。

由于受到了伤害，索尼沉重地感到自己在他们三人(艾拉、威尔、他自己)之中很少有插手的机会。他做了一些努力，在他们之前，为了他们。——不错，那是好消息，让我们祝愿他们生活幸福……工作出色。——

那男孩在场使得索尼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得愚蠢；那男孩的母亲一回到家里，索尼立即就再一次远离了男性的理解。艾拉在发指令：——我们不要对任何人说婚姻的事。——

那是什么想法？从什么时候起艾拉学会了权衡政治方面的利弊？从什么时候起她觉得她理解这类事情？她真的相信到现在为止秘密警察还没有注意到贝比在哪里及在做些什么吗？——为什么不说？——

她感觉出了她丈夫话中的嘲笑意味，便转过头去不看那两个男人。——我不得不留下能再去看她的后路。——

她回来的那一天像婚姻中所有的日子那样过完了，结果她和他回到了他们的卧室，索尼和艾拉。不管白天里发生了什么事，都免不了那要命的结果。他们例行故事地做着上床睡觉的准备，对他们来说这一切此前已重复过无数次，一夜又一夜，年年月月如此；拉窗帘、洗脸、漱口，历来如此，为的是使接吻变得惬意销魂，为的是能在春情荡漾的对视中彼此当着对方脱衣服。他那一囊性器耷拉着，像是某种不为他的肉体承认的异物。她在椅子上一件一件地叠她的衣服以及那些紧裹她的腿和脚的长袜子。她开始打开一个印花袋里的洗漱用品。——我不想当着威尔的面说——艾拉穿着睡衣站在卧室中间，好像那是她未敲门就闯进去的某个地方似的。他正拿着他那边床头带闹钟的收音机在定闹响的钟点，他终于把目光转向她了。——他不是孩子了。——出了什么事？什么事情？——一阵对贝比的担心扫过他全身，使他焦躁不安。

——她有了。——

这种委婉语来自他们过去的生活中的后院闲话。他笑了，同时温情地纠正说：——她怀孕了。我认为威尔不会没有注意到这类可能性……就是说怀孕是贝比结婚的原因。——

——噢不。——她停顿了一下，好让他认识到另一种可能性。——无论如何他们想必是结婚了。他们彼此相爱——

他拉开他那一边的被子并坐到了床上。——家庭生活——

小孩——这不适合于他们那种行动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行动，而是处在一种特殊的流亡之中。——

——噢，他们已获准在营地以外住了。——

——是的，你已告诉我们。她那块蔬菜地。——

——她为怀上孩子感到非常高兴。你恐怕没想到她有如此强烈的母性本能吧，对吗？——

——在他们长大之后……你能知道他们一些什么呢？——

——而且他们甚至已确信会生一个——男孩。这年月，你可以通过检查预知生男生女，想象一下！——

是的，一想到生育，艾拉又恢复了生气——他是这样看的——一个新的生命从一个孕育他的老的生命之中诞生。艾拉现在看起来像任何别的女人了，留着同样的头发——她们留这种头发的确是想使自己显得更加年轻。她以后再也不会坐在床前的梳妆台边梳理她那又长又直、乌黑发亮的头发了。他摆脱了艾拉。自由了。

他慢慢地一摆把两腿放到了床上并且把被子往身上一盖，一直盖到胸部。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听见她在房内走动，听见贝比在跳舞，正跑上来吻他的耳朵，还看见她那涂着睫毛油的亮闪闪的眼睛。结婚了。贝比。背井离乡，离家那么远，她怎么能知道她自己的心意。但是在斗争中没有谁是年龄不够的，没有谁不是准备着迎接任何事情的，连孩子们都扔石头并且被枪杀。——她那么年轻。——他几乎没有觉察到他说得那么大声，艾拉听见了他的话，认为那是瞬间流露的亲昵之情。她说：——我那时也一样年轻。——

他睁开眼睛。年轻多了。十八岁。艾拉已从那装洗漱用品的袋中拿出一条又长又亮的黑辫子。一小段丝带捆扎在辫子被剪掉的地方。艾拉在抚平一张薄纸，纸发出沙沙的声音，然后

她把辫子包在纸中并放进了抽屉里。

另外那个女人也是同一个星期回来的。他那么痛苦地盼望她回来，以致于有时他好像没法把足够的氧气吸入肺中似的，呼吸被强烈的担心阻塞了，他生怕她不能获准通过边关，而他自己又永远拿不到护照去看她。黑人运动中出现的分歧和阴谋使他感到紧张，他唯一的解脱方法是转向另外的这种痛苦，他对汉娜的渴望。转而他又从这种痛苦堕回了他为某些同志蓄谋使他陷入的困境而感到的沮丧之中。

当她在电话中告诉他说她已被开释，已获得签证并将在周末到达时，他恳求她，坚决地恳请她允许他去机场接她，尽管那样做有悖于谨慎和安全的原则——那种他和她严厉地强加在他们自己身上的道德准则。

他不会去机场迎客厅露面，他将在机场地下停车场等她，而她将带着她的提箱走进那散发着燃尽的汽油味的水泥大洞穴，朝那在荡着回音的白昼的幽暗中苦苦等待的他走去……她又住在他拿着电话筒在其中通话的那座别墅里了。他因期待而兴奋欲狂；汉娜能给他什么感觉！有生以来——五十岁了，我的天——他从未体验过这样的情感。他年轻的时候他老了，是那么回事；如今颠倒过来了，只有现在他才明白年轻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汉娜归来的头一天晚上，他服用了一片安眠药以平息自己的亢奋；以抹去在床上躺在他旁边的艾拉的形象。

他在幽暗的地下车库里等她，包围他的是一旦停下来就变成了呆滞的尸体的汽车，还有在他的神经末梢上走过来又走过去然后消逝的脚步，等着等着，他突然感到所有的生命力和意志力都在离他而去，突然感到这点。于是他仿佛又回到了在瓦尔河三角洲某地驱车前进的时刻——当时他正一个劲儿地赶往

他将去发表演说的一个集会地点，突然他产生一种放开方向盘的可怕冲动，接着他发现自己坐在一辆失去控制的小车里猛冲，冲向一个终点，弃绝一切。现在是在车库里，为了控制自己，他从轿车里走了出来；他站在那里定了定神，以便在她出现时迎接她。他不停地克制自己，感到自己的双手好像变粗了，迟钝了。地下车库冷冷的，一个巨大的墓室。那个从提桶中拿出水淋淋的拖把擦洗豪华轿车的老黑人男子是随法老一起被埋葬的一个奴仆。她会带着她的提箱出现的；什么都无法阻止这件事发生。瞧她来了，她非来不可。她已经看见他，正慢慢朝他走来，在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分离之后庄严地向他走来，她那两条带雀斑的白白的腿强健有力地迈着步子，她的身体因提箱的重量而稍稍斜向一边，台阶那边射过来的光线从后面照在她的金发上。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站在那里微笑着，好不容易才把手从身上松开，像是准备迎接她似的，这些姿势背后什么意义都没有。她接受了他的沉默，在这个奇怪的公共场所，除了那个年老的黑人清洁工好像别无他人，但谨慎还是抑制了他们，他俩没有热烈而轻率地互相拥抱；怎么说她已回到这个国家，在这里你永远不能保证没有人在监视你。她自己笑了起来，流出了眼泪。在回别墅的路上，她向他倾诉了她在电话中没有讲的有关签证一事的所有细节，在他开车的时候，她把一只手放到他的一条腿上，它温柔而坚定地张开并贴在上面，一种对他的需要和要求。

一旦他们再次回到那张床上，在那大洞穴里发生的事便显得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靠近土地，索尼又回到了地上，作为一个在斗争的人，能够触摸、感觉和嗅出生活美妙的激变。

——……那时他睡在这里。我不时来一下，发现他在你的床上打鼾……——他摇摇头，而她则微微一笑并吻吻他的脖子。

——但你为什么把那口令告诉他？你为什么没想到告诉他别的呢？——

——此外我能让他说什么才能使你感到绝对有把握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仅仅只属于我们俩呢？

——可现在增加了第三个人。——

——噢决不是那样，对他来说那口令和任何其他口令一样。一旦达到目的，它就没有意义了。你知道。他已经忘记了，那是只属于我们俩的……至于他嘛，他所操心的其他事可多啦。他非常出色……他完成了不少任务……好几次出入这里，好几次。——

——别对我说这些。至于你自己，忘记那件事，管它是什么。我不想知道他是多么成功。不知他是否被盯梢，不知他们是否使用了惯用伎俩，让他把他们引向他的联系人，包括这座别墅。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无法时时刻刻都守在这里……再说他那么自负，那么自在，毫不在乎，什么都不说。那电话真叫人沮丧。我没法告诉你，没法问你任何关于那个家伙的情况。弄不好他可能就被捕了，我也和他一起入狱，而你一点儿都不知道。——

有那么一会儿，她在想这是否是一种责备。但在他们之间，那是不可能的；你们都不是为对方活着，彼此间的爱蕴含在事业之中，假如你们为了个人安危拒绝斗争所要求的东西，那彼此间就不会再有爱。她不知道该怎样表述这一点；她并不是非说出来不可，因为他又在说话了。——我希望你在允许他利用我们之前对他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你很清楚，和我一样，这不仅仅是我本人的事——时刻都存在我们的运动通过我被渗透的危险，通过我们中任何一个人。

——我亲爱的，你信不过我吗？

——我已对你说过，你对我意味着什么。

——她把脸紧紧贴在他身上，这就压低了她的声音。——“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他把她的头移开，用长长的双手紧紧捧着她的脸，她那像蜡笔画似的柔软的两颊被挤向她那双小而明亮的蓝眼睛，都被他扭曲了，他使劲地吻她的眼睛、鼻子和口，好像要把她抹掉似的。他们再一次做爱，这种爱使他们难分难舍，他们担心假如没有它可能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他们俩静静地躺着的时候，她像通常那样非常有分寸地意识到了她拥有他的限度。——家里怎么样？艾拉回来了吗？——

——她是几天以前回来的。威尔在和我相处的日子里表现得相当明事理……他甚至还煮了煮饭……——

她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当然，他是一个好男孩，他就像你，只不过没长大。你会发现他长成何种模样。——

她使他对自己的孩子放心，她要是他妻子该多好！瞧情人们之间在玩些什么游戏！——我女儿结婚了，这一点使你吃惊吧？我是大感意外。——

汉娜笑了。——不，一点也不吃惊。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她不像她母亲那么美，但还是很可爱的，和谁结婚了？和卢萨卡的某个人，没错吧？——

——那人像我们其他黑人一样，也是在黑人区长大的。我从未见过他。艾拉喜欢他。我希望那不是一个大错误。——

——怎么会是一个错误呢？——

——结婚，在如今这年月。瞧他们的处境，动荡不定，流亡在外，没有家——结婚为的什么？婚姻意味着某些社会结构，而我们现在正在为摧毁现有的那些结构而忙碌，我们不得不这样。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也是我们的孩子们的时代的任

务。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想结婚；她长着一个脑袋，尽管她年轻。至少我认为她长有脑袋。——

——你认为他们只应同居？——

他俩彼此对视着，真像贝比的父亲及其情妇。

——是的，也只能这样。他们之间会有长时间的分离，他们都会不得不去各自被派往的地方。婚姻需以固定的地方、固定的生活方式为依托。结婚对他们是一个错误。只要可能，想同居就同居好了，至于以后嘛，怎么着——

——艾拉肯定不愿那样。她不为婚事高兴吗？——

有那么一会儿，他用双手捂住脸，从手指缝间呼吸。——她高兴。——

他没有继续说他想说的话，他没有告诉汉娜他的女儿将生孩子了。

我不知道她与一个将做外公的人做爱时感觉如何。那也不能阻止他。我不知道他既然知道自己那么老了怎么还能继续做那种事——多老了？五十多岁了——同时另一个年轻男人也在对他心爱的女儿做同样的事。

在本该让孙子或孙女坐在他膝上摇晃嬉乐的时候他却在操他那个肥脸的金发女人（粉红的牛奶冻，就像在我们儿时我母亲常用小盒为我们做的那种）。

这样去想他实在令人恶心，我知道，但这一切确实是他造成的。他这位上进的老师为我安排的正是这样的受教育的机会。

我理所当然地设想——在我母亲向我说起我姐姐怀孕一事时，我的确想过——事到如今，他也该收敛了吧。即使在我姐姐因为他而企图自杀时他没有停止干那种事，那么现在，他那

一直令他耿耿于怀的自尊，恐怕足以阻止他了吧。一个外公，那个伟大的情夫！我的父亲，那个有生以来从未显得可笑过的人。假如阻止他的不是他那著名的自尊，按我的猜想，那恐怕该是他的自大、他的虚荣心吧——很多个早晨我在浴室里发现他的肚皮大得相当可观了，他的胸部已出现白色胸毛。在他打哈欠的时候，他呼出的气难闻极了。尽管如此，他一定还保留着某种尊严吧。

但是不。一切都照常进行——已进行多久了呢？我一直把那事儿设想成一段小插曲、某种会结束的东西；但它却是我的生活。将来某一天我进入他这个年纪并回想我的青年时代的时候，我会发现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当然他从未见过那个小小男孩。只见过我母亲带回的那些照片。她告诉他那婴儿和他挂相，就像我出生时那样，她说。那孩子那么小就有一对非常引人注目的眉毛了。但他说所有的婴儿都是一个模样的。这位情夫根本不想承认他是一个父亲、一个外祖父，不管是为我还是为他的外孙。那种眉毛在他看来真是晦气……而我母亲却那么天真而自豪地把它视为血脉延续的证明，某种他的任何别的女人都没法从她那里夺走的东西。也许并不是那么天真无邪；或许女人们真正需要男人们只不过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孩子；一旦这种生物学功能被实施并传至第二代，在她们自己再也怀不上孩子的时候（我母亲现在一定接近那一阶段了吧？像贝比一样，我总是把她想象得年轻），她们就不需要我们了。我意识到我对女人们了解不够。这不是他热心于传授的科目。

我母亲经常去卢萨卡探望贝比和那个小男孩。当然——她说过“我有必要留一条再去看她的后路”。在那孩子出生之前她忙着织毛衣和缝衣服，而他则离开家去参加会议和晚上的“会

议”。她把那些小衣服的半成品用别针别在有软衬底的熨衣板上，在上面覆盖一块湿布，然后用熨斗熨平整；羊毛的气味随蒸气蒸腾起来。有时为了和她做伴我就在厨房里学习。没有人用那块马蹄形磁铁收拾别针了。

在那孩子出生之前她又去了卢萨卡一次，出生的时候还去了一次。当局没有给她添任何麻烦；他们为什么要折磨那可怜的女人呢？在詹斯马兹机场的第三个出入口他们的确检查她的行李了——毕竟，她是索尼的妻子——她带的全是自己做的漂亮的小孩衣服，上面绣的是兔子之类图案，而不是反政府的文件，上面饰有白色和蓝色的绸带，而不是某个被取缔的政治组织的旗帜，让这些东西铺满他们的检查台，他们一定感到自己是多么愚蠢。她说他们对她挺好；祝贺她即将作姥姥了。我父亲评价说，是的，假假惺惺表示好意和谋财害命是结伴而行的。从他在监狱的日子起他就明白这一点了。雇佣我母亲的那个医生非常善解人意并且与人方便——他好像并不反对她经常不去诊疗所上班。我料想她在请假期间是没有报酬的，但我母亲已习惯于用不多的一点钱维持家计，尽管在家里她并不克扣我们什么，但她显然还是能够攒下机票钱的。我想那就是她显得和从前不一样的原因——现在，不仅仅是头发不同了——她在穿着上也不像从前那么在意了，她几次去看望我姐姐都穿着紧身裤和平底鞋，用我的行李包带着给那个小男孩的衣服和玩具。在回来的时候她不问我们——我过得怎么样。此外，她好像在这里已结交更多的朋友；她自己的朋友，而不是我父亲的那些朋友，和后一类朋友在一起时她总是处在边缘的。在我回到家而且她在诊疗所的工作也做完了的时候，她常常仍然迟迟未归。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他回到家里，我听见他在厨房里喊她：艾拉？艾拉？他从来是不用喊她的，我不知道那种状况持续了多久。

但是他错了；他已失去了能感觉出我母亲在另外某个房间里的本能。那些房间空空的。她不在那里。她出去了，不是为他，不是为我。

正如索尼相信他在汉娜身上找到了他唯一的朋友那样，他相信他在解放事业的风险、公共讲坛、秘密会议和监狱中找到了他最理想的同志。假如那种友谊对他意味着把那种神圣的感官之乐当作才智的一部分加以接受，那么那种同志情谊则意味着他与他那些具有共同信念的同志们可以一起生一起死。在受到审讯的时候他们都不说出彼此的名字。既然他们都已到了那个份上，任何别的背叛都不能在他们之间找到可侵的裂缝。

索尼一度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的热心读者，也是一位虔信语言的威力的业余辞令能手。他一定知道某个术语一旦被造出来，它会创造一种自我完成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还会提供一种系统阐述它的方式。“不忠实的”一词作为一个政治术语被提出来是为了防微杜渐，用温和灵巧的方式对待某天晚上索尼独自在家时来找他的那一类人的。他把他们打发走了；就像他肯定别的人也会做的那样。最好让他们的阴谋在没有被人注意的情况下破产；黑人运动内部出现的任何类型的“不忠实的”行为都只会使政府嗅出血腥味并趁机而入。一些人私下里秘密地讨论了那些夜间拜访，它们已传开了；这一话题没有被列入执行委员会的议程。但那些夜间拜访者们中的几位对那位执行委员仍然漠然以待。也许他们正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以便再次行动，而不是如实悔改自己的过错，一点小过错——只一次——领导层接受了这种结论。这类结论的选择在领导层内部激起了矛盾。有些人认为，应该由某些强有力的人物私下里和那些搞

阴谋的人谈谈，这些人非处理不可，必须再一次让他们明白抵抗运动的必需条件是团结，此外别无选择——言外之意就是，他们不可能搞阴谋而不取其咎。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尽可能小心地对待这种内讧，无论如何不应让他们感到处在被开除的危险之中，——否则就会促使他们抢先行动，为保全面子而宣告分裂出去。当然，那伙搞阴谋的不忠者嗅出了这种意见分歧、犹豫不决的不安气氛，并且跃跃欲试地想利用这一点。他们在其他的执行委员们中间进行议院游说（这个词对黑人运动并不适合，这一运动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其广大的支持者们都是被排除在议会之外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执行委员们的谨慎考虑有可能变成对他们的支持。新闻界透露出了黑人运动中出现的裂隙：领导层中的异军——老卫士支部不罢休。

索尼长时间以来已注意到这种告诫信号，由于某种原因他部分地误解了它们。在汉娜去莱索托之前，在那个睡在那张贴近地面的大床上的男人来到之前，在艾拉带着消息从卢萨卡回来之前——好儿个月以前，索尼和汉娜谈起过一位索尼一直引为知己的同志的奇怪态度。——“所有的人都微笑了事，那么接下来你就要面临一场宫廷政变了。”——他曾说过这句话却并不完全明白他说了什么。而汉娜，她早在那时就说过，任何潜在的阴谋策划者都不得不相信，他们要想成事必须先俘获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和她都没有想过他们可能已经胸有成竹。不管你对一个人多么了解，你永远不知道在采取一项决定性的行动时他心里在想些什么，那是某种“与性格不符”的东西，看不出它是怎么改变方向的，也看不出是什么在为那种转向、背叛做准备的。你跑开并抛下那个垂死的人不管。只有一次。

索尼不得不承认不忠不会很快以失败告终。政治斗争的学习过程是没有尽头。和索尼一起被逮捕的伙伴们中的一个（索尼

忆及过去的友情，有时仍然在私下里把他们看作同志）现在成了宫廷政变的参加者。这不可思议，是索尼肋下的一个伤口。这个人是汉娜去狱中探望过的同志之一。

——他过去写的信常常那么好，那么斗志昂扬。——

——你也给他写过信？——

——是的，给每一个人，那是我们的方针，尽可能多地接触。这你明白。——

石头中有教诲，万物中蕴含着善。

索尼有独特背景并且善于辞令，因此本来很多人是愿意选他去承担“训导”那些不忠者的任务的，但是根据有关决议任何被不忠者们拜访过的人都不能担当这一重任。有资格去完成这一任务的必须是还没有被拜访并把拜访者送出门外的人。“训导”会晤一定不能出现假装的敌意气氛。但是他和工会领导人们一起参加各种预备会，还是出席与其他附属的激进团体的秘密会议的代表——这些秘密会议的目的是寻求这些团体的支持。

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跑遍全国各地，不是出席协商会，就是在赶往另一个会议地点的路上奔忙，其间还需利用各种机会去拜见这一位或那一位必须和他单独谈话的人，这些会晤都是秘密中的秘密；还要考虑各种流言，也就是那些处在内讧者一边而实际上却是在为黑人运动传递情报的人送来的消息；还要对各种怀疑进行比较，不能轻易断定这个人或那个人在窥探运动的领袖们对撤换不忠者采取什么审慎态度。因此索尼几乎根本没有时间和心绪去履行他的其他责任——没法去关心他自己担负起的东西，也就是他一直维持的两个家庭：他的家和那别墅。好在艾拉在为去看望外孙的准备工作忙得不亦乐乎或者是已去看外孙了，而汉娜又明白哪些是需优先考虑的事

情。因此艾拉好像并没有注意到他忘记了她即将再次出远门的日期，在她和跟在她后面替她拿行李的那个男孩走进厨房和他道别时，有那么一瞬间他显得茫然不知所以。

——你乘几点的飞机？我送你去机场吧。——

不用了，有威尔哩，威尔将开车送她，然后他会直接把车开回来。——你能肯定没有车现在对你无妨吗？——艾拉这种经常流露的体谅之情，使他突然记得她头天晚上一定问过他用车是否会对他造成不便；她知道他处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尽管他没告诉她多少情况。

在离开几天之后，他驱车去那别墅呆了一个小时；那是早上一点钟，汉娜被立即惊醒了，她听见车子停在小巷里的声音，马上跌跌撞撞地冲向大门。他处在由大量因说话而导致的紧张和疲惫之中，他两个眼窝发紫，好像是挨了拳打似的，一接触她那睡得热乎乎的皮肤，他就惊了一下并发起抖来。别说话，别再说话了，汉娜说，尽管她是他最愿与之交谈的人，是他最愿与之分享超越自我而生活将获得的一切的人，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们很快就做起爱来——不，他操了她，那是他身上剩下的所有可供消耗的东西。然后他不得不穿起衣服并且离开；为的是在早餐时向他儿子露露面，为的是使他自己稍事休息后能实施第二天的各项决定。假如他能够睡过去；但是接着我头脑中的一次旅行开始了，目的是启动我的心智。漂亮的言辞过去一直是一种可赖以自慰的东西，如今却成了痛骂的对象。

为什么那天晚上来找他？

他怎么可能想象出有人能从那次意想不到的、侮辱性的拜访中分析出某种富于深意的东西呢？

但是别人的确是这样评价那件事的，为什么找的是你呢？

这话轻轻松松就脱口而出了。他设法相信那显而易见的弦

外之意：你的哪一点使你看起来像有隙可乘之人呢？一定有某种东西，为什么别的……？这位无可指责的同志，这个素孚众望的索尼……毕竟双手并不那么干净？没有任何人知道——有时就连那些喊喊喳喳重复这类话的人都不知道——猜疑是从哪里来的；也许它们来自深埋在他们自己内心的恶意，并且与由对不忠实行为的恐惧造成的怀疑的污泥搅和在一起，也许是由敌人经过周密策划而散布出来的——现在所谓敌人，不仅仅局限于政府、警察和军队了，还包括不忠实者们，这些势力最后会不会可能联合起来呢？

为什么找他呢？

那些人怎么可能那么放肆地来找他呢？是什么使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这样呢？现在不再是把他们赶出门外的简单问题了。一想到他曾对他们敞开大门他就感到极大的沮丧和厌恶。一想到他那些曾和他同入监狱的同志们会希望他扪心自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胁下的伤口就被戳了一下。

——本来我是希望把我的生命寄托在一些人的信任之上的，但是他们不愿放弃这些猜疑，不发表任何相反的意见……你能相信他们的信任吗？——他必须找时间和汉娜谈谈，有必要和汉娜谈谈。

——那些杂种。——汉娜的两颊涌现出了血斑，明亮的泪水盛在她眼里蓝莹莹的，她因愤怒脸胀得通红了。

他对这种无用的举动摇了摇头。——我本该为他们把我的头放在断头台上，他们从来没有……他们是最好的……——

——不，我是指另外那些人——他们企图使你们彼此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他们希望你们互不信任，希望你们搞窝里斗。你必须阻止这种局面出现。——

——“毕竟双手不那么干净。”——

——你必须辩他个水落石出。是吗，索尼？——

——我想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说……不得不承认这类事情在我们之中是可能发生的。

她不知道她的抚摸是否会使他感到羞辱；他是否需要远离他所有的娱乐以便自觉不为外物影响，超越了柔情和攻击的力量所及。但她拿起了他的手并且抚摸他的骨头，一根接一根。——没有哪个真正重要的人会怀疑你的，哪怕怀疑一会儿。你明白这一点。——

他找最高层的领导人们谈了此事；他们讨论了怎样处理它最好，并且选择了一种表明他们无庸置疑地信任和器重他的办法。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让他留在他们身边一起参加一些最重要的讨论，借此使别的同志觉得很多非常重要的决策的制定都有他的份儿，即使在制定它们时他不在场也是如此。他带着热烈的忠诚看到团结又恢复了。目标又统一起来了，于是他忘记了他内心的创伤。

我有一个属于我的小女孩。说她"小"不是因为她个子不大，——尽管她的确小巧，她的身材大概和我母亲的一样——而是在这个形容词常用的意义上说她小。她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我从不搞什么伟大的恋爱。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东西，她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她。我在她提供的地方和她睡觉，她父母外出的时候，就在她家客厅的长沙发上，有时则在她的一个朋友借给她的房间里。

就像爸爸一样。我的性生活没有家。

那是一种她很看重的甜蜜、惬意的经历。她人很聪明（别担心，我不会和没受过教育的女孩亲密交往的），在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俩常常一起去看电影和我所受的教育使我有雅兴欣赏的

进步戏剧。她当电脑操作员的收入料想是足以供我俩住进一个小套间的，尽管我还是一个学生而且只是偶尔打工赚点钱，她老是建议那样。那样我们就可以整个晚上都睡在一起了，她说，同时天真地表现出某种敬畏。但我不能让我母亲独自呆着，再说，由于我母亲还指望着我在她离家时和他一起呆在家里，我也不能离开他。

那个小女孩为自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的女朋友而感到自豪。我知道她告诉所有的人说我是那个著名的索尼的儿子；她的父母对我和她交往表示信任，因为我们这个为别人而活的家庭的高尚的道德标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自己对参加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害怕得要死，他们属于把“索尼”视为某种英雄的那一类人，而且我认为他们会永远那样看他；尽管我最近注意到他在他的同伴们之中好像不像从前那么举足轻重了。黑人运动的大人物们如今不像从前那样常来找他进行秘密交谈了。我有一种他已被晾在一边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而他又不愿和我谈论此事。他被淘汰了；这可不是那种适合于和我分享的秘密。我想，从事政治和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你有你走运的时期，然后它就结束了，接着就轮到别的某个人走运了。而这一点，又正是他不容易接受的。

我能看出我母亲喜欢那个小女孩。我不愿和她在我家睡觉，哪怕是有机会，比如说我母亲去了卢萨卡，而他则睡在那座藏娇别墅的地铺的时候，不过我曾把她带回家来共进茶点。我知道我母亲喜欢我那样做，在她眼里，那是传统的恋爱方式，应该那样。她又恢复了原来的打扮，她穿上了长袜和高跟鞋。——噢，你妈真美。——我的小女孩被迷住了。

——过去很美。在她还留着长头发的时候。——

这两位女性立即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和谐。小女孩本能

她知道我母亲希望我——至少她的孩子们中的一个——能够在她身边“安顿”下来，过一种传统的家庭生活，让解放见鬼去吧！啊！在小家庭的小小天地里生活，过去他们年轻的时候，她和她丈夫的小天地够好的了；现在不同了，天地宽敞多了，环境舒服多了，不再是住在悲伤之子——柏诺奈城的黑人区，而是非法住在白人区的一座屋子里，这里的电影院向所有的人敞开。留在家里，这对我够好的了，我可以永远成为妈妈的孩子了(在她看来)，但这也是一种失望(在他眼里)。她替我准备了一个角色：在高贵的索尼和贝比为保卫人民的自由而战的时候，听话的威尔维持家里的烟火。

在我把大学一年级的学习成绩告诉她的时候——全是优秀——我对她说，我这么学习是为了什么呢？在革命中谁会雇一个商学院的毕业生呢？——说完我笑了起来。因此她把我的话当作玩笑。——威尔，你学得这么棒真是太好了。——

——噢，对的，爸爸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她在看着我，一瞬间忘记了谨慎，然后她的双眼很快低垂下来，左眼皮轻微地抽搐了一下。我不该说那句话；这是我俩达成的最亲密的契约——什么契约呢？背叛他吗？我不知道这一契约有什么意义，但我发现她仍然希望它被遵守，尽管孙子带给她的慰藉和去探望贝比——一种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已用某种方式使她适应了她一定从她丈夫身上感觉出的某种东西。

但我不是在开玩笑，我已极其厌倦了。——我为什么要继续住在这里好像只有为自己营建一个美丽宜人的小角落才对似的——(我没有说“和一个美丽小巧的女孩”。)

她在观察我的嘴唇，好像她不相信从它们之中吐出的那句话似的。她的惊恐使她皱缩并衰老了，就像在茶话会上她为未

来的媳妇感到的快慰使她变得年轻而丰润一样。——我们会需要有文凭的人才的。丛林斗士们赢不了经济战。——

我母亲是从哪里学到这类行话的呢？无疑是从他那里，或者是在卢萨卡探亲期间和别人闲聊时学来的。那不是她自己的语言。我和她之间从不那样交流思想。

——你是有用之才，威尔。——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不要离开。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们。她不愿让我去战斗。为我的人民。为我的自由。

我从未想过我母亲内心会有任何诡计，但我想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父亲的金发情妇的姐妹，因为他喜欢她们俩。环境已使她培养起了使用心计的能力，正如她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一样。也许是为了向我表明她是多么依赖我她最近才要求我四处开车送她的（我已折价卖掉那辆摩托车而买了一辆“美丽而小巧”的二手货日本轿车，因为那个女孩的父母不愿让她搂着我的腰和我骑着摩托车四处招摇）。她要去会一个朋友或是应邀去拜访那个医生的病人中的一位——像我说的那样，她变得更加不依赖于我父亲了，用她的简单方式。我在某个购物中心或是某个便于我掉转车头的街角让她下车。她说，她离目的地只有一两步远了，没有必要把她一直送到门口。因此她并不对我表示过分的依赖，她的依赖是经过仔细盘算的。她不需要我再开车来接她回家——她叫我放心，说有一路公共汽车可坐，或是那位朋友会开车送她。可怜的女人，我已了解她的情况。有一次在我正准备拐弯的时候，我被一辆卡车阻挡住了，在没被她注意的情况下，我发现她不是沿着她说她要走的那一边街道往前走，而是转过街对面的拐角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了；她或许是搞错了地址；但这件事还是使我感到她所谓外出访友纯粹是可悲的谎言。她根本没有朋友，根本没有

准许她，她不过是想向我表明假如没有我她没法和他一起生活。

阿拉伯的所有香料都消除不了那臭味。

为什么找的是他呢？

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回来纠缠他，他的胸膛里有强酸在灼烧。这已不再是同一个问题了。现在，这已是一个新的、不同的问题了。好像并不只是他一个人。其他的几个同志也在那天晚上或别的某天晚上被那些人找过。他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把此事汇报给执行委员会时他和他们在私下里交换了意见。但是由此引起的怀疑，不得不由高层领导出面排除的那种怀疑，却被传布开了而且只针对他一个人。为什么针对他呢？为什么这种针对他的怀疑能在同志们的心中找到某种存在的依据呢？没有任何痕迹表明涉及到别的那些被不忠者们找过的人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他不可靠。投下了什么阴影，从哪里来的呢？阴影在他背后，包围着他；一切都在他心中翻滚，在他的胸骨下面的那个地方烧灼。甚至连汉娜放在他身上的那只柔软的胖手都平息不了它。

汉娜。他们知道汉娜其人。他们知道从入狱那时至今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发生的事——他们是男人，其中有一些还是追逐女人的人——就是说在女人们向他们卖弄风情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逮住她们。但他不是一个追逐女人的人，在常人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一个周末或夜晚在另外一个城市，一个女人用某种特定的方式看着你，于是你们就勾搭上了，而你一回到家里就忘记了她。革命者、活动家都是完整的男人和女人，只是人。这类最低限度的偶遇与彼此互相委身和信任毫不相关。

但索尼从来就不是那种男人。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从来没

有那些有待忽视的献殷勤的调情或一夜风流。他在错综复杂的平衡之中过着一种显然持久的双重生活。他对此很认真，千方百计维持那种平衡，而且显然他不愿放弃这种双重生活。他们知道对一个搞革命的人来说艾拉是一个多么好的妻子。而且他们都知道他的另一个女人是谁。有用。她不怕警察和监狱以及与革命者交往的危险。在某一点上，她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只是在某一点上；她没有直接地参与黑人运动，当然也就不能参加审议会和参与决策的制定，因此她也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受纪律的约束。他知道这一点。索尼，同志们中最守纪律的人，知道她这一点，不管他允许她对他多么亲近。而亲近他也就是亲近黑人运动。他知道他对这一点负有责任；当然他也注意到他们知道这一点。

他开始觉察出由汉娜投下的一个阴影。他对汉娜的需要。他没有对他的同伴们——他们已表明了他们对他的信任——说他发现睡在她的门廊里的那个男人的事，那个她用一句他无法拒认的亲密口令介绍来的男人，那个他为其送食物和当警卫的男人——是的！——不知道他是谁或他在做什么，这是一种冒险主义，也许，汉娜受骗上当了。

而他们知道这件事；答案就在这里。他帮助了一次行动——某种没有经过组织批准的行动，他也没有向组织汇报这件事。有些人——那些不忠者——知道此事，而这就是他们觉得有找他的可能性的原因。其他的人也知道这件事，就像他们知道不忠者们找过他一样。

因此凭什么说他不会过一种三重生活呢？假如像他这样一个早已证明其正直的人都会向组织隐瞒情况——他本来是应当完全献身于组织的，忠诚是信念的介绍信——那么恐怕他面对不忠行为的进攻也同样脆弱——敞开着，像一个伤口。

本来正直却被斥为卑鄙，那么，与其被人视为卑鄙不如索性真的卑鄙。

他恨自己出于学究式的老习惯想到了这种陈词滥调；这没有用，对他没有一点用处，在他还是一个过着安稳的小日子的小学教师的时候，格言警句那么令人愉快地概括了绝不必去经历的种种危险。现在的现实可不那么优雅了——困扰他的是诽谤和自我背叛，真难理清个头绪。

他得到了平反。是的。只是“平反”一词竟然不得不用于索尼身上！没有任何冲他而来的东西被证明或推翻，没有任何指控，只有一个阴影。他像其他的人，也就是不忠者们，一样被平反了，好像他和他们是同类似的。也许除了他没有任何人那样看一起平反的事。组织上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那就够了。而和不忠实者之间却还有一番交易要做。他参加了讨论为维护团结而提出的各项条件的预备会议。但他什么也没有说。本来他以前历来都是出语不凡、观点鲜明而富于影响力的，但现在他用双手托着头，他那双眼睛好像是在收集和综合那些散布在各种话语和动机之间的某一决定的各个要点，还没有到他说话的时候——他不能正式“参与”处理不忠者的交易。他那位担任会议主席的同志时不时地向他投来一瞥以听取他的看法，与与此同时摘下自己的眼镜好像他的瞬间暂停只是为了摘摘眼镜似的。会议主席是他的一位老朋友；他们曾在监狱的院子里一起锻炼过。每次听到一种观点他的确都产生某种想插上几句的强烈要求，但接着一种非理性的愤怒的冲动扑灭了它，那件事已经结束和容忍下来了，现在没有谁再愿听什么指控。自我，自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迷上了自我。但那是他们，他的同志们的过错，他们坐在这间弃置不用的仓库里，彼此手中控制着对方的生而有时是死。按照某个人的胡思乱想，所有的会议

室，不管其目标多么不同，都是商人们的办公室和董事会的会议室，因此这间仓库会议室里竖着齐眼高的隔板。那个空荡无水的冷水器立在那里，就像那个被忽略的鱼缸立在柏诺奈的院子里一样，威尔和贝比让鱼儿在缸里等死哩……他的愤怒被控制住了，他的注意力在四处游荡：自我，自我。立即让他们停职检查，有一个人在说，他们不能来这里和我们坐在一起！

——让他们当普通成员好了，对的……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一个带有贫困留下的痘斑和监狱看守打出的伤痕的小个子黑人把火柴棒从嘴角吐了出来。

——他们多数是普通成员，对吗？——

——不，不，只有三个。还有两个是执行委员。——

——主席同志……主席同志……我能不能只是……——

——我们只见到卡莱布一人。另一个呢——他已有好几个月没来开会了！——

——执行任务去了！——

接着便是笑声，还有私下交谈。——瞧我们派出去的是些什么人？你听见那句话吗？——某项任务……他东窜西窜，声称……我告诉你们——说一些让人以为是由我们说出的话。——

他们打破了紧张气氛，接着会议主持人敲击桌子使他们恢复了会议秩序。——这里不是竞技场，同志们。——

一位素来被指望能在会上发言的人开始发表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说了，这个人演说时总是那么神情自若，好像他是在一面镜子里端详他那饱满而英俊的脸，他本人就是他自己的有欣赏力的听众似的。——同志们……我们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其最终结果我们可能难以预见……民主行动的队伍从内部受到

了威胁……这匹特洛伊木马[1]……能把它拴进马厩吗……我问你们……告诉我……它与法西斯分子的卡车有什么区别，法西斯分子的卡车看起来像是清白地装着冷冻饮料，把我们的孩子们吸引到街上，使得法西斯分子有机会把我们的孩子枪杀在街上……难道我们准备噤若寒蝉，准备把脖子伸向潜伏在这里的叛徒们的屠刀，就在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全副精力与智慧献给我们的斗争的地方……难道我们愿意让犹大[2]坐在我们中间……我说，我敢以我们的广大人民的名义大声地说，我们的广大人民，他们在罢工行动中牺牲了他们的面包，在抵制房租运动中担当了无屋可归的风险，在矿井里流汗操劳的也正是我们的这些同胞……让我们把这些辜负了人民的信任的叛徒赶出去，我们的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他们愿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好了，但我们不能姑息养奸从而破坏我们神圣的斗争事业——

陈旧，没有新意。索尼没有注意到他自己正在慢慢地摇头，他在琢磨的不是演说的修辞和夸张措辞，这位演说者和他本人一样勇敢，可惜他本人勇敢也是白搭——他在琢磨一个在监狱里被连续单独监禁了十七个月的人怎么竟能这么滔滔不绝地演说；在琢磨这样的控诉怎么竟用如此过分渲染的方式来表达，使在场的每个人耳中都塞满了术语。他相信那些不忠者应该被开除；与其内部不和，还不如各奔前程。但是此刻，一想到开除不忠者的决定和浮华的措辞搅和到了一起，他就充满了反感。他喜欢通过明了的措辞拚命抓住真理的稻草，他没有发表

① 据古希腊神话，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久攻不下。奥底修斯献计造了一匹大木马，马肚里藏有精兵，把马弃在城外，然后佯装败退。特洛伊人在希方奸细的蒙骗和怂恿下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拖进了城内。半夜，希腊人暗中回师，木马中的勇士们冲出木马，打开城门，特洛伊城陷落。特洛伊木马常用来比喻内部的颠覆者。

② 据《圣经·新约》加略人犹大，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为三十枚银币，以与耶稣亲吻为暗号出卖了耶稣。

演说。

但必须有某个人出来说话。一个运动不能通过拘谨的弃权来进行。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保护过他(免受无中生有之害！免受一个阴影之害！)并让他在他们身边亮相的高层领导已经秘密地达成了一种妥协方案，大多数人都会接受它。——同志们——那个被领导层推举出来的发言人平静地朝四周看看所有与会的人，用手指摸了一会儿他的下颌骨的隆起部位，等待大家集中注意力听他说话——我提议，从团结的最高利益以及整个运动的安全出发，我们不要公开把这些人开除出执行委员会。我们最好是在征得他们的同意的情况下停他们的职——让他们隐退——直到执行委员会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中自动解体。他们将不再参加任何会议，不再以任何资格代表我们上台讲话。他们将不再接受记者采访。我们知道他们会同意这样……整个事件将变为有雷而无雨之事。——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下一个人发言。——他们仍然还是成员——普通成员吗？

——是的，没有分裂。他们在接受再教育——假如有人愿费心问就这么说。——

那位发言人把头往后一仰，挺出一副富于英雄气概的侧面像。——同志们，我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索尼和他那些可敬的同伴也就是那些领导人一起离开会场。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肘——此事只好这么处理，索尼。——

——你知道我的想法。——

汉娜正在等他去找她并通报会议的情况。他开车到别墅，把车停在巷子里，然后穿过灌木丛，那里有花胸的好望角鹡鸟在飞来飞去，它们就在他面前歌唱。他不自禁地向它们伸出

了双手。她旁边有一堆烟蒂，他从她干乎的嘴里领略到了她的焦虑的烟味。他先把会议的决定告诉了她，然后回过头去描述会议的经过，一步一步地讲述，甚至用略带夸张的语言意译了在当时使他难受的那个演说，乐得她脸都扭曲了。像他一样，她了解那个演说的男人的真正品质——他文风浮华也无妨，尽管他突然渴望变得朴实无华——在这个国家，在这种生活中，冲突与斗争破坏了所有性格的连贯性，没有任何东西是简单的。他们经常谈到这一点，尤其提及贝比——他的贝比的性格变化。提及她轻浮、熟练地运用自己的魅力的方式，然后是突然（谁知道呢？）在她身上露出锋芒的那一目标——人类社会最强有力的目标，也就是改变世界的目标。

改变世界。又是吹得满天飞的话语。

他俯下身子，把那缸满满的烟灰倒入花园。——抽得够多了。别再抽了。——

她把烟盒推到一边。——我保证。你在这里的时候不抽。——她停顿一下接着说：——……这么说没事了。莫名其妙。一切又和从前一样了。——

——不一样。——他努力回报她的微笑，但他的笑却是一种久留不去的咧嘴怪笑，与之相映的是在他忧郁地凝视的眼睛上方皱起的那对互相对峙、又黑又浓的眉毛。

——你能和我一起吃饭吗？——

他不能，他已答应让艾拉那天晚上用车——她应邀要去拜访某个人，他自己好不容易推辞了这一邀请，号称他晚上要赶写东西。因此他过了不久就离开了别墅，他这是回第二个家。艾拉并不期望他通报任何情况，感谢上帝！他回家晚了——但她已习惯了。她一句怨言都没有说就拿起钥匙匆匆忙忙赴约去了，身上散发着香水的气味。那男孩出去了，他终于摘到了一

个女孩。索尼会在空虚(如果不是宁静)之中上床睡去。

汉娜不知道她的情人已做了外祖父——但愿他能意识到，即使她知道了，事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有妻子和已成年的儿子和女儿，他做了外祖父的消息本来属于他生活中没有她一席之地的那一领域，却偏偏会拓展她与他共有的另一生活的领域。从最初她去监狱探望他并去他家里拜访的时候起，她就被索尼的整个生活氛围迷住了，他把一半爱献给了他的家人，把另一半爱则给了他的政治同仁。

她也有件事没有告诉他。联合国最高难民委员会想聘她担任高级职位。她没有申请过那一职位——在她足够幸运地拥有一个使她留恋不舍的情人的时候她不会有换工作的念头。来自国际律师委员会的观察员之一在讨论索尼和其他人的案件的症结时和她认识了，显然是这个人推荐她担任那一职位的。对这种对她的意外的器重她充满感激，感到吃惊甚至有点儿惊慌。这件事像刚体验到一种新感觉那样使她心动，某种不同于情人的东西触动了她。聘她担任这一职位所蕴含的对她的敬意使她感到某种迫不及待的欣慰，好像这种敬意刚开始就要结束了似的；不过她并不把此事看作有待做出的一个决定——她甚至远远还没有想到去考虑它。但她感到现在不是把这件事告诉索尼的时候，现在不能告诉他任何事，任何意外的事。他刚经历过一场他从未想到过会发生的内讧事件。现在不能告诉他任何事。只能把她自己交给他，就像自从去监狱探望他以来她一直委身于他一样。哪怕是一件使她感到快慰、应该为之自豪的事情，都不能现在告诉他。索尼是她最远的地平线。真需要某种勇气(她觉得自己缺乏这种勇气)她才能克服不安走上那高处眺望前景；果真走到那里，会发现根本不是从世界的边缘掉下去。

最近有两次我独自在家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刚答话，电话那一头的不知什么人已把电话挂断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又将要被捕了：那想必是秘密警察想弄清他是否住在家里。我想我最好还是提请他保持警惕；但是他对此事报以怀疑的微笑——别担心，孩子。他通常回家都不像现在这么生气勃勃——确切地说——精力充沛，兴奋异常，真是可耻，他从她那里回来时几乎不对我们掩饰他的兴高采烈，他的双唇那么饱满，他的鬈曲的黑发梳向脑后，不留下在他刚离开的那张床上被弄乱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也没有过去他作一次演讲或与警察交涉时我们常常能感觉到的蕴含在那依然如故地快速流动的同一种血液里的某种东西了。或许他和他的情妇发生了口角。也许正是她打来的电话，她希望他是一个人在家里并且会接她的电话。但我才是有可能在家的人，我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我已开始一项自己的事业——就这么称它吧——这一事业需要孤独。在电影院度过一个下午后那么镇静地和他的金发女人离去的时候，他就把我推进了一种妥协的、被遗弃的状态，如今我终于把这种状态派上用场了。

接着，上个星期又来了两个电话，第一次，在一阵嗡嗡响的沉默(这可能意味着远距离)之后，打电话的那个人要求和我母亲说话。一个男人。他所说的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屋子的女主人”。第二次——我为我的思路被打断感到十分恼火——我问是不是电话推销、直接销售（我在商学院的课程表上有这

么一项)。那个声音说不是，还有礼貌地道歉，但在我想我最好也以礼相待，问问对方到底想做什么的时候，对方已把电话挂断了。不！我母亲不可能——我母亲不可能现在也有一个情人在某个地方。我发现自己暗自笑了起来，开始是因尬尴而笑，后来是因为这种想法实在滑稽——玩笑开到了我身上，现在我可以大声嘲笑我自己了。就这一次小丑真的跳跃起来了。我们家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电影脚本之中，和国家电视台从美国买的系列幽默剧中的家庭不同，在那个家庭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面对面地互相欺骗。我母亲和我有时在厨房里观看他们，她一边看一边准备饭菜——这使他受到了伤害，他过去常对我们进行莎士比亚熏陶，而今却发现我们在为这类东西格格发笑。

我可怜的母亲，瞧她，剪掉头发之后变丑了，她编织小孩的衣服，努力在雇主的病人中结交新朋友，她在大胆地显示她有一种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哩。现在，我够大了，几乎希望那是真的了。我明白了需通过一个陌生人才能重新恢复勇气和自信，在那个人眼里你是一个重要东西，重要人物，处在父亲、母亲、儿子构成的三角之外；这座屋子的三角是——索尼、艾拉、威尔。

由于政府对黑人运动的压制，黑人国民代表大会已有两年没有召开了。这次代表大会秘密举行的时候执行委员会按既定方针被解散了。

旧的执行委员会全体再次当选，一致鼓掌通过。那两个属于不忠者团伙的人仍没有被淘汰：他们还在原来的位子上，其中一个把热烈的掌声视为自己应得的荣誉，另一个则谦恭地抿着嘴并低垂着眼睛。这一定是领导层，索尼的同伙们，为顾全

大局宽恕他们的结果，因为有多种方式可以避免这类情况出现——可以用权威的游说支持其他的候选人从而剥夺这两个人的候选资格。就连民主运动都必须这样进行，以便达到斗争的各项目的。索尼从事争取解放的政治活动已经多年，他本人就有好几次参与了这类妥协活动。

就是说那些夜晚拜访者已接受了教训，被带回了队伍之中——也获得了他们在交易中的要价。关于这件事他没听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他们坐在那里，像他其他的任何同志一样。就像从前一样。但在新的执行委员会内部选举官员时，索尼没有保住他的主要职位。这也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从那个领导者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这位领导曾经抓住他的手肘说，此事只好这么处理，索尼。他假装微微仰一下头，实则是瞟索尼一眼，以便使对索尼的打击变得轻如一瞥，那迅速闪过的眼色告诉索尼他应让位给一个更有力的候选人——为了斗争的需要。索尼内心决不会怀疑他的伙伴们，他的战友们，会不把斗争的利益摆在高于所有其他的考虑的位置上。他本人也会这样做。尽管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因此一定有某种充分的理由；让他担任某个听起来不错但责任小得多的职位，而不是他曾那么一丝不苟地履行其职责的那些，他们这样做一定是对的。他的生命属于他们。他几乎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放弃了他所喜爱的职业，放弃了塑造未来一代的心灵的工作，而选择了在演讲台上作宣传鼓动(该死的背诵)的肥皂泡一般的名声；离开了温暖安逸的家，而选择了牢房，无论在哪里都受到监视；打碎了他的情感的完整载体——是的，乐意这样，为了斗争的需要他愿再次这样——因此他变得毫无保护，任何人可以进入他之中，任何人可以从中取其所需。假如他对斗争事业负有责任，那么斗争事业也对他负有责任，索尼变成了“索尼”。除这一

角色以外他别无所有。

这一切早就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了，早在草原上的教会学校教书的时候，在紫色的砖墙之间，在红色的水泥地板上，在因暴晒而格格响着膨胀的锡铁皮屋顶下，这一切就开始了；教会学校的氛围和教育当局的毫无区别，正是在教育当局的大厦内，在莫失良机的铭言牌下，小学教师索尼从学督那里接受了一道道微不足道的命令，也正是在那里他被正式宣告开除，因为他带领学生们示威游行，离开了当局让他和他们老实呆在那里的那个卑贱的地方。

索尼不会有任何怨言。避免个人崇拜是一条原则，某个别的同志如果是更适合的人选，那么索尼随时会按原则拥护他当选。只要能够完成好岗位的工作，由谁去占领那个岗位都没有关系；更新是好的，黑人运动应该不断地成长壮大，任何人都不宜在同一个岗位呆得太久，应该从年青干部那里吸收新鲜血液。他自己就用过这一现成的术语。他也明白——尽管这并不能使他关闭他心中的那个一个人组成的裁判所——明白他永远不会真正地知道为什么鼓动他的政治风帆的风变得迟滞了。他只能继续想象那些背着他给出的答案。这些答案只能从他发现别人可能对他持有的各种怀疑中产生。一些被忘记或抑制住的东西，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但欣然接受考验时，他没有理睬它们。他想到了他对别人的各种批评，或是他所赞同过的那些批评。普遍流传说索尼过于理性。索尼想得太多了。索尼问的问题太多。索尼的演说风格变得越来越可以预知了……过时了。索尼不是胆小鬼，不，谁都不能说他不愿拼上自己的性命，但是……索尼有牵挂，牵挂与革命是不相适应的，他自己就曾经这么说过。索尼关于使用暴力的立场和既定的方针也不太合拍。你记得吗，那一次……阴谋团伙的事……还有另外一次，

在那之前，为九位死难者扫墓的时候……他夸大其辞的演说，可后来……

当他找那些唯一能找的人，也就是他最亲密的同志们，当面刨根问底的时候，他们即使知道答案也不告诉他。不告诉他真相；那一定意味着，真相会破坏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会永远不原谅他们。——事情就是那样的，索尼，一件该死的丢脸的事……有一些人(摇一摇头)，唉！你不能信任他们，他们太有野心，而你太直率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会耍花招，你的本性如此，伙计。今天是你，明天是我——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只是我们不得不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为斗争着想——

当他和汉娜面谈这件事的时候——从第一次发现他和汉娜可能共同探讨问题那时起，每一个政治问题他都和她一起分析研究——这回汉娜不像往常那样能够大显身手了，这一次做不到，在这点上无能为力。她所能做的一切是安慰他，抚摸和拥抱他，柔软的两腿重重地夹在他身体上，双臂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双手伸入他的头发之中，好像她是在把支离破碎的他捡起并重新组装起来似的。这种宠爱使他立即感到羞耻，他是她的情人，而不是某个有待救助的受害者。他认为这不符合政治实践家的原则；他用行动表明这一点，那就是不再提已发生的事，要把它像过去的其他所有斗争阶段一样置之脑后，同时欣然地去完成现在分配给他的斗争任务。他像她的丈夫那样把她抱进怀里，不需要任何安慰，结果，尽管他没有寻求，安慰却不知不觉地降临到了他身上。他没法拒绝它，尽管他想要的并不是它。他想从她那里得到的，是谁也没法给他的东西，是他对自己的信任。

每当她从浴室里蒙着水蒸汽的镜子中看见她自己，她就从

镜中那张熟悉的肥脸看到了联合国最高难民委员会非洲事务特派员的形象，（她没法把烟戒掉，即便是为了取悦于他，因为抽烟会使她发胖。）汉娜从未喜欢过她自己的脸。她从不为虚荣而打扮自己；而这偏偏是她吸引索尼的品质之一。一种不期而获的奖赏。她想必会同意索尼的儿子威尔的看法，即她那一脸粉红色的肉的确多得过分了一点——尽管威尔把她比作那种动物，私下里用那种动物的名称辱骂她的做法，肯定会使她大受伤害。尤其是出自他之口。

她那么经常的在镜中看见自己担任难民委员会驻非洲特派员的形象，因此她不得不把联合国最高难民委员会想聘任她的事告诉索尼。无论如何，她现在不得不告诉他了。最高委员会在等她的答复哩。

她不知道到底是在做爱之前告诉他好，还是在做爱之后好。每次听见他从别墅门廊里开裂的水泥地上走来的脚步，她都感到一种犹豫不决的焦虑，同时在他们唯一的那间房里不安地徘徊以逃避那不可避免的时刻。到底在做爱前还是做爱后，这两者的区别在汉娜看来好像极其重要。这是一个诚实与否的问题，诚实在他们之间太宝贵了。他们从来没有诱骗过对方。妇人的诡计和男人的狡诈都是对平等的否定，这是他们所从事的争取人类自由的激烈斗争的道德规范。假如她在做爱之后对他说应聘的事，那可能会使他觉得她是在有预谋地先用柔情之网套住他，使他像被剪掉头发的参孙① 一样无力表示反对。假如她在

① 据《圣经·旧约》，参孙是一名力大无比的勇士，以色列人的第七十五代士师。为了对付他，非利士人收买了他的情妇大利拉。大利拉从参孙口中探出他力大无穷的奥秘在他的头发里，剪掉头发力量就丧失了。于是，大利拉趁他沉睡时剃掉了他的头发，他因此被缚，遭到了非利士人的戏侮。后来参孙的头发慢慢又长出，当非利士人在他们的神殿里欢庆胜利并戏侮他的时候，参孙求神再一次赐给他力量。然后他双手各扳神殿的一根柱子，致使神殿倾覆，他自己也和敌人同归于尽。

做爱之前告诉他，那么做爱又会显得像是她企图使他分心，不去注意他有权要求她全神贯注地对待的事情的一种手段。不过最后她还是在完全被解除疑虑的状态下，也就是在爱情驱散恐惧或性的镇静药削弱判断力的时候告诉了他。

她伸出一只手去摸地板上的烟盒，他从她的脑袋下面抽出手臂阻止了她。她微笑了一下，眼睛仍然闭着，然后把去摸烟的手弯曲起来伸进了他腋窝里湿润的腋毛里。他像吻小孩一样吻了吻她的前额。她是那么爱他，她本来是能够告诉他任何事情的：我们就要死了，某一天你会再次进入监狱，我要走了——对他说什么都不会有不良后果。

——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有人为我提供了一个工作。——

他睡意迷蒙地回答。——是宗教委员会的那个吗？你愿意的话一定能得到的。——

——不是那个。这真是一件简直令我不相信的事。——

他用手臂和胸部轻轻夹了夹她放在他腋窝里的手，借此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联合国。最高难民委员会。——接着她就和盘托出了：——事实上他们已为我提供了一个理事级的职位——仅次于秘书长助理。

他好像不想动，不想完全醒过来。

有那么一会儿她以为他会再次睡过去而记不住她所说的话。让他睡吧，让他睡去吧。

——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不久以前。我并不把它当回事。——

——什么类型的职位。在哪里。——

——噢，确切头衔是最高委员会非洲事务特派员。总部在

亚的斯亚贝巴[1]。但是在整个非洲工作，当然。——

——是的，这是一块辽阔的大陆，汉娜，……还有大量战争。——

索尼轻柔地挣脱她的拥抱并坐了起来。——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他们怎么知道你？——

——显然是由国际律师委员会推荐的。我不清楚。——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他在擦他交叉在胸前的两只手臂。——亚的斯……厄里特里亚[2]，苏丹，黎巴嫩[3]。天知道在那里，每天都有新的难民营，新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莫桑比克。——她补充了一个近些的地方，容易和他联系上的地方。

他转过头来俯视着她。她静静地躺着，一头金发裹着她的头部，一绺因做爱而汗湿的头发散落在一边脸颊上。但索尼只是微笑，那种微笑久留不去，变成了他没法放松的那种痛苦的咧嘴怪笑。——一次极好的机会，我的汉娜。一种等着你选择的荣誉。——

——是送上门来的。——

——不是，是选择。——

——我刚忘掉它。我甚至没有回信……他们又写信来了。寄的是急件。——

——当然。他们需要你。受到强有力的推荐。——

——躺下，我不能对你的背说话。……来吧。——

他在她旁边躺了下来。他们那么躺着，像两个人躺在坟墓上纪念一起度过的忠诚的一生似的。

---

① 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的首都。
② 埃塞俄比亚一省名。
③ 黎巴嫩是亚洲国家。

她握住他的手。——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我是说，我能够做什么……我是……我在这里有工作——

——他们知道这一点，可不是嘛。他们知道你是多么擅长于那种工作；这就是要你的理由。他们知道你能做某种……更大……更重要的事情。——

——没有任何事比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更重要。对我是如此。——

——你不知道对他们说什么。——

——是的。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

——你已经想过它了。——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没有真的……这好像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东西。——

——但你已经想过它了。——

——想过这会意味着什么——是的。——他套出了她这句话，他正在促使正视她没有正视，不愿正视的东西。

她没法通过反问"你认为怎样"而把皮球踢给他。

她从床上爬起来，赤着脚慢慢地走进厨房，到了那幅熟悉的凡·高的向日葵前面，她准备煮点咖啡。她想他很快会不得不离开；他总是不得不离开。在烧开水的过程中她没有回那卧房；她让他单独呆在那里，天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她知道他在想的是什么，她不想看见。她在摘窗台上的花盆里种植的薄荷科芬芳植物的枯叶。盥洗室里传来便桶放水的哗哗声；他用过盥洗室了，她发现这很让人放心——生命带着对肉体的小小要求在谦卑地继续。

她端来两杯咖啡，他已回到床上。

——我真希望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

跑去开门的又是我。

其实在他们捶打门之前我已听见他们来了。我醒过来并且立即意识到伴随门上刺耳的捶打声和走在混凝土路上的脚步声而来的是什么(那混凝土路是他为我母亲铺的,免得我们把泥巴带入门廊)。我的脑袋里好像有一个像收音机闹钟那样的起闹装置。

我翻身下了床,甚至没有开灯就沿过道走了过去,用一个夸张的动作把门打开。

——他不在这里。——

门口有三个人的身影,我看出其中一个人苍白模糊,另外两个黑乎乎的一片——一个是白人警官,另外是黑人。他们中的一个把电筒照在我脸上。

——你们想来搜查吗?我父亲不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犯不着问了。——

他们中的一个把门廊上的电灯开关打开,黑暗立即从他们身上移开了——那个白人军官穿着制服,那两个黑人则是他们那类人的打扮,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与其说像警察不如说像跳迪斯科的人。那个白人还年轻但镶上假牙了,他对我的傲慢报以微笑时我看见了,他微笑是想向我表明,他对不会从我父亲这种人的家人那里得到任何敬畏的事实已习以为常了。他说的是南非荷兰语。——但你知道你母亲在哪里,嗨——去叫你母亲来。——

他说出了我母亲的全名,婚前的和婚后的。

我的心脏开始怦怦跳起来,好像有一大群野兽在我胸膛里狂奔似的。——她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个白人又重复了一次我母亲的名字。

我不得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我,他们只想找她问他的情况,

我肋骨下面野兽的狂奔使我产生种种孩子气的冲动，我真想砰地一下把他们关在门外，并大声对她叫喊，帮帮我，救救我。我？还是他？他们不是在找索尼，他们来找的是她。在我背后我听见她离开卧室走了上来，在用眼睛看到她之前我已用心灵看见她穿着那件绣花晨衣走来了，她那条闪亮的辫子垂在身后。

她轻轻地把我推到一边，显出她真正的模样。一件短睡衣，一头被化学药品弄笨拙的短发，从鼻子到口的两根坚忍的线条改变了她的微笑。她答应了她的两名字，她和他结婚之前在娘家的名字以及婚后同来自他的一切一起接受的名字。我开始叫喊而她要我肃静，为此她用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膀，同时把另一只手放到嘴上向我示意，好像我只能理解手势似的，我想在我能听懂话语之前很久她就已经用手势和我交流了。我跟着她进入门廊——天啦，瞧她在那儿做什么，她正在从杂物橱里拿出那只她过去时刻为他准备好的万用旅行包，然后她把它拿进卧室，开始往其中放润手膏、梳子和卫生纸之类——我终于大喊起来，终于喊了起来；那个杂种！那个杂种，瞧他现在做了什么！他做的什么事，把你也搭进去了！我要杀了他，我告诉你，他再踏进那厨房门我就杀了他！

她在摇头，一边整理旅行包，一边向我摇头想使我镇静下来，没准你还会以为她是去看贝比和外孙子哩。她转向我，羞怯地对我说：——威尔……我得换换衣服……——

天知道他们会对她做些什么，但做儿子的不能看自己的母亲赤身裸体。

他们一带走她，我就匆匆穿上裤子，没有关灯就离开屋子，驾着我那辆残破的二手小车以其最快的速度向那别墅开去，住在这屋的人养的狗咆哮着向我追过来，我折下灌木枝朝它们扔

过去。我没有穿鞋子，在我跑上台阶的时候我的小腿被它们咬了。现在轮到我捶门了，我掀开那破旧的纱门，用两个拳头在木头门板上捶了起来。我没有叫爸爸；索尼，我大声吼叫道。索尼。索尼。索尼。索尼。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继续捶门，我发现我的拳头和脸都被汗水弄湿了，我感到恶心。开始是作为一个男孩，我嘶着嗓子吼叫，现在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哭了，这是第二次。

正屋里的灯亮起来了，透过狗的疯狂吠叫传来人的声音。我他妈惊恐地冲向花园里树木最密、最黑暗的地方，穿过鱼塘的亮光，作为私闯民宅的黑人被屋主追逐着。我企图翻越栅栏，摔了下来，爬起来第二次尝试，正当我脑袋在天空的映衬下暴露出来的时候，一颗子弹从我脑袋上方呼啸而过。

那天晚上我去杀他。

为逮捕她的人开门的是我。险些死了的也是我。

这是一个和解的周末。

索尼和他的金发情妇又去了橘花掩映下的棚屋度假地。再一次，双双一起离开，又可以整夜整夜在一起了；好不容易才获得暂时的解脱，逃避了一直在逼迫他们的东西，逃避了闯入他们与世界长相遗忘的单房别墅中打扰他们的东西。这是汉娜的主意——汉娜的计划，一旦她感觉到他知道她会担任联合国最高难民委员会派往辽阔的非洲大陆的特派员，他们之间的每一件事都成了暗中活动，内疚、恐惧和悔恨赋予她心计，以免她的皮肤被他的痛苦腐蚀：她不能去，她不能去，而她知道她会去。她用甜言蜜语说服他找个借口离开家两天。到国内别的某个地方参加全国性的紧急会议？他历来能够用某种方式稳妥地安排这类外出幽会，结果他的家人相信他是和他的同志们在一起，而他的同志们则相信他家里一定有什么要事使他非得在家过一个周末不可。他们历来都能成功地溜之大吉。而在她说溜之大吉这一通俗用语时，她自己都觉得听起来与任何普通艳遇的玩世不恭的欺骗没有什么两样；那种欺骗不适合他们。而所谓“历来”，推敲起来间接地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最近——不同于“历来”——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全国性”的重要会议的当然代表了。

他们该去哪里呢？

——去卢斯腾堡吗？——

她提出去那个地方，好像同时又很快排除了那里的可能

性。正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曾一起度过一段最快乐的时光；但也正是从那个地方一回到家里他就发现他的女儿已切腕企图自尽。

他们互相探询地看着对方，感到尴尬。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他们俩都受到了诱惑，都想回到那个橘花的香味如令人振奋的氧气一般的地方。

为了能去卢斯腾堡，她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这个借口忽略了另一类情感因素的存在，因为那种情感可能使他一想到回到那个地方就会发抖。——卢斯腾堡路近。——好像从前他们驱车进行的那些长途旅行不是一种两人在一起亲昵的特殊方式似的，那时他们在自在自足的空间里远游，举手投足之处不存在任何外界的干扰。

因此索尼说谎了，那必要的谎言。对艾拉说谎，她真想象不出他会对她说谎。对他的同志们说谎，他们现在对他很少有迫切需要了，也不太可能到家里来和他联系了。艾拉叫他放心，说威尔会把他的车子借给她去实施她的周末安排。他拿起手提箱离开了家。她吻了吻他的一边脸颊，在开车去接汉娜的路上，他把手放在艾拉吻过的地方，好像那是刮胡子时弄伤的伤口似的。

一上路强烈的快感就攫住了索尼和汉娜，属于他们的这一天真棒，头一天晚上的雨珠在草原的青草上闪着亮光，他们下坡进入亚热带地区的时候，路边野生的桃花心木在他们头顶形成一个个光泽宜人的巨大穹窿。她喂杏干给他吃，有一次他假装要咬她的手指一口。经过一条铁路的侧轨的时候，他想起他曾带领一群孩子在这一带野炊过。——讲给我听听。——想了解这位认真负责的小学教师的由来已久的欲望又抬头了，只是由于了解他的机会太多她才很少想到去问他。——不堪回想的

灾难。下了一场暴雨。我把孩子们聚集在这条侧轨边，希望能让他们乘上路过的火车。我们站在倾盆大雨中等了好几个小时，好不容易等来一列火车，可那是只有白人才能坐的车，司机不愿让他们上车。——想起当时的情景他自我解嘲地笑了起来。——那些孩子们浑身淌着雨水像海豹似的。他们把那次经历视为一次伟大的历险。——

——还好，现在至少不会发生那种事了。——

是的，这条铁路上的所有火车都不再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了。也不再有任何法律禁止他这类男人和她那类女人同床共枕了。他们幽会的度假地的女接待员受过良好的训练，能用一种颇具个人风格的方式欢迎顾客。——请问您从前光临过这里吗，先生？

他正在顾客登记表上填她祖父的姓氏，他们以此假名冒充夫妇。——没有。——

——真有意思……但有很多顾客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们这里来……——

是的，现在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这么一对黑白"夫妻"了，但按照传统这种结合还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即使是出于生意原因不得不对此不予考虑。

——没有。——在登记表上写日期的时候他注意到汉娜的双眼盯在他背上；他代表他们俩为这一谎言感到羞愧（在这件事上说谎是错的，它会让人觉得好像他正在为他是一个黑人而赔不是似的）。只有这一谎言是一种羞辱。

她本想叫他要求住他俩从前在此住过的那座小棚屋，但考虑他已否认从前来过，她只好做罢。分派给他们的小屋和从前那座小屋没有什么区别，她打开窗帘并打开窗户，以便把屋内驱虫剂的气味排出去。——上次是驱虫剂使你在三更半夜喘息

起来。——他当然不会放过重温旧梦的机会。——没错。我们从床上爬起来，走出屋外去散步，星星已经垂降到天边，天气那么可爱而凉爽。——他是想勾起她的情思，让她对他说：我爱你索尼，我多么爱你——但现在她和艾拉一样了，她说不出来。他躺到床上并闭上一只眼睛，这是他想小睡一会儿的信号。——振作起来。不要懒洋洋的。和我一起游泳去。——他们在水下互相冲撞和追逐，在这种时候不笑是不可能的。然后他们又友好地躺回了床上，把下午的炎热关在小屋之外。他在床上读书，她则戴着耳机(你的皇冠，他这样称它)在听袖珍收录机，耳机埋藏在她那被水弄得失去光泽的头发里，她在床上弹过来弹过去，像他心不在焉地缠绕在手指上弄干的葡萄藤卷须一样。时不时地，一句话不说，她会突然取下耳机并把一边耳机放到他耳朵上，同时闭着眼睛，抿紧柔软的嘴唇，陶醉在她所听的音乐之中。——这是什么音乐？————曼陀林协奏曲，威瓦尔第的。雨点音乐，听那慢慢的律动。——她又把耳机戴回了头上。但在他把正在读的文件、笔记和演说辞摊放在他胸膛上的时候，她知道他想和她谈话，便取下耳机让它像项链一样挂在她的下巴底下。

——我越来越担忧了。——他的手背落到了旁边那叠材料上。——这些年轻人好像还在瞎折腾，老式的教条主义者，陈旧的标语口号，殊不知社会主义世界——我们的榜样——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那里的人民为了摆脱我们的那些青年同志们仍然在想入非非地想在解放之后应用的那些政策进行了战斗并付出了生命。我们有我们必须服从人民的原则……对的，在东欧正是人民大众推翻了那些据信是由他们做主的政权！那是人民的选择和意志！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不信任他们吗？难道我们真想“实现”那些被这些暴力证

明只不过是使痛苦和贫困长存的那些政策吗？那些生活是从人民之中的人在什么时候开始把人民撇在一边的呢？

——你是在说那些未被聘用者，营地集会者——活跃了各种集会的罢课的一代吗？你是欠他们不少，必须把讲台让给他们……噢，是的，这是真的，还有一些白人，那些思想僵化的斯大林主义者。

——不，不。就连我们这些人之间……磁针常常跳回去，你听到的是同一张唱片。当然这仍然是款待芸芸大众的最好办法。我们并不是没有这样做过……尤其是对青年和工人们。这在他们看来仍然好像是对他们的挫折的答复。因此……仍然还有些人，在谈到把土地交还给人民的时候，他们指的是某种类型的一个个强制性的集体。他们并不在乎这类政策在其他每一个地方都被放弃了因为它们不顶用——人们在那种体制之下不能有效地工作，这已被七十多年的艰难历史证明了！难道这不意味着什么吗？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直摇头，因为宪法大纲使自由宪法现代化了——从自由广场那时到今天，三十五年了，看在上帝份上，我们前进了——但是他们轻蔑地笑着说那是背叛，因为在分配土地的同时又承认私有财产，一种与国有化相混合的经济。因此，假如任何人被允许有一个小家庭，他们就会义愤填膺。他们还梦想着我们的人民民主能够通过只有上帝知道的某种奇迹——告诉我什么奇迹——向工人们提供国有的花园似的城郊住宅区，而其实没有哪个别的政权已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我们应该有信心承认这是社会主义的一大失败，假如我们想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的话。因为这才是我们早就应该担当的角色。二十世纪的想法已成为过去。结束了。社会主义万岁，万岁。哪一种社会主义？我们在为哪一种社会主义欢呼？死去的那一种吗？我们将吸取其最优秀的思想并向前

发展。必须这样。难道他们没有看见，不愿看见？苏联，整个东欧，甚至中国——都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是的，这就是那些暴动的成果，不是吗？汉娜，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真东西，非常科学，以对具体事例的分析为基础！——这是对我们人类的各种需要以及怎样做才能实现它们的一种新的全面的理解。这可不是一件可让资本主义世界拍手称快的事，这不是它所想的，我们并没有被俘虏。这不是修正主义——但在这点上你会受到那种老掉牙的、鹦鹉学舌似的指控。

她在他旁边动了动。——再一次……改变他们的思想方法。我不知道……从你通过学习改变认为自己无力和白人抗争的想法到现在还没过多长时间哩。老的左派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方法，上帝作证！感谢上帝。只有老左派。现在新的现实有待接受……从这里的情况看，生活对很多人会变得艰难。那意味着很多绝对的东西会失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一个传教士的外孙女，……生活会使人们觉得缺乏安全感。你可以鼓起勇气做你不得不做的一切以除掉那些旧的体制，假如你能够相信另一面有一个乐园的话。你愿为自由而死的唯一条件是能赢来永生的某种政治等价物——这在旧的社会主义经典中被允诺为解放，不是与混合经济的妥协，不是人们与金钱——白人，或是黑人资产者的妥协！——这些人至今还对被白人通过征服窃取的土地拥有产权！看来是这么回事！

——但那些旧的经典正在被改写！这才是要害所在！现在人们随时愿意为改写它们而死。我们应该醒悟并意识到这一点了。假如这意味着让我们的人民在自由的怀抱中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并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给一代代无家可归的难民以安身之所而不是逃离之地——

好了，说白了。

所说的这一切横亘于他们之间，就像被不得体地向死者家属提起的最近死去的人的名字一样。我要是早把舌头割掉就好了，冒犯者说，但我不是有意想伤害谁，因为，无论如何，人已死去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有关的人员都不得不去习惯它。

汉娜迅速打破了僵局。——那些干部是否接受这种看法呢？——

——本来应该接受，但是没有。没有。他们对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高层——最高领导层除外——当然。不管在这里还是国外，各种谈判在“世界已经变化”的共识上继续进行。此外别无出路。可是我们对这种变化守口如瓶。谁都不想去谈论它，除非是在它影响我们的同盟军对我们的斗争的态度的范围内。随着冷战的结束，他们是否会把我们的敌人仍然看作他们的敌人呢？除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就外界的巨大变化对我们的思想意识意味着什么进行过任何真正公开的讨论。什么也没有！我们害怕谈论它，生怕它们削弱我们对人民的控制。生怕假如我们不能在这里用古老的社会主义天堂取代资本主义地狱，我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兄弟们心目中的叛徒！——

她像一个好朋友那样握起他的手：她早就希望永远不要为了别的某种亲昵而放弃他们之间的友谊了，而他也早已向她保证过那决不会发生。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假如他对她的这一评价，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某种被忘记的因素，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受到她足够的重视，那对他是不公平的，那是不承认他的价值。一个好男人。

——从历史上看，这个国家在工业和技术发展方面历来非常先进，而在思想意识、政治文化方面却大大落后于时代。英

国式的自由主义及其种族主义制度即使在被布尔人的民族主义及其种族主义制度取代很久之后的今天仍然阴魂未散，白人的霸道在其他地方都已被废除，可在这里却仍然继续为虐，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在接管这个国家的时候不会死守某种已成昨日黄花的东西。假如旧的社会主义死去了，让我们承认它，并且确信我们一定能在正在到来的新的左翼运动中获得解决。——

——你对那有把握吗？正在到来的东西看起来很像旧民族主义的复归。——一个好男人，她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她崇敬他有一种他深信不疑的理想主义，而这种理想主义恰恰又是她本人——一个她自以为次要的人——所怀疑的。

他感觉到她的怀疑主义的刺痛。——就像对你我在房子里一样有把握。你没法实现你不信仰的东西。假如我们不相信。它，有什么……——

谈论变革会危及这个将在橘花丛中度过的周末。到这里来度周末，汉娜正是想换换环境。不过对她来说，假如她永远死守那小别墅——这固然便于相距不远的索尼来和她幽会——那么她的生活怎么会有所变化呢？这样一桩风流韵事——它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了，遵循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生活法则——它怎么服从生活的另一法则，也就是不断前进的法则呢？他永远不会离开艾拉，她永远不会真正地希望他离开艾拉、威尔和他的女儿，他女儿和他一样，也是一个献身于解放事业的人，正在国外战斗。假如他真的离开艾拉，那他也就不再是索尼了。他总是不得不从床上爬起并回到家里，总是有一只眼睛在监视着想打断他们像现在这样躺在一起时的长谈，那就是谎言能够允许他们偶尔在一起度周末的限度。现在谎言的范围扩大了。在她简要而实际地提及她可能担任的职位的时候，她向他隐瞒了她一想到非洲大陆的辽阔就油然而生的那种激动。她将担当

的那些重要职责令她心驰神往，她曾坐在其隔板后面（一个只有头和双肩的美丽的女像柱）的探监室为她敞开，把她导向一种安排生活的权力——为数以千计的饥民安排食宿，他们数以千计，数以万计，世界在无限量地生产难民．令她激动的还有她将会晤的那些重要人物，将进入的国际名流圈；那些男人会占据这类为情爱而设的地方，像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他从她那里学到了这一生活法则。

他们手拉手在树下漫步，在他们度过销魂时光的地方旧地重游，树上点缀着诱人的果实，有悬垂着的柑橘，灰白色的柠檬和鲜艳的纳吉果。那里种植的各种柑橘同时开花结果，甚至在同一枝上都是如此；花香之中夹杂着腐烂的果实散发出的令人恶心的墓地腐味，腐烂的果实落在地上，爬满了苍蝇。一个被她踩烂的腐果沾到了她的鞋上，她用一条腿站立，一边扶着他的肩膀维持平衡，一边在一棵树的树干上擦去鞋底的污物。他用双手捧起她的头并且残酷地对她狂吻起来，他的手指粗暴地插到了她的衣服里面，毫不顾及那是在别人可能碰见他们的露天里，就像在晚会上一个粗暴的醉汉把一个女人拖出屋外一样。她不得不挣扎，以免他当场和她就地性交。但是回到小棚屋之后，他用手臂枕着她的头，和她一起仰视着那厚厚的、编织得平整有条的茅屋顶，一个为他们而设的华盖，他又变成了柔情的索尼，为他们的存在之乐惊奇的索尼。原来他对汉娜做爱了。这个周末，他必须对她做爱，好好和她来一场，使得她永远无法放弃它，永远不离开，需要索尼。

他回来的时候我没有杀他的念头了。

我们一起去找了律师，然后和律师一起去了约翰·诺斯特尔广场，以便弄清他们把她关在哪里。但警察不愿意说。

在把她带走之后，他们星期天早上又来了，他们搜查了正屋，车库以及院子里的那间房子——白人在这里住的时候这间房子一定是仆人住的。这间小房现在是我们的贮藏室。他们搜出了需换新帆布的花园坐椅、种花草用的工具、贝比的旧自行车和一个破旧的食物搅拌器。他们还搜出了一个木制的蘑菇，我记得我母亲过去常用它来缝补袜子。他们还搜出了一箱子课本、一大堆小布块，甚至还有包在布块里的三个手榴弹、两个水下爆破弹和两个地雷。那些碎布是我们刚搬进来时我父亲为我的房间做窗帘时剩下的。那些手榴弹看起来像是小小的金属菠萝，我一眼就认出了它们，我早就在贴在各邮局以提醒人们警惕这类物品的告示上见过它们了，在一个充斥武器的械市，说不定它们就在你身边爆开。我也认出了水下爆破弹。另外两个东西看起来像小汽车发动机的空气过滤器，我不会认出它们是地雷。

我愤怒却面带微笑地跟随他们在正屋里搜查我们的所有物品，得意地看见他们只徒劳地搜出一些讨厌的东西，我早就知道他们搜不出任何东西。我父亲经验相当丰富，他不会把哪怕一小页有危害的文件留在自己家里。我说，现在你们已乱七八糟地搜够了，你们该走了，我好整整房子——但那些素材仍然

在屋子里转悠，就像一群知道有一块骨头埋在某个地方的狗一样，然后他们就在院子里翻开了。他们打开我的车的盖子。他们倒空垃圾箱。然后，在课本和做窗帘剩下的破布之间，他们找到了他们早就知道放在哪里的东西。

他和我一起行动，为保持体力我们在厨房里急匆匆喝完茶和吃完面包，紧接着又驱车从一个警察局到另一个警察，决心弄清他们把她关在哪里。他深信此事因他而起。一个针对他的阴谋。他们在追捕他可是又找不到新的指控理由，因此他们就找上他的妻子了，他们希望他在为她焦虑的过程中会暴露自己，会做出某种露马脚的事情，证明他的确参与了他们栽赃于她的那类活动。他们早就把炸弹放在那里了，然后他们又跑回来“搜查出了”它们。

——可为什么他们要首先把整个屋子翻得乱七八糟呢？——

——因为你在场，威尔。——

这话使他想到他当时不在家里，他的一边脸颊抽搐了一下，我几乎为他难过了，尽管不知道他去了哪个该死的地方……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甚至不在他知道我能找到他的地方。

他坚持说他们一定是在来带走她的时候把炸弹放好的，但门是我去开的，我看见他们和她一起离开，没有人接近过贮藏室。

——他们一定是在你再次睡着之后又回来过。你听见什么响声吗？——

他在热切地询问——我想他是以为他可能在我身上偶然获得某种他可能用于为她辩护的证据；他已习惯于发现我有用。但是，事情发生时他不在场，又是他。

因此我瞪着眼睛看着他。——我去找你了。——

——噢，我知道。——

他的脸庞绷紧了，为了自卫，变成了一种原型——他的大鼻子像被雕刻出来的一样高耸着，他的嘴唇略带浅紫色并弯曲成一条强有力的黑线。他退缩到了过去，又恢复了一个小学教师似的做派，用拇指轻轻叩起桌子来。

——我让整屋子敞开着，让所有的灯都亮着。任何人来这里都会认为会被发现的。——

我的粗心大意无可厚非，几乎无可指责！

但即便我们在其他方面不能作为父与子和睦相处，我们仍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把我母亲从牢里救出来。一种新的同谋关系。当然，他很勇敢——我历来崇拜他的勇气——因为他不断地在他们可能决定把他抓起来的场合抛头露面。他们常用的伎俩是，把某个他们要拘留或指控的人的亲友关进监狱，借此把他们真正要抓的人诱向警察局。无疑我没有任何危险，我是家中“干净”的一员，和我母亲一样。

——他们甚至给了她一个护照——真是那样。——他解释说在艾拉被捕的时候他因急事不在家（在律师看来那只能是政治事务），太不幸了，但是不管清白的艾拉受到什么指控他都准备承担全部责任。——让他们逮捕我好了。只要他们能释放艾拉，我完全愿意承担一切。这件事整个是发疯。艾拉！你是否能想想办法，让他们放了她而把我当作人质关起来？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听着他的话而且看出他是当真的。但是坐在椅子上的律师朝前伸直双腿，咂了咂下唇。——索尼，你是在把胡言乱语当真。你知道你和他们做不成这种交易。看在上帝份上……你不是初出茅庐……你对这一切非常清楚。只能按老一套行事；只要他们一指控她我们就尽最大努力争取保释她，我会尽

可能早地做好申请保释的准备。——

在寻找她的过程中我不愿让他单独去各个警察局。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我陪伴他会对他有所保护；但我知道她要求我做的是什么，即便在她本人无法告诉我的时候。我们带了食物和干净衣服。他知道在监狱中需要些什么。他也知道怎样和警察说话；显然，一旦他们注意到你在狱中呆过并且出来了，知道不管他们对你做什么你都不怕他们，你就可以向他们问话，而他们无法轻而易举地拒绝回答了，相反，对那些不了解监狱（关押者和被关押者都熟悉这种地方）的人他们往往会闭口不答了事。在律师打听我母亲的下落一无所获的地方，我父亲却能得到些消息，他以小费打通关节，我想那小费是支持被拘留者组织给的。我母亲不在戴普克鲁夫监狱，我们以为她在那里，他还与那里的拒绝接受给她的换洗衣服的少校争论了一番。他们把她带到了某个小村的一个监狱。我开车送他去了那里。他们不让我们见她但接受了食物和衣服。

——现在怎么着？——我等着他发话打道回家，因为他好像陷入了茫然之中；他弓着背坐在我旁边，好像他会一跃而起并像我曾做的去捶门似的——捶监狱的门。

——这里比太阳城[1] 好些。条件好些。——

但我不是监狱的老顾客。她入狱了，我只知道这一点。

那些大家伙们——那些领导人——又到家里来了，像与老朋友相比已变得太忙或太重要的人物那样屈尊光临了，来表示他们的哀悼了。他关起门来和他们呆在一起；我想他们从与秘密警察打交道的经验中可能会有所收获。但假如她出了什么事，那是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他明白这一点，每一次他发现我

① “太阳城”原为一游乐胜地的名称，在这里是政治犯给约翰内斯堡城附近的戴普克鲁夫监狱取的代号。——原注

在看着他时他就明白这一点。在我把发生的事告诉那个许身于我的小姑娘的时候她泪汪汪地哭了起来，她自告奋勇地要来“照看我们”。但这不是任何别人的事——只是他的和我的事。我们一起吃饭并回顾那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以及任何能回忆起来的相关的东西。我已告诉过他有关电话的事；那说明不了问题。他的同志们中的一个认为有人在受审问时招了供——可是招了什么呢？假如真有人招供，那一定有某种可泄露的东西吧。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父亲再一次说了律师认为出自他这么一个有经验和才智的人之口无异于胡说八道的话。他还把他的想法作了发挥。——假如我走进那位少校的办公室并告诉他那些炸弹是我藏在院子里的，说那些放在那里的水下爆破弹和手榴弹是我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没有哪个男人——没有哪个丈夫——能做得比这更多，哪怕是他想赢得我母亲的爱。我不知道做何解释。假如她是他的同志之一——那么他们或许不得不采取在某个人比另一个人对运动更有价值时他们必须采取的行动。看来似乎更像那么回事。可是在这一案件中……我的母亲！

假如他真的那么爱他，他为什么仍然有时晚上去找那个女人呢？他在厨房里背对着我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在门口对我说，我不会回来晚的，或者是稍稍迟疑，不知道怎么说他真正想说的话，也就是假如有新的事情发生我会知道到那里去找他，这一次，是向我保证那是他将呆的地方。

他离开时的神色好像是他要去上吊似的。

假如他回来时发现她突然被释放了，那他会做何感想呢？

我父亲还来不及去警察局声明在我们的院子里搜出的那些炸弹是他藏在那里的，我们的律师已见到有我母亲的签字的声

明书，我母亲在上面已承认是她同意让那些属于别人的财产在那个贮藏室里存放“几个晚上”的。

在被审问时招认的是我母亲。

我知道为什么她那么做。那是为了确保她丈夫和我与此事毫无牵连。她坚持说她不知道将来取走那些“财产”的人的姓名；她也拒绝透露把那些“财产”交托给她的那个人或那些人的姓名，也不解释她为什么和那些人合作。

她早已受过短训，知道怎样对付审讯者。我父亲的一只手紧紧地攥成拳头，好像要把他自己打昏似的，他双膝分开坐着，他的头耷拉在他弓起的胸前。律师感到尴尬和焦虑不安。他驯服地倒了一杯水；他无力把水递给一个自己也曾被拘留和监禁的男人，一个敢于和各种类型的监警对抗的老斗士。我父亲抬起头来朝四周看看，想从某个地方弄清——从我这里，因为我当时在场，发生什么事时我总是在家的，我是她的孩子，母亲的孩子——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从什么时候起？我母亲是从哪里学会这些东西的？她是怎么在他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学到那些不适合她的知识的呢？她知道一些什么？她知道哪些人的名字她不能泄露？艾拉几个月来，在他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在做些什么？

我并不吃惊；我兴高采烈。这种兴奋并不持久——她受到了指控，案情看来对她不利，律师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也有我疯狂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解脱，它从我内心的某个地方高高升起，洒下一道道亮光。她入狱了同时又自由了，摆脱了他，也摆脱了我。

什么胡言乱语！

她被关在那里。她，正是她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带着我们去探望肮脏的玻璃后面站在看守们之间的父亲，经过监狱的走

廊的时候是她把我们搂近她以免我们的衣服触碰监狱的墙壁。

弄清艾拉被关在哪里的人是汉娜。她利用了各种关系。替艾拉的丈夫把一个字条偷送给她的人也是汉娜。汉娜从前就在危难之际帮助过这家人。她帮助过很多家人。她去监狱探望过那位父亲和丈夫。那个字条是一片被紧紧地卷得很小的纸——索尼知道这类东西不得不怎样粘在马口铁碟子的底部在吃饭时间偷偷送进去，或者是放在鞋子的内鞋底送进去。汉娜在把字条送给艾拉之前没有读它。一个有艾拉的字迹的字条被带了出来。这个小字条是一片从阿斯匹林瓶子上浸泡下来的标签。上面写着这几个字：别和贝比联系。等待。

索尼没有把字条的事告诉儿子以免他提问。汉娜毕竟是一位同志。她历来是个同志。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还是。事业就是情人，情人就是事业。

汉娜对艾拉的关心是一种安慰；可又不能成为安慰。在他看来她好像是以她的职业资格躺在他身边，就像在他被拘留时她去探望他一样，他不过是她出于对解放事业的热忱而去探望的很多人中的一个，她给他写一封封鼓舞士气的信，同时也给别的人写。他没有去找她谈话。他不能像他所需要的那样去和汉娜谈——不能谈他怎么让事情发生了，不能谈贝比和那个他从未见过的丈夫怎样莫名其妙地招募了艾拉这样一个女人，所有人的可怜的艾拉，把她暴露在危险之下，耗尽心血的艾拉——而且这一切都是背着他完成的。他已经让事情发生了，没有看见，没有被告知（他有时不相信那个男孩不知道这些事），就是因为他怀抱中的这个女人。她知道这一点，因此不能和她谈论这件事。这是一件他们俩都无法预见到会发生的事。因为她对他的全家有一种浪漫的敬意，他则自信自己具备安排好生活

的各个方面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她而获得的，在草原小镇黑人区的简陋而无意义的生活中它从未被开启过，是它使得他能胜任他的出身、祖国和性格所要求的一切——献身于解放运动，维持一个家庭，永葆性爱激情。她是他唯一的机会。她是他的狂喜与高傲的源泉。在她对他做爱的时候，她仍然是。艾拉进了监狱，而且这个女人也要离他而去了因为自我以外的公益事业要求她这样。但在他沉浸在她和他自己的温暖中的时候，在他的舌神经掠过她皮肤上看不见的柔毛，掠过她的臀部那有鸡皮疙瘩的不同的肌肤的时候，在她的重量压在他胸毛丛生的胸部上的时候，他们俩失明了，窒息了，互相缠绕在一起，像像在黄道带的圆雕饰中的神秘的动物形象一样。

黄道上的一宫。——我有时会回来的。——噢杂草啊。

噢杂草啊：你是如此妩媚诱人，又是如此芳香浓郁，竟使感官为你刺痛，但愿你从未降生人间。

他们将去看她。父亲和儿子偕同律师一块去法庭听律师为保释申辩。索尼知道程序：艾拉将会出庭接受对她的正式指控，此案过些日子还要通过复审。他们将会见到她；她将从自她失踪以来所有日子的推测、谈话和恐惧中脱化而出——艾拉将以新的化身出现。这令索尼难以置信，虽说他本人早就曾被从法庭后面的牢房里带上法庭，但他不知道该怎样准备面对艾拉不同寻常的出庭。他没有注意到他现在的穿着和他从前被带上被告席时的穿着一样。

审讯不是在位于本城那一大片灰色街区的地方法院进行，地方法院和另一高级权力机关即矿业公司联合会总部在同一地区，该总部从前发生过一次可能是由包在窗帘碎布里的那类物品引起的爆炸。审判她的地点是草原那边的索维托地区法院。

他们乘律师的空调小车直奔索维托，那空调车像密封的潜水箱一样，隔开了迎面开来并飞驰而过的小面包车里拥挤的一张张脸和只见口动不闻其声的嘈杂声，还有来来去去驶往正在公路附近修建的工业基地的摇摇晃晃的巨大运输车。在往来的车之间是一长溜绿色的东西，那是遗散在路上的芦苇草，车驶过时掀起的阵风使它聚散不定。律师在驾驶台仪表板下的放音机里换了几次录音带，车内的人没有互相交谈。威尔坐在后排，正好在他父亲的脑袋后方。

在饱经践踏的草原上，索维托的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互相混为一体的地方，法院围成一个巨大的四合院，他们只能经由四合院里四边相连的走廊进去。院子用红砖建成，种有灌木，显示出很久以前殖民时代的建筑遗风，那时候征服的堡垒是行政管理的绿洲。院子里按几何原则井然有序地布置着草坪和花坛，它们把入侵者优雅的生活与审美标准同他们的受害者粗野的生存方式区别开来。律师一到那里就离开了他们父子俩，让他们与和他们一样的黑人呆在一起，这些人或游荡、或站着，有的倚在柱子上，有的则聚集在门口，一旦有专程而来的法庭官员姗姗来迟，他们就会赶紧散开让路。在等待。所有的人，像他们父子俩一样，在等着看一张被制服淹没的脸，看装甲车和你用拳头砸上去只会自找苦吃的关得紧紧的门。

他们是索尼的选民。他曾教过他们的孩子，曾鼓动他们为自己的权力而战，他本人更是为他们坐过监牢。但是他像他们一样，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这么谦卑地等着见自己的亲骨肉因某一不可理喻的灾难被带上法庭。(可不是吗？她的骨肉和他的在他们的儿子体内永远地混到了一起，他儿子就跟在他身边。)这些正在用鼻孔吸鼻烟的老妇，是谋杀犯的母亲们，这些年轻的女人们，她们打扮、涂抹自己，为的是想使盗车者想到被激起

的欲望而忘记本来目的，这些其他的女人，她们厌倦地靠在墙上，背着用毯子裹着的婴儿，还有这些靠叫卖为生的老男人，他们缩手缩脚地穿着宽松下垂的旧衣服——假如他们这些人是在等着看一个普通的罪犯，或是像他这样的政治犯(艾拉！担当那种角色！)，那也没什么关系。现在，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他不知道的某一点。过去多次出席对他的同志的审判并没有为他做好应付目前这一局面的准备；在那些情况下同仇敌忾使每一个人的出席都变成对法律程序的蔑视。可是想象一下，自由之歌和欢呼是为了可怜的艾拉！

律师去办理正式手续并打听她将在哪个法庭出庭了。等待的时间很长，开始他们父子俩沿着四面的走廊走了一圈又一圈，就像期待随时被召见的人所做的那样。——他为什么不回来呢？——男孩的父亲说道，做儿子的知道，那不过是为了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他们在别人的喧闹声中够孤独的，他并不一定要回答。

至少也得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拖这么久。——

——你想不想让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呢？——

——没有用，威尔。——

做儿子的从走廊跳了下去。房子的一面的阴影把四合院分成阴暗和阳光明亮的两部分，他走到那些晒太阳的人当中，在草地上躺了下来。这是一次奇怪的野营，忍耐取代了假日的娱乐。有些人离开四合院，不久又带着油饼、桔子、罐装可乐和刚买的香烟回来了。孩子们在狡黠地嬉乐和打斗。像他们一样，他在水龙头下捧起水喝了起来。一个穿着政府发的靴子和工装裤的雇员带着例行公事的冷漠一边低声哼一首圣歌，一边打开浇水管把那些花坛淋得湿漉漉的。

索尼站在他儿子上方，看来好像要用鞋尖戳他似的。——

地上不湿吗？（微微地笑了笑。）你想吃点什么吗？——

他们谁都不想错过她被带进法庭的那一难以想象的时刻。做父亲的停顿了一下，朝太阳做了个手势，接着就回到走廊上站着了。也许他以为他儿子在草地上睡着了；他儿子脸朝天空，双眼闭着。但是在律师转动双肩穿过走廊上的人群的时候，他父亲还来不及招呼他，他已一蹦而起并跨越躺在草地上的其他人直奔而来了。——终于有结果了！——尽管申请保释的事是在下午两点裁决。警察同意保释，但检查官坚持进行辩驳……我认识那个家伙。……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真荒唐，但你得跟着荒唐。拖到现在上午是无法开庭的了。我不得不到法庭议事室去然后再回来，那里有紧急事情有待我去关照。现在我们不要浪费时间问问题了，你们跟着我就是了，什么也不要说，威尔，帮我拿包。你是我的秘书。来吧。——

他朝前面低声咕哝着挤过一条走廊，来到一条用菱形网眼的铁丝屏拦住的过道前。——跟在我旁边就是了。不要注意任何人。如果有人问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就指一指我。——

律师大步走到过道尽头那间房里的长柜台前，再一次用他魁梧的身体挤进乱成一团的警察和争着想引起值班官员们注意的其他人之中。警察们卡嗒卡嗒在那对父子身边窜过去窜过来，像是在跳粗野的踢跶舞似的。不管他们站在旁边什么地方，他们都挡着某个人的路。用黑人自己的语言以及白种警官的阿非利堪斯语进行的交谈和发布的命令漫天飞扬，它们都带有老想染指权威、动辄发号施令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急迫和非人的色彩。肉体的迷乱使他们父子俩很难不被人注意；他们俩都任由别人把他们推来推去，好像他们是被某个清洁工人扔在一边的没有生命的障碍物似的，而与此同时他们又透过过道和铁丝屏的网眼注意着院子里发生的事情，那才是最引他们留意的，因为艾

拉属于他们。因为艾拉属于他们，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所见的正发生在别的受害者身上的一切——这些受害者被从牢房或无窗囚车上押出来，穿过院子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也可能正发生在她身上，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索尼本人也曾踏着戴手铐者那样的碎步被押往法庭接待室进行登记。他曾看见一些可怜的男人被看守硬拖着，他们又哭又闹，为了使他们老实点，白种暴徒当即给他们几拳，他们痛得立即蜷曲成了一团，或者是黑种暴徒抓住他们一边推撞摇晃一边破口大骂。对被脚镣弄得一跛一跛的男人拖着脚步走过去的场面他已习以为常，从那被囚禁的人身上升起的恐怖进入犯人接待室的日光灯的凶光和电脑的记忆中，他对这些都不陌生。但是艾拉，艾拉，艾拉与这些无关！艾拉，她穿着她自己缝制的散发着芳香的整洁衣服，脖子上挂着那串小珍珠串成的项链，双臂紧紧缩回身体两侧，下意识地远离监禁他的监狱的墙壁——这才是艾拉历来的模样，她与任何有关监狱的东西接触都永远应该是这副模样。还有那个男孩——身为那个男孩必须意味着什么呢？他对这种事毫无了解，作为一个不太具有男子气的小伙子，他受他母亲的保护太多，因此，尽管他聪明并且读书多（是的，该承认这一点，在那方面他受到了他父亲的鼓励），但他只是间接地知道驱使一个人摧残另一个人的强权的丑恶而野蛮的诱惑，过去他被带去探监时他父亲平静地向这个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微笑，父亲向他显示的只是反抗强权时表现出的壮美和高贵。做父亲的现在可以做他当年隔着玻璃隔板没能做到的事了，索尼把一只手放到了威尔肩上。为了抚慰他。为了和他融为一体。

律师正在柜台前张开双臂露着黑色律师服和法庭的警卫官交涉。——我是她的律师——你不能禁止我和我的委托人磋商！我要找法庭的主管——他迅速傲慢地朝那扇门昂了一下头，同

时把那对父子拉到了他身边。——我的公文包。拿我的文件来。——一个大腹便便的警察挡住了去路。但是索尼像一个匆匆操起还没有忘记的外国语的旅游者一样，连哄带骗地用监狱里惯用的阿非利堪斯语和他争辩起来。威尔在混乱中溜了过去，紧紧地挨在律师身边。律师示意索尼继续说下去，可事实上，那个警察在听到要他去处理别的事情的急匆匆的喊声时不再注意索尼了。尽管那个警察威胁说要把这一行人的所为报告法院院长、检查官和法官，但现在没有谁对那个律师的随从进入接待室的权力提出质疑了。

——十分钟，不得超过。——那位威严的警官用严厉的命令式口吻保留了他的自尊。

律师既没有表示接受这一条件，也没有向那父子俩作任何解释；他们跟着他走到接待厅尽头一个隔开的小间前，人们在他们面前走过来走过去，他们后面的花玻璃映射出别人晃动的脑袋的被扭曲的颜色。律师打开了小间的门。

她正站在那里微笑着向他们致意，丈夫、儿子、律师。女看守离开她站到了背后，和艾拉的形象一对比，坐在桌子边的那个警察几乎根本不存在。她穿着她自己缝制的上衣，她的化妆仍然具有那些令人放心的特色(与索尼订立的自尊的契约，完好无损，感谢上帝)，但从她那熟悉的美貌后面透露出一种鲜明的陌生。她无畏地装点了自己。正如画家在他的主题中找到自己一样，看来好像是某种自我选择的经历在她身上发现了她自己的本来面目，那种一直在那里等着去发现的东西。在卢萨卡，在暗地里，在监狱中——谁知道在哪里——她为发现她那张隐藏的脸经受了考验。他不得不辨认才能认出她来。

这个女人热情地轮流拥抱了他们——索尼，律师，然后，当然，还有那个她从未让其离开过她的怀抱的人，她的儿子。

威尔，系上领带。

上帝保佑非洲。

我爱凯塞尔·奇夫斯。

那次坐在车中的时候我盯着他的后脑勺，我内心的一切都停滞了。我不想任何东西。我没有想她，我只注意我体外的东西。律师把车开得疯快，在追那些小面包车，追上，落后，再超过，小面包车上贴着广告之类。录音磁带播放的是“刺和真诚”音乐。我用手往下按时，羊皮座位的垫子上的绒毛埋住我的手。只要我愿把手松开，座位立即又完全恢复原貌，包裹着一个真空。

当我看见一个男人在挨一个警察打时把脑袋藏在双肘之间，我内心的一切又冲开了闸门，涌了出来——被抑制的对生活的恐惧，为她，也为我自己——我父亲把他的手放到了我肩上。他知道。一只手落到我肩上。他对我有所要求，与他合为一体。我们家没有谁能够免于磨难。她想使我远离磨难是徒劳的。另一方面，贝比倒是如愿地把她变成了贝比愿她成为的那种人。

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知道他发现他从前准备的一切都是错的。甚至更糟：她不需要它。我本该把这告诉他，我本该把他没有注意到的很多事情告诉他，过去他总是把太多的心思用在别处了，因此根本没有注意她的事，那些事情我现在明白了；我明白了她对那些“工作上的朋友”的拜访，他过去很乐

意地认可了它们,因为它们使得他不用为忽略了她而承担责任,我也明白了她那么频繁地出境的原因——噢,他也已经意识到它们并不纯粹是出于想念孙子,但是他错误地得出了损人的结论(太典型了!当然只有他的金发情妇有成为他的战友的智力和勇气),他认为艾拉受骗了,被贝比和那个丈夫利用了。他一定看见了,门打开的时候她在那里。他一定发现了她并不“清白”;“清白”这个词,我已听见他像演说似地说过多遍,它意味着否认你的家人有任何责任。

他一定已看见她怎么样。她像一个年轻女人那样吻他——我从不知道我的母亲会那样,我想现在她处在另一边,她知道不能抚摸的滋味——但她不需要抚慰,没有恐惧待他去驱散,没有泪水待他去擦干。在你落入那些吼叫并毒打一个把脑袋遮挡起来的男人的暴徒手里的时候,一个律师比丈夫和儿子都管用。我明白这一点。那个律师,他在看守和警察中间是有头有脸的,他就是力量,他就是她与之站在一起的人。他们之间有迅速的,滔滔不绝的问答,这两个已在事关幸存的问题上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人彼此如鱼得水;他是在她被拘留期间唯一见过她的人,也是唯一了解她现在的任何事情的人。她没有时间或心思问我们家里怎么样了。我父亲做过几次尝试,好不容易才私下里对她低语道——这整件事都是发疯,别担心,艾拉,什么都持续不了多久的。——他指的是任何对她的指控。她看看律师,然后看看我;她那两道平滑的黑色眉毛在她踌躇而视的柔和目光上皱到了一起,在她对什么东西不明白并且设法解释的时候她总是那副模样。她碰了碰我父亲的手。——现在,轮到我了。——她和那个律师笑了起来。

下午两点钟,在第二法庭,艾拉被指控违反了《国内安全条例》中的四条。——她出庭的那一天,我听见她婚前和婚后的

名字被大声说出以验明正身，从那时起我就把她看作“艾拉”了。加给她的罪状包括搞恐怖活动和推动一个被取缔的组织的活动。她被指控为某个叫作德兰斯瓦实行团的组织的成员，负责本地的恐怖行动，与某个叫阿莫斯·塞博肯的高级头目有联系。她还被指控在邻国的一些恐怖团伙及约翰内斯堡地区的一个牢房之间充当过通信员，参加过安排爆炸活动的秘密会议，还在她非法居住的租来的房屋里私藏用于恐怖活动的武器。

她和我们一起回了家。在法庭上律师陈述了所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为什么应该批准保释我母亲——艾拉，那个模范妻子和主妇，作为一个认真的工作人员，她的腼腆性格和美德，早已被那位已雇佣她多年的深孚众望的开业医生证实了。结果，检察官的异议被否决，我们交了一万元保释金；律师早已准备好了杰苏德大夫的空白支票，就像那次大夫的绷带及时包扎起了贝比切开的手腕一样，那次我父亲不在场。

在他，我的父亲，过他的秘密生活的岁月里，我一直和艾拉住在一起，可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实行团”或者某个高级头目的代号，我对她在过的秘密生活毫无所闻。我一直在掩护他们俩。她甚至不必向我吐露秘密；为了保护我，她保持了沉默，她的沉默使我成了她的同谋，就像我已变成他的同谋一样。

艾拉欣然迎接战斗。

没有谁比索尼更清楚，让看守和警察看见你笑总是好的。对一个落到他们手里后还能笑的人，他们很难不怀有某种敬意。可是不知道她这是从哪里学来的，竟然知道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和她的律师交谈，而且外表不泄露任何秘密——甚至连那个碰巧成了她的丈夫的老政治犯都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精于监狱之道。艾拉精于监狱之道。他的艾拉，他对自己声明了这种

所有权。在内心他忽略了他在他俩之间制造的岁月的裂隙，仍然把他俩看成是从前二位一体的"索尼和艾拉"，那时他们一起学习怎么生活，除了与柏诺奈城外那座小屋有关的事，他们不用面对、决定和处理任何事情。

现在，他来到的时候，汉娜不是让他坐下来喝咖啡，就是递给他一杯葡萄酒。他们再一次像第一天他们在咖啡馆里约会时那样坐到了一起，那时候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开始，那种事本来就永远不该发生——从那时起就应该改写。

——艾拉怎么样啦？她是否惊恐不已？——

——她回家了。他们批准了保释。保释金一万元。——

汉娜那长茸毛的粉红色脸庞痛苦地绷紧了。他和她都知道高额保释金意味着检察当局有信心维持指控。——她被指控做了些什么。

——违反《国内安全条例》。那一类的活儿。布置恐怖任务，往返于牢房送情报。——

是的，她那些使他得以自由地整夜睡在这间房里、睡在现在就在他们身后的床上的卢萨卡之行。

——当然，还有贮藏室里搜出的私藏的武器。——

沉默持续着。突然汉娜眼睛里的蓝色浓烈起来，就像眼中充满泪水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不管艾拉是不是一个革命者，不管她是不是加入了斗争——假如她加入了，谁能不为她的选择而高兴呢？——也不管她是天真地被她女儿引入了她不理解的行动，还是受到了秘密警察的栽赃陷害，反正那位恬静美丽的妻子被背叛了，被出卖了，从前她缝制窗帘的布料如今被用来包藏了手榴弹和地雷。

索尼惊愕了，被侵扰了。汉娜哭了。泪水缓缓地顺着她那宽大的脸庞流了下来，她没有从他的目光下转过脸去，也没有

为顾全面子而用双手把脸捂起来。她没有权力为艾拉哭泣！

——看在上帝份上，汉娜。——

但泪水一涌而出，沿着那张亲爱的脸的轮廓流了下来。她试图说话，但她控制不了她喉部的肌肉，她的喉咙像小鸟的一样膨了起来。可怕，可怕，她好不容易站了起来，同时摇着头把泪水抖掉。一些泪水落到了他的两只手上。他站起身来并隔着桌子抱住了她，他们在狂热的笨拙之中紧紧搂着对方，碰翻了桌上的茶杯和糖碗。

当他们躺在地板上那同一张床上的时候——像他们过去所喜爱的那样靠近大地，醒着——他们闭着的眼皮下流动的血液之潮正在把他们冲散，他们俩之间的红色的生命之水越扩越宽。她没有说话，但他肯定能听见，这再也不会发生了。

索尼在体验一种不幸的代换。这隔着桌子的狂热拥抱属于在法庭接待室隔开的小间里与艾拉的会面。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我那段时间对此不太注意。我想他身上一定表露了某些迹象，不过是它们被当成了其他东西罢了。整个屋子，我们的生活，都以艾拉为中心；假如他在家的话，现在，他还能到哪里去呢？艾拉不得不每天向警察汇报两次。他能让别的什么人带她去那里吗？一个对任何同志都同样全力相助，在任何危险之中都把同志置于自己的欲求之上的人。

不仅我们家的生活围绕艾拉旋转，而且现在领导者们的注意力也集中到了艾拉身上。我父亲的同志们又经常来登门拜访了——来看她，向她保证他们对她的支持。必须为在最高法庭替她辩护做好安排，要落实从哪些途径得到所需的钱，哪一个律师最适合担任她的辩护人。一个女人受审——于是就有了她

可能面对什么样的法官的问题，是一个厌恶女性、以惩罚女人为乐的人，还是一个有可能积极地被优雅、成熟和美感染的人呢？另外，在辩护时怎样最好地利用这样一种可能性呢？妇女联合会为她买来了糕点，工会代表大会送来了鲜花。

正是通过这些投身于解放运动的来访者我得知她——我父亲的情妇已经走了。这是非常偶然听到的。某个来自开普敦的人对她与艾拉的丈夫的关系一无所知，此人在我们的客厅里发表意见说，应该把艾拉一案的更多细节通报国际大赦及其他关心政治犯遭遇的组织。——我们不应该等待审判开始。要想法让海外的人知道此案的背景，告诉他们我们的艾拉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我告诉你们最能胜任此事的人是谁，是汉娜·普劳曼，她真了不起——接着有一个人插话：——可她已经不在这里了，伙计。她已在联合国最高难民委员会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在北非某个地方。——

于是他又成了好丈夫，好同志，因为那个女人走了。他要么表现得认真而殷勤——他一度是艾拉的伴侣，艾拉的勇气所在，而现在，艾拉成了主角——要么就是愁眉不展，独自在厨房的桌子边坐至深夜，不是因为我母亲可能坐十年牢(我纠缠着律师给我估计个年数)，而是因为不再有铺在地上的大床了。没有那间妓女的房子了，你走进其中时一切都不知羞耻地暴露无遗。

艾拉的名声对我来说真有点可畏：那个和我睡觉的小姑娘把我当作病弱者对待，同学们一见到我，就见到了报纸上的那些标题：车库里的手榴弹非法住在白人郊区的主妇被指控私藏恐怖物品。对我那位以艾拉为伪装的母亲的指控暂时使我歇息了。我把他的情妇忘到了脑后，还有他，那个陌生人的话突然又使我想起了他们俩。

现在，我也做了一件可耻的事。我抵挡不住势不可挡的冲动。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再次去了那座小别墅。我以为我将在那里看到什么呢？或许我只是想证实一下，证实一下。也许我没法相信那种说法；他，她和我被绑在一起的时间够长的了。花园的侧门被锁上了。我翻墙进入了花园。正屋里的狗没有听见任何声响，没有出来。我沿别墅门廊的台阶走上去，好像要向她宣告我驾到似的。我站在那下坠的纱门前但没有去碰它，因为我记得它会发出短促的尖叫。一个曾经装过葡萄酒瓶的纸板箱躺在枯叶之间，破裂了，里面是两本被雨水泡坏的电话号码簿。一扇窗子烂了，其中的玻璃落进了房间里面。

没有床。床原来所处的位置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脏肮的方形；我记得从前有一幅丑陋的画挂在那里。那些室内植物都因缺水而枯死了。两个裂开的垫子在墙角把它们的内脏撒得到处都是。被舍弃的房里有一种嗡嗡响的沉默。一度在其中响动的所有动作和音节，一度在其中发生的一切，现在混淆到了一起，在毫无意义地旋转，尘埃在墙与墙之间浮游，游过来又游过去。这就是结束了的一切。这就是过去，它的尘埃还没有落到地上。

我把头从破窗户伸进房里。烟的气味。她的气味。他回家时身上有烟味，他散发的不是他给她的精液的气味。那张床。用我父亲的那些著名引言之一（这回，该引用《圣经》了吧？）形容，那张床断气了。

你所期待出现的感觉在你刻意寻求的时候往往不会当即出现。我那时在那里没有发现异国情调。

艾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了律师们在计划为她辩护时给她的那些长串长串的问题中，她按照要求完完全全地叙述了她所纽

和所做的所有导致她受到起诉的事情。她用手和笔做笔记，然后一页又一页地把它们用打字机打出来。他坐在她对面的桌边，就像他们当年所做的那样，那时他作为小学教师正在桌边批改学生的作业，她则为了提高自己而在学习函授课程。但是现在她若是抬起头来向他问什么，那不过是向一个更有应付准备受审时面临的潜在危险的经验的人寻求忠告而已。每逢这种时候都有悲痛的浪涛涌向他，他真想拒绝回答，但他还是克制了自己并回答了她；她往往用点头表示谢谢，并且在稿纸的空白处潦草地记下些什么。她在桌子对面的形象透过他前面的书本或报纸进入他的眼帘。他在找她谈心之前等待得越久，他说话的机会就越少；随着她写下每行供词，随着每次与律师磋商，随着每次他那些处于领导层的同志们来访，荒谬的事在逐步变成被接受的现实，即艾拉是一个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革命者。这种状况不仅是由政府造成的，而且也是由律师们和解放运动的领导们造成的。使艾拉做好准备去迎接——他知道，他知道——那只有自愿选择了革命之路、对自己具有完全把握的革命者才能忍受的一切。

带着想伸出指尖把某种正在从他的掌握之下消失的东西抓住的意识，他把一杯特意准备好让她在忙她的任务时喝的茶递给她，同时突然地对她说话了。

——是什么使你做出那种事的呢？——

已是深夜，她看看房间四周，以弄清是否只有他俩在，以弄清那个男孩，威尔，是否在场向她表示支持或信任——他经常是呆在旁边的，头上套着耳机，以免他正在听的音乐打扰她。

艾拉从容不迫。她甚至可能会觉得并不是非得回答不可，就是说，她从未表露过的责备可能以这种形式出现。索尼有一种瞬间的预感，但她说话了。

——我心里明白。——

他凝视着她，她看起来几乎回复到了她过去那种说话简洁的温顺之中。

——你从前不明白的东西你现在明白了什么？贝比怎么能够——他大声地叫喊！——那样利用她的母亲？我简直不能相信这种事情……我不能原谅她。——他警觉地听见自己的声音嘶哑了——假如他的眼泪括约肌失控，艾拉会明白它们不是为她而流，而是因为他在排斥贝比。他的女儿。

——没有什么可原谅的。她什么也没做。——

——这不是真话。就算她没做什么吧——那一定是她介绍你认识的那些人干的好事。她暴露了你。是她介绍的。——（为了你我不认这个女儿，这话在他暂停说话的时候在他们之间回荡。听，为了你我得那样做。）——当然，与我们这里的生活相比，那里的令人激动、重要而且自由。噢我确信如此。各种妥协，琐碎小事……它们都消逝了，要面对的是战争，不是为证明某一观点和你的白人邻居兜圈子。但假如你所求更多，这里就有大量的事情可做，我们本来……至少……我们本来是可以商量一下的。——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否想商量。——

他等待了一会。——艾拉。主动一点，或商量一下不好吗？显然你是能够和贝比商量的。假如你说她不是利用你的那个人的话。——

——从前你是那么为她自豪。现在别把她说得一无是处。不要为你自己糟践他人。——

随着腹部肌肉的收缩他体验到一种对他来说是新的情感，不可避免，那就是悔恨导致的恶心，这从来就是一种必须完全孤单地去承受的东西；他所糟践的东西太多了。艾拉喝了喝给

她的茶，他看见她硬而黑的睫毛下凝神的双眼徘徊在她所写的那些证词上，但她很快把视线转移了，好像在那一片刻那些字句表达的是错误的意思似的。她看看他，接着突然开始像一个讲故事的人那样说话了。——贝比和他无论去哪里都带着那孩子，你知道。孩子仍然太小。不是会议，就是晚会——他常常凌晨一点还未上床。第一次，我的确被吓住了，我告诉他们那是不对的，可怜的小家伙。我的意思是，你和我……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每次外出，都有某个人来家里照料他们，他们晚上八点钟就在家里他们自己的床上好好休息了。但有一次我去探望贝比他们的时候——我记不起那是第四次还是第三次了——他们夫妇俩告诉我说，他们有一天晚上带着那个小家伙一起去参加一个晚会，晚会结束后回到家发现他们的房子已被炸毁了。你记得南非在边境地区的第二次袭击吧，在自己安全的住所被炸之后贝比捎来一个信，说被炸的不是他们住的地方，叫我们放心。可不，她那样做了，因为她不想让你——我们——担忧；而在她把这些告诉我的时候，她要我许诺不告诉你。但被炸的正是他们的住所。假如那天晚上他们把孩子留在了家里由某个人照看——交托给了某个像我这样的人……——

孤立是一种像寒冷一样的感觉，它先占据他的手和脚，进而是他生命的核心。假如他别无他法，只有归咎于贝比——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第二次死里逃生的贝比，那么，在他自己心目中，他处于什么位置呢？

——是那么回事？——

——我想是的。——

——真不容易跟上你的思维，艾拉。你省略的东西太多了。——

——我知道。——

——你说你“明白了”。——

——是的。——

——你能解释一下吗？为了复仇？假如你一直在受政治教育的话，那么你应该明白，那在我们的斗争中并不是什么可取的动因。你是否有某种神秘的经历，或是别的什么？你明白了什么？——

——明白了我所做的一切的必要性。——她把手指向前伸直并合拢的双手分别竖在她面前的那叠证词的左右两边，像是为证词加了个框似的。同时她把自己袒露到了他面前，等着他的评判。

假如他是有权评判她的那个人该多好。作为她的丈夫？还是作为一个同志？他那么富于匠心地建造起来的生活之屋现在不适合于居住了，他的那些分类一点用都没有，无一适合他的需要。需要汉娜。他对汉娜的吸引力属于他们——他们大家——他、艾拉和汉娜生活在其中的那个被歪曲的时间和地点。和汉娜在一起有献身于解放事业的性快乐；献身于解放事业意味着危险，而那种盲目的原始本能旨在保证人类在各种危险环境下幸存，哪怕是在动物死去或植物走向衰败之后。在这种奇特的移情过程中，他的生活的生物学动力，虽然本来属于他妻子和他生的孩子们，却被转向了他的情妇。他和汉娜没有生孩子；革命运动将是他俩的后裔。他们俩的交配之乐就是为了那一点。

但现在，艾拉是革命者了。

每天开车一起去警察局汇报时他们一起办理的那些古怪的例行手续，在他看来好像是一种恢复他们从前一度共享的那种家庭亲密的可能性。那一定是一种奇怪的回归，但肯定有某种他们从其中开始的东西存在，它一定隐匿在他们之间已难以想象

地发生了改变的状况之中。现在，他呆在家里了，就像他过去一度常做的那样，其他的现状也使这成了可能：那座小别墅被遗弃了；他也不知何故从解放运动的高层职位上解放出来了。

他对艾拉做爱了。不过从前他从未停止过对艾拉做爱，那时他尽责地计算时间间隔，以免使她怀疑他正在把自己给予另外某个女人。不同的是，现在他回家了，回到了艾拉身边，艾拉，他的妻子，他的艾拉。她没有表露任何注意到热情复归的迹象；她合作得很好——他只能这样向自己描述。凭着对女人在做爱时能感到什么的更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她在假装有快感。她在想别的事情；或者说她禁不住要想问题，这就要命，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体内的时候，如果他不能使她排除一切杂念而只沉浸在做爱的迷狂之中，那么他就算不上男人。有时候，他否认自己算不上男人，煞费苦心地自我鞭策，却还是如死肉一样从她身上瘫下来。她并不对他或为他感到尴尬。她轻轻地拍一下他的手，说：——没关系。——

没关系。艾拉说了那句话，他躺在她旁边，他的心带着对汉娜的怨恨在怦怦直跳。他神志恍惚地听见汉娜所说的那些话；它们好像是发自他所认识的人中除汉娜以外没有任何人提到过的生活的中心。但生活的中心不在那里，不在汉娜那里，生活的中心在老调重弹的地方——为生育、婚姻和家庭琐事进行的忙碌，以及它们藉以长存的仪式如吃饭和穿衣之类，它们在艾拉那里。由于汉娜，艾拉离他而去了。毁掉了。艾拉原有的那个自我。汉娜摧毁了它。艾拉也走了，但她的肉体却活生生地躺在他身边。某种高于自我的东西拯救自我；这是年轻气盛时他教给他羞涩的新娘的信条。他听着艾拉的呼吸，她时不时地打几下轻鼾，她所涂的护肤霜被睡觉时上升的体温烘温，他闻到一种过于甜蜜的香味——婚姻中熟悉的腻味，逃离它而

趋向不拘习俗的狂野的地下爱情——他产生一种难以平息的渴望，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抑止他对他已逃离的一切的渴望。

作为同志的艾拉。法庭的第一类物证是一个RPG-7型火箭发射器、两枚RPG-7型火箭、三个RG-42型手榴弹、两个水下爆破弹、两个FM-57型地雷和一块用来包这些东西的印花布料。那段布料是另一个艾拉，也就是为儿子缝制窗帘的那个艾拉以前从东方市场买来的。艾拉昂着头坐在警官们之间，她神情自若，不时朝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索尼和威尔抬抬眉毛或投来一丝微笑。对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的这一阶段，索尼根本无法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感情。日光——法庭的日光、警察的脚步、成群的律师以及法官到带天篷的座位上入座时全场起立的混乱——这一切使他眼花缭乱，使他那孤独的、黑夜般的情绪一团混乱。但这至少是他的位置，草原上的一直未变的战场。带着一杆痛苦的长矛，还有对这个女人艾拉的骄傲，他左冲右突。他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个男人突然产生的焦虑。威尔在小声地对他父亲说什么，索尼烦躁地把头扭开了，他在全神贯注地注意法庭的律师席上的程序。他儿子试图告诉他的是，他亲眼看见从贮藏室的窗帘布剩料中搜出些什么武器，其中根本没有那个RPG-7型火箭发射筒和那两枚火箭。

我的生活里没有新鲜空气。警察局和监狱里擦得光亮亮的走廊成了我所爱的人们带我去的游乐场。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位白人朋友有一次邀请我去他的农庄和他的儿子们一起过一个星期六。那农庄叫作恩克尔博斯；我至今仍记得其中的一个儿子跳下车去解开的那个挂在农庄门口的告示牌。他们每个星期都去那里度周末。他们有一个橡皮筏放在水坝上。他们还有越野摩托车，我们轮流骑着它们轰隆隆地四处驰骋，扬起的阵阵尘土同正盛开着黄花的黑树干的亚拉昆亚合欢树的芳香花粉弥漫在一起；当时是七月末，冬天正在我们的脸颊上融化。

我需要空气。又是擦得亮光光的走廊，一群警察在阴沉地站岗，陌生人的身体在沿着听众席硬梆梆的长凳挪动，我们则带着渴望在追踪律师的每一表情，试图穿过法官——一个藏在他的红色法衣中的某个地方的男人——在他本人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之间保持的距离。人们在那高尚的场合下被麻烦弄得萎靡不振——多少次我盯着高挂在天花顶上的那些风扇，它们在把麻烦搅过来搅过去，但没有任何花粉注入新的气息。只有一片陈腐之气。我的整个一生，自从我们离开那个矿业小城外的老家以来，我一直在吸呼由这类在这里生命和自由被假定受到法律保护的地方散发的死亡的浊气。

这回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是艾拉，我父亲则在听众席坐在我旁边，像过去她常做的那样。我感到麻木，我感到我正任由

自己颓然依在一个坐在我另一边的拄着拐棍睡着了的矮胖的老黑人身上。让我们一起睡去吧，管他法庭在伸张的是正义还是不义，我们不知道他们将做的决定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我们不知道法官那经过斟酌的手势——在记笔记(什么笔记呢？)会导致什么结果。律师们在交换卷宗，还有那个那么傲慢地面对我们的法庭记录员，他竟然意识不到他抠鼻孔时我们能看见他，电脑操作员们在用手指梳理她们那蓬松的头发，警察则在吱吱嘎嘎地踮着脚走进走出，同时点点头朝法官席上的人敬礼，像人们在离开教室时敷衍塞责地在胸口划十字那样。

我旁边那个老黑人开始打鼾了。由于我已对这类地方习以为常，我自动地当着法庭的权威神气起来，我用手肘推醒他，省得警察走上来骂他一顿。我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不担惊受怕，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吃了一惊，而他的突然惊醒也使我猛然警觉起来。我当时的心境就像是看电影一时走神，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眼前看到的情景与先前所记住的情景互相抵触。检察官正在向法官出示物证：三个菠萝状的手榴弹、两个水下爆破弹、两个地雷，是的——但另外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奇怪东西，也就是一个RPG-7型火箭发射筒和两枚RPG-7型火箭。包在窗帘布中藏在我们的贮藏室里的那些东西不包括这些，其中根本没有RPG-7型火箭发射筒和火箭弹。我几乎跳起来并向法官大喊大叫了。但我在监狱和法庭受到的训练使我克制住了自己。我试图悄悄地告诉他，我的父亲，但是他也知道在这种地方假如你想蒙混过去该怎样行事。他使我闭嘴了。我感到气闷，我所知道的真相简直要使我窒息了。我擦着坐在凳子上的那些人的膝盖走出法庭。这里是比勒托利亚，审讯在司法部的最高法院进行，而不是在专为黑人设立的索维托法院；索维托法院只是她第一次受审的地方。我在法院的前大厅那些有擦得亮亮的黄铜

基座的雄伟的大柱子之间坐了下来，透过玻璃上的一个个彩色菱形直射而下的彩光照在我身上；他们的教堂和他们的法院是以某种方式莫名其妙地混在一起的，他们在他们的法律中看到某种神圣的权威。每个进入法庭的人都必须经过一道金属探测拱门并被搜身；我迷惑地注意到有一支枪对着我——一个黑种小男孩，他的女性家人坐在凳子上都已恹恹欲睡了，他离我还远，在等待，同时拿着一支玩具自动步枪在四处乱走。现在一个守卫第四号法庭的大门的白人警察假装被打中了。那孩子绕着他的新玩伴跳来蹦去，他的笑声在有被困住的燕子飞翔的法庭前大厅的穹顶下回荡，与此同时，我坐在那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看见了那些被打开的包过炸弹的窗帘布，我一个挨一个地数那些显得那么死气的东西，手榴弹，水下爆破弹和地雷，我肯定只见过这几种东西，我听见检察官在确认所有的物证。我为自己骄傲，感到自己非常重要。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只知道我内心拥有正义，它会在他们之间炸开。他们的谎言和诡计，他们栽的赃将从艾拉身上脱落，她将获得自由。

我的父亲没有来找我。直到法官去喝茶小憩时他才来。“休庭”的宣告从第四号法庭的几道门传出，我听见人们走出法庭时发出的移动脚步和衣服的声音以及他们说话的声音。我感到我要闷死了。我站了起来。你病了吗，他说。看他那样子好像我这模样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似的。

我好长时间没有触摸他了，我紧紧抓住了他的双臂。——贮藏室没有那些火箭。没有那狗屁发射筒。它们根本不在那里。那是他们栽的赃，就像他们更早些时候把另外那些东西放在那里一样。我向你保证我看见了，它们根本不在那里。——

他立即相信了我的话，但律师们当然讯问了我。我拿得准吗？那天早上他们搜查的时候我一直在贮藏室吗？我是否处在

焦虑、激动和愤怒之中呢？是的，这些都对而且不仅仅如此，相信我，我所有的脚趾都僵硬地勾曲着，就像我的所有手指紧攥成拳头一样，我的双肩绷得那么紧张，以致我的脖子第二天还痛，好像我扭伤了肌肉似的。但是我清楚我看到些什么，无论哪个法庭问我我都可以就此发誓——要是那一天我用一张纸写下了那些武器的清单并让那些狗娘养的签了字，那该多好，该多好！

在律师们对我的可靠性感到满意并且对我应付盘问而不被检察官吓住的能力有了满意的估价之后，他们一致认为我所说的情况是一个重要证据。它使得宣称艾拉在我们家的贮藏室私藏武器或者明明知道它们是武器仍然允许把它们藏在我家的整个指控成了值得怀疑的诬陷。在她的第二份供词中，艾拉声明她知道将放进贮藏室的是一些"废弃不用的办公设备"。她没有去查看他们放在那些家庭杂物之间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按我目睹的真相，即使他们在那里存放了炸弹，其中也根本没有RPG-7型火箭。

我父亲变得欢欣鼓舞，他又露出了在贝比和我还小的时候他常有的那种露齿微笑和凝视的力量，它们洋溢在他的周围，当年我们去监狱里探望他时他表现出的也是这种神采。——他们不仅不能证明她知道放在贮藏室的是什么，他们也不可能证明他们没有把那些东西放在那里而对她进行栽赃陷害。他们逃不脱合理的怀疑——不可能逃脱，一旦证明了他们把火箭栽赃于她，他们的所有证据都会不攻自破！假如警察当局在主要的指控方面说谎，那么诉讼还怎么能够维持下去？法官将不得不把整个案子一笔勾销——这真是达到那一目的的好机会！——

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商量对策。会谈以我为中心，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不是任何人的同谋，我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找到了我

自己的证据。律师对案件的结局不像我父亲那样有把握，但我已变成他们的辩护的中枢环节，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证人。我听见其中一位对我父亲旁白道：——他必须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做到在被盘问时不流露任何拿不准的迹象——哪怕是在说话的语气上——对任何细节都是如此，不管它多么琐碎，不管它显然是多么不相干。因为那些人会不择手段地利用被告和证人的特殊关系，一口咬定是个人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声称在涉及到家庭成员时，一个年轻小伙子作伪证是自然而然的……毕竟，那是他母亲。——

我母亲——艾拉——带着新的专心倾听了一切，不过她没有看我。我感到奇怪的是她不愿看我。看起来她好像想否认我们之间的这种新的亲密联系。于是，我相信我开始猜想了（但我或许一直就明白？）——当然是在我内心深处，没有谁会了解——我猜想艾拉知道包藏在她为我做窗帘时剩下的布料里的那些丑陋而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她知道，但她不想让我知道——我，这个对她的那么多别人甚至他——我的父亲——都不了解的事情了如指掌的人。男人们谈了很多很多，那些律师还在彼此身上试验我的每一个回答，然后我父亲、艾拉和我站起身来准备告辞，那个资深律师告诉艾拉说她和我第二天最好再来找他接受短训。艾拉制造了一种使人肃静的气氛；告别时的急促不清的话停止了。当时的情景好像是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不经意闯进了一间奇怪的屋子，而屋子的主人是她，她站在那里。——我不让威尔出庭作证。——

真荒谬。其中一个律师那么吃惊地大笑起来，律师们，我父亲，他们都不拿她当真。自然，那个可怜的女人被弄糊涂了，他们会向她解释，她会明白过来的，他们会使她信服的。对那男孩没有任何危害。没有任何危害。毕竟，她是一个女人，她

又在为她的儿子着想了——

妈妈的男孩！我心中燃起一团愤怒之火，针对我自己，针对她。现在他们抬高了声音，在互相交谈，在谈论我。随时都会有人记起来并扭过头来问我你长大了以后想当个什么呢？

由我开车。她坐在我旁边，他坐在她背后。随着我的心绪的猛烈起伏，我把车开得很快，他们俩都没叫我小心点。就这么一次我感到我掌握着他们的命运。他把身子倾向前面，以免被排除在她和我可能说的什么事情之外。但他即使没那么热切也错过不了任何东西。我们没有说话。我可能对她说的话不会当着他的面说。利用眼睛的余光我看见他捏了捏她的一边肩膀并把那只手在上面放了一会儿。可怜的艾拉可怜的艾拉。他是否在对小妻子说没关系，她有一个强壮而聪明的作为人民领袖的丈夫，终于出来说服她放弃那些愚蠢的想法了呢？

她要求我在药店门口停一停。她呆在药店里的时候，他在坐立不安地叹息。——事情会过去的。她心烦意乱了。这事儿是有点超出她的承受力，与她的天性不合，威尔。——

她从药店里走出来并且朝我们微笑，同时在阳光下皱着眉头，看那模样好像在期待我们给她拍张照片似的。他又受到鼓励，开始旧话重提。——这是件事关真相的事，艾拉。它甚至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不仅仅只是你牵涉在其中。威尔不得不说出真相。这也是向那混蛋制度本身挑战的一次机会。——

我本来已发动引擎，但我让车子播动一下停了下来。——我们还是把这一切留到家里再说吧。——

他没有理睬我的话，他仍然是我父亲。——相信我，艾拉，决不会有那种只凭他是一个证人就对他提出起诉的事。根本不存在同谋关系的问题。没有任何人会逮捕威尔！不会因为这点；不会认为他是我的儿子或你的儿子。任何辩护律师团都有义务

传讯他们所需的任何一人。你肯定明白这一点，对吗？但我不是律师，假如我是律师，我随时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打赢官司……他是你的儿子。他也是我的儿子，难道我愿把他推入火坑吗？相信我。难道我会对你撒谎吗？——

不过我们没有向他挑战。想像一下！在他有脸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俩谁都没有哄然大笑起来。我们俩谁都没有下断言，是的，是的，是的。是否那一切已被遗忘，已被冲洗得一干二净，是否我们这三个他的沉船事故的幸存者将在他的指挥之下建造一个新的栖身之所以实现他的某种想返回家中的梦想？

我偏过头去从侧面看她。她舔了舔一只手的食指，然后开始揉她的另一只手的手背上的一个疤痕。她发现我在看着她，就把那只手放下并把头扭开了。在她发现她摆脱了我的目光之后，她对我父亲和我开了腔。——够了。够了。——

我不知道他从这句话里听懂了什么，但我明白她在说什么。我父亲是著名的索尼，贝比是革命流亡者，艾拉是革命组织的同伙——他们是我们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没有必要把我也贡献出去了，谁需要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呢？英雄人物是他们。

什么都没法改变她的主意。辩护律师团寄希望于那个饱经风霜的政治活动家，他也是她最亲密的人——她的丈夫——他一定是使她恢复理性变得明智的最佳人选。通过他们夫妇俩这么多年共同生活的影响改变她的主意；尽管律师们没有说：通过爱。

够了，她说。够了。即使不以任何方式把那男孩卷进去，一切对她也够受的了，那让她可怕地感到厌恶。吓倒了她。她不怕在卢萨卡为无情的、可耻的贝比充当通信员，她有足够的勇气完成别的只有上帝知道的事情，但是她害怕这件事情。他

们的男孩，但被心照不宣地接受的事实是，威尔是她的儿子，而且尽管索尼像李尔王失去他的女儿那样失去了他的贝比——与其让你这么使我伤心，不如当初不让你降生——艾拉在涉及到那个男孩的事情上仍然拥有一种温柔而心照不宣的优先权。

通过爱。索尼有条件说服她恢复理性——没有谁比他更得力——他拥有曾经是她的良师益友的小学教师的纯朴和他作为解放运动的老战士的智慧。爱。有时候他认为说服她的办法是把一切告诉她，向她坦白汉娜的事，坦白他在那座别墅贴近地面度过的一个个夜晚，还有在橘花丛中幽会的一个个周末，甚至他看见她，艾拉，他的妻子，和汉娜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时感到的那种变态的快感(纯真的艾拉怎么可能理解那一点；假如她能理解那是多么可怕。)但是这样做也就意味着告诉艾拉，他是怎样使威尔成为知情不报者的，整个事情在他公然带着他的金发情妇去电影院而被还是小学生的威尔撞见时是怎样开始的。艾拉怎么可能为这点原谅他！坦白了这些之后爱还能说服她什么！

但或许艾拉能告诉他为什么这一切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他身上。假如他坦白了一切，暴露了一切，为自己不作任何保留，永远抛弃掉属于(需要汉娜的)他的一切。噢，汉娜。噢小学教师。他受到了他在“忧伤之子”城外的小屋读过的剧本末尾的台词的嘲弄，他当时读不懂它。噢汉娜。

捶这扇门吧，它放进了你的愚蠢。

她不应该以为她能够永远依靠那个男孩，那孩子过去常常用她那长长的黑辫子的末梢轻拂自己的双唇使自己入睡。那条辫子早已被剪掉。她剪短了头发。我是一个男人了。现在我也

像我父亲所做的那样常常把自己插入女人体内了。

我把她叫出屋子，离开他，她和我一起去散步。我需要新鲜空气。可去散步的地方不多；往前走三个街区就到了打折售酒店、熟食店和那个葡萄牙人自称为超级市场的百货店，朝另一个方向走三个街区你就到了荷兰新教教堂，我们的白人邻居们每逢星期天都在其中祈祷他们的上帝，这个上帝不允许我们这类人进入他的殿堂。我们从这些邻居们的房屋旁经过，想当年我父亲带领我们挑战性地移居到这个破旧但对我们这些刚离开草原上的蜗居的人来说却显得那么堂皇的街区，从那时至今邻居们已几经改变。更多的黑人像我们一样移居进来了，由于这一点有些白人搬走了，取代他们的是一些无钱在别处居住的更穷的白人。我们的大多数同胞都像我们一样——他们修葺了他们住的屋子——给屋子涂了颜色，在门廊里铺了瓷砖，把大门装饰得充满奇情异想。白人们则把一些旧汽车的残骸搁置在一块块料想是用来作花园的土地上，他们还在窗玻璃被打烂的窗户上安上了纸板。

那些过去经常向我们(我母亲是一名真正的贵妇)打招呼的邻居在我们走过时好像根本没有看见我们；他们眼睛看着别处。也许他们是些不同的邻居，我从来都不太注意，所有邻居对我来说都一样。或者是他们看到了报纸上的那些标题和艾拉的照片，艾拉，就是住在他们之中的那个艾拉，看起来多像个贵妇，你曾向她打招呼，好像她是白人似的。

艾拉走在我的旁边。——妈。你不能替我做决定。——

——这整个都是我的事。律师们无权想怎么为我辩护就怎么辩护。我有权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是这样。——

——那不是我的意思。你必须听听我的意思，你以为你明白事情应该怎样才有利于我，但你没有意识到……——

——我明白，我意识到了。我不想让你卷入这件事。我不想让你的生活取决于我的生活，没想清楚的是你，威尔。——

我被一个石头绊了一下脚，她等着我答话。我终于大声地说道：——艾拉。——

她的黑眼睛明亮起来并且变窄了，她吃惊地抿起了嘴，嘴部肌肉有点扭曲。但是接着她溺爱地——只是——把一只手在我的前臂上放了一会儿。

——为什么我不得不再次说这些？为什么我必须做那个被指望的人，那个被抛在后面的人，被排除在外的人？为什么你、他、贝比和所有的人都假定那一斗争没有我的份？为什么大家都想当然地认定我该留下来过那种你们都已拒绝的虚假的正常生活，说什么我一、两年之内会在某个大企业或多国公司（假如这里还有这类东西的话）体面地安顿下来，会获得贷款修建一幢和白人们的一样好的房屋，会开上一辆公司的小车，会和某个符合白人们的年会晚宴标准的完全拿得出手的女孩结婚并生下一群孩子，还能把他们送入某个吸收我们的这种孩子的私立学校，因此也就认定我在由大公司和金钱构成的白人世界的边缘会生活幸福——凭什么这么认定？为什么决定下来那就是我的生活？谁决定的？我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选中我？是不是我有块胎记或别的什么决定了我就该是那个样？——

她的双肩因悲痛而耸了起来，但我还没有停下来。忍这么久了，我没法停下来。——那就像是一重诅咒，而我得把它当作我的命运接受下来。现在，你，你，在我能够像你们其他的人一样行动的时候，在我能够在法庭面对他们并告诉他们他们在说谎的时候——那些恶棍，他们是说谎者，是我打开门让他们进屋的，是我打开门让每一种灾难进了我们家，我总是在家里，随叫随到，让威尔去做好了，威尔，多好的名字，他会去

做的——现在，在我能够行动的时候，你却说，“够了！”。够了！为改变我们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与我无关。家里需要我。我在家里。这就够了！这一切我受够了！——

她退缩着，好像我在打她似的，我是在打击她，我只是喘不过气来时才停止。

——我不能那样做。你必须用别的方式了却你的心愿。不是通过我。我离不开你，威尔。——

——我有什么东西这么特殊呢？这么说我是你押在某件事上的赌注，我将成为你和他的确都不想放弃的什么东西？即使是为了革命都不愿舍弃？你内心某处为我在董事会预先定好的座位，你真的不想毁掉它，对吗？我是你的人质，是你对美好事物所抱的中产阶级的怀旧心理的象征吗？你只想用你的印花窗帘在那座原本是为白人修建的屋子里把卧室打扮得漂漂亮亮，你并不真的想看到它们被用于更好的目的。——

我们在可怕的沉默中继续走了一会儿。我的心因我的残忍导致的兴奋而在砰砰直跳。

——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不会像那样。——

我哼了一声表示反驳。

她再怎么说也无济于事，尽管她并没有说那么多。她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我为自己说出事情的真相。我们一声不吭地沿着我们住的那条街走着。还隔着一段距离我们就看见有个什么东西挂在我们的门上，在黑暗中那看起来像是一件黑色的运动衫，或许它是被人在街上捡到的，正挂在那儿等着失主去认领哩。走近后发现那是一只死猫，有一块纸板系在它那被勒紧的脖子上，纸板上用红字写着：共产主义黑母狗滚出这里。艾拉在绝望地摸索着解勒在猫脖子上的绳子。我说，它死了，妈，解也没用，它死了，别管它。我们进屋去吧。待会儿我来处理它。

不知怎的我们伸出手臂抱住了对方，我们靠在一起，平静地走上水泥小路并且把前门关在了身后。能让正在监视我们的屋子的人一饱眼福的就这些。

艾拉的固执是从哪儿来的呢？不，执迷不悟，这样说或许更确切。这两者都不是她的性格所固有的；从前不是。

索尼不得不向自己定义他所谓“从前”意指什么。是的，对他来说她的生活年表有一段空白；他对她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他相信自己对这些变化是负有责任的。他早已注意到她剪短了头发。他当时认为那不过是出自女人的奇想。当时在他眼里那没有什么意味。

他努力保持平静并用理性控制自己；他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批评，像一个明智的人、一个在斗争中解放了自己的心灵的人应该做的那样。必须找到对策。他知道他难以把艾拉当作一个同志来接受。他不得不有意识地摒弃自己关于艾拉的过时的观念。有意识地；这就是问题所在。

假如一个人一生的性格是在他出生后的头三年形成的（如耶稣会教育学家们所说，他很久以前就读过），那么，或许一个人对他的爱人的看法也是在他们一起天真地度过的开头几年定型的。理性告诉他，假如他想做到不仅能把艾拉当作妻子，而且能像其他人那样把她当作同志加以接受，那么他们俩就得一起恢复和深化过去那种“索尼和汉娜”的生活。那将是他们俩的共同生活，尽管她将被打入监狱，他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也会再次入狱。他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得达到某些要求。艾拉必须再次成为他妻子，他过去做到过这点。他还明白原谅自己和被艾拉原谅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负罪感是一种自我放任的徒劳无

益的情感。

索尼原谅了自己，但这没有用。艾拉从未责备过他，因此没有什么可求她原谅的。再说艾拉的举止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除了她自己还有任何人负有责任。即使是他对她的伤害都无碍于她，他看出了这点。或许他自以为艾拉需要苦苦等待他改变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或许这一切与那件事无关，只与他有关。或许她已通过政治斗争改造了自身，就像他一样。他永远无法问她，他的情妇的问题现在已成了毫不相干的话题。

律师们心照不宣地明白寄希望于索尼去影响艾拉是徒劳的了。磋商——他也参与其中——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辩护律师们提出了延长押候期以准备新证据的要求并且得到了认可。私下里来找索尼的是那个资深律师，就像医生向患者的亲戚而不是患者本人通报最后诊断结果那样，资深律师告诉索尼说他准备从艾拉一案中退出了。索尼恳求他重新考虑，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艾拉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并清了清嗓子，她没有任何希望老律师改变主意的表示。尽管在最后一次磋商时老律师已愤怒地对她失去了耐心，她还是“为他所做的一切”谢谢了他而且——出现在艾拉身上真奇怪！——在他和她握手的时候，她突然吻了一下他的一边脸颊。

星期二，六月十四日。

就是在这一天下午，我回到家时发现我父亲是独自一人。他正站在电话机旁，好像他刚用过电话或是在等着电话铃响似的。五点了，到他们每天去警察局做第二次汇报的时候了，这是左右我们这种生活的例行手续之一。我对此已训练有素，因此就连我都为他们会迟到而着急了。——你们还没有去？——

——没有。——他站在那里。

——她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呢？——

——我没有见她。——

——她是不是进城了呢？——所谓“城”指的是律师事务所。

——我打了电话。她不在那里。——

——噢，我想她随时会回来的。——

是他的双手使我惊恐起来。——车子在车库里。——

我注意到了他的双手，他的两个大拇指在搓其他手指的内侧，两只手在不自禁地颤抖，像神经系统的功能每况愈下的老人表现的那样。

——那么，她一定是和某个人一起出走了。你不在这里吗？——

——我搭本恩的车出去了——有一个会，因此我把车留给了她。本恩在一个小时前把我送了回来。——

——一定有个留言条。我去厨房里找找。——

——我已找到了。——

我们在等着她回家。冬天的寒气从地板上侵袭上来，被街灯刺破的呆滞、黑暗的窗玻璃越变越黑，显示出了时间的流逝，他和我都是偷偷看表，不想让对方发现。只要已过去的时间没有用钟表计量，我们就能够相信她不久便会回来。——你是不是该打个电话给警察局，编造一个借口，说她病了或是别的什么？——

他看着我，好像我刚说的话使他觉察到了他正在逃避的东西似的。他深深地憋了一口气。——这是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做。假如她没去汇报，他们会取消保释的，不对吗？我们可以从杰苏德那里弄一个证明，她病

了，——

——一个借口……是一个信号。它会使他们警惕起来。——

——警惕什么？——

父亲最清楚。很晚了，在夜里很晚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很晚了，而她还没有回家，他不知怎的知道她不会回来了——他认为他有什么权力对我隐瞒情况呢？

我真想朝他大喊，让他的手静止下来。

——你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在哪里？告诉我。——

——我不知道，威尔，我说的是真话，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噢对的。你知道得越少，就越好；那是我们互相保护的方法，我应该知道这一点，假如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就会知道这点。他是在对我说真话。

我们上床睡了，他和我。他让他们的卧室门敞开着，我也让我的敞开着，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们分开躺在黑暗中，在想象艾拉可能在哪些地方，正穿过黑夜走在哪里的路上——我们俩都在想象，我能肯定。后来我睡着了，一直睡到了黎明，因为我年青。但我料想他根本没有睡。

一个年青女孩清早来到我家。她双唇和指甲都涂成了紫红色，穿着一双白色塑料靴子，看模样是一个去上班的机灵的服装厂女工。邻居中的任何在监视这座屋子的告密者都会以为她是这家的那个儿子的女朋友之一，她看起来真像他们相信我们这类人的儿子会迷恋的那种女孩。她的指甲长长的，当她在包里摸索那个字条时她的手镯叮当作响，她找到字条并交给了他。在那些紧张的片刻，我的情感中突兀地生发出另一种东西，那就是为我们的人民感到骄傲，他们穿着朴素，谁也猜不着他们竟是在为解放斗争服务。白人们看着我们的时候不知道他们面

对的是什么人；不论是看着她，还是看着那些在城里的人行道上编织衣服卖的来自农村的老妇，不论是看着驾小面包车从街上经过的黑人司机，还是看着穿全国矿工协会的T恤衫的矿工，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人的真正身份；不论是看着我的姐姐贝比，还是看着我的母亲艾拉，他们都莫名其妙。我想告诉他们。

那个字条是由我父亲的一个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写的。它要求他到某座房子去一趟。我留在家里以便警察来找她时有人在家。当然，我是那个为他们开门的人。但她不在家。又一次，我母亲离开了家而且永远不回来了。现在艾拉走了，她不会回来了，直到将来某一天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有了新鲜空气，她再不用受白人为我们制定的法律的审判，再不用住在草原外的黑人区或是作为非法居民住在这样一条白人的街上，这里的白人邻居——那些把手臂交叉在乳房上，带着淫荡的期望抿着嘴唇的女人，那些耷拉着手臂并皱着眉头的男人——也再没有机会看警车停在这座屋子的门口，警察带着枪和警犬站在门廊上的情景了。

领导层认为最好是不让索尼参与让艾拉舍掉保释金并离开这个国家的决定。一旦她的失踪被发现，他有可能再一次被捕，被抓去盘问有关她的情况。但怎么说他们也无法证明他促成了他妻子的出逃。

就是说不需要他，哪怕是为了出逃。

他告诉他的儿子说，是领导层决定让她走的，因为她的案子非常严重，在出示证据为她辩护的过程中有可能泄露解放运动的重要情报。这个案子牵涉到一些为解放运动服务的渗透者，弄不好他们为保全自己不得不充当政府的证人。艾拉相当出色地完成了她的各项使命，但现在她的身份暴露了。从今以后，她的名字将在国内和国外的解放运动中被人们称颂——在国外

她仍然可以积极地投入解放运动。杰苏德大夫把他失去的那笔保释金视为对解放斗争的贡献，当索尼和他的儿子威尔去向艾拉的这位老雇主致谢的时候，杰苏德大夫一边继续写关于某个病人的病情的报告一边和他们说话。——对我们来说艾拉比一万元钱宝贵得多。上帝保佑她。——

一段时间后传来了艾拉的消息。消息是由第三者或第四者送来的，也许是某个通信员送来的，她从前就扮演过这种角色，这种人往往以清白无辜的身份往返于国与国之间。索尼向当局申请护照，以便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去探望艾拉，去探望贝比和他的孙子。但是他的申请被否决了，这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结果，尽管他的一个同志说——真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没有机会拿到护照。——

在他顺应了得不到护照的失望很久以后，他仍然没有忘记那位同志的话。这句话反映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那就是，管理警察局的档案的那些人发现，对他们来说他已不再是代表解放运动的危险的特别人物了。决定谁是人民的领袖的人是敌人——警察和司法部长等，使你成为“索尼”的，是你所受到的监视、追捕和侵扰。在这个国家的所谓“紧急状况”下，他曾在其中那么成功地演说的公开集会现在已被取缔，由于害怕受迫害或关闭，报纸和杂志现在也只报导那些最杰出的领袖们说的话了，由于这些领袖在国外名气太大了，因此在他们公然违抗法律时政府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于是索尼成了幕后的无名英雄，他的用处是起草以年高德劭的领袖们的名义发表的声明，或者是为解放运动的新秀们润色文字以便使他们更有份量。再一次，像从前有一次做过的那样，在悠久的友谊也就是在秘密生活中结成的特殊的亲密关系使之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令人尴尬地对别的同志直言发问：我再也不值得信任了吗？同

志们对此报以诸如此类的否定和抗议——他在想些什么呢？什么东西钻进了他的脑袋呢？

但愿他们不在想——没有想过什么东西钻进了他的脑袋，钻进了他的生活，使他偏离了目标，那在他们非有他不行的年月里唯一重要的目标——钻进他的脑袋的是对一个女人的痴迷。一个革命者的生活中没有地方容纳第二种痴迷。但是他从未因为她而忽略过那一事业！事实上她和那一事业融合为一了，是她把他的男子气，把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性雄风与那一事业联成了一个整体！是她把心脏的有力跳动赋予了他的政治斗争。他自己（在内心）为自己对她的否定感到万分悲痛；为这种对他自己的不公正感到痛心。

然后，再一次——由于没有“索尼和艾拉”一体的温情，他感到沮丧，但他的情感猛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发现自己在想——不切实际地乱想——假如法律当年仍然禁止他和汉娜接触，假如白人们为了维护其“纯洁性”而恶心地制定出来的那一法西斯法律当年仍然有效，那么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拿自己去冒险。为汉娜。不会去冒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需要汉娜，为那个白种女人冒险去坐牢，也就意味着拿他自己唯一的自由去冒险，他这类人的唯一的自由，也就是一次接一次地去坐牢的自由——随时准备坐牢，只要有必要，为了斗争。只为了斗争。其他的任何事都一钱不值，毫无意义。那一肮脏的法律本来是可以挽救他的。

摆脱欲望的危险枪弹。

接着他害怕起他自己来，他竟然做了如此反常的猜想。假如这种荒唐的想法在他脸上流露出一丁点，假如某个人稍稍觉察到他内心掠过了这么一种可耻的想法，不管此人是一个正在笑着嘲弄他的审问者，还是他的一个同志，他都会惊得目瞪口

呆。

他满了五十二岁。那一天什么纪念活动也没有。他儿子没有记住他的生日，但几天后邮寄来一个生日卡。生日卡上贴着一张一个在笑的小男孩的照片，他戴着一顶有米老鼠似的两只耳朵的帽子。上面有爱的祝辞(生日卡的套话)、手写的表示亲吻的一个个X 和签名——艾拉、贝比和那个他从来未见过的丈夫的签名。

潮水冲洗掉海岸线，它一点一滴地流入时间之海。他们也流走了，一个接一个，情人们，孩子们纠缠的手臂，少了这些生活就难以想象的过去时光的记忆，都远去了。五十二岁了。五十岁以前他显然没有受年龄的影响，一直是那么富于活力和男子气,可现在衰老开始了……他的牙床已开始萎缩(牙医坚持说这是一个历时很长的过程)，他的前列腺已开始胀大了(杰苏德说他可能不得不动手术)。离大地很近，欣然迎接战斗，就像他从前所感觉的那样；年龄摆在那里，正在他体内起作用。

曾经是他的政治理想的东西现在以他在这种非他所求的现状下的日常生活而告终结了。和儿子住在一幢已失去生气的屋子里——两个沉默无声的男人，无法维持那种生气——他被免除了各种责任、各种劳心费神的事，被抛在了一边，在坐等事业的召唤。他自由了，不再为任何雄心困扰，甚至摆脱了成为芸芸大众的“索尼”的诱惑，这种诱惑在某个时期或许玷污了当年小学教师培养起来的那种纯洁的信仰。现在他仍在继续为事业工作，所有的白天和一半的夜晚，无论何时需要他。他像其他很多他这类人一样生活着，和他一样，他们的家庭也已四分五裂，取而代之的是流亡国外、化名、地下活动，对他们这类家庭的人来说真正的家庭和依恋是某种为后来人的东西。

再也没有信从联合国最高难民委员会寄来了。偶尔会有电

话打来，传来的是艾拉的声音，在他听起来好像声音很近；其实很遥远，是在她没有说名字的外国。几分钟以后他往往把话筒递给她在等着与之说话的那个人；尽管他站在一旁，耳朵边没有话筒，他仍然能听见艾拉的声音因激动而提高了，因为她发现自己正在和她的儿子说话。

在一切都被忘记之后，他梦见了她：汉娜。一个短暂而明媚的梦，像雕刻一样精确。她从他睡眠的深深黑暗中走出，像猫一样在摇动她的每一只脚，过去她历来都是这样——走出浴缸，一边摇脚一边抖身上的水珠。

梦使他惊醒过来。他再也睡不着了。他闭起的眼帘后面掠过一道道电光，一串又一串的男人骑马奔驰而过，他们脸上扎着布块，手里举着带有纳粹党徽“卍”的旗帜，那被歪曲的形状再一次为同样的目标在扭动着。白人极端分子正在那一标志之下重新聚结；移居进白人区的黑人们正在它的阴影之下遭受威胁和肆意破坏。还有恐惧，恐惧。

一个电动蟋蟀在静寂中鸣唱：他能听见威尔的电动打字机在吱吱作响，正在打印东西。至少那男孩看起来好像已变得够勤奋的了，尽管商业管理并不是经济学中他自己最愿为他儿子选择的专业。自从用自己找活儿干积攒的钱买下那台电脑打字机以来，那男孩也一夜接一夜地忙到深夜，不知在忙什么课题。起床去找那男孩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对他说，我睡不着，和我说说话吧。但夜间他们之间的沉默，不同于白天的沉默；威尔仍然在那儿，他们仍然在一起。

尽管索尼为了去探望他妻子和女儿申请护照被拒绝了，却有不少其他的人正在为公开的政治目的出入国境。其中有实业家、牧师、大学师生、自由主义者和律师，他们毕竟属于法律认可的专业团体和社会团体，即使他们有时也犹犹豫豫地滥用一下官方对他们的这种信任。他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也不想企望）和国内的解放运动有过任何联系。作为统治阶层，他们本能地希望能够找出被不同的皮肤和不同的修辞掩盖的同样也属于他们这类人的某种东西，但他们忽略了在国内找到它的种种机会，而是寄希望于去国外会晤流亡在外的解放运动领袖。因为他们所恐惧的那一未来看起来存在，已经存在，在这个国家之外。或许，在那一未来在国内实现之前，通过抢先行动可以先赢得某些期待中的未来的报酬。

有些人从国外回来后欣然有喜色。那些流亡领导们穿的是普通西装，而不是卡斯特罗[1]式工作服，他们可以就葡萄酒闲聊上半天。这类人肯定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吗？现在，就连苏联人，这些年来一直在武装他们的苏联人，都已变得随和而愿到比勒陀利亚赴宴了——到最后，肯定没有任何交易会那么难做，那么不可靠，没有任何交易会被催泪瓦斯弄得那么模糊，被枪弹撕得那么难以愈合，没有任何交易会被地雷和汽油弹的爆炸、终身监禁的准备工作、一夜接一夜的审问以及把成千上万的人

① 卡斯特罗（费德尔，1927— ），古巴共产党领袖。

赶出家门的卡车的轰鸣弄得那么糟糕——竟然不能在餐桌上交涉成功。

而与此同时，在国内却是用另一种已试验过的方式行事，让警察和军队去与罢课者和示威者交涉，去与那些雄辩的闹事者（有黑人也有白人）交涉。假如警察和军队做不到这一点，还可用另一种方法进行交涉：永远不去查明是谁杀害了那些闹事者，是谁戴着面具行凶，是谁在开动的汽车里开枪。

在白人间的友好互访代表团——其中有些可能暗中受到政府的指派——飞来飞去的同时，索尼的几个同事也正在领取限定目的地和时间的旅游证件。比勒陀利亚的某个实用主义者一定盘算过这样做能够赢得美国国会的欢心，降低其要对南非进行强制性制裁的热烈呼声。对任何一个不在内政部的人来说，关于这个人可以获准有条件出国而那个人不可以出国的那些决定都是毫无逻辑可言的。有那么一两个人遭拘留刚被释放，竟然立即获准飞往卢萨卡和伦敦，而别的一些人如索尼等的申请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否决了。他已不抱希望了，无论如何目前是如此了。再说，他被指派负责处理黑人教育的危机问题，太忙了，无法脱身。越来越多的恼人事情使他不得不去操心，有些事情甚至是发生在他本人住的地区。不是这家黑人的浴室的窗子被砖块砸烂了；就是那户黑人家的大门被泼上了污七八糟的颜料。这种涂抹都会留下痕迹。离索尼家只有一条街的地方，有一对黑人夫妻刚刚搬来，正当他们在布置家具的时候，一群白种男人和女人闯进了屋子并命令他们夫妇俩离开。其中一个对那位丈夫大声吼叫道：——这里是白人的郊区，我们有足够的人把你们赶出去。即使这里被划成了自由居住区，我们这里也不吃法律那一套，我在警告你。——那位妻子说她要报警了；那伙人大笑起来，然后才慢悠悠地走了。也难怪他们发笑，警

察告诉这对夫妻说他们住在那幢屋子里是非法的，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提出申诉。

在处理这类事情的过程中，有一位领导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他将奉命作为小组成员之一赴卢萨卡参加一个协商会议。旅行证件已替所有的六个同志办好了。尽管什么也没说，但他明白一定是流亡国外的领导者们点名要他参加的，这是对他的一种承认，它高于任何人的怀疑，包括自我怀疑。

抛开危机去国外探亲与奉命作为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出访是有区别的。作为被排除在外和被抛在后面的人，在艾拉和贝比之前出国或只以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出国探亲，与作为正式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奉命出访并在昆达总统的总统别墅同解放运动的最高层领导幸会是有区别的。在小橱子里寻找小提箱的时候，他碰巧发现了那个旧的万用旅行包，艾拉过去总是把它准备得好好的，以防他万一被捕。没有任何旧东西适合这次旅行。他于是去了东方市场，也就是她曾买下那片窗帘布的地方，在一个同时也是同志的店主的推荐下，他给自己买了一个带拉链的旅行包，这个包有背带、众多口袋和一把号码锁。

他出访回来的那一天，威尔去机场接他了。威尔！威尔在国际迎宾厅的人群边上等他。那些人纷纷涌向前，不是在亲吻祖父和情人，就是在为婴儿们惊叫，同时阻塞住在手推车后面怯生生地向前挪动的其他旅客的路。他发现他自己也露出了所有旅客回家时的那一种自豪而愚蠢的幸福的微笑；一定是有人通知了威尔他父亲将在这一天的这个时间回来。威尔来了！

他们站在对方的面前，好像即将彼此拥抱似的。索尼在咕哝咕哝说些什么，他那只空着的手已在胸前的口袋里摸索那些照片了。当然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不能谈与流亡国外的领导

人会晤的情况，他不得不把话题局限在那一边的家庭事务上。——他们的状况好极了——将来你会亲眼看到的——你的侄儿连话都还不会说，却在唱歌了！贝比真想见到你，我带来了一封她写给你的很长的信——

威尔把旅行包背在肩上，在前面向停车场走去。——艾拉怎么样？——

索尼好像被他的插话伤害了似的。——待会儿我会告诉你的。她在瑞典。她刚好是我到达的前一天走的。只迟了一天……——他在乘客座上坐下并关上了车门。——现在我们回家吧，孩子！——

他儿子把钥匙插入汽车发动装置，然后他扭过头，他们俩不可避免地对视着。——他们是昨天干的。烧毁了。——

我星期六在一家电影院干活，我的差事是在门口验票，那天我在日场电影完毕后早早地就往那座屋子赶。那条街在星期六总是比在其他日子热闹，每个人都为度周末停止了工作，孩子们也不用上学。住在那里的白人和我们这类人——每个人都在修整花园或擦洗汽车，孩子们则在用他们的滑板或自行车表演杂技，白人们的客人在门廊里喝啤酒，我们这类人的亲戚朋友则是在屋内接受款待。

去我和他睡觉的那幢屋子的人不多。贝比和她的朋友们从不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格格笑或喝啤酒。蟑螂们占据了存有精美食品的厨房。玫瑰树尽管无人浇水却也活了下来。大部分时间那个地方都是关起来的。但是这一天，栅栏和门廊之间的小小空间挤满了人，周围的人也越聚越多，男人们有的骑着摩托离开，有的开着小车奔来，女人们也加入在他们的行列中，男孩们则踏着滑板奔向那一热闹的地方，所有这些人塞满了整个街

道。我只能看见那些系在棍子上或用手举着的标语牌的背面，它们在人们的头上方歪过来斜过去。有一个人在用阿非利堪斯语大声说话，但他没有带扩音器，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听见那一大群人发出的无休止的呼应声，那是一种由奇怪的快感导致的可怕欢呼，我以前从未听到过人类有这种声音，撕破这种欢呼声的是在大人们的腿之间嬉闹的小孩的阵阵尖叫。全是白人。我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白种邻居是否也在其中，他们脸上的表情扭曲了他们所有人的脸。我迷惑地注意到有几个黑人也在场，在人群边缘，发生了一场扭打，有个黑人遭到了拳头的猛击。街道上还有一些黑人，我从他们眼前经过，他们静静地站在他们自家门廊的屋檐下。我继续往前走并进了人群，一边扭动双肩往前挤，一边叫别人让让路，说——我能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对不起，对不起，让我过去。——我有点儿像白痴，但仍然是那个有教养的年轻小伙子，这是我母亲教给我们的。那些标语牌摇晃着向我倾斜，我看见了上面的字句。我们的家是白的　回到你们的地方去　共产主义者＋黑人＝我们的文明的末日　滚出去　别污了这白色。有块牌上画着一幅拙劣的漫画，可以看出画的是他，粗大的黑眉毛下的双眼，螺旋状的鼻孔。画像上还用粗粗的红笔狠狠地打了一个叉。我拚命挤到了大门前并且举起了双手，手掌朝外，绷得硬硬的手指张开着，把双手戳向那些像在向我扔石头和砖块似地朝我叫喊的脸，把他们推出这个寄身之所。这个他说过他替我们提供的过体面日子的地方。先前在大声说话的那个男人走开了，他上下蹦跳着，绿色的短袜耷拉在跑鞋上，他的粗壮结实的红色小腿和从无袖T恤衫裸露出的膨胀的红肩膀上都文有紫色图案，那张巨大肿胀的红脸布满了金色头发和汗水。——愤怒的眼泪，我不知道。你在这干嘛？你在这干嘛？他们朝我咆哮，好像是

在齐声唱圣歌似的。

我在那儿干嘛！

是的，我在那儿干嘛！

但我尖着嗓子回答说：这是我父亲的房子。他们还来不及决定怎么处置我，我已冲进他们之中，挣扎着想杀出包围圈。一些警察终于赶来了（一辆警车停在那儿，车上有一条天线在摇晃）。我被从人群中拉了出来，警察中的一个救了我，从前这类人来搜查屋子，来逮捕他和带走我母亲时，我曾多次为他们开过门。他们驱散了那群人，但没有逮捕其中任何一个或没收那些标语牌；那是星期六之夜，在我睡在我新近交的女朋友床上的时候，那群人中的某一个又返回了那座屋子并用汽油弹把它烧成了一片灰烬。

我真高兴看见它毁了。

烟的气味。

当他和我去看那座房子的时候，它已变成一堆熏黑的残砖和断木，仍然有余烟未尽。几个敢于走出屋来观望的我们的同胞睁着眼睛远远地站在我们后面，好像是在葬礼上表示敬意似的。一个小孩在那只塘鹅上平衡着身体——这只由从前拥有这座屋子的白人遗留下来的塘鹅已被打烂了。消防队走后一些黑人警察奉命在守护现场，等着政府方面来做点调查真相的姿态。这些警察试图阻止我们进入那破败的墙壁之间的废墟，在他告诉他们房子是他的时，他们对自己的职责有点拿不准了。

我跟随他走过破碎的玻璃碴和湿漉漉的断木，跨过被扭曲和熔化的金属，和他一起猫着身子走到只有一根残存的柱子支撑的铅皮屋顶下，那屋顶断成了锯齿状，悬在那里一副摇摇

欲坠的模样。你的房间，他说。虽然面对的是一片废墟，他仍然为我、为我的生活声明什么东西曾经属于我，同时叫我不要忘记。但在这么一片废墟中已无所谓所有权了，就连哪怕一件仍然可用的东西都没有留下。过去的厨房、客厅、卧室都已被掀翻，被一古脑推入了一次最后的洗劫，火与水的洗劫，我们在那座房子里的生活最后一次被一双敌意的手强拉硬推进了灾难之中。他走过去用脚拨弄熔化的橡胶，用手指拉开那又脏又湿的残留物，好像其中埋着有待救命的人似的。他因愤怒而在急促、响亮地喘气或者几乎要流泪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残忍，残忍，他们真残忍，他不断地对我重复着这些话，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没法分担他的情感。我们从废墟中走了出来，我们那些有胆量走出屋来的同胞仍然在那里，睁大着眼睛。

他们的眼睛全盯着他。他们的恐惧攫住了他们。我看出了是怎么回事——他们希望他从那废墟里捡出些什么东西来。给他们的东西。他垂着两只黑黑的手站在他们面前，两手空空，他困倦地用手揩了一下前额，他没有注意到额头上留下了一小块黑斑。他还露齿微笑了一下。他笑时整个脸部肌肉都收缩起来，一副极度痛苦的怪相，其中有痛苦和不屈、威胁和反抗，它们蕴藏在皮肤的每一条皱纹里、脸部的每一根线条里，人类的脸部只有在某种难以想象的内在要求的驱动下才能够显露出这样的皱纹和线条。这很奇怪，但他表现出了这些复杂的情感。

当然，接着，从前的那些话语又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我们不会被烧死，他说，我们是那种鸟，你知道，它叫作凤凰，它总是从灰烬中再生。监狱关不住我们。汽油弹消灭不了我们。这条街——这整个国家是我们的生活领地。火阻止不了我。它也阻止不了你。

一团团像纸一样的灰烬在我们周围飘飞——床单、衣

服——还是他的书？

烟的气味，那是她的气味。

毁灭的气味，被毁灭的一切的气味，他第一次带进那座房子的就是它。

这是一个老故事——我们的。我父亲的和我的。爱，爱和恨是其中最常见和最普通的体验。但没有两种事物是一样的，它们两者都是生活的指纹。这就是使文学诞生并使之与宇宙本身在生物学意义上联为一体的奇迹。

在我们的故事里，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我补充了我当时并不在场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有时候——我可以看出——我在用事情发生的当时我可能没有能力或没有意识到去使用的措词说了某些东西，全凭事后的认识。有时候我听见我的声音径直向前，我的判断、我的观点长驱直入，占据了本该属于别人的位置。下一次我将不得不注意这一点。有时候记忆打开地板之门，让我落回过去的经历之中，好像我刚好又回到了过去时光，正在再一次过当年的生活，因此我用现在时态，用当年我不得不用来表达自己的那些词汇来叙述它。就这样我学到了他没有教给我的东西，即语法是一种征服时间的系统；写下“he was”、“he is”和“he will be”① 也就是把握过去、现在和将来。完整的时间，不再消逝。

全部的时间，全部的时间。

我在那幕已结束的戏中演那个角色。

从他们的欺骗，从我因不在场而感到的失意，从我因对他

① 这三者分别是英文“他是……”的过去一般时态、现在一般时态和将来一般时态，意思分别为“他(过去)是……”、“他(现在)是……”和“他(将来)是……”(他将成为……)。

们太了解而感到的痛苦，我想象出在我看不到的情况下别人在做些什么，在说和感觉什么。关于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女人的所有细节吗？——噢，那些都是我从我认识的女人们那里得来的。“现在的索尼不是以前的那个他了”；有一个人这样对我说过，他的同志们认为那是因为艾拉走了。但是我正年青，现在轮到我了，轮到我去和女人们周旋了。我玩政治的时间也快到了。过去我被排除在外，这种事情我哪怕只沾上一丁点都不中他们的意，不过将来某一天我会成为那个做记录的人，会记录下他、我母亲或艾拉、贝比和其他人所做的事情，记录下被争取自由的斗争决定了的生活是怎么回事，争取自由的斗争决定它，就像反抗干渴的斗争决定沙漠居民的生活，反抗严寒的斗争决定冰天雪地居民的生活一样。那才是斗争的真正面目，不同于讲台上那种像电视中响亮而无多大意义的歌词一样被重复过无数次的标语口号。

他又一次被捕了。这些天，我都在天亮之前醒来，我意识到他在那里，被关在那里。好像他就在那座被烧毁的房子的隔壁房间呼吸似的。我把这首诗送给他，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把它给他。不是莎士比亚的诗；唉，无论如何……

凌晨4点
一只鸟在用清晨磨砺它的嗓音
监狱的毯子上的金雀花脏脏地抵着双唇
鸟儿在那外面
很久以前我们把它捡起来
把它的骨骼用线扎起来使它再变成一只鸟
鸟啊
来吧，我将用双手把你捧起

抚摸你光滑的羽毛
张开我手指的栏杆让你
飞去！
穿过那些铁栏杆的空间
飞吧！
来吧，情人，同志，朋友，鸟
来吧
我用我的面包皮诱惑你，看——
鸽子
橄榄小枝衔在喙子上
迅猛地穿过铁栏杆，在石头墙上
撞断了脖子

他——我父亲的所做所为使我成了一名作家。我是否必须为此感谢他呢？为什么我就不能成为别的什么家呢？

我是一个作家，而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一本我永远不能出版的书。

·附 录·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

瑞典学院已经决定将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纳丁·戈迪默。她是南非人，她的母亲是英国人，她的父亲是立陶宛人。她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种族隔离的种种后果构成了这些作品的重要主题。她生于1923年。

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长篇小说《尊贵的客人》(1970)是她前期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作品结构严谨，简洁含蓄，文体高雅。她极其热切地成功表达了在一个国家诞生时各种事件的纷繁复杂。回国来的前殖民地官员被卷进冲突当中，忠诚感又使他无所适从。事件的进展通过平行发展的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得到反映。他那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则对个人在追求未来的伟大游戏中的

作用提出了反思。

70年代中期以来，戈迪默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长篇小说技巧。这个创作阶段产生了三部杰作：《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博格的女儿》(1979)和《七月的人民》(1981)。每部作品均以其独到的方式刻画了在黑人意识日益增长、精神与物质环境均为复杂的非洲中，令人可信的个人立场。戈迪默还以最大的限度提出了白人——即便是仁慈的白人——的特权是否正当的问题。

在这几部强有力的长篇小说中，《七月的人民》尤其值得一提。索维托事件为小说的故事提供了背景。白人家庭斯梅尔斯遇到了武装暴动，他们在男佣七月的帮助下逃到了七月的村子里，他们不得不在腾空了的原始小棚屋中勉强生存。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仆关系由于这一家人越来越依靠七月而颠倒。小说题目的模糊性则迅速地鲜明起来：七月的人民就是他服侍的那家白人，但也是他的部落的成员。对于环境所造成的文化与物质上的粗俗化，描写得很出色。夫妻之间的交流枯竭了。他试图不用古老的措辞表述新的境遇，“但是词儿就是出不来”。提到妻子时用的是代词：“她。不是‘莫琳’。不是‘他的妻子’”。那些在语言和社交方面均感觉最易适应的人是孩子们。作者在作品中用孩子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成人间的关系是自有原因的。

戈迪默的最新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于1990年出版。它的主题是在一个难以容忍的社会中的爱情，以及存在于通往变化的道路上的复杂情况与种种障碍。情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极为微妙的描述。与此同时，顽固的政治现实则不断地进行干扰。双重的叙述视角使人物描写丰富而多面化，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成分就是妻子在最后所表现的英雄主义。这部小说颇具独创性

与启示性，同时又因其富有诗意而迷人。

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不应使我们忘记那些短篇作品。它们简洁紧凑，极为生动，显示了处于创作能力高峰的戈迪默。《短篇小说选》(1975)提供了一个概况。在短篇集《士兵的拥抱》(1980)中，正如同名短篇所示，基本主题成功地得到再现。戈迪默独特的女性经历、她的同情心和出色的文体同样使她的短篇小说具有特色。

申慧辉 译

受 奖 演 说

写 作 与 存 在

〔南非〕 **纳丁·戈迪默**

太初有言。

言与神同在，意谓神言，亦即那创世的言语①。可是经过人类文化若干世纪的演进，“言语”染上了其他含义，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拥有言语已逐渐同义于极权、声誉、令人敬畏而有时危险的信念、在电视上露面讲话享有黄金时刻、既具有侃侃而谈的天赋也不乏喋喋饶舌的才能等等。言语飞越太空，从卫星上反射回来，如今比以往更接近那被认为是其来所自的天国。对于我和我的同行来说，它最重要的形变却发生在很久以前，在它初次被刻划到一块石板上或描摹到莎草纸上之

① The word 原为希腊文，既有“言”、“语”等意，亦有“言语所表达之意义及道理”之意。官话本《新约·约翰福音》译作“道”。此处为照顾前后文理一贯，故译作“言”。又《旧约·创世纪》描述神造万物仅凭言语而已。

时，在它从声音具形为可视物，从被聆听物化为被阅读的一系列符号，然后成为手稿之时；在它穿越时间从羊皮纸旅行到古登堡①之时。这乃是作家的创世纪，是将她或他写入存在的故事。

奇怪的是，这是一个双重过程，同时造就着作家及其要成为人类文化媒介中一变体的目的。它既是一个个体存在发生与发展的发育过程，也是依照那个体的性质分别对就其发育过程所作探索的适应过程。因为我们作家就是为此任务而被逐渐造就的。犹如波尔吉斯的短篇小说《上帝的手迹》②中与美洲虎关在一起的囚徒——他借着一天仅一度照入的光线，试图从那生灵毛皮上的斑纹解读存在的意义，我们穷毕生精力企图通过言语释译我们在各种社会、我们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世界中所汲取的书本知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此无法解决、不可言说的参与关系之中，写作永远且同时是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对个体和集体存在的探索。存在于此。

人类，作为唯一具有自省能力的动物，且因此令人烦恼的较高级能力而受到祝福或诅咒，总是想要知道为什么。这并不仅仅是有关我们究竟为什么在这里的本体论大问题，对此各种宗教和哲学都曾在不同时代对不同人们试图作出确定的回答；现今科学则试探性地尝试各种令人目眩的片断解释，而我们也许像恐龙一样，即将在我们存在若干千年之后灭绝，根本来不及发展起必要的理解力以整体地理解它们。自从人们变得自觉，他们也寻求对诸如生殖、死亡、季节循环、大地、海洋、风与星星、太阳与月亮、丰收与灾害等普遍现象的解释。作家的祖

① 约翰内斯·古登堡(1400—1467)，德国活版印刷发明者。

② 《上帝的手迹》载约尔格·路易斯·波尔吉斯《迷宫及其它》，译者不详，唐纳德·H·叶茨与詹姆斯·E·克尔比合编，企鹅现代经典丛书，71页。——原注

先、口头故事讲述者们以神话开始摸索和整理这些神秘事物，利用日常生活因素——可观察的现实——和想象力——投射入隐蔽事物的能力——编造着故事。

罗兰·巴尔特①问："神话的特点是什么？"又答曰："把一个意义转化成形式。"神话是以此方式斡旋于已知和未知之间的故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②巧妙地把神话非神话化为一种介乎童话和侦探故事之间的体裁。存在于此，我们并不知"是谁干的"。但是，即便找不出答案，某种令人满意的东西还是能够发明出来的。神话就是神秘事物加幻想产物——诸神、人格化的兽类和鸟类、妖怪、幻形生物等——它们为神秘事物安置某种出于想象的解释。人类和他们的伙伴生灵是故事的实体，但是，如尼科斯·卡赞查基斯③曾经所写道的，"艺术不是肉体的再现而是创造肉体之动力的表现。"

现在有许多被证明了的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从某些答案中又有新的有关存在的问题生出。因此，神话体裁从未完全被抛弃过，尽管我们倾向于把它看作古董。如果说它在某些社会中早已降格成儿童睡前故事，那么在世界上那些受森林和沙漠保护，与国际大文化隔离的部分地区，它仍然活着，继续提供着作为个体与存在之间一种斡旋体系的艺术。它还从太空飞旋返回——一个化身为蝙蝠侠④及其同伙的伊卡路斯⑤，绝不堕入失败之汪洋去对付生活的万有引力。然而，这些新神话与其说

① 罗兰·巴尔特《神话学》，安乃特·拉佛斯英译，希尔与王出版公司，131页。——原注

②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天猫座历史》："我把它们置于童话与侦探小说之间的中途。"普隆出版公司，13页。——原注

③ 尼科斯·卡赞查基斯《给希腊的报告》，费伯出版公司，150页。——原注

④ 美国40年代起流行的连环画(后拍成电视和电影)中的主角。

⑤ 希腊神话人物，与父亲借蜡翼飞出克里特迷宫，因接近太阳，蜡翼熔化坠海而死。

与求启发和提供某种答案，不如说是为了消遣，给不再想面对哪怕是偶遇的对于其生存之恐怖的答案的人们提供一条幻想的逃避之路。（也许正是对于人类现已拥有摧毁他们整个星球的手段的肯定认识，对于他们自己已以此方式变成了诸神，可怕地承担着他们自身延续存在的责任的恐惧，使得漫画书和电影神话成了逃避现实之作。）存在的动力仍在。它们是不同于当代通俗神话制造者的作家在今天仍然关涉的东西，一如古代形式的神话所曾尝试关涉的。

作家们如何对待这种关涉并继续对之进行实验曾经是现在仍是，也许比从前更其是，文学研究者们的课题。与可感知现实及此范围之外的——不可感知现实——之本质有关的作家是所有这类研究的基础，无论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概念标签，也无论作家们被归藏于什么样的分类缩微档案中以供文学编史年鉴之用。现实是由许多因素和存在物构成的，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表现出来的和为稍事喘息而留在内心来表现出来的。可是从被目为已过时的精神分析学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有文学研究都瞄准同一目标：强制一种一致性（若非隐藏于谜语之中的原理，什么又是一致性呢？）；借助方法论把作家对存在动力的把握确定下来。但生命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存在不断地被环境和不同意识层次拖到这边，拉到那边，抟成这样，揉成那样。绝没有纯粹的存在状态，因此也绝没有完全体现那不可预测性的纯粹文本，“真正的”文本。它肯定不能被任何批评方法论触及，无论其尝试多么有趣。解构一个文本多少是一种矛盾，既然解构它即用其残片制造另一结构，一如罗兰·巴尔特① 在其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

① 罗兰·巴尔特《S／Z》，理查德·米勒英译，乔纳森·凯普公司。——原注

辛纳》所作语言学和语义学解析中那么迷人的而且并不讳言的作为。所以文学研究者毕竟也是某种故事讲述者。

也许除了通过艺术之外就没有其他达致对存在有所理解的途径了？作家们自己并不分析他们所做的；分析将意味着足履绳索横越峡谷时朝下看。如是说并非有意把写作过程神秘化，而是要把作家为跨越不可预测性之峡谷而必须具备的高度精神集中形象化，并使之成为言语自己的，犹如探险者树立旗帜。叶芝的那位飞行员孤独飞行之中内心“寂寞的愉快冲动”①和他的诞生于群众起义的“可怕的美”②，二者既反对又联合；E.M.福斯特的“仅有的联结”；乔伊斯的精选、诡谲的“沉默、狡猾和流亡”；更近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③，在其中控制他人的权力体现为西蒙·玻利瓦尔其人，被导向那唯一无可争议的强权——死亡——的奴役——这些都是作家通过言语接近存在状态的变化无穷的方式的例子。凡有价值的作家都只希望发挥袖珍手电筒般的光亮——而罕有通过天才点起一把骤然的火炬，照入血腥但美丽的人类有关存在的经验之迷宫者。

安东尼·伯吉斯④曾经给文学下了一个概括定义为“对言语的美学探索”。我宁愿说写作仅仅从那里开始，因为探索远不止此，虽说只有美学手段能够表达这种探索。

在被赋予了言语之后，作家如何成其为作家？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起步是否有什么特别趣味。无疑它与其他人的起步阶段

① W.B.叶芝《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自己的死亡》，傅浩中译，见王佐良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567页。

② W.B.叶芝《1916年复活节》，查良铮中译，见同上书，563—566页。

③ 加·加西亚·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王永年中译，见《世界文学》199年2期。

④ 安东尼·伯吉斯，伦敦《观察家》周报，1981年4月19日。——原注

有许多共同之处，由于这一年一度有一位作家站在前面的聚会的结果，在此之前已被太经常地描述过了。至于我自己，我曾说过我所写或所说的任何事实都不会比我的虚构小说真实。生活、见解，都不是作品，因为只有在远远站立与涉足其中之间的张力中，想象力才改造二者。我来对自己作些简要的说明吧。我是一个我所认为的所谓天然作家。我不曾做任何决定要当一名作家。起初，我不曾指望以供人阅读来谋生。我孩提时写作是出于通过我的感官理解生活的快乐——观看、嗅闻、触摸事物；稍后则出于令我困惑或内心中狂躁的情感，它们在文字中变得具体有形，找到某种启示、安慰和欣喜。有一篇卡夫卡①式的小寓言是这样写的："我有三只狗：'咬住他'、'抓住他'和'永不再有'。'咬住他'和'抓住他'是普通的无尾小黑狗，它们独自呆着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它们。可是还有'永不再有'。'永不再有'是一匹杂种丹麦大狗，有着一副千百年极精心的育种都绝对生产不出的相貌。'永不再有'是个吉卜赛人。"在我生长于斯的南非金矿区那座小镇上，我就是那杂种狗"永不再有"（尽管我绝少可能被描写成丹麦大狗……），在它身上找不到公认的小镇人特征。我就是那吉卜赛人，用二手的词语敲敲打打，通过学习所阅读的东西修补着自己写作的成果。因为我的学校就是当地图书馆。普鲁斯特、契诃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仅举几位于我成为作家有功者——则是我的老师。在我生命的那一段时期，是的，我曾是那种认为书本是用另一些书本制造出来的理论的证明……但是我没有如此停留很久，我也不相信任何潜在的作家会如此。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也开始了最初的通过性冲动求异的行

① 弗朗兹·卡夫卡《第三本八开笔记》，载《乡下的婚礼筹备》，定形版，塞克与瓦尔堡公司——原注。

为。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从那时起，表现在游戏中的想象力便迷失于对欲望和爱情之白日梦的专注之中，而对于那些将要成为某一种艺术家的孩子来说，这继出生危机之后的第一次人生危机还另有一些附加的作用：想象力通过对新的骚动的情感进行主观的折射而获得扩展。作家开始能够进入他人的生活。既远远站立又涉足其中的过程来临了。

不知不觉地，我曾一直专注于存在题材：是否，如在我最初的短篇小说里，在以致命一击结果一只被猫抓伤的鸽子的必要性之中有一个孩子对死亡和凶杀的沉思，或是否有惊愕和早期对种族主义的意识来自我上学的路上，当时路边的那些店主——他们自己是矿区小镇金格鲁殖民社会白人等级中处于最低阶层的东欧移民——粗暴地辱骂着那些被殖民社会定为最低等级的、根本不被当人看的那些店铺的顾客——黑人矿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假如我是那类人——黑人——中的一个孩子，我可能根本成不了一个作家，既然使这对于我成为可能的图书馆不对任何黑人儿童开放。因为我正式的学校教育充其量只是粗线条的。

向他人讲话开始了一位作家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发表：发表给任何愿意阅读我所写东西的人看。这曾是我对发表的意义自然、天真的想法，而它一直不曾改变，今天我仍这么看，尽管我意识到大多数人不愿相信一个作家心目中竟会没有一个特定的读者群；而且我还意识到：那些诱使作家留意谁会见怪，谁会赞成纸上言语的有意无意的诱惑——一种像欧律狄刻①的

① 希腊神话中吟唱诗人俄耳甫斯之妻。欧律狄刻死后，俄耳甫斯追到阴间。冥后为其琴声所感动，答应他把欧律狄刻带回人间，但途中不得回顾。将近地面时他忍不住回头看妻子是否跟在后面，结果欧律狄刻不得不重返阴间，俄耳甫斯亦被宙斯用雷击死。

顾盼一般，会引导作家回到一个被毁天才的阴影之中的诱惑。

可供替换的选择不是象牙塔的诅咒，另一个创造力的毁灭者。波尔吉斯曾经说他为朋友和消遣而写作。我认为这是对那个愚蠢的问题——常常是一种指控——“你为谁写作？”①——的一个恼怒无礼的反应，正如萨特的忠告——有些时候作家应当停止写作，而仅以另一种方式作用于存在——所得到的反应，当作家正受挫于对人世间不公的哀叹与对他所知最拿手的即是写作的认识之间的无法解决的冲突之时。波尔吉斯和萨特二人从完全不同的否认文学具有社会目的的极端出发，当然都充分意识到了它在探索存在状态过程中扮有隐含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性角色，并从此派生出所有其他角色，在朋友中间的个人角色、在抗议示威中的公共角色等等。波尔吉斯并不是为他的朋友们写作，因为他发表作品，而我们都曾领受他的作品的恩惠。萨特则没有停止写作，虽然他1968年曾站在街垒之前。

然而我们为谁写作这一问题还是困扰着作家，仿佛一只铁皮罐拴在每一篇已发表的作品的尾巴上。主要是它刺耳地发出作为赞扬或污蔑的倾向性论断。在这种环境中，加缪②对此问题处理得最好。他说较之有倾向的文学他更喜欢有立场的个人。“要么为他整个人服务，要么根本不为他服务，如果人需要面包和公道，如果为这种需要服务而必须做必要的事情的话，他也需要纯粹的美，那是他心灵的面包。”所以加缪呼唤“生活中的勇气和工作中的才能”。而马尔克斯③重新定义倾向性④

① 见让-·保尔·萨特《为何写作》，中译者不详，载《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出版社，1983年。

② 阿尔贝·加缪《记事本1942—5》。——原注

③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次访谈中；我的笔记没有标明刊名日期。——原注

④ 原文为德文。——译者注

小说如是："一个作家能够为一场革命服务的最佳方式即尽量写得好些。"

我相信这两段声明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所有写作者的信条。它们不解决当代作家曾经面临并将继续面临的冲突。但它们坦率地表述了一种如此做的真正可能性，它们把作家的面孔断然扭向她和他的存在、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和作为象任何他人一样，在一个社会环境中，起着作用的有责任心的人，存在的理由。

存在于此：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是文学的具有特定含义的存在位置。切斯瓦夫·米沃什① 曾经写下棒喝："不为国家或人民服务的诗歌算什么呢？"布莱希特② 则描写过一个时代，当时"谈论树木几乎是一种罪行。"历经如此时代，在如此地方生活和写作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有过如此绝望的想法；萨特的解决办法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毫无意义，在那里，作家过去曾经——现在仍然——被审查和禁止写作，在那里，根本谈不上放弃言语，为了把片纸只字从监狱中走私出来，过去曾经现在仍然要冒生命危险。我们探索其个体发育过程的存在状态一直大量包含此类经验。我们的探求，用尼科斯·卡赞查基斯③ 的话来说，不得不"作出与我们时代可怕的节奏合拍的决定。"

我们有些人曾看到我们的书在我们自己国家里被禁，闲置多年不被人阅读，而我们仍继续写作。许多作家曾被捕入狱。仅仅看看非洲——索因卡、讷古基·瓦·雄果、杰克·玛潘杰在他们国家里，而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南非，杰里米·克洛宁、

① 切斯瓦夫·米沃什《献辞》，载《诗选》，埃柯出版社。——原注

②贝尔托特·布莱希特《致后人》，载《诗选》，H.R.黑斯英译，格罗夫出版社，173页。——原注

③ 尼科斯·卡赞查基斯《给希腊的报告》，费伯与费伯公司。——原注

蒙加纳·瓦里·塞若特、布雷腾·布雷腾巴赫、丹尼斯·布而图斯、杰基·塞若克：这些人都曾因在生活中所显示的勇气而入狱，现仍继续作为诗人享有谈论树木的权利。许多巨匠，从托马斯·曼到契努阿·阿切比，被不同国家中的政治冲突和压迫所驱逐，曾忍受了流亡的创痛，从中有些人便永远没有恢复过来，遂不复为作家；有些人则根本就没有幸存下来。我想到那些南非人；坎·瑟姆巴、阿莱克斯·拉·古玛、奈特·纳卡萨·托德·玛希基查等。还有些作家，从约瑟夫·罗斯到米兰·昆德拉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得不首先用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一种外语——发表新作品。

接着在1988年，我们时代的可怕节奏在一阵前所未有的狂乱中加快了，作家则被召唤向那狂乱提交言语。在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漫长的近现代进程中，作家们一直在为除政治之外的原因遭受辱骂、查禁甚至流放。福楼拜因猥亵而被拖入法庭，由于《包法利夫人》；斯特林堡因渎神而被传讯，由于《结婚》；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遭禁——有过许多所谓冒犯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习俗的事例，正如有过反叛政治独裁的事例。可是，在一个对表现自由提出如此指控对于法国、瑞典和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将是闻所未闻的时期，有一种势力崛起了，它从远较社会习俗广泛得多且远较任何单一政治体制的权力强大得多的某种东西获取了它那惊人的权威。一个世界性宗教的敕令把一位作家判处了死刑。

三千多年，现在，无论躲在哪儿，无论去哪儿，萨尔曼·拉什迪都生存于伊斯兰宗教法官① 对他的宣判之下。任何地方都没有他的避难所。每天清晨这位作家坐下来写作时，他不知

① 原文为阿拉伯文。

是否会活过这一天；他不知是否纸页将被写满。萨尔曼·拉什迪碰巧是一位优秀作家，那部他因之被枷锁示众的小说，《撒旦诗篇》，是一次富有创意的对我们时代最强烈的存在经验之一——在一个后殖民时期世界中被扯到一起的两种文化之间变迁的个体人格——的探索。一切都被通过想象力的折射重新检验了：性爱与孝道的意义、社会认可仪式的意义、被对立于不同生活处境中，宗教的和世俗的，不同信仰体系的环境从其主观中消除的一个正在成形的对于个人的宗教性信仰的意义等等。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的神话学。可是，虽说他为欧洲的后殖民时代意识做了冈特·格拉斯曾以《铁皮鼓》和《非人的岁月》为后纳粹时代意识所做的事情，或许甚至还曾试图接近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为我们存在之苦恼所做的，但他的成就水平应无关紧要。即使他是个平庸的作家，他的境遇也是每一位同行作家极度关心的对象，因为，除了他个人的悲惨命运之外，那还能带来什么隐含意义，什么新的对言语运载者的威胁呢？这应当是个人所关心之事，尤其应当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所关心之事。随着独裁政权在表面上的挫败，这道以一个伟大而受人尊敬的宗教的名义召唤国际恐怖主义力量的新的凶杀指令应当且只能由民主国家政府和联合国当作一种对人道的侵犯来处理。

从这可怖的单数威胁再回到那些对于正处在其最后的、总结性十年的本世纪的作家们来说一直具有普遍性的威胁上来吧。在任何地方的高压制度下——无论是苏联、拉丁美洲、非洲还是别国的模式——大多数遭监禁作家都因他们作为公民为争取摆脱所属一般社会的压迫而进行的活动而被禁止发言。另一些人则因以尽量写好的方式为社会服务而被高压制度定罪；因为一旦艺术家以对显现在她或他周围生活中的存在状态的反叛

性诚实深入地探索我们时代的可耻秘密，我们的这种审美冒险就变得具有颠覆性了；那么，作家的主题和人物就不可避免地被那个社会的压力和扭曲所塑造，一如渔夫的生活是由大海的力量所决定。

有一个两难的矛盾。在保持这种诚实的过程中，作家有时必须既冒被国家指控为反叛，又冒被解放势力抱怨为缺乏责任感之险。作为人类一分子，没有哪个作家会堕落到相信摩尼教的"平衡"谎言。当魔鬼被置于天平一端时，他的鞋子里总是夹带着铅块。然而，为了要粗略地释述马尔克斯既作为作家又作为争取正义的战士提出的格言，作家必须获取一切如实地既探查敌人又探查亲爱的武装同志的权利，既然只有寻求真理的尝试才会使存在有意义，只有寻求真理的尝试才会恰好赶在叶芝的怪兽①懒懒走向伯利恒投生之前接近正义。在文学中，从生活中，

> "我们一页页翻过彼此的面容
> 我们阅读每一瞥凝视的眼神
> ……得以这样做已耗费了几世几生。"

这些是南非诗人和我们国家的正义与和平战士蒙加纳·塞若特的诗句。

作家仅仅是在如此范围内对人类有所服务，即作家甚至违背他或她自己的忠诚运用着言语，确信存在状态——如其所被揭示的——会在其复合体中某处抓住真理之索的些许游丝且能够在艺术之中，此处和彼此，统合在一起；确信存在状态会在某

① 叶芝认为人类文明二千年一循环，在每一新纪元开始之前，旧文明必经一场大破坏。"怪兽"即救主重临之前先行的破坏之神的象征。见叶芝《二次圣临》，傅浩中译，载《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568—569页。

② 蒙加纳尔·瓦里·塞若特《一个粗鲁的故事》，克利普镇书局。

处产生一些真理的断章残句；真理是言语的终极言语，永远不会被我们拼读或抄写的磕绊努力所改变，永远不会被谎言，被语义学的诡辩，被用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偏见、霸权、对破坏的赞美、诅咒和颂歌等目的的言语玷污所改变。

傅浩 译

戈迪默访谈录之一：

来自动荡国土的声音

（1986）

〔美国〕 彼得·马钦
朱迪丝·基琴
斯坦·S·拉宾

以下对话根据1986年1月24日对戈迪默小姐的一次录音采访整理而成，当时她正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洛克波特学院访问，接受布洛克波特国际作家论坛奖。与戈迪默小姐座谈的是小说家彼得·马钦、诗人朱迪丝·基琴和诗人斯坦·山沃尔·拉宾，后者是布洛克波特作家论坛节目主持人。

马钦 我知道你是位非常忙碌的女性。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其他事情上——比如政治活动、教学和讲演等等。那么作为一位作家，你是怎样做到如此多产的呢？

戈迪默 我并不认为我很多产。我觉得自己写得很慢，不过把我的作品与年龄对比一下，似乎又已经写了很多。我脑袋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计划；一部书该写多久就写多久。其他

一些事情纯属政治责任：作家要表达声音，作家要被人知晓，生活在我那样的国家，你不能不说话。

马钦 那么你早上写作吗？是否有每天早上写作的习惯？

戈迪默 是的，我总是早上写作，但是现在回信的负担愈来愈重，总有那么多信要复，那些信只能由我来复，别人无法代替。作家要写许多私人信件。年轻作家向你讨教，你不能不理不睬。有人想出版南非作家作品选，找谁索要联系地址呢？还不是找我。所有这些都挺费时间。

马钦 你是九岁开始写作的吧？能跟我们说说吗？

戈迪默 记得那时在学校，可以挑选写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决定写诗。那是一首很糟糕的诗，我从来就未能写出好诗来。那就是我所写的第一篇东西。后来我一度自编过整张报纸，摹仿我居住的那座小城的那份周报——我们都把它称之为“破烂玩艺儿”。我编出婚礼、集会和市政大楼的开幕式等消息，还绘制专栏题图和插画。我就是这样起步的，但是后来并没有成为记者。

马钦 你对细节具有独到的眼光，对人们的穿戴、住所、食物和生活习性都观察入微。你是否时时都保持这种洞察力呢？

戈迪默 是的。小时候我最喜欢做而且被大人们鼓励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摹仿他人，逗人发笑，我总是摹仿得很像。我可以像鹦鹉那样摹仿口音和讲话方式，有时候妈妈的朋友来玩，我就摹仿别人的声音给他们听。现在想起来那种事情并不好笑，可是那时候我喜欢出出风头。好在那种卖弄欲——我还是舞蹈家，正正经经地跳过几场舞——现在已荡然无存。不管怎么说，所有的作家在其早年都会专注于写作。

马钦 你曾说你14岁时就读过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①。那本书对你的写作是否有什么影响?

戈迪默 当然有影响。那是第一本我读过之后让我思索生活环境和这座小城的生活方式的书。我住在这座淘金小城,周围是众多巨大的金矿。距我家一英里远的地方,就有一片我们称之为"场子"的地方,或者又叫"营地",那里住着从南非各地前来的黑人矿工,没有妻室,也没有儿女。事情并没有多大改观:他们是季节工,如今依然如此。我开始想到,他们不仅仅是在那儿干活的说话难懂的"矿孩",而且是工人,是过着常人生活的人。我想这是读到围场境况②时产生的感觉,我开始明白人为什么被一群一群地加以奴役。

马钦 你是否在家里或学校里就已经开始提问棘手的问题?

戈迪默 当然不是在学校里。我就读的是一所修女学校,好像并没有产生过那些疑问。那里没有黑人孩子,也没有谁想到去问问为什么没有。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很难想到这些,父母就是榜样——这一点我们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就能看到。我就读的是一所全白人学校,对一个被隔离的孩子来说,图书馆就是一切——黑人不许进那座图书馆。看电影是一大乐趣,我省下口袋里的钱,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去看,但是电影院也不让黑人进。我只是简单地想:"事情就是这样,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正常。"

马钦 是不是猛然顿悟呢?

---

① 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美国小说家。《屠场》是他的成名作,描写芝加哥联合屠宰场的工人生活,出版后引起全国轰动,被视为"揭露黑幕"代表作品。

② 围场:指牲畜被屠宰或装运之前关闭的场所。辛克莱在《屠场》中对围场的恶劣环境有详尽的描写。

戈迪默 我不认为如此。事后你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妈妈对黑人的生活感到内疚，看见他们遭受虐待——这种事情时时都能见到——她就会说："唉，他们毕竟也是人啊。"于是乎她开始把黑人当人看，并且做了不少善事——她属于一个小型妇女团体，她们在城市近郊的黑人聚居区开办了一所孤儿院和一家诊所——但也仅此而已。她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制度应当为她所怜悯的那些人的生活处境承担责任。

基琴 在上星期的《纽约时报》上，有人提到你在听说起一个舞会时曾经这样评论道："假如我只有25岁，我也许不会去关心什么公平不公平；我会回家去写一篇关于舞会的短篇小说。"你是否认为那种时代已经完结——即艺术的路途是漫长的，但你和你的国家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

戈迪默 是的，我想我在说那句话时有点儿歉意。我已经经历了许多岁月，遭遇了许多事情，观念当然会有所改变。我并不喜欢用那些沉重的政治词汇，但又想不出别的词来。举个例子吧。18岁那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名叫《要做的善事》，描写一个孩子捡到一只鸽子，那鸽子显然是被哪个家伙用弹弓打中了。它受伤坠地，痛苦不堪，已经没法子如孩子希望的那样，放进鸽子笼里饲养起来恢复元气。那孩子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看着它受苦，要么把它杀死。小姑娘脱下鞋，朝鸽子的脑袋重重一击。不久前我出于某种特殊原因重读那篇故事，意识到我当时是在思考对生与死所负的责任，意识到我们可以杀死别人，夺走他人的性命。那是我头一次面对这个道德问题。

马钦 你说你自己学着写短篇小说。那么谁是你的老师呢？你是否回到了十九世纪的英语中？

戈迪默 我什么杂书都读。买过《飘》[①]和《匹普斯日记》[②]。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我读过契诃夫、莫泊桑和尤多拉·韦尔蒂[③]，还可以算上海明威吧。如果没有他们，和其他的一些人，我就找不到表达自己心声的方式。

基琴 我们是否可以来谈谈你新近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似乎涉及到一些基本主题。其中之一是毁灭——不仅仅是白人毁灭黑人，而且还有白人毁灭白人，甚至黑人毁灭黑人。

戈迪默 最近一些年来，气氛变得十分异常。你真不知道自己是在跟谁说话。你跟朋友们在一起，可是后来却发现其中的一些人其实并非朋友。我有两个年轻朋友，他和她都是律师，两人都极其卖力地投身于解放运动。可是那小伙子却被证明是受雇的奸细，成了许多桩重大叛国案的当局证人。

马钦 我感到惊奇的是你只是在读校样时才发现毁灭这个主题。

戈迪默 出版一部小说集时，里面的作品通常是在好几年中写成的——一般是五年左右——因此并没有通读过。等到合在一起，就会注意到其中某个特殊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好像引起了各种人的注意。在我们那种社会里，发生在我身上和我的小说中的一种现象，就是情感的扭曲。就像婴儿的脑袋卡在了产道里一样，生活在南非，你的个性和感觉时时都受到压抑。

---

① 《飘》：美国女作家玛·米切尔(1900—1949)的作品，背景为美国南北战争。

② 《匹普斯日记》：英国作家萨缪尔·匹普斯(1633—1703)的日记体小说。

③ 韦尔蒂(1909—)，美国女作家，擅写短篇小说。

拉宾 你既写长篇也写短篇。你觉得这两种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有何不同？它们容纳的真实性有何不同？

戈迪默 我并不认为它们容纳的真实性有何不同。不过我现在很少写短篇。我得有点悲哀地承认，我现在不大看重短篇小说。让我感兴趣的主题越来越复杂，也许是因为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吧。

拉宾 那就是说你无法在短篇小说里处理好如此复杂的主题，因为情节发展和可以支配的人物角色都有限？

戈迪默 不，不，这是主题层次的事。甚至在我的短篇里，我都不满足于只有一个层次。这就好像是剥洋葱皮，你一层一层往里面深入，有时候似乎感到小说未能提供足够的空间。

基琴 你的近作《七月的人民》是一部富于理想色彩的小说。你是否认为真会发生那样的事，或者只是开未来的玩笑？

戈迪默 我是开现在的玩笑，看看我们正在南非干些什么事，完全有可能出现那种结果。小说写出来后的这些年，许多像科幻小说一样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预言家，而是因为事情就是如此。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导致发生那样的事。

基琴 你觉得自己是位女性作家呢还是位碰巧是女性的作家？

戈迪默 我得说老实话。我一点也没去想自己是女性作家。有某种男性的写作，有某种女性的写作，还有一种写作则让作家成为真正的作家——可以深入所有性别与年龄的奇异的造物。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必须让他或者她自己拥有的自由。

马钦 你对自然具有十分强烈的感觉，好像赤脚走在大地上一样。你是否一直都是这样的呢？

戈迪默 是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南非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可是我不巧住在这个国家少数几块不美丽的地方之一——一座不美丽的小矿城。实际上，那是一个由几座金矿拼凑起来的小城镇。但是我一直对甲虫和花朵深怀感情。后来我长大成人，周游全国，大大增加了对大自然的见识。在早期的作品中，它确实是诱发我写作的动因。不幸的是，一个人长大后，那些因素就消失了，因为鲜花与露珠不再让你感到新奇。一旦见识太多，就不再产生刺激。

拉宾 你删改多吗？

戈迪默 不多。写长篇小说时，通常我就一直写下去，虽然有时候也回头写一章，但并不重新开头。等到写完，就要做通读的大量工作。

拉宾 写作时你是否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

戈迪默 不常读。我也从不拿给任何人看。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拿给别人看，感觉就会消失。

马钦 不给任何人看？家人也不给吗？

戈迪默 是的，从来给过。每当在报章上读到十九世纪的作家，比如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如何诱使家人和朋友一连聆听数小时，我就感到很惊奇。当然，他们确实有点东西读给家人听。

马钦 那你听不听批评意见呢？家人的友人的或者评论家们的？

戈迪默 我的家庭非常直言不讳，我可以听到他们的真话，特别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当然，还有我先生。至于朋友，我认为从来不会告诉你真相，因为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就不会说不喜欢最近出版的哪本书。他们总是朝你微笑，吻你的双颊，当然我也一样。评论家？这个

世界上大概只有那么一两位评论家，如果写文章评论我的书，我会有兴趣去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批评得十分严厉，我就会被击中要害，因为我会认为他们知道我想做什么但是未能做成。至于一般的评论，都是赞美你并未写好的那些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想写什么。

马钦 如果你的直言不讳的丈夫和孩子不喜欢，那该怎么办？

戈迪默 那可太惨啦，因为那时书已经问世。在此之前他们没有读过。

拉宾 尽管你经常被郑重其事地归入英语小说的主流，但是我注意到在你最近的作品中，意识流手法，或者内心独白，有增加的趋势。

戈迪默 我认为我们所有今日写作的人都深受乔伊斯的影响，深受普鲁斯特的影响。没有普鲁斯特、乔伊斯，还有托马斯·曼，我们会在何方？

马钦 你的力量显然表现在写作上，而非新闻报道或政治演讲。你是否相信你的小说会导致变革？

戈迪默 我不认为小说能够导致变革。我不认为作家有那么重要，至少在我的国家不是如此。黑人作家被看作敌人，大多数白人作家也被如此看待，因为我们都反对那个政权。你找不到哪个作家公开地或暗底下拥护种族隔离制度。书籍使南非人，黑人和白人，从内心认识自己，得到一面比较自己感情和动机的镜子。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小说唤起了他们的良知。而对于黑人，则让他们在痛苦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尊严和骄傲。

[illegible]予 译

戈迪默访谈录之二·

我关心的是人的解放

（1987）

〔美国〕玛格丽特·沃尔特斯

本文为美国伊利诺州诺思布鲁克市当代艺术学院教授玛格丽特·沃尔特斯与纳丁·戈迪默的座谈纪要，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沃尔特斯 纳丁·戈迪默，非常欢迎你前来当代艺术学院。我不多做介绍了，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你的作品都很熟悉。在我初次读到《说谎的日子》时，我对戈迪默一无所知。那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还很年轻，只把它当作一部描写青春期，描写一个少女成长过程的作品；时值今日我依然认为那是我所读过的同类作品当中最好的一部。后来我又读了她的短篇小说，还有《陌生人的世界》和《爱的原因》，意识到她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南非作家。接着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是1966年问世的《资产阶级世界末日》，这本书我下面还要提到，在我看来它似乎是戈迪默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她在英美两国的名气越来越大。1974年出版的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获布克奖。然后是1979年，出版了我最喜欢的《伯格的女儿》，再就是《七月的人民》。纳丁·戈迪默一直住在约翰内斯堡①，近些年来她开始就南非的政治局势发表看法。她刚发表了一部新著《大自然的游戏》，这本书我们等一会儿还要谈到。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言归正传，谈谈你是如何开始写作的吧。我想你写短篇小说写了很长时间吧。

戈迪默 是的，我从小就开始写短篇，15岁时在南非的一家小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故事，一篇写大人的故事。

沃尔特斯 你是否发现，像其他一些非洲作家所说的，你创造了一种表达非洲自然情感的语言。你大概是在欧洲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吧。

戈迪默 没错。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去创造一种特殊的语言，只不过是某些单字，我们生活在南非的人看得懂，但是外边的人看不明白——比如donga是"沟渠"的意思②，还有一些植物和鸟儿的名字等等。我习惯于阅读，比如很喜欢美国南部的那些作家③，但我不知道Judas tree④是种什么树，也没见过chinaberry tree⑤是何种模样，更没有听过有谁像南方人那样说话。小说家不可能到处都加注，时时解答问题，我不认为有那种必要。

沃尔特斯 你是何时周游海外的？

戈迪默 出游是一种愿望。我想看看欧洲，但一直没有机会。

---

① 南非最大的城市。

② 相应的英国英语单字为ditch。

③ 即美国南方作家，包括福克纳、安·波特和韦尔蒂等，他们的作品多描写南部各州的生活，俚语和土语较多。

④ 南欧紫荆。

⑤ 楝树。

而我的许多同时代人都纷纷前往。一个人向往文学与艺术，但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又无所作为，于是就去伦敦，去巴黎，海明威那一代人是这样，更早的几代人也是这样，因为你在俄亥俄，在威尔明顿或斯普林斯[1]成不了画家或作家。当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已经没有那种看法。现在的人刚好相反，如果一个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迫流亡国外，那简直如丧考妣。

沃尔特斯 对你来说，住在国内显然至关重要。

戈迪默 是的。我觉得不管我生活在何处，我都会成为作家，因为我一生都在写作。但我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作家。

沃尔特斯 你是否认为流亡对作家大有益处？在《说谎的日子》里，那位名叫伊萨的小说家准备去英国写书。

戈迪默 不，我看不出有什么益处。我觉得有一些天赋极高的作家，流亡时也会继续写作，但是写出来的书不会是留在国内时会写的那种。我并不是说流放是一种扼杀天赋的灾难；只要有天分，就不会被扼杀。你们已经有多丽丝·莱辛[2]，有丹尼斯·布鲁图斯，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人。但我认识更多的一些人，因为流放而变得痴呆，因为性格中的某种脆弱而遭致扼杀。他们的一生成为悲剧，结局极为悲惨。

〔这次座谈安排了一些听众参加。沃尔特斯就戈迪默的几部长篇小说《博格的女儿》、《大自然的游戏》、《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和《七月的人民》提了一些问题之后，请戈迪默朗读了《大自然的游戏》中的一些片断，然后请听众提问〕

---

① 均为美国中部城市名。

② 多丽丝·莱辛(1919—)，英国女作家，出生于伊朗，后移居罗得西亚，一生颠沛流离。著有《金色笔记簿》等。

听众 有一部书你没有提到，但也许是因为生活背景的缘故，我很感兴趣，就是《尊贵的客人》。我生于希腊，经历过独立战争后的内战。我很想听戈迪默女士谈谈看法。你一定明白我在这里指的是津巴布韦①。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正是对非洲独立运动的理解促使你写下了这部近乎于预言的书？

戈迪默 是的，我头脑里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国家；我用上了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自然特征，还加上了一点博茨瓦纳和肯尼亚。但是那种动乱却是我研究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局势之后总结出来的。比如说吧，贸易联合体在西非就相当重要，小说家拥有把这一切都集中在一块的自由。

听众 你说你花费了好长时间才变得具有政治意识。那你是否认为女性作家应该进入政界，在男性政治作家的行列中取得一席地位呢？

戈迪默 我并不认为就是否应当变得更有政治意识这一点而言，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在一个社会里都是人——除非你谈论的是女权主义政治含义上的那种女性。我确实无法给你一个恰当的答复，因为我并非女权主义作家，根本就不沾边儿。我是一个女人，我所写的东西显然受到我是一个女人这一事实的影响，但是既然提到政治，可以说我所关心的是人的解放，无论其性别或肤色如何。至于我自己，我不过是一位女性作家，仅此而已。

听众 读完《七月的人民》，我对最后一章有些不解。我们是不是应该相信莫琳只身逃走了，离开了她的家？

戈迪默 对，她是离开了家。我想她是。这就是我称之为结局

① 津巴布韦当时刚获独立，国内局势较为动荡。

开放的书。我恰好喜欢结局开放的书，别人写的结局开放的书。因为我觉得生活就是如此；只要没死，就没有定论，甚至人死了都无法盖棺定论呢。因此可以说并没有真正的结局。作家是随心所欲的人，可以把这儿的生活挪到那儿去。

听众 戈迪默女士，我读过而且还重读过你的一些作品，但并没有全都读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注意到了你的犹太风格。你是否可以谈谈这种犹太风格对你的生活和你的作品具有什么影响？

戈迪默 说来奇怪，希莱拉① 是我九部小说当中的第一位犹太英雄或女英雄。但是她的犹太血统并没有对她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犹太血统对我毫无影响。我的家庭并不宣讲犹太教，也从未提到过任何有关犹太民族历史的事。倒是长大以后我自己读了一些。我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这个事实，但它对我的生活观、人生哲学和道德准则的形成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对我而言，基本的事实是我是一位白种非洲人。

听众 在南非对你的作品是否有政治上的批评？

戈迪默 你是指普通民众？

听众 政府或者执政党派。

戈迪默 执政党派恐怕未给我这份荣誉。不过我的几部书被查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获开禁。当然有政治上的指责，说你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很自然，我认为，在所有的国家都会有这种事。如果你属于左翼，像我这样，左翼里还有众多派别，这派说你的观点不合适，那派却表示赞

① 希莱拉是戈迪默所著《大自然的游戏》中的女主人公。

同。这就是我们不曾拥有的民主的一部分。我们只在私下里拥有那份民主。

听众 我想就你刚才所说的你并非女权主义作家这种说法斗胆说上几句，因为我发现《大自然的游戏》是一部关于"女英雄主义"的小说。希莱拉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萨萨也是如此，她拒绝盲从他人，只愿走自己的路。村子里的这两位妻子对比十分鲜明——黑妻子嫁给了白男人，白女人嫁给了黑丈夫，这种情景非常有趣，希望你随便谈谈。

戈迪默 我想任何以女人为中心角色的创作片断，都可以从女权主义的观点进行阐释，这是由于妇女多少年来的地位造成的。我所理解的女权主义小说包含有对女性的某种印证。我觉得，也许在潜意识里，希莱拉身上有诸多关于女人，关于女性性格形成因素的东西。但这并非是有意为之。

沃尔特斯 我谨代表诸位对你的到来表示感谢。

戈迪默 谢谢你们邀请我。

东子 译

戈迪默访谈录之三：

作家必须保持艺术独立

(1989)

〔美国〕泰利·格罗斯

本文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泰利·格罗斯对纳丁·戈迪默的采访。播出时间为1989年5月24日。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格罗斯 纳丁·戈迪默是南非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长期以来她坚持反对本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在自己的长篇和短篇作品中描写了种族隔离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极度痛苦。在《七月的人民》中，她设想了内战生活；而在《大自然的游戏》，她则描述了黑人多数统治的前景。戈迪默是国际笔会(PEN)副主席，最新的作品《基本姿态》刚刚出了平装本。这本书收入了她从50年代初期到1985年期间所写的散文随笔。其中的许多文章说明在南非做一名作家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一名白人妇女，她如何看待自己与种族隔离制度所作的斗争。前不久，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家戴维·韦伦

斯特在南非遭人谋杀，许多黑人和白人不顾禁令集合起来为他送葬。戈迪默对我说，她把此事看作是一种乐观的迹象。

戈迪默 看见黑人和白人为了韦伯斯特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你就会感到乐观，而并非像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人跟我说的那样，一旦建立黑人多数统治，在南非就没有白人的位置。我不相信会那样，而且也并未见到那种迹象。一切都取决于白人，取决于他们如何行事，取决于他们现在站在哪一边，不仅仅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格罗斯 我很想知道你是何时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的。你生在南非，父母都是移民。母亲是伦敦人，父亲，我想是立陶宛人。你生活在一座小矿城里吧。

戈迪默 嗯，跟我自己孩子的政治意识相比较，我的悟性其实并不高。不过在那座小城里，你完全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接触不到震撼人心的思想，只能看到父母和老师的生活态度。等到我进入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我就读的是一所修女学校，所有的孩子都是白人。我所接触到的黑人都干伺候人的活儿，比如扫街、送信等等。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在我身边忙碌。那是一座淘金小城，当然还有数以千计的黑人季节工人住在营地里，距我们的住所很近，但被截然隔离。我十几岁的时候读到了厄普顿·辛克莱这样一些作家的书——我读了很多书——开始想到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公平，开始注意起周围的生活。我很早就开始写作，17岁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关于种族隔离的，并没有直接描写，只是叙述了其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

格罗斯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是否也意味着你不得不反对自己的

父母呢？你父母赞同那种制度吗？

戈迪默 我想，我父亲是赞同的。你一定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没有apartheid（种族隔离制度）这个词呢。种族主义政权1948年才建立起来，那时候我已经长大成人。我说的是三十年代，那时实行的是殖民种族主义政策，里面掺合着家长统治的因素。我母亲具有社会良心，她做了许多好事，在这里我并没有讥讽的意思。她和别人一道在黑人聚居区附近为黑人孩子开办了一所孤儿院和一家诊所，看见黑人受到虐待，她总是又难过又生气，当然也仅仅只是一种慈悲。她并没有把那一切与制度联系起来，并没有想到那是因为他们不曾拥有与白人平等的权利的缘故。

格罗斯 对于你，写作是否是对社会不公正的一种答复？

戈迪默 写作不是对不公正的答复，我那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不公正。我开始写作是出于对生活的惊奇，想发现其中的奥秘，这是我探寻生活的方式。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样。我不认为有哪个真正的作家是因为政治因素而开始写作的。

格罗斯 50年代你与许多黑人作家结成了朋友。在那个年代，黑人作家与白人作家要结成朋友，是不是有许多障碍？

戈迪默 是的，是有许多，不过我想到处都一样，可能在美国也是如此。作家、艺术家、演员和记者都想摆脱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彼此找到感兴趣的共同的东西，那些东西超越肤色、种族和语言。我认为在南非也是一样。我与一些初学写作的黑人青年拥有许多共同看法，那些共同看法是如此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与那个小镇上的人的共同之处。

格罗斯 那座小矿城的人是否把你看作叛徒？

戈迪默 我很早就离开那里了，不清楚他们如何看待我。我在那里时，只是埋头写作，那是一项秘密活动。没有谁对此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这实在是件大好事，因为这样我可以按自己的思路进行。第一本书出版时，他们有点恼火——那时我母亲还住在那里——因为写的是那种小地方，里面多少有一些自传的成分。

格罗斯 我听一些在南非从事解放运动的白人说，他们担心一旦爆发革命，就会出现针对白人的狂热行为，而且不会把赞同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区别开来。你是否担心这种事情？

戈迪默 不，我必须说我不担心。我觉得奇怪的是你说说这话的人是解放运动活动分子，因为只有从未对黑人做过什么事的人才会有这种担心。

格罗斯 我在这里不想说出姓名，但是的确有一个人对我这样说过。

戈迪默 我想以前也许有这种可能，在70年代闹黑人分离主义的时候。但是如今随着联合民主阵线①的建立——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处于半公开状态——民主意识已经超越肤色的界限。

格罗斯 你的三本书受到了审查，是这样吗？

戈迪默 我的三本书在南非被查禁了许多年，不过近来已全部开禁。我乐观地希望这种事将不再发生。查禁我这样的作家对当局来说实在不怎么划算。审查制度现在已经由查禁书籍转移到了查禁出版社。真正的压力在出版社和新闻媒介。

---

① 南非8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一个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组织，参加者有黑人，也有白人。

格罗斯 审查是否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表明当局对一本书感到恼火，不希望别人读到它？

戈迪默 对，我想是如此，对我来说，这是对别人无法读到自己作品的一种补偿。不过现在小说作品很少遭查禁，甚至连相当棘手的非小说作品也极少遭遇这种命运。这是因为如果这类书达到某种层次，读者就不会太多。你一定清楚对电视就进行了绝对控制，都是官方电视。我这种人不为电视写作。我们从不在讨论节目中露面，根本就不容许你露面。

格罗斯 我跟你读一段你以前关于写作的论述。你说"最好的写作方式就是好像你已经死了，不害怕任何人的反应，不理睬任何人的观点"。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是不是你招惹了南非两边的人？

戈迪默 不，这是一种信念，要深远得多。我认为作家必须永远保持独立，保持艺术独立，运用自己的洞察力——超出他人的洞察力——而不要担心是否冒犯你的母亲和好友，不要担心你的政治上的同道会对你怎么看。作家永远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宣传家。宣传家有宣传家的位置；鼓动家有鼓动家的位置。我不属于那种；我不是那种人。我是作家；我具有某种才能，我觉得我首要的责任就是恰如其分地运用我的才能。你越是接近真实，就越能恰当地运用你的才能，而不必去担心别人怎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这个准则，写作时就好像自己已经死了，不去考虑会有什么后果。

东子 译

戈迪默年表

1923年 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山小镇斯普林斯，父母都是犹太人后裔。

1932年 9岁，开始写一些小诗和小故事，发表在当地报纸的儿童栏目内。

1938年 15岁，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周刊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明天再来》。

1946年 23岁，进入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斯特兰大学。

1948年 25岁，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同年开始一次短暂婚姻，后生下一女儿。

1951年 28岁，作品发表在美国《纽约人》杂志并引起美国文坛的注意。

1952年 29岁，在美国出版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温柔声音》。

1953年 30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纽约时报》称它"成熟，洞悉人生，笔法新颖，独具风格，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媲美。"

1954年 31岁，与商人莱因霍尔德·卡塞尔结婚，生下一子。同年她第一次访问埃及，从此开始了她在非洲大陆的旅行。

1956年 33岁，出版短篇小说集《六英尺土地》。

1958年　35岁，出版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该书歌颂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友谊，也揭示了黑人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因此，该书在南非遭禁达十年之久。

1960年　37岁，出版短篇小说集《星期五的足迹》。

1963年　40岁，出版长篇小说《爱的时机》。

1965年　42岁，出版短篇小说集《不是为了出版》。

1966年　43岁，出版长篇小说《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其主题是：种族隔离政策使白人和黑人同时成为牺牲品。该书在南非遭禁达十二年之久。

1971年　48岁，出版短篇小说集《利文斯通的伙伴们》和长篇小说《尊贵的客人》。《尊贵的客人》写的不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而是黑人集团之间的争斗，该书获詹姆斯·莱特·布莱克纪念奖。

1974年　51岁，出版长篇小说《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该书获布克文学奖。

1976年　53岁，出版短篇小说集《小说选》，该书获法兰西国际文学大金鹰奖。同年另出小说选《一个确定的星期一》。

1979年　56岁，出版长篇小说《博格的女儿》，该书写的是一个南非白人共产党领袖的女儿继承父志勇敢抗争的故事，此书曾被禁四个月。

1981年　58岁，出版长篇小说《七月的人民》。

1987年　64岁，出版长篇小说《大自然的游戏》。

1988年　65岁，出版随笔集《根本的姿态》。论者称该书“表明戈迪默是一个敏锐的记者、坦率的自传作者，是南非的良心”。

1990年　67岁，出版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

1991年　68岁，获诺贝尔文学奖。

莫雅平　辑